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第一辑）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Outside:

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ern Containment Strategy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来自外部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薛小荣 高民政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第一辑）

高民政 主编

Revolution from the Outside:

The Reform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estern Containment Strategy in the
Period of Gorbachev

来自外部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薛小荣 高民政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 薛小荣，高民政著.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 11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 / 高民政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 - 7 - 201 - 12496 - 4

I. ①来… II. ①薛…②高… III. ①对外政策 - 研究 - 苏联 - 1985 - 1991 IV. ①D85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9475 号

来自外部的革命

LAIZI WAIBU DE GEMING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郑 玥
特约编辑 王佳欢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9.25
插 页 2
字 数 5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你们都是些盲人、瞎猫，要是没有我，你们准得被帝国主义者一个个插死。

——约瑟夫·斯大林

资本主义的思想家冒充人道主义和人权的捍卫者，企图迫使社会主义世界接受与我们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准则及标准，破坏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而没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生活本身以及人类活动就要丧失自己的意义。他们想要使人养成资产阶级社会中盛行的习惯和兴趣，“松动”人的意识，使之容易接受小资产阶级思想、声色犬马的诱惑，易于接受个人主义、小市民的发财意识和芜杂的思想文化。

——米·谢·戈尔巴乔夫

无论苏联统治者出于自由意志调整自己的政策，还是以其他方式发生变革，我都坚信苏联一定会发生变革。我对人类自由怀有深刻而持久的信仰。在耐心和勇气的支持下，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新时代。

——哈里·杜鲁门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是一种思想结束、共产主义试验的最后篇章结束的见证人。现在，甚至连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本身的许多人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破产的制度。

——乔治·布什

目 录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1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1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4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10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13
第一章 改革的含义:意识形态与战略霸权	19
一、西方的战略企图:摧毁共产主义制度	20
1. 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与变革的世界	20
2. 西方战略:封堵、渗透与政治颠覆	23
二、苏联的战略目标:巩固共产党的执政	27
1. 战略选择:政党逻辑、战争记忆与苏联模式	28
2. 战略行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世界战争	39
三、冷战与改革:战略对抗与调适	54
1. 铁幕与冷战:两大阵营的战略对抗	55
2. 改革与调适: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	66
3.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主义原则	77
四、“颠覆”与“联盟”:西方的对苏战略	80
1. “人心之争”:自由与战略	80

2 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 2. NSC68:美国全球冷战蓝图 91
- 3. “神圣联盟”:里根与教皇 93

第二章 撒切尔、里根—布什、科尔与戈尔巴乔夫 96

- 一、撒切尔:不喜欢共产主义 97
 - 1. 撒切尔与里根:抛弃国际缓和政策 97
 - 2. 戈尔巴乔夫: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00
- 二、里根—布什:从遏制到超越 105
 - 1. 里根主义、邪恶帝国与戈尔巴乔夫 105
 - 2. 布什主义、超越遏制与戈尔巴乔夫 114
- 三、科尔:我要的是德国统一 125
 - 1. 柏林危机与德国的分裂 126
 - 2. 科尔—昂纳克:选择谁? 130
- 四、戈尔巴乔夫:“人”的意义 140
 - 1. “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观 140
 - 2. 出国访问、首脑会晤与戈尔巴乔夫 142

第三章 意识操纵:西方价值的灌输与渗透 145

- 一、心理战略:反击共产主义政治战 146
 - 1. NSC4 - A:《心理行动》 146
 - 2. 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 151
 - 3. 政治战争:美国新闻署 160
- 二、广播政治:美国之音与自由电台 164
 - 1. 美国之音:不是搞广播而是搞革命 165
 - 2. 自由欧洲电台:灰色和黑色的宣传 169
- 三、文化政治化: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174
 - 1.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文化的塑造 175
 - 2. 乔治·奥威尔:被塑造的政治艺术形象 184

第四章 对外交往:西方与苏联的社会生活	189
一、窗内窗外:社会的信息管制	190
1. 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穿越铁幕”与“解冻”	190
2. 卡特—勃列日涅夫:“人权”与《赫尔辛基协议》	198
二、外交往来:政治态度的转变	206
1. 外交老一代:葛罗米柯——苏维埃利益的维护者	206
2. 外交新一代:谢瓦尔德纳泽——“新思维”的执行者	215
三、社会落差:戈尔巴乔夫惊叹	222
1. 国内与国外: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223
2. 人道与民主:戈尔巴乔夫的新社会主义	227
四、思想共鸣:西方的价值植入	233
1. 工业化、信息化与思想控制的销蚀	234
2. 公开性、民主化与思想闸机的开放	242
第五章 政治渗透:西方与苏联的政治运动	247
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西方的机会	248
1. “解冻”与“春潮”: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249
2. “立场”与“偏见”:秘密行动与诺贝尔文学奖	254
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内部的革命	260
1. 改革与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260
2. 权力与野心:反对派与失控民主	264
三、政治反对派:叶利钦与西方国家	267
1. 改革的“佐罗”: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	268
2. 叶利钦与美国之一:苏联人民代表	275
3. 叶利钦与美国之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280
4. 叶利钦与美国之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	282
5. 叶利钦与美国之四:“八一九事件”	287
四、苏联的独立运动:波罗的海三国	291
1. 走向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运动	291

4 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2. 寻求外援:波罗的海运动与西方国家	300
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东欧剧变	304
1. 西方的机会:东欧的新危机	305
2. 辛纳屈主义:苏联的新政策	314
3. 东欧的民主:治病的良药吗?	318
第六章 经济援助:西方与苏联的经济改革	321
一、西方的经济战略:政治的目标	322
1. 目标:削弱共产主义的生存潜力	322
2. 手段:巴黎统筹委员会与经济战	327
二、苏联的艰难改革:沉重的经济	333
1. 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及其发展的困境	333
2. 加速战略与戈尔巴乔夫的最初努力	337
三、西方的经济援助:致命的毒药	342
1. 经济改革的阻力:官僚阶层	343
2. 西方的经济援助:政治企图	348
3. 市场经济的神话:改革破产	353
4. 资本主义的幽灵:改革诡计	362
第七章 军事竞赛:西方与苏联的改革困境	366
一、美国的军事政策:军事竞赛与实力优势	367
1. “星球大战”:技术与信心	367
2. 秘密援助:阿富汗战争	373
二、苏联的军事改革:“新思维”与战略的转变	380
1. 核恐惧:苏联军事思维的新变化	381
2. 裁军:“合理足够”的军事力量	385
3. 撤军:苏联军事力量与东欧剧变	391
三、分裂与瓦解:苏联军队的“中立旁观”	393
1. 改革与“新思维”:苏联军队的“非政治化”	394

2. “八一九事件”与苏联军队“中立旁观”	398
第八章 全人类利益:政治价值与国家利益	405
一、“全人类利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价值	406
1. 全人类利益:持久的和平	406
2.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幻想	409
3. 和平的演说:改革的表白	413
二、共产党—苏联命运: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416
1.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与阶级立场	417
2. 国家利益:国际政治的现实本质与苏联的自我放弃	420
三、苏联—俄罗斯人民:社会生活与民族情绪	431
1. 改革的阵痛:人民的痛苦与民族情绪	432
2. 民主的限度:与国家的自由繁荣无关	436
3. 普京的反思:体制性危机与改革悲剧	439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442
参考文献	450

导言 “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人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引发的苏东剧变犹如一场“政治地震”，是20世纪震撼人心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事件从1989年东欧国家剧变开始，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基本结束，大体只经历了两年时间，其来势之凶猛、时间之短暂、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如何认识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实际上，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①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透过纷繁复杂的表层现象，揭示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深层根源，从而在吸取苏联改革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苏东社会主义剧变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战略思维，回答了人们最关心的“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朝着既定的方向坚定前进。

一、深刻总结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重大意义

全面深刻地研究戈尔巴乔夫改革，既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现状及发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91页。

2 来自外部的革命——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与西方的遏制战略

展趋势的正确认识和深刻把握,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走向的高瞻远瞩与战略思考,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是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真理性的必然要求。随着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甚嚣尘上。西方舆论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理想已“被埋葬”。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一书中认为,社会主义在实践上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在思想领域”,是对历史发展作出了“根本错误的判断”。曾流亡英国的波兰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则称“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同时,苏东剧变造成各国共产党内部思想的大混乱,集中表现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泛滥,党内对有关党的性质、作用、前途、指导思想、组织原则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产生分歧,出现许多模糊认识和错误想法。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已经过时?社会主义是否已经失败,而资本主义已经获胜?共产党还有无必要存在下去吗?怎样才能存在下去?还要不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敌对势力别有用心地谬论和共产党内部思想的混乱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现实的指导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还是否科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但是如何解释苏东剧变这一“历史之谜”呢?这是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①。江泽民指出:“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②总结的不好,就有可能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会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从现实意义上讲,加强对苏东问题,特别是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研究,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为当前正处于深水期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20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

^① 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学习”(1999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6页。

^②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兴起以及在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国际经济竞争和科技进步不断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从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等一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深刻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格局。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严重挫折。这样一个错综复杂、变化深刻的历史进程,向人们、向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提出了许多重大课题:世界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应该如何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开辟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应该怎么加强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长治久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对于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来说,科学地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正确地回答苏东剧变带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年摆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怎么办”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对于我们来讲,汲取的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必须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寻找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实际的建设道路,而不是从书本中、从模式里简单套取。苏东剧变的沉痛历史教训说明,“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①。在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政治勇气,实施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事业焕发出了新的生机。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下带领中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在于党能够深刻总结我国和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我们党能够继续执政和发展,社会主义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在中国能够充满新的生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条宝贵经验。”^①

二、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的原因分析

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体制因素

邓小平认为:“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②这是邓小平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总的看法。“很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③,缺乏民主和监督,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造成个人崇拜,导致精神生活畸形

“不是很成功”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高度集中的党内外体制,使权力过分集中,各级政府机关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党政机关容易脱离群众;事实上的干部委任制和干部终身制,滋长了官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不健全,党和国家监督机关的职能被削弱,专政职能加强,等等。同时,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苏联社会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之中,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由于政治权力的强行干涉,整个苏联社会的精神生活畸形发展。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严重压抑了学术理论的民主,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分析事实的权利,造成了党和人民思维意识的保守与惰性,使苏共理论全面滞后与僵化。

(2)“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④

这是邓小平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总的

^① 江泽民:“加紧培养适应新世纪要求的中青年领导干部”(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② 邓小平:“解放思想,独立思考”(1988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③ 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④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1985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

认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发展阶段上的一种体制模式,它对促进苏联社会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于发展生产力而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纵向与沙俄时代比较,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面貌,经济上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横向与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快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但是随着战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这种体制统得太死,缺乏活力,地方和企业积极性受到扼制,职工积极性得不到发挥,更主要的是违背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工业化和全盘农业化的发展道路,使农、轻、重比例极不协调,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高投入、高产出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无法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造成工业生产效益低、投入产出比不佳等问题。从赫鲁晓夫开始,苏共领导人曾经试图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差与歪曲,对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清楚,苏共领导人只能对这一体制作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体制改造。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不是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而是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2. 理论原因

理论上的优势是无产阶级执政的首要条件,没有理论上的清醒,就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就在于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与曲解。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理论上的僵化与教条主义

邓小平认为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1985年5月16日,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邓小平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在这里,邓小平明确了两个意思:首先,无论是苏

^①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页。

联还是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还没有认识清楚;其次,必须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七十多年的历史而观,苏联共产党一直没有真正搞清楚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运行机制的关系,也没有真正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导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模式一直在苏联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苏共既想改革,破除这一僵化体制,但又囿于没有正确认识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误把作为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表现形式的运行机制看作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使这一体制在实践中与根本制度发生冲突,日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戈尔巴乔夫虽倡言改革,但是和他的前任领导人一样,没有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因此在改革的实践中,使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成为一种非此即彼的关系,即要么实行改革,那就意味着要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要么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那就是说要反对改革。这种错误的改革心理发生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

(2) 理论上的曲解和偷换概念

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不仅没有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反而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曲解和偷换概念,从而导致了苏联社会的思想大混乱,以致无法有效抵御西方势力的思想入侵。江泽民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最近南斯拉夫政局的演变等事件,除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外,执政党内和群众中发生思想变化、思想混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①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理解误区和形而上学的曲解,导致党的指导思想日益僵化与混乱。赫鲁晓夫时期,“三和两全”的路线方针更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路线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抽象的人道主义,对以后的苏共领导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影响至深。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后,继承了赫鲁晓夫“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全盘接受了他的“人道主义观”,声称改革就是要“最充

^① 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88页。

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①。同时,戈尔巴乔夫还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核时代观”与“三和”路线,并将其发展成为所谓的“对外政策新思维”。戈尔巴乔夫把这一认识理论化、系统化,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使苏共彻底抛弃了认识和辨别事物的思想武器。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苏东各国共产党进行了彻底的政治改造,根本改变了党的阶级奋斗目标、指导思想、组织原则,从而由共产主义式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式的资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性质方面,把党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全民党”,否定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在奋斗目标方面,把共产主义改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要把苏联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在指导思想方面,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旨在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在组织原则方面,抛弃民主集中制,主张“普遍的民主”,即没有集中的民主。实际上是想使共产党失去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成为一个派别林立、自由组合的组织和松散的政治议论俱乐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推行,使党变质,使社会变色,在苏东剧变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

3. 党的原因

1989—1990年,东欧国家相继出现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物价上涨,拖欠西方国家大量债务,群众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羽翼日渐丰满,执政党内部陷入分裂。西方国家借机公开支持东欧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成立组织,并直接向东欧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条件,召开圆桌会议。波兰的团结工会在这种背景下上台执政,拉开了东欧国家政治剧变的帷幕。接着如多米诺骨牌一般,东欧国家的执政党相继改组并在大选中下台。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如此形势,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情况之所以能够出现,问题首先出在东欧国家的执政党身上。他说:“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5页。

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①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邓小平在次年的“南方谈话”中更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②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苏联共产党指导思想混乱

苏东剧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在邓小平看来,主要是苏共长期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缺乏一条坚定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和一套健全的、马克思主义的抵御“西化”“分化”的战略与策略,因而导致党内和社会上思想混乱,继而使党组织涣散、分裂、失去战斗力。江泽民也认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和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等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③

(2) 苏联共产党内部政治分裂

“苏共从党章中取消民主集中制后,党也就四分五裂了。”^④江泽民指出,国际敌对势力和国内一些人更是想在我国搞出一点乱子,以图乱中取胜,否定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还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中的办法,一些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已钻到了相当的岗位,准备十年后同我们算账。他们人数不多,但能量不小。这还不值得我们极端注意和高度警惕吗?我们的同志头脑要清醒,而且要站在斗争的前线。”^⑤他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牢记一九八九年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给世人

① 邓小平:“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4页。

②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0页。

③ 江泽民:“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001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0页。

④ 同上,第226页。

⑤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113页。

提供的深刻教训”^①。同时江泽民特别强调,领导成员之间最忌讳的就是有人不但不去维护团结,反而挑拨离间、两面三刀,专门在班子里面搅和。海外有些报刊经常搞出一些挑拨离间、无中生有的东西,有的人往往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甚至加以散布,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有的人整天不干正事,专门造谣诽谤,写份材料用复印机一复印,到处发送,看起来好像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其实谣源就是他一个人。“对我们内部、对干部队伍中出现的这样的害群之马,一定要严厉查处,不能放任不管、姑息养奸。对搞挑拨离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大家务必保持警惕,绝不能让这种人钻到领导岗位上来。如果让他们得势,就会误党误国误民。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苏联党的历史上,都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大家要牢牢记取。”^②

(3) 苏联共产党严重脱离人民

苏联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不仅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混乱,更为关键的则在于党与人民的分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割裂了党群关系,弱化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尽管各自的原因很复杂,但人心向背的变化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③。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治设计者、组织协调者、思想引导者和行动带领者,其力量源泉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离开了人民群众,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中国没有一种政治势力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很牢固,但如果作风问题解决不好,也有可能出现‘霸王别姬’这样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人心向背事关重大,失去了民心,党就有危险。”^④

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防止党脱离人民,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

^①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② 江泽民:“领导干部要在思想、作风建设中作出表率”(1998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页。

^③ 江泽民:“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

^④ 习近平:“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页。

人”，如何更好地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共产党的一个严峻考验，也是共产党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综观苏共执政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缺乏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即民主的选举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无法从具体制度上保证党能够切实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却在党内形成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特殊要求、特殊地位和特殊工作方式的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使苏共日益走上了腐化变质的道路，造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中断，使党的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盛行，党缺乏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敏锐性，僵化保守、不思改革，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又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涣散了党的组织，弱化了党的战斗力。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民主化”“公开性”的旗帜下，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势力借此大肆诋毁、攻击、否定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成就，进而否定“十月革命”，破坏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使党在改革的大潮中失去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造成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三、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判断

如何看待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呢？中国共产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1. 一个现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

戈尔巴乔夫改革及其失败引发的苏东剧变，其直接后果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严重挫折。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首先，从思想上来说，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受到冲击与质疑，科学社会主义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究竟走向何方？等问题困扰着人们。其次，从现实力量对比上来说，由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世界上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地图上消失了，它改变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就世界范围内来说进入了低潮。同时，也对现存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究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提出了强劲挑战。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目前社会主义运动处在历史发展的低潮期,但是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现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是真理,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仍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对中国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关键是我们的精神状态要振奋,要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才能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低潮孕育着高潮。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来看,低潮将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预示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只要我们坚守住社会主义阵地,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好,就是我们的贡献。

2. 一支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

以苏联为代表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虽然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但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力量。苏东剧变发生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何去何从,成为世人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明确表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①，“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②。从历史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早在苏东剧变的时候,邓小平就强调:“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只要“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只要中国“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③

1989年9月29日,江泽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②③} 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1989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0~321页。

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深刻的变革。1991年7月5日,江泽民在会见葡共总书记阿尔瓦罗·库尼亚尔时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是新生的社会制度,出现曲折是难免的。他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充满信心,重要的是各党要认真总结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是乘着“担子重,责任大”的高度负责的精神,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国不能因为苏东剧变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政策,而是要继续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江泽民说:“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继续保持蓬勃生机;在改革中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就会葬送党和人民七十年的全部成果。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①1991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原主编博奇格雷夫的采访时,就苏联和东欧发生剧变后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表示,一些人预言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会失败,这起码是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模式,也不是东欧模式,而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这条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奋斗与摸索作出的历史性选择。

3. 一个趋势——社会主义长期性与艰巨性、必然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苏东剧变的发生只能说明苏联和东欧所实践的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失败,而不能说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失败。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划时代的新生事物,从其建立之日起,就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之中,其间出现一些失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

^①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页。

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

四、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

苏东剧变留给我们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建设党。江泽民强调:“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在党和国家面临严峻考验的重大政治斗争中,我们党的队伍、党的组织总的来讲是好的,但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不及时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不消除党内存在的隐患,党和国家就不可能长治久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从反面给我们提出了这个严肃课题。”^②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着眼于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

1. 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

思想建党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与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轻视或放弃,也是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首先是从思想上的胜利开始的,“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历程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也是从思想理论的僵化落后开始的,苏东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失败为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这一原则。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生活发

^①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383页。

^② 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2000年),《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47~548页。

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改革和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特别是改革的深化引起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和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带来深刻影响。旧的平衡打破之后,新的平衡尚处于建立和完善过程之中,人民内部矛盾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党如何才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更好地解决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呢?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要求我们党首先必须在思想上有清醒的认识,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关键是要加强党性修养,严格党内生活。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不可能随着党龄的增加而自然增强,也不可能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不强、威信高不高,跟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密切相关;一个班子党性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也同有没有严格的党内生活密切相关。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这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观点,也是极为重要的政治要求。

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些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其消极影响和后果不可低估。历史和现实一再告诉我们,执政党不注重作风建设,听任不正之风侵蚀党的肌体,就会损害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甚至失去民心,丧失政权。那么面对这些严峻挑战应该怎么办?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能不能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

2.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在苏联政治体制中,苏共名义上是执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

“整个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活动都以共产党一个党做骨干。整个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停滞或前进,是倒退或转向,完全由党的会议决定。”^①统一的苏联共产党不仅肩负着捍卫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重任,而且也肩负着维护联盟国家统一的重任,因此改革必须依靠苏共的力量来进行。这既是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

然而苏联政治体制的这一结构性特点不仅决定了苏共既是改革的倡导者、领导者和推动者,是改革的主要领导力量,同时也是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改革的客体。因此在改革时期,苏共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也更为敏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苏共成为其政治上的反对派——苏共党内和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势力和要求脱离苏联而独立的各加盟共和国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共同敌人。苏共既阻碍着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争夺国家政权,扭转国家发展方向企图的实现,又阻碍着各加盟共和国“地方精英”和民族主义势力摆脱联盟中央控制、走向完全独立的“雄心”的实现。而戈尔巴乔夫等苏共领导人发动的改革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的地位,实际上就是使国家政权陷入混乱和瘫痪。维系联盟国家的支柱——苏共的瓦解直接导致国家政权的失控,造成社会制度的剧变,随后便是联盟国家的解体。这是苏联政治体制改革失败的根本之处。因此,“苏联的制度之所以垮台,并不是因为那里有太多的国家,而是因为根本没有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政党取代了国家”^②。而“把共产党清除出政治舞台以后,一下子就使苏维埃社会失去了支撑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和实践活动体系的基座”^③,使改革失去了控制。

在中国,邓小平在领导政治体制改革之时便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

① [南斯拉夫]密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陈逸译,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1981年,第91页。

② [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主编:《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③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序言第3页。

党的领导。”^①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主要原因是:首先,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在改革中,要明确地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如何执政和如何领导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这样的改革是党自己的事,不能靠别的什么力量来领导,只能而且必须依靠党来领导。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核心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涉及党政关系,而且涉及党同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的关系,还要解决领导干部终身制、干部队伍实现“四化”和发扬人民民主等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进行统筹处理,这些问题很难解决。再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特殊复杂性,涉及面广,关联的问题多,又直接牵扯很多人的利益,需要在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下进行。这就需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及时解决可能引起不安定团结的因素,保证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国家搞所谓‘休克疗法’,结果引起了剧烈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教训是很深刻的。”^②而中国的“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我们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失误,一旦出现就无可挽回、无法弥补。”^③可以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3. 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

苏东剧变,其根源在于执政的共产党砍了列宁主义的旗帜,推行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亡党首先是从思想上开始的。从斯大林时期的中后期开始,苏共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存在着严重的教条理解和形而上学的曲解,不是根据现实

^①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页。

^③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4~35页。

生活的要求进行发展创新,而是在更多时候恰恰犯了列宁所说的“制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设想不分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全盘照搬,忽视苏联国情,在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的作用之下,大搞社会主义的“直线式”进攻,企图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立即建成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适应了改革对马克思主义要求创新的现实需要,但他根本否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只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抽出一些他认为“有用的东西”,连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费边的社会主义著作中的“积极内容”,社会党国际的纲领中“合理的内核”一起,甚至与康德哲学中的“伦理观念”、基督教教义中关于“人的价值的思想”一起,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中,使苏共失去认识事物、辨别是非的能力而成为理论上的“侏儒”,丧失了执政的思想根基。正如普里马科夫所言,由于苏共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具有不容争辩之科学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被宣布为唯一正确的科学流派,而一切其他流派均为异端邪说。马克思主义被反复确认为万能的学说,对千变万化的现实不需任何适应地保持着自己所有结论的正确性——而与之争辩的尝试均宣布为离经叛道。最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被神化了,实质上变成了圣像”^①,使马克思主义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最终导致思想的枯竭。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苏共丧失了理论创新的意识和勇气,丢掉了改造主客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弱化了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与解决重大问题的理论能力。社会主义大厦的崩溃正是从苏共思想理论上的贫乏开始的。正如曾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博尔金所言,导致党被削弱的最深刻原因是,苏共和社会失去了一个全民族的伟大思想。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教条。正是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而戈尔巴乔夫又提不出能够把人们联合起来的切实有效的新思想,最终导致苏共彻底失去了社会领袖的地位并被迫解散。

^①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在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从中国实际出发不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最终形成了指导中国改革的伟大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更是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历来是全面改革。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能把这说成是不改革。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生搬硬套在自己身上。要从我国国情出发、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发,有领导有步骤推进改革,不求轰动效应,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①

4.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

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只有把党自身建设好,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带领中国人民阔步前进,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所言:“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领导人民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因此而自豪,但我们自豪而不自满,决不会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在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②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0页。

^②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第一章 改革的含义：意识形态与战略霸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被公正地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后果的事件”^①的改革，其目的在于重新塑造苏联国内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使之符合社会主义民主价值。同时，在重新构建与西方国家的新关系中，改善苏维埃的国家形象以更好地肩负起超级大国的国际责任。简而言之，改革最为关键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它将通过自身的成功实践为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与西方之间产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提供坚实的历史证据。“哪种制度更符合人们的利益，在这场历史性争论中改革的成功将提供决定性论据。清除了在非常条件下生产的积垢之后，苏联的形象将具有新的吸引力，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社会主义的理想将获得新的动力。”^②

然而在西方世界看来，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宏伟设想仍然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意识形态主张——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战胜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延续和再现，苏联改革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强化其国家力量从而增强其全球战略霸权的竞争能力。不过，作为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死敌和全球利益的竞争对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仍然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的改革进程中，看到了长久期待的政治机会——通过促进苏联内部的变化实现和平演变的可能。于是，改革开始在苏联和西方具有了截然相反的意义。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② 同上，第163页。

一、西方的战略企图：摧毁共产主义制度

尽管戈尔巴乔夫宣称“改革的实情符合普遍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利益”^①，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对全球利益的关注，仍然促使西方世界保持着对苏维埃政权及其内部改革的怀疑和敌视。就像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所怀疑的那样，即使戈尔巴乔夫把封闭的苏联社会带进一个创造性和多元主义相互依存的时代，但是“苏联仍将受一个坚持政权垄断、独裁和使社会空气令人窒息的机构的摆布，仍将处于坚持列宁主义主张的政党的领导之下”^②。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历史使命”就是：彻底摧毁共产主义制度，把它扔进“历史的垃圾堆”^③。

1. 十月革命：社会主义与变革的世界

事实上，这种思想和政治的敌视从十月革命胜利时就已经开始了。“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支队伍。”^④当布尔什维克成功领导十月革命并在俄国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时，就预示着西方帝国主义主导的霸权世界即将面临深刻的变化。更准确地说，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将成为世界格局发生变革的主要动力。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十月革命的成功验证了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理论创新的正确性和科学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4页。

②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④ [俄]列宁：“在罗戈日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8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3页。

产主义。”^①在列宁看来,不能因为俄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普遍性。事实上,十月革命能够在俄国取得胜利,恰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因为正是人民群众点燃的革命烈火使布尔什维克成为探索人类发展的引路人。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过长期的、顽强的斗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后,俄罗斯的革命应当继续始终不渝地前进,决不能局限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为战争以及战争给疲惫不堪的人民所造成的空前灾难已经为社会革命的爆发打下了基础。因此,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或者像有些人叫喊的那样,是‘独裁者’的意志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战争尖锐而严峻地向劳动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或者是奋不顾身地勇敢前进,或者是毁灭——饿死。”^②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显示了以苏维埃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性和先进性。“革命之火的光辉就表现在建立了劳动者革命的支柱苏维埃。俄国人民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从沙皇制度跃进到了苏维埃。这是一个确凿的、任何地方还不曾有过的 事实。”^③1918年1月6日,列宁在 面对右派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人对革命的指责时,愤怒而又自信地作出回应:“在华丽的塔夫利达宫里,度过了沉闷、无聊而又令人厌倦的一天。塔夫利达宫在外表上和斯莫尔尼不同,就跟资产阶级议会制和无产阶级苏维埃机关不同差不多:资产阶级议会制虽然华丽,但它是死气沉沉的;苏维埃机关虽然平常,在许多方面还没有就绪,尚待努力改善,但它是朝气蓬勃和富有生气的。在那里,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世界里,敌对阶级的和资产阶级敌对集团的领袖们进行着舌战。在这里,在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世界里,被压迫阶级正在笨手笨脚地、不熟练地做着……”^④

① [俄]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4页。

②③ [俄]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43页。

④ [俄]列宁:“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38页。

事实上,这种政治自信并非仅仅体现在列宁身上。对领导和参加了十月革命的一代人来说,列宁表达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自信已经内化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时代精神,即在抛弃了资本主义这个“死尸的社会”^①的同时,共产党人找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新路。托洛茨基以其繁复的语言表达了十月革命的人类精神:“整体上看,人类历史的上升过程可以概括为自觉意识对盲目力量的一连串胜利,在自然领域,在社会领域乃至在人本身无不如此。迄今为止,批评性和创造性思维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这是值得称许的。物理与化学科学已经走到了人类显然即将成为物质世界主人的临界点。但是在社会关系方面还是像过去那样处在类似珊瑚岛那么缓慢的形成过程。议会制度照亮的仅仅是社会的表层,因此用人工光源就足够了。与君主制度以及其他人神同形和史前野兽的遗产相比,民主制度当然算是巨大的成就。然而,它仍然使人们的彼此社会关系中力量的盲目作用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了。恰恰是十月革命头一次无意识地把手插进了这个深奥的领域。苏维埃制度想把目的与计划纳入社会基础本身之中去,而迄今为止充斥社会基础中的仅仅是积累起来的后果。”^②

1918年11月7日,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强调了十月革命的时代意义。他说:“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帝国主义大厮杀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③在随后的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列宁向全世界发表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宣言:“许多国家都在掀起工人的社会主义革命。全世界的资本家又惊恐又恼怒,急忙联合起来镇压起义。而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更是激起他们满腔仇恨。各国帝国主义者

① [俄]列宁:“来自另一世界的人们”(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36页。

②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25~1226页。

③ [俄]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4~165页。

联合起来准备向我们进攻,新的战斗正临到我们头上,新的牺牲在等待我们。同志们!让我们在纪念十月革命烈士的时候在他们的纪念碑前宣誓:我们要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学习他们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要把他们的口号变成我们的口号,变成全世界起义工人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不胜利,毋宁死。’^①

“不胜利,毋宁死”的战斗誓言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精神恐慌。它表明:社会主义一旦从历史孕育而生,无论其遭遇如何,都必将成为人类改变自身命运的精神之源。“十月革命为以大众为对象的新文化奠定了基础,正因为如此,它马上便具有了国际意义。甚至即使由于不利的形势和敌人的进攻,苏维埃制度——我们姑且假定——暂时被推翻了,十月革命不可磨灭的印记反正也会留在后来人类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之中。”^②

2. 西方战略:封堵、渗透与政治颠覆

亨廷顿认为:“共产主义最有关的特点是它的政治理论和实践。”^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十月革命的危险恰恰就在于此。

一方面,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资产阶级宣扬的资本主义“千年世界”的梦破碎了。列宁指出:“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马克思主义赋予了工人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和恩格斯“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

① [俄]列宁:“在十月革命烈士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6~167页。

②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27页。

③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

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①。相比于资本主义对人类造成的危害——“资本主义花了好几百年来提高科学与技术,却又使人类陷入战争和危机的地狱”^②,社会主义开始具有新的特殊意义。“它成为强调科学——作为进步的象征和政治智慧的科学——的政治纪律的伦理”,从而比资本主义表现出更加理性的新特征:“更为科学、更为世俗、更符合社会需要,能够发展出具有现代功能的角色。”^③

另一方面,十月革命不仅在时代精神上使资本主义遭受深刻挫折,更为关键的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为革命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具体完备的政治理论和为实现这一理论而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经验不仅提供了革命的取胜之道,而且树立了革命的制度典范。即使这种社会制度仍然存在不少缺点,但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而言,它仍然具有历史的优越性。“同沙皇制度和克伦斯基的共和国相比较,立宪会议在我们看来,要比那些臭名昭著的政权机关好,但是,随着苏维埃的出现,这种全民的革命组织当然无可比拟地高出世界上的任何议会。”^④可以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革命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⑤。

然而最令西方世界不安的是,布尔什维克及其创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其出现伊始就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强力挑战者。“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外交舞台上完全不曾出现过像苏联这样的国家。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国家公开宣称以颠覆既有秩序为纲领。”^⑥胜利后的十

① [俄]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讲话”(1918年11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64页。

②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三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226页。

③ [美]戴维·E.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45页。

④ [俄]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1918年1月),《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44页。

⑤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4页。

⑥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32页。

月革命刺激了社会主义思想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蔓延,并因可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国工人运动的“政治内爆”造成国家统治的危机而使英法等国深感恐惧。“布尔什维克革命使西方各国政府极为震惊,它们担心革命将引发其他地区的兵变和叛乱。”^①

为了尽快扼杀和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积极干涉俄国内部事务。从1918年3月上旬起,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部队先后在摩尔曼斯克港登陆,开始了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行动。7月2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大规模武装干涉俄国。从远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部的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大举进入苏维埃俄国;在南方,英国和土耳其军队占领了巴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7月29日,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所有这些事实现在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行动是英法帝国主义者蓄谋扼杀苏维埃俄国、把俄国重新拖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一贯政策的一个环节。现在这个危机必须由苏维埃俄国的广大群众来解决,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危机是一场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斗争,不仅要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军的反革命阴谋,粉碎任何反革命阴谋,而且要打退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进攻。”^②11月12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决定进一步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力量积极与俄国国内的白卫军联合起来。11月18日,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宣布自己是“俄罗斯国家的最高执政”和“最高统帅”。1919年初春,协约国干涉军队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白卫军队联合起来,向苏维埃政权发起全面进攻。

但是苏维埃俄国奋起反击。至1920年11月17日,红军攻占雅尔塔,弗兰格尔残部从克里米亚逃往土耳其。至此,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行动及其所支持的俄国白卫军彻底失败。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告:“经过三年的战争,我们迫使几乎所有这些

^① [美]理查德·W. 布利特等:《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39页。

^② [俄]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7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页。

国家都放弃了继续干涉的念头。这就是说,三年前在帝国主义战争还没结束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可能出现的局面,即长期僵持、双方最后不分胜负的局面终于形成了。”^①

西方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粗暴干涉的行动在两个方面强化了俄国与西方的相互敌视:

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行动在事实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真理性。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②战争结束之后,尽管布尔什维克由于国际政治巨大的实力差距而采取了西方的传统现实政策,但这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而已。“为恢复对国内的控制,苏联不得不在革命圣战与现实政治,在号召世界革命与实行和平共存间,作出务实的妥协。虽然它选择延后世界革命,但绝不会支持现有的秩序。”^③

对西方世界来说,武装干涉的失败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内部缺乏协调一致的战略目标。列宁指出:“这种局面是由于什么原因形成的呢?这不是因为我们在军事方面比较强,协约国比较弱,而是因为协约国国内部瓦解日益加剧。”^④对于一直叫嚣着要“掐死苏维埃政权”^⑤的丘吉尔来说,武装干涉失败的原因在于:“如果现有力量联合使用的话,本来可以轻易取得成功的。

①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23页。

② [俄]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3~264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35页。

④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⑤ [苏]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61页。

可是成功由于完全缺乏联合而消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大战中获胜的协约国之间完全没有任何明确或坚定的政策。有些国家赞成和平，有些国家主张战争。结果是他们既不讲和，又不打仗。如果他们在战线的一个部分打仗，他们就急忙在战线的另一部分讲和。如果说他们鼓励高尔察克与邓尼金，花金钱和派军队支持他们，他们却并没有鼓励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每次关于建立统一机构，以指挥与监督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均遭否决。”^①不过，出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恐惧，西方世界仍然在欧洲东部建立了由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构筑起来的“政治防疫地带”，企图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俄国“封冻在无尽的冬天之中”。^②

二、苏联的战略目标：巩固共产党的执政

面对西方帝国主义扼杀苏维埃政权的图谋，即使在和平时期，布尔什维克也从来没有给予轻视和忽略。列宁警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喘息时机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往往有可能更为猖狂地再次企图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现在并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对我国的事务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保持战斗准备。”^③从革命的理论意义上讲，这是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谁认为可能有这样的革命，谁就不仅不是革命者，而且是工人阶级的死敌。这样的革命一次也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甚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手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④。从革命的现实威胁上讲，以英法等国为首的帝国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战后》（第5卷），吴良健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② 同上，第223页。

③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④ [俄]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1919年3—4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5页。

主义无论是用武装干涉的武力手段,还是用封锁围堵的经济政治手段,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苏维埃政权的颠覆活动。“数十年来,英国人一直是采用别的方式进行侵略,主要是设法切断被侵略国的供应来源,还喜欢使用以援助为借口卡住你脖子的办法,而不愿使用公开的、直接的、厉害的、激烈的武力。”^①列宁强调:“如果说德国强盗在军事屠杀的残暴性方面打破了纪录,那么英国强盗不仅在夺得的殖民地的数量方面,而且在玩弄令人厌恶的虚伪手法的高超方面,也打破了纪录。”^②在西方帝国主义赤裸裸的险恶用心和实际行动面前,为了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布尔什维克始终把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放在革命和建设的首要位置。因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③。

1. 战略选择:政党逻辑、战争记忆与苏联模式

列宁以直白的语言表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质——布尔什维克专政。他说:“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提出——像你们所听到的那样——建立社会主义统一战线时,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这个党还在1905年革命以前就取得了这种地位。这个党在1905年领导了工人群众,从那时起,在1905年以后的反动时期内,即当工人运动在斯托雷平杜马的条件下历尽艰辛恢复起来的时候,它一直和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因而只有这个党才能领导工人阶级去深刻地根本地改变旧社会。’”^④

斯大林进一步发挥了列宁的国家政权建设思想。他说:“共产党是无产

① [俄]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1918年3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② [俄]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1918年8月),《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页。

③ [俄]列宁:“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31页。

④ [俄]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和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9年7月),《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25~126页。

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①,即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有任何巩固的和发展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需要党呢?因为党是无产阶级顺利夺取政权所必需的战斗司令部。几乎用不着证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在斗争进程中把整个运动的领导都集中起来的党,那么无产阶级就不能实现自己的革命专政。可以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党,不仅是为了争得专政,而且更是为了保持专政、巩固专政并扩大专政,以求取得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因此,执政的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工具,其本质意义在于要保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核心领导地位,即“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②。

列宁和斯大林强调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并非仅仅是为了掌握国家政权,而是为了通过对国家政权的掌握以实现革命成果的维护、巩固和扩大,其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就是以高度中央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生。可以说,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确立,实质上是布尔什维克在不断应对国内外危机情况下的历史产物。

从内部动因来看,强调高度中央集权乃至对斯大林作为领袖超越于党之上的个人崇拜,在相当意义上起源于列宁强调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逻辑和组织伦理。从俄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之日起,列宁对革命政党组织在革命中作用的重视超过了任何人。列宁自信地宣告:“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③在列宁看来,这个“革命家组织”要想发挥“把俄国翻转过来”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组织特征:职业革命家和以职业革命家为主要成员构成的“强有力的严守秘密的组织”^④。“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

① [苏]斯大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926年),《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43页。

② [苏]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1927年),《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1页。

③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④ 同上,第129页。

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①

列宁之所以强调“革命家组织”以集中为核心的组织关系,主要是基于职业革命家与俄国社会大众之间的政治伦理和“革命家组织”内部的革命伦理而言的。从职业革命家与俄国社会大众的政治伦理关系来讲,列宁承认“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制的先进战士”^②。但是这是从工人阶级的政治本性上来讲的。在政治实践中,工人阶级的政治本性需要被外来力量启发才能被工人阶级所认识。可以说,列宁之所以强调职业革命家的先锋领导作用,其根源就在于俄国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③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④。作为从外面进行阶级意识灌输的启发者,职业革命家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⑤。

同时,对于“革命家组织”内部的革命伦理而言,尽管组织内部采取了秘密的集中制,但并不妨碍一般意义上的民主精神的发扬。列宁指出:“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

①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4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第29页。

④ 同上,第76页。

⑤ 同上,第79页。

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①

正是基于对“革命家组织”的组织内部伦理和社会政治伦理的上述认知,列宁对职业革命家和“革命家组织”寄予了充分的历史信任。“当我们有了受过专门训练、经过长期教育的工人革命家(当然是‘所有各个兵种’的革命家)队伍的时候,世界上任何政治警察都不能战胜这支队伍,因为这支由无限忠于革命的人组成的队伍也一定会获得最广大的工人群众的无限信任。”^②然而列宁逝世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党的领袖能够像他那样精心维护着“革命家组织”的革命伦理。在斯大林的铁腕镇压下,“革命家组织”的革命伦理迅速向官僚主义伦理滑落。“在进入革命前,列宁的党就是一个决心控制自发运动的组织紧密的团体。布尔什维克纲领的主要路线早在1917年前就已形成。即使在革命低潮时,这个党虽然内部纷争不已,仍然向国家提供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纲领。在差不多二十年的过程中,它的理性观点捍卫着它,反对由革命产生的专制主义所固有的那种无理性的冲动。在差不多二十年中,布尔什维主义抵抗住了渴望权力的诸神。但是当它向它们屈服后,它那种卑躬屈膝的样子甚至比雅各宾主义更为丑恶。”^③于是,布尔什维克不可避免地蜕变成为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权力工具。“苏维埃国家是在一个极权主义超级国家中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超级国家中,官僚阶层不仅领导政治、行政、国民经济、分配、文化和生活,而且领导苏维埃人从摇篮到棺材的每一个行动。这是历史上唯一以最严格的方式规定出自己臣民的道德、感情、爱好与思想的国家。不是国家为人,而是人为国家。所以国家

① [俄]列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1902年），《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34页。

② 同上，第127页。

③ [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于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98～399页。

绝对重于人这一点成了苏维埃党内特权阶层的‘权力哲学’。因此,在这里官僚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人民的主宰者。正是这个囊括一切的和史无前例的权力目标要求建立囊括一切和史无前例的官僚阶层。”^①

除了组织内部的发展逻辑促使斯大林模式确立之外,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外部动因来看,对西方帝国主义干涉历史的集体记忆和战后西方世界构筑的敌视苏维埃俄国的国际环境,迫使斯大林急于通过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寻求增强俄国抵御和对抗外部入侵的力量。

在1925年1月19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在讲话中指出:“近来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的变化。向我们预示新的纠纷即将发生的一些新的前提正日益成熟,因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对付这些纠纷。武装干涉问题现在又成了现实的前提。”^②斯大林提醒中央委员们注意:

由于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而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后天,而是几年以后),由于战争不能不使东方和西方的内部革命危机尖锐化,准备对付一切的问题就不能不摆在我们的面前。我认为西方革命运动的力量是强大的,这种力量正在壮大并且还会继续壮大,这种力量能够在某些地方推翻资产阶级。事实就是这样。但是要保持住这种力量是很困难的。例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边陲国家的例子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周围的国家里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问题、我们军队的实力问题和它的战斗准备问题就一定会成为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

这并不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去积极地反对谁。这样说是不对的。如果谁在言谈之间流露出这种口气,那是不对的。我们的旗帜依然是和平的旗帜。但是,如果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就不应该坐着

^① [苏]阿·阿夫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中央委员会与列宁》,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9~390页。

^② [苏]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1925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2~13页。

不动。我们必须行动,但我们是最后行动。我们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有决定性的砝码、把能够举足轻重的砝码放在天平盘上。^①

对外部局势的高度警惕、同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为首的党内反对派的斗争,以及伴随而生的大规模镇压清洗运动,又从内部不断强化着苏维埃政权的危机感和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压迫感。1938年1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党组织在开除党员方面的错误、对待被开除联共(布)党籍者的申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态度以及克服这些缺点的办法》的决议,将斯大林对布尔什维克党内“暗藏的人民公敌和两面派暗害分子”^②的政治怀疑推到了顶点: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我们许多党组织及其领导者到目前为止还不善于发觉和揭露伪装得很巧妙的敌人,这种敌人首先力图以叫喊警惕性来掩盖自己的敌对活动,把自己保留在党的队伍里,然后采取迫害的办法来打击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在我们的队伍里制造一种互不信任和无谓猜疑的气氛。

这种暗藏的敌人是最凶恶的叛徒,他们平时叫喊警惕性比任何人都叫得响亮,他们急于尽可能多“揭露”一些人,他们所以这样做就是在党的面前掩饰自己的罪行,使党组织不去注意揭露真正的人民公敌。

这种暗藏的敌人是卑鄙的两面派分子,他们千方百计地竭力在党组织里制造一种无谓的猜疑气氛,在这种气氛下,任何一个党员起来维护被人诬陷的党员时,就立刻被指责为丧失警惕性,被指责为同人民公敌有联系。

这种暗藏的敌人是卑鄙龌龊的煽惑者,当党组织开始审查关于某个党员的检举材料时,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布置诬陷的圈套,散布关于这

① [苏]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演说”(1925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②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4页。

个党员政治上不可靠的空气,并且大量地组织检举这个党员的新的材料,使问题得不到客观的分析。

党组织及其领导者不仅不去揭露这种暗藏的敌人的陷害活动,反而往往听从他们的意旨,替他们造成一种诬陷忠实党员而可以不受处分的条件,并且党组织及其领导者自己就在毫无根据地大批地开除党员,处分党员,等等。不仅如此,甚至在那些钻进党的机关和诬陷忠实党员的敌人被揭露以后,我们党的领导者还常常不采取措施去消除由于暗害行为而使党组织错误地开除党员这方面所造成的恶果。^①

在斯大林看来,唯一能够粉碎帝国主义阴谋和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关键力量,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壮大。简单地说,就是要快速实现俄国工业化。因为“工业是一把钥匙”^②。对斯大林来说,布尔什维克掌握了这把“钥匙”,就能从根本上增强抵御国内外风险的能力。面对党内关于快速工业化争论中提出的诸如“我们需不需要把计划定得这样紧呢?不紧不行吗?难道不能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吗?我们采取迅速发展工业的方针,是不是由于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性情急躁呢”^③等问题,斯大林在1928年11月19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上作《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的演说时着重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抽象地来讲,我们当然可以用比较缓慢的速度进行工作。但是问题在于:第一,不能撇开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第二,如果从我们周围的环境出发,那就不能不承认,正是这个环境促使我们迅速发展我国工业。”^④

从外部环境来看,布尔什维克是在一个技术非常落后的国家内取得政权的。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一方面,我国有最先进的苏维埃制度和全世界最先进的政权即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应当作为社会主义和苏维埃政权的

^①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95~496页。

^② [苏]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8页。

^{③④} 同上,第213页。

基础的我国工业技术却过分落后。你们是否以为,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情况下可以在我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呢?”更为关键的是,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唯一的苏维埃政权,如果没有足够的、独立的工业基础,就无法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不为国防建立足够的工业基础,就不能保卫住我们的国家的独立。不使工业具有高度的技术,就不能建立这样的工业基础。”^①

从内部环境来看,俄国农业、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过分落后的情况往往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温床。“小商品生产者及其分散而十分落后的生产在我国还占绝对优势,和这种生产比较起来,我国社会主义大工业就像大海中的孤岛,虽然这个岛的基础在一天天扩大,但它仍然是大海中孤岛。”^②对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来说,“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必须逐步而又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把农业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去,转到大生产的基础上去,使它跟上社会主义工业。或者我们解决这个任务,那么我国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就有了保证;或者我们放弃这个任务,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么回到资本主义去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③

1929年4月23日—29日,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作为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着重强调了工业化发展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布局。在指导方针上,要“根据国家工业化、加强苏联国防力量和不依赖资本主义国家这一总方针,对工业部门的投资主要应当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部门(占全部工业投资的78%)”。在工业布局上,重点投资于钢铁工业、煤矿工业、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和大型电站等重工业领域。^④实际上,在“五年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实

① [苏]斯大林:“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1928年11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14页。

② 同上,第218页。

③ 同上,第218~219页。

④ 参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际的投资高达 13 亿卢布,比斯大林的最高估计几乎多了 5 亿卢布。到了 1929 年年中,工业化发生了剧烈而具有决定性的转变,资本投资的拨款突然上升至 34 亿卢布,等于财政人民委员所答应的 5 倍,也等于斯大林自己要求的 4 倍。“政治局很快就陷入一种真正疯狂的工业化之中。”^①于是,斯大林在 1930 年 6 月 27 日代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时表达了政治局的欣喜之情。他预言式地告诉与会代表们:“在国民经济总体中,工业的比重已经开始超过农业的比重,我们正处在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前夜。”^②

从 1928 年开始到 1932 年年底,经过 4 年零 3 个月的努力,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提前完成,而且超过了布尔什维克所预期的程度,超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内那些最急躁的人的预期的程度。1933 年 1 月 7 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作《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时,表达了对“五年计划”成就的喜悦之情:

从前我们没有钢铁工业,即国家工业化的基础,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拖拉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汽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机床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巨大的现代化学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真正的巨大的现代农业机器制造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没有航空工业,现在我们已经有了。

从前我们在电力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在石油制品和煤炭的生产方面占最末位,现在我们已经

① [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于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② [苏]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1930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32页。

升到最前列的一个位置了。

从前我们只在乌克兰有一个煤矿钢铁基地，而且我们经营这个基地是很吃力的。现在我们不仅发展这个基地，而且在东部建立了我国所引以自豪的新的煤矿钢铁基地。

从前我们只在我国北部有一个纺织工业基地。现在我们在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西部很快就会有新的两个新的纺织工业基地。^①

“五年计划”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从而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再次避免了遭受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可能。斯大林指出，没有自己的重工业，没有自己的军事工业，“只要谁高兴，谁都可以蹂躏它”。总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遇到的就会是军事干涉，就会是战争而不是互不侵犯公约，这种战争是危险的致命的战争，是流血的实力悬殊的战争，因为在这个战争中我们在拥有一切现代化进攻武器的敌人面前几乎是手无寸铁的”。^②然而在斯大林看来，“五年计划”的重要性更加体现在它的国际意义上。他说：“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历史表明了，五年计划不是苏联的私事，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事情。”^③具体来说，“五年计划”的国际意义体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营垒的出现。“我们只进行了两三年的建设工作，我们只显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成就，全世界就分成了两个营垒，一个营垒的人向我们狂吠不已，另一个营垒的人却因为五年计划的成就而惊讶万分；更不必说，全世界还有我们自己的日益加强的营垒，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工人阶级的营垒，他们因苏联工人阶级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他们决心支持苏联工人阶级而使全世界资产阶级胆颤心惊。”^④

因此，尽管在快速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的政治镇压运动和人口的大量死亡，但是对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而言，这一切都是值得的。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

① [苏]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结”（1933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164页。

② 同上，第167页。

③ 同上，第147页。

④ 同上，第156页。

代表会议上的演说中表达了这种深沉的政治情感：

人们有时问：不能稍微放慢速度，延缓进展吗？不，不能，同志们！决不能减低速度！恰恰相反，必须竭力和尽可能加快速度。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全世界工人阶级所负的义务要求我们这样做。

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挨打。不，我们绝对不愿意！旧俄历史的特征之一就是它因为落后而不断挨打。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主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就是因为它落后。因为它的军事落后，文化落后，国家制度落后，工业落后，农业落后。大家都打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你们记得革命前的一位诗人的话吧：“俄罗斯母亲呵，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这些先生们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们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

正因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①

为了改变落后的面貌并寻求一种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反对派合谋的对策，苏维埃政权开始不断向着极权化的方向发展。通过大规模地运用暴力和恐怖，苏联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以军事化的方式迅速展开，政治局充当司令部。“政治局通过党的机器和政府严密控制着经济的每一个部门。持续不断的宣传向工人灌输他们正在为这个英雄的计划做贡献的伟

^① [苏]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7页。

大思想,并要求他们不断提高生产率。”^①斯大林则通过政治局统管全局。“他密切监视着每一个新动向。他的责任巨大,但他能看到真正的进展,这些进展证明人民的努力不是徒劳的,他的政策是正确的。”^②斯大林强调了改变俄国的落后面貌之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重要性,“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③。对斯大林来说,严酷的极权体制是为战胜国内外敌人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也是一代苏维埃人必须肩负的沉重历史使命。斯大林提醒全党:“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还要克服怎样巨大的困难。这就是说,不要使党高枕而卧,而要在党内提高警惕性;不要使党酣睡,而要使它保持战斗准备状态;不要解除党的武装,而要把它武装起来;不要使党涣散,而要使它保持动员状态以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不要醉心于已得的成就,不要骄傲自满。”^④于是,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外部危机,斯大林“创造了一种镇压与恐怖的体制,屠杀了数百万人,但也许它是唯一可以赢得那场与希特勒大搏斗的体制”^⑤。

2. 战略行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与世界战争

事实上,对德国的关注一直是布尔什维克世界革命图景的焦点,更是布尔什维克谋划国家战略时始终秉持的国际参照点。在列宁看来,俄国革命的最终成功取决于世界革命,特别是以德国无产阶级为代表的欧洲革命的总体爆发。“孟什维克说我们想单独地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然而我们一贯说,我们只是世界革命链条上的一环,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只靠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的任务。世界革命还没有到来,但是我们也没有被打败。军国

① [英]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与人物》,张志明、朱振国、唐国强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第311~312页。

② 同上,第315页。

③ [苏]斯大林:“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1931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8页。

④ [苏]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1934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2页。

⑤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页。

主义正在瓦解,而我们却日益巩固,遭到破产的是他们而不是我们。”^①但是1920年10月结束的苏波战争使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坚持的世界革命思想在继德国、匈牙利革命后再次遭受挫折,并造成了严重的历史后果。“皮尔苏茨基的波兰战后意外地得到了巩固。相反地,波兰革命的发展却遭到严重的打击。根据里加条约确定的疆界,苏维埃共和国与德国不再接壤,这一事实后来在两国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自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华沙’错误的影响,他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和谈到这个错误。”^②列宁在1920年9月22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作《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时承认:“我们的失败在西欧引起了某种变化,使得各种同我们敌对的分子都勾结起来反对我们了。”^③

不过,苏波战争带来的另一个重要的历史后果就是苏联获得了喘息时机,并因此促使苏联采取了超越革命意识形态的新战略。1920年11月21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只要总的看一下我们所处的国际形势,就会发现: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不仅有了喘息的时机,而且得到了某种更为重要的东西。”^④这种“更为重要的东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表明了苏维埃俄国革命力量发展的巨大潜力。列宁说:

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战争,

①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支部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2~43页。

② [苏]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1页。

③ [俄]列宁:“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1920年9月),《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9页。

④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页。

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①

另一方面,喘息也表明了帝国主义内部存在的矛盾可以为苏维埃俄国营造和缓的国际环境。1920年12月6日,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作关于租让的报告中分析了德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列宁说:“德国战败了,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压制,但是它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按经济发展程度来说,如果美国占世界第一位,那德国就占世界第二位。专家们甚至认为,在电力工业方面,它超过了美国,你们知道,电力工业有极大的意义。在广泛使用电力方面,美国领先,而在技术的完善方面,德国居上。凡尔赛条约正是强加在这样一个国家头上,它当然不能忍受。德国是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它不可能忍受凡尔赛条约,德国本身是个帝国主义国家,然而是一个被征服了的国家,所以它必然要寻找同盟者来反对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一个情况。”^②像列宁分析德国的情况一样,德国也认为俄国是《凡尔赛和约》的第二个受损国。“不管是俄国,还是德国,都是世界新格局中的被压迫者。”^③1922年4月16日,在参加意大利热那亚会议期间,苏联外长人民委员契切林和德国代

①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② [俄]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组织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12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0~71页。

③ [俄]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林娜·雷巴斯:《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上),吴昊、张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代表团团长拉塞诺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该条约的签订重建了俄德关系,从而激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因为西方盟国把两个欧陆最大强国摒除在外,在德苏之间制造了一连串与德苏对立的小国,又割裂这两国的国土。所有这一切都为德苏制造出最大的诱因,使他们得以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合力推翻凡尔赛体系。”^①1926年4月,德国与苏联又缔结《柏林条约》。该条约确认了《拉巴洛条约》继续有效,并相互承诺:如果其中一国与任何第三国或国家集团发生战争,另一国将保持中立。

然而伴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德国面临的经济、政治和政府的全面危机,特别是希特勒代表的纳粹政治力量的崛起,世界秩序再次面临重组的危机。事实上,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之时,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就非常精确地预测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②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本身已遭受协约国压榨的德国社会对英法帝国主义充满了刻骨的复仇情绪。“只要说一下‘凡尔赛和约’这几个字,并回忆一下由它而来的思想上的和物质上的后果就足够了。每个人的生存这时都受到了通货膨胀的摧残,它吞没了一切的收入和储蓄。在糟糕的1923年里,当法国人入侵鲁尔地区时,通货膨胀已成为脱缰之马。这时又还有背后一刀这种神话的心理作用。人们愤懑地在自思自想,难道我们不会是这场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吗?若不仅仅因为是自己队伍内部的背叛,难道我们不会赢得胜利吗?成千上万曾经参加过世界大战的那支庞大军队的被遣散的军官们,这时流落在街头;他们以自己往日备受尊敬的地位和目前为了每天的面包而挣扎的悲惨境地相比较,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尊严扫地的英雄。”^③正是这股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情绪造成的权力真空,被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希特勒所填补。“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37~238页。

②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20页。

③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2~43页。

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①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和《第二本书》里清晰表达了他的奋斗目标，或者说是他的千年帝国的宏伟远景：在德国创造一个“纯洁”的各族共同体；扩展德国的生存空间，统治中欧，最终成为世界的主宰。复仇中的德国接受了希特勒和他的主张。1930年9月14日，希特勒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国会选举中获得了107席。1932年7月31日，纳粹党在德国国会选举中赢得了37.8%的选票，在608个议席中占有230席，第一次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②1933年1月30日，通过完全合乎宪法的方式，希特勒从并不情愿的兴登堡总统那里获得了总理的职位。3月24日，国会以441票对94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4年为期。于是，在战败后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迅速走到了政治终点，一个不可预测的德国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最终葬送了民主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构造：一个领土和国际地位都受到削弱、背负赔款重担的战败国，一个充满了修正主义的愤恨、在一个政治危机中蹒跚而行的国度，一个最后遭到了经济危机重创的社会。”^③在希特勒的煽动下，充满着复仇主义的德国不断冲击着《凡尔赛和约》确立的战后秩序，开始令英法主导下的西方世界深感忧虑：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正在武装起来。“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④

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德国陆军宣布今年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这是从根本上对《凡尔赛和约》进行挑战的开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74~75页。

② 参见[英]玛丽·弗尔布鲁克：《德国史1918—2008》，卿文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③ 同上，第52页。

④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和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①5月21日,根据新颁布的法律,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服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②根据6月26日颁布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个年满20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制义务。10月15日,希特勒下令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并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11月7日,德国征召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人入伍,共有59.6万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德国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拥有75万人的精兵。

在大力扩充军事力量的同时,纳粹德国的外交政策开始进入一个加速推进的新阶段。1934年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6月14日,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同希特勒进行了第一次会晤。1936年3月,希特勒实施了第一个重大外交冒险行动:德国军队越过莱茵河,重新占领了左岸的非军事区。5月18日,德国外交部部长纽赖特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坦言,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的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结成“罗马—柏林轴心”同盟。1938年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3月13日,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吞并奥地利是希特勒采取的第二个重大外交冒险行动。然而与两年前占领莱茵兰的行动相比,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不再是虚张声势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③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127页。

② 同上,第137~138页。

③ 同上,第200页。

希特勒以他一贯的欺骗战术为德国的战备赢得了时间。就像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的那样:“迄今我们已成功地让敌人猜不透德国真正的目标,就如同一九三二年前,国内对手始终看不出我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不出我们保证守法只是幌子。他们大可镇压我们,在一九二五年逮捕我们两个人,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可是不然,他们引领我们走过危险地带。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同样的情形。一九三三年时,法国的总理应该有这种认识(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这么说):‘新上任的德国总理曾写过《我的奋斗》,书中有如此这般的言论。这种人在我们的四周有如芒刺在背。不是他下台,就是我们进军!’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任我们自由发展,让我们溜过危险区,而我们也顺利渡过惊涛骇浪。等我们准备完毕,充分武装,武装得比他们好,这时他们却开启战端!”^①

尽管英法两国对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一次次地挑战《凡尔赛和约》体系的行为未能采取积极预防措施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其所推行的“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妨碍甚至破坏了英法与苏联之间共同构筑安全屏障的政治信任。事实上,希特勒愈来愈大胆的举动看似冒险,实则正是利用了英法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立场。希特勒毫无顾忌地宣扬着他对于俄国领土的欲望:“俄国领土对于我们的意义,就像是印度对于英国的意义一样。只要我能够让德国人民明白这块空间对于我们的将来意味着什么就行了”,他坚信“俄国的那块生存空间必须要由德国人来统治”。^②在希特勒看来,对俄国发起的东线战争是一场涉及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于希特勒而言,犹太教和布尔什维主义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在东方寻求生存空间的斗争和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与犹太人的斗争紧密相连。”^③希特勒反布尔什维主义的言论使英法看到了再次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可能,并为此而愿意作出牺牲欧洲其他小国利益的决定。英国外长哈利法克斯在1937年拜访希特勒时,称许纳粹德国为“欧洲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66页。

② [英]马克·B·索尔特:《国际关系中的野蛮与文明》,肖欢容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141~142页。

③ 同上,第144页。

堡垒”，并提出不少“随着时间或许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但泽、奥地利和捷克。哈利法克斯唯一的警告是完成这些变化的方法：“英国愿意见到，任何改变均应经由和平演变而来，而且应避免会引起大规模骚动的方法。”^①

面对希特勒上台后德国表现出来的对苏维埃俄国意识形态的敌意，斯大林并未太过在意。事实上，希特勒所宣布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只不过是装饰一道门面而已”^②，在意识形态敌视的背后仍然是对德国国家利益的考量。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在进攻波兰之前对但泽行政长官说：“我一切的作为都是针对俄罗斯而来的。若西方太愚昧、太昏庸以致看不出这一点，那我只有被迫与俄国人达成某种谅解，先击溃西方，再集结大军转向苏联。”^③不过，出于防范德国对苏联可能带来的威胁，斯大林也不断尝试与英法等国结成共同安全条约的可能。然而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是其后帝国主义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战争不仅使俄国革命时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而且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西方与俄国之间政治不信任，始终使斯大林对西方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在1937年2月23日至3月5日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斯大林集中表达了他对苏维埃政权内部的“人民公敌”和帝国主义政治阴谋的忧虑：

外国特务的破坏活动和扰乱性的间谍活动，已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组织，不仅是经济的，还有行动的和党的组织……外国特务，包括托洛茨基分子，不仅渗透到了基层组织，还渗透到了某些重要的岗位……只要还存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外国特务就会把破坏分子、密探、反党分子和谋杀者派到我们内部，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们必须砸烂并抛弃那种过时的理论；它认为随着我们的不断进步，阶级斗争也将逐渐熄灭，它认为随着我们的成功，阶级敌人也会越来越老实……相反，我们越是前进，越是成功，被打败的剥削阶级的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77页。

②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2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02页。

残余势力就会变得越是恼羞成怒，就会迅速采取更加尖锐的斗争形式，就会给苏联带来更多的损害，就会采取更加疯狂的斗争手段……^①

尽管如此，斯大林仍然派出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展开与英法等国的外交努力，以为苏联的战备赢得尽可能长的时间。1939年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但是遭到英法的拖延和拒绝。5月3日，主张与英法结盟的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被解职。“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作为“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的莫洛托夫接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遭到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②为了寻求维护苏联安全的新途径，8月23日夜，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德国外交部部长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附属的秘密协定。8月3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并不表明斯大林的政治投机。事实上，当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于1939年时，怎样推迟苏联被卷入资本主义国家发起的新的世界大战，以赢得战备时间成为斯大林考虑的首要问题。在德国人侵波兰后的9月7日，斯大林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会谈中，披露了他自己对这场战争的考虑：“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大集团之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目的是重新划分世界并统治世界！在我们看来，它们互相残杀、彼此削弱没什么不好。最好是借德国之手去动摇那些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英国）。希特勒在动摇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尽管他既不理解也不想这样干……我们可以设法让双方互相争斗，并且让他们打得尽可能猛烈些。互不侵犯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德国。下次我们会鼓动另一边……”^③斯大林的考虑似乎印证了英国之所以对先前苏联提出的“三国联

①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27页。

②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39页。

③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盟”犹疑的原因。英国首相张伯伦解释了拒绝的原因：“我必须承认，对俄罗斯怀有非常深刻的怀疑。我认为即使它有心也无力于维持有效的攻势。我也不信任其动机，在我看来，苏联的动机似与我国的自由观念毫无关联，而且一味只想挑拨离间。”^①以至于当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之时，丘吉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苏联的报应到了。“我们前此一向把他们看作自私的谋略家，现在证明他们还是傻瓜。俄国的力量、群众、勇敢和坚忍还有待考验。但就战略、政策、预见和才能来判断，斯大林和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受骗上当的笨伯。”^②

不过，作为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丘吉尔更加愿意看到苏联被迫卷入与德国的战争后，给这场新的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局势变化。在1939年10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在解释苏联军队进入波兰的举动时安慰对战争心怀恐惧的英国听众们：“我无法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个谜中之谜，但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那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如果德国想要把自己扩张到黑海海滨，或者是它想要占领巴尔干各国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人民，那它就不可能与俄国的利益或安全保持一致了，就会触犯到俄国古老的生存利益。”^③10月6日，丘吉尔在约见苏联大使马依斯基时说：“我的一些保守党朋友建议和平。他们担心德国会在战争中布尔什维克化。但是我主张战斗到底。希特勒应该被消灭。纳粹主义应该彻底被清除。即便德国变成布尔什维克我也不害怕。我宁可要共产主义，也不要纳粹主义。”^④

面对变化的形势，斯大林也在新的世界大战中为苏联寻找新的国际定位。10月25日，斯大林在与季米特洛夫的会谈时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对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我们那时都太乐观了，因而犯了错误……现在绝不当再重复那时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了……”^⑤斯大林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98页。

②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298页。

③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4～55页。

④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页。

⑤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对希特勒是否会遵守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抱信心。1940年11月25日,他告诉季米特洛夫:“我们与德国的关系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却存在严重的摩擦。”^①12月18日,希特勒发布关于入侵俄国的“巴巴罗萨行动”^②的命令。命令要求德国国防军必须作好一举击败俄国的准备。

对希特勒来说,入侵俄国既是德国拓展生存空间的利益需要,也是消灭布尔什维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后者成为前者的政治遮羞布和道德优越感。1941年3月30日,希特勒告诉他的将军们:“对俄国的战争用不着骑士风度;这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种族的斗争,因此,必须要用前所未有的无情与残酷来进行这场斗争。”^③5月13日,希特勒在一次会议上发布口头命令,该命令实际上使德军士兵在俄国可能犯下的任何暴行都不会受到惩罚。按照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在纽伦堡审判时的供述:“在这次会议上,元首说,在对俄战争中所用的方法,将不得不对付西方国家的方法有所不同……他说,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在俄国人来说,就是拼命。他说,俄国既然不是《海牙公约》的签字国,那么,对待俄国战俘的方法就不一定要按照该公约的条款……他(又)说,所谓人民委员不应被当作战俘看待。”^④6月6日,德国国防军发布“关于处置政委的指导原则”。“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它涉及政委即红军中政治军官的命运:这些人‘不管是在战斗中战俘,还是仍然在抵抗,原则上应该用武器立即予以消灭’。”^⑤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苏德战争爆发。

6月22日上午9点,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德国入侵和英苏关系在BBC电台发表广播讲话:

纳粹制度它除了贪得无厌和种族统治而外,没有任何宗旨和原则。

①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② 注:“巴巴罗萨行动”作为入侵俄国的代号,是为了纪念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他为了使基督教的圣地摆脱穆斯林的控制,领导了12世纪的十字军远征。

③⑤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16页。

④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09页。

它的残酷行为和凶暴侵略所造成的恶果超过了各式各样的人类罪行。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我并不想收回我说过话。但是,这一切,在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对照之下,都已黯然失色了。过去的一切,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它的悲剧,都已经一闪而过了……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一个唯一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我们决心要毁灭希特勒,以及纳粹制度的一切痕迹。什么也不能使我们改变这个决心。什么也不能……这就是我们的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宣言。根据以上的理由,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的一切援助。我们将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朋友和盟国呼吁,请他们采取同一方针,并且如同我们一样,忠诚不渝地坚持到底……

这不是阶级的战争,而是整个英帝国和英联邦不分种族、信仰与党派所从事的一场战争。美国的行动,不应当由我来讲,但是我要说这样一句话:如果希特勒妄想他对苏俄的进攻,将会使决心消灭他的伟大民主国家的目标有丝毫偏离,或者会使他们的努力有丝毫松懈,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他进攻俄国,只不过是企图进攻不列颠诸岛的前奏……

因此,俄国的危难就是我们的危难,也是美国的危难,正如俄国人为保卫家乡而战的事业,是世界各地的自由人民和自由民族的事业一样。让我们吸取通过残酷的经验得来的教训吧。让我们加倍努力,只要一息尚存,力量还在,就齐心协力打击敌人吧。^①

6月26日,驻英大使马依斯基向莫斯科报告:“丘吉尔此举所产生的巨大效应不仅影响着英国,而且波及到了美国……你们从我以前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我认为英国对于战争的立场是坚定的,并没有发现任何英、德在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12~314页。

不久的将来进行交易的迹象。”^①

7月3日,斯大林发表广播讲话。他在讲话中首先说:“同志们!公民们兄弟姐妹们!我们的陆海军战士们!我的朋友们,我在向你们讲话!”斯大林解释了苏联政府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魔鬼领导的。当然,这是在一个必要的条件下缔结的,即和平协定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触犯爱好和平国家的领土完整、独立和荣誉。大家知道,德国同苏联订立的互不侵犯条约正是这样的条约。

我们同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得到了些什么呢?我们保证我国获得了一年半的和平,使我国有可能准备好自己的力量,在法西斯德国胆敢冒险违反条约进攻我国的情况下予以反击。这肯定是我们有所得,而法西斯德国有所失。

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撕毁条约,进攻苏联,得到了些什么,又失掉了些什么呢?这使它的军队在短期内取得了某种有利的地位,可是它在政治上却输了,它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是血腥的侵略者。毫无疑问,德国在军事上暂时有所得,只是偶然因素,而苏联在政治上大有所得,却是重大的长久的因素,在这个基础上,红军在反法西斯德国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胜利必将日益扩大。^②

^①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② [苏]斯大林:“广播演说”(1941年7月),《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6~477页。

斯大林在演说的最后强调：

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绝不能看成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战争。它同时是全体苏联人民反对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伟大战争。这场反法西斯压迫者的全民卫国战争的目的，不仅是要消除我国面临的危险，而且还要帮助那些呻吟在德国法西斯主义枷锁下的欧洲各国人民。在这场解放战争中，我们不是孤立的。在这场伟大战争中，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其中包括受希特勒头目们奴役的德国人民，将是我们可靠的同盟者。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祖国的自由而进行的战争，将同欧洲和美洲各国人民为争取他们的独立、民主自由的斗争汇合在一起。这将是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因此，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关于支援苏联的历史性的演说和美国政府关于准备援助我国的宣言，就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苏联各族人民对此只能表示衷心的感谢。^①

7月12日，苏联和英国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两国在抵抗德国的战争中进行合作的协议。该协定奠定了反希特勒联盟的基础。协议中规定，两国在反对德国的战争中有义务相互支持、相互援助，保证不单独对德媾和。

7月30日—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霍普金斯访问莫斯科，并与斯大林、莫洛托夫就美国向苏联供货问题举行了会谈。8月1日，霍普金斯在向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利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与斯大林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建设性谈话。他委托我亲自向您转达他的意见。现在我想告诉您，我对这条战线很有信心。居（国）民的精神状态十分高涨。对于胜利的无比坚定的信心就在这里。”^②

8月4日，为寻求美国的战争援助并促成英、美、苏三国的战时同盟，英

^① [苏]斯大林：“广播演说”（1941年7月），《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9～480页。

^②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页。

国首相丘吉尔乘坐“威尔士亲王”号穿越大西洋，于9日上午抵达纽芬兰普拉森夏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会晤。8月12日，经过磋商定稿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正式发表。该联合宣言的八点主张强调了英美两国的世界义务：“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以后，两国希望见到建立这样一种和平，以使一切民族得以在自己的疆界内安居乐业，保证一切地方的所有居民都可以过无所恐惧、不虞匮乏的生活。”同时，宣言初步表达了两国对战胜德国后的世界安排：“两国相信，世界上一切国家，基于实际的和精神上的原因，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如果在自己的国界以外进行侵略威胁或可能进行侵略威胁的国家继续使用陆海空军备，就不能保持未来的和平。两国相信，必须在建立更广泛和更持久的普遍安全体系以前解除这类国家的武装。两国也将赞助和提倡一切其他实际可行的方法，以减轻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军备方面的沉重负担。”^①对于此时的英美两国来说，要实现上述宏图就不能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战后安排时将俄国完全排除在外，而应该听取苏联的意见并获得其赞同。因此，尽管丘吉尔将对苏联的援助比喻为“俄国作为一位受欢迎的客人来到饥饿者的餐桌旁”^②，但还是和罗斯福就联合宣言的相关情况联名致电斯大林，解释了英美两国的行为和希望苏联参与的迫切愿望：“我们充分认识到，苏联英勇而坚决的抵抗，对于击败希特勒主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我们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立即制定将来分配我们的合在一起的资源的方案。”^③

9月29日—10月1日，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在莫斯科举行。英国代表是军需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美国是总统的私人代表哈里曼大使，苏联参与会谈的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议首次就西方盟国对苏援助问题通过了一些具体的决定。

12月7日，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和希特勒于21日向美国宣战，以美、英、苏等国为首的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建立起来。

①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70～371页。

② 同上，第373页。

③ 同上，第372页。

正是在这个被丘吉尔誉为“伟大的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下,遭受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侵略的世界各国最终赢得了人类文明的胜利。然而也正是因为“伟大的同盟”的前提是共同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肆虐,一旦法西斯主义被击败并铲除的时候,战争期间构筑起来的“伟大的同盟”还能成为和平时期平衡大国意志和力量的安全保障吗?

三、冷战与改革:战略对抗与调适

事实上,大量有关冷战的档案都表明:在战后初期,美、英、苏三国首脑都曾为延续“伟大的同盟”以使之成为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安全体系而作出了努力。但是由于它们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国家利益实现的目标手段差别以及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内部矛盾的调解与压力,迫使战时“伟大的同盟”最终在残酷的现实利益面前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将世界划分成为两个阵营的冰冷铁幕。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恐怖下,美苏全面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被局部的“代理人战争”所取代。然而在代表“自由的帝国”的美国与代表“正义的帝国”的苏联^①之间,看似意识形态较量的背后,其实是两个超级大国及其所在阵营综合实力的比拼。在冷战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美苏之间对外战略的调整与转变,其实都是在国力强弱之间的政策偏向选择。甚至在相当程度上而言,冷战的历史其实就是美国和苏联各自代表的意识形态阵营,在相互挑战和应对因此而带来的危机时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对美国而言,这是民选政府的政策调整;对苏联而言,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改革尝试。无论是美国的政策调整还是苏联的改革努力,都表明在冷战这场双方表现出极大战略克制的实力较量中,超级大国的内部革新能力得到了系统性验证。冷战历史的终结表明: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无法实现内部的自我革新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与考验。

^① 注:挪威学者文安立在《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对美国和苏联两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描述。参见[挪威]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1. 铁幕与冷战:两大阵营的战略对抗

冷战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特征成为20世纪中后期的时代特征。然而在以苏联解体为代表的历史终结之后,“冷战”仍然成为我们今天描述国际政治冲突状态时的专有词汇,成为我们分析现实矛盾问题时的历史裁量。简而言之,在大国的政治角力之间,冷战思维无处不在。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冷战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它是如何最深刻地割裂了人类社会统一体,使之分裂成为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大阵营?冷战又是如何塑造了生活在意识形态铁幕两边的人类思维,使之充满了偏见、歧视甚至仇恨?或者如梅尔文·P. 莱弗勒在研究中提出的疑问:冷战中的领导要比我们想象中更明断,或起码更有见识。“他们清楚自己正在冒的险,也估量了自己所作的权衡。尽管耐人寻味,这同时也令人费神。为什么他们要继续这样一场为全人类招致灾难的斗争?为什么他们明明知道某些资源是国民所需要的,但却还是不得不把这些资源转移到美苏对抗上去?为什么他们不满足于用军备竞赛和傀儡战争以外的方式展现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如果他们能够哪怕偶尔领悟到避免、缓解、脱离冷战将会让他们收获颇丰,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而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事态又发生了转变?”^①

看来,一切又回到了历史的“零年”:1945年——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②事实上,尽管冷战是以意识形态敌视作为显著特征而发生的,但其产生的结果却是美国和苏联关于战后国际秩序安排,或者说是在对待苏联的战争利益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导致的战略决裂的必然。对战后国际秩序安排的角力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时就已在美国、英国和苏联等主要大国之间展开了。焦点主要集中在对待德国和中东欧问题上。1941年12月16日,斯大林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举行第一次会谈时,就对上述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利益关切。斯大林认为,削弱德国是绝对必要的,首先是把莱茵州连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2页。

^② 注:“零年”的概念借用了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的学术著作《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倪韬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同它的工业区与落后的普鲁士分隔开来。至于莱茵州的未来命运,是作为独立国家,还是托管,以后还可以讨论。重要的是分割。斯大林坚持主张,必须恢复1941年德国入侵之前的边界,包括1940年苏联和芬兰和平条约所规定的苏、芬边界,还包括波罗的海国家、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斯大林认为,上述方案应该作为战后问题条约附件的秘密议定书的基础。在17日与艾登的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明确告诉艾登:“结果无疑是有意思的,但是他更感兴趣的是未来苏联的边界。”^①他解释说:“苏联边界问题(与中欧和东欧总的边界无关)对我们特别重要。苏联政府之所以特别关注此问题,具体地说,还因为波罗的海国家和芬兰的问题。”^②

然而斯大林对苏联安全问题的担忧并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最终保证。况且,即使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政治保证,斯大林也不会对这种保证给予充分的信任。十月革命以来苏维埃政权遭受西方帝国主义干涉的历史记忆、西方国家挑动德国“祸水东引”的企图以及对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信念的坚持,特别是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行动及其对苏联的现实胁迫,使斯大林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心理,并促使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断走向强硬。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在与美国和英国打交道时,“要是我们开始向这样的胁迫低头或是露出不稳定的迹象,我们就什么都办不成了。要想从这样的对手身上捞到好处,我们就必须用坚忍不拔的方针来武装自己”^③。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时,表达了他对战后世界的看法。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正统观点,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各种经济矛盾。斯大林说:“如果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偶然发生的,或者是由于某些国家领导人犯了错误而发生的,那就不正确了,虽然错误确实是有过的。其实,这次战争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资本主义的世

①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② 同上,第55页。

③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9页。

世界经济体系包含着总危机和军事冲突的因素,因此现代世界资本主义并不是平稳地均衡地向前发展,而是经历着危机和战祸的。问题在于,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通常经过相当时期就要剧烈破坏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均势,那些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通常就要用武力来改变这种状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以求有利于自己。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就分裂为两个敌对的营垒而进行战争。”^①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区别就在于,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而且这一性质又因为苏联的介入以及它与西方建立的同盟而得到强化并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在斯大林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表明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获得胜利的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在战火中胜利地经住了考验,并证明它具有充分的生命力。”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②斯大林肯定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为战胜纳粹德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要求全体苏维埃人民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更加努力生产,以使苏联工业每年生产生铁 5000 万吨、钢 6000 万吨、煤炭 5 亿吨、石油 6000 万吨。斯大林强调:“只有这样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③

在斯大林进行选举演说的同时,他的政治局战友们也进行了同样的主旨演说——苏联作为胜利国有权获得和行使自己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权力。负责党内事务的马林科夫最为直白地表达了胜利者的意图:“胜利的果实从胜利者的手中滑掉,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有过。但我们不应当这样……我们必须首先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们的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记住,只有我们强大了,我们的朋友才会尊重我们。”^④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在选举讲话中警告说:“即使是在爱好和平的国家中,也有一

① [苏]斯大林:“在莫斯科市莫斯科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1946年2月),《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8~489页。

② 同上,第491页。

③ 同上,第499页。

④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5页。

小撮敌视苏联的反动分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政策……感到满意。是的,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①

斯大林和他的战友们的选举演说让西方世界深感震惊。美国自由派领袖之一、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断定斯大林的演讲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纽约时报》在头版对斯大林的演说予以报道,一上来就宣布斯大林认为战争“序幕已经拉开”。^②如果说美国人的反应是“震惊”的话,那么对奉行现实主义理念、“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者”^③的丘吉尔来说,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其政治本性和帝国本色的表露而已。在纳粹德国覆灭之际,丘吉尔表现出了他对斯大林和苏联扩张野心的不安和警惕:“这个显然是广大无涯的胜利达到顶峰的时刻,对我说来,却是一个极不愉快的时刻。我往来于欢呼的人群之中,或坐在摆着从大同盟各地区来的祝贺和祝福电文的桌子旁边,而心中却感到沉痛,脑子里充满着不祥的预兆。德国军事力量的毁灭已经给共产党俄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带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双方已经失去了共同敌人,那个共同敌人差不多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维系。从此以后,俄罗斯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信条都无需对他们的进展和最后的版图加以限制。”^④特别是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使“伟大的同盟”失去了核心支柱,在与苏联关于波兰政府的组成、捷克斯洛伐克的前途以及如何理解苏联寻求安全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让丘吉尔认识到,“苏联威胁已经取代了纳粹德国的威胁”^⑤。在丘吉尔看来,建立一条新阵线以阻止苏俄对自由世界扩张的步伐已经势在必行。

①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55~456页。

② [美]沃尔特·拉弗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5页。

③ [苏]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④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93~394页。

⑤ [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斯大林和丘吉尔(1941—1945)》,王仲宣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84页。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名为“和平的肌腱”的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提醒美国听众,“上帝已经选择了”美国而不是“某些共产主义或者新法西斯国家”来拥有原子弹。为了利用这一武器提供的“喘息空间”,“讲英语的民族”要在联合国的原则之下——但不是它的组织框架下——“建立兄弟联盟”,以图重整世界。因为: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Stettin)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它的后面,有所有中、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都位于我必须称之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仅常常受到来自苏联的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的高度的、有些情况下还愈演愈烈的控制……共产党……已被抬高到与其数量远不相称的显赫的掌权地位,而且到处都在谋求获得极权主义的控制权。^①

丘吉尔强调,苏联人并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教义的无限扩张”。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讲以“铁幕”一词而声名远播。丘吉尔认为这篇演说词的“关键点”在于这样的一个建议:英美在联合国之外,以原子武器为后盾,在“欧洲建立一个不会永久性地排斥任何一个国家的统一体”。^②

斯大林对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深感愤怒。1946年3月14日,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指责丘吉尔的演说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举动”,它在“同盟国间散布不和的种子,并阻止她们的合作”。在斯大林看来,丘吉尔就是一个切切实实的“战争贩子”。“事实上,丘吉尔先生现在已立在战争煽动者的地位。丘吉尔先生在这里并不孤立。他的朋友不仅在英国有,而且在

^①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

^② [美]沃尔特·拉弗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5~36页。

美国也有。应该指出的,就是丘吉尔先生和他的友人在这方面惊人地很像希特勒和他的友人,希特勒曾宣布种族学说,而开始鼓吹战争的工作,他宣称只有能操德语的人民才是有真正价值的民族,现在丘吉尔先生也以种族学说做标榜,开始鼓吹战争的工作,他断言只有操英语的国家才是有真正价值的国家,才是能担负起决定全世界命运的责任的国家。”^①丘吉尔的种族言论其实就是对非英语国家的最后通牒:“你们甘心承认我们的霸权——这样就可相安无事。否则,战争就不可避免。”在斯大林看来,“丘吉尔先生的方针就是作战的方针,号召和苏联作战的方针”^②。在坚决拒绝了丘吉尔关于修改《雅尔塔协定》的要求后,斯大林发出严厉警告:

丘吉尔先生不喜欢这种事变的发展,而且他还敲了警钟,诉之于武力。但是他也同样不喜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的一个苏维埃制度。他在当年也曾敲过警钟,并组织了“十四国”反对俄国的军事远征,目的是拖着历史的车轮向后倒退。但历史却比丘吉尔的干涉表现得更为有力,而丘吉尔先生的堂吉诃德的狂想,结果是在当时遭受了完全的失败。

我不晓得丘吉尔先生及其友人们能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组织一个新的军事的远征以反对“东欧”,但如果他能达到这个目的,也是很少可能的,因为“简单的人们”的千百万人是警卫着世界的和平事业,那就可以自信地说一句,他们必像他们于二十六年前被击败一样而同样被击败。^③

作为被斯大林指责为丘吉尔的“友人”——美国总统杜鲁门,与罗斯福总统有着很大的不同。“罗斯福是美国东北部世家子弟,杜鲁门则来自中西部农村中产阶级家庭。罗斯福受教于第一流的中学和大学,杜鲁门一辈子

① [苏]斯大林:“关于丘吉尔的演说答真理报记者”(1946年3月),《斯大林论战后国际关系(1946—1949)》,天津联合出版社,1949年,第1页。

② 同上,第2页。

③ 同上,第7页。

的最高学历只是高中毕业(虽然艾奇逊曾敬佩地赞誉他学力不逊于耶鲁毕业生)。罗斯福自幼即被培养要出人头地、做元首;杜鲁门则是堪萨斯城政治机器运作捧出来的人物。”作为罗斯福总统的副手,“杜鲁门缺乏实质的外交政策经历,罗斯福亦未充分让他与闻涉外事务”。^①对丘吉尔来说,罗斯福的突然逝世和继任总统杜鲁门对战时同盟外交政策参与的缺失,使得西方国家在阻止苏联膨胀的胜利野心时出现了一段致命的脱节。“在这个令人悲伤的真空之中,一个总统不能起作用了,而另一个总统还不能了解情况。军事长官们和国务院都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指导。前者把他们自己局限于本行的范围以内,后者则领会不到牵涉进去的问题。”^②不过,令丘吉尔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杜鲁门有着与罗斯福不同的处事风格,但在他们之间仍然保持着一个关键性的联系纽带——马歇尔。1945年4月16日,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伯爵在给丘吉尔的电报中对杜鲁门的个人特点作了说明:“杜鲁门的嗜好是研究战略史,据说这方面的书,他看得很多,这也许是一件有趣的事。有一个晚上,他在这里无疑地表现出他对于汉尼拔战役的惊人的知识。他很器重马歇尔。”^③1946年11月,当杜鲁门领导的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落败后,作为战时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马歇尔被任命为国务卿。在1947年4月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期间,马歇尔在与斯大林会见后表明了他在面对共产主义浪潮冲击下欧洲安全的态度:“必须找到一个防止西欧完全崩溃的办法。”^④

事实上,寻找防止西欧崩溃和阻止苏联扩张的努力在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发表选举演说后就积极进行了。2月中旬,在罗斯福时期备受冷落的“俄国问题专家”、刚刚在年初被委任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接到了美国国务院的电报,电报要求他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进行分析。饱受压抑的凯南认为必须让华盛顿理解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78~379页。

② [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吴万沈译,南方出版社,2004年,第393页。

③ 同上,第413页。

④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页。

苏联的行为与美国的对策,而不仅仅是用几句话解释苏联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态度。2月22日,在秘书的帮助下,他起草了长达八千字的电报并发往华盛顿。凯南认为,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神经质的看法,源于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最初是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无屏障的平原上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而具有的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又增加了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和组织得更好的社会之畏惧。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陈旧的,其心理基础是脆弱的、人为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它们直接接触,担忧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界人了解俄国内部的真相,会产生某种后果。”^①由此凯南认为,美国所面对的苏联是这样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它坚信,如果苏联政权要得到巩固,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但同时凯南又指出,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但是它同德国不一样:“苏联政权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它不是按固定的计划行事的,它不冒不必要的风险。它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高度敏感。由于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因此,凯南向华盛顿建议,要把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在“现实和实事求是的基础上”。^②

“八千字电报”使凯南受到了当时在华盛顿占上风的强硬派的青睐。国务卿贝尔纳斯称赞凯南的电报分析得“十分精彩”。前驻苏大使哈里曼在给凯南的个人电报中说:“对你2月22日有分析的长篇电报谨致庆贺之意。”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要求将电报复制多份给军队中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要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2页。

② 同上,第13页。

员。一时之间,“八千字电报”似乎成了“美国决策人的圣经”。^① 凯南也赢得了个人政治生涯的转机。1946年4月,在福莱斯特尔的极力推荐下,凯南被调回华盛顿,出任国防学院副院长。1947年初新上任的国务卿马歇尔又授权凯南筹建国务院政策计划室,并于5月任命凯南担任首任主任。国务院政策计划室是战后初期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机关,主要任务是帮助政府制订较长期的对外战略。很快,凯南又再次发表政策建议,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遏制思想”。

1946年12月,应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要求,凯南撰写了《苏联对外政策心理背景》一文。1947年1月,凯南以此文为基础,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思维方式及其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的演讲。7月,《外交》季刊以“X”匿名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文章认为,苏联在其对外行为中表现出两个“政治性格”,而每个“政治性格”都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政治性格”是既敌视西方又愿意同西方和平共处。由此造成克里姆林宫在对外政策中“躲躲闪闪、守口如瓶、欺诈蒙骗、疑心重重以及不怀好意”。第二个“政治性格”是既固执又灵活。凯南声称,克里姆林宫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而且苏联共产党为了策略上的考虑,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某种理论,全体党员依据铁的纪律要“忠实地、无条件地”接受这种理论,由此造成苏联政权的目标是“僵硬和固执的”。但同时苏联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又是谨慎和灵活的。“它主要关心的是灌满世界权力盆地中可以抵达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如果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会达观地接受并适应这一现实。重要的是永远朝着一个最终的目标前进。”^②凯南主张美国应当把苏联看作敌手而非伙伴,美国对苏政策“最主要的方面就是长期、耐心、坚定与警觉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③。尽管凯南的文章是以“X”先生署名,但是其真实来源仍然被媒体曝光。1947年7月8日,美国新闻记者阿瑟·克鲁克在《纽约时报》发表《官方对俄国看法之指南》一文,暗示“X”文章的官方来源及作者(凯南时任国务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4页。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17页。

院政策计划室主任)之后,舆论哗然。凯南说:“顿时,它很快成了名副其实的宣传漩涡的中心。《生活》周刊和《读者文摘》发表了长篇摘要。遏制一词经新闻界的一致同意,被挑了出来并捧上了‘主义’的地位,把它和当时政府的外交政策等同起来。”^①

事实上,外界的猜测并非空穴来风。“X”文章所表露出来的对苏新战略的主张早在发表之前,就已深深地体现在杜鲁门的国会演说之中。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众议院大厅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谈道:“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正在抵抗依靠武装暴力的少数人或外来压力的奴役阴谋的自由人民。我认为,我们必须帮助那些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挽救他们自己命运的自由人民。我认为,我们主要应该是通过经济和财政的援助,因为这对经济稳定和有序的政治进展是必要的。”在杜鲁门看来,美国的政策归根到底在于维护每个国家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杜鲁门的国会演说很快便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杜鲁门认为:“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②

似乎是为了证实杜鲁门在演说中的担忧,4月26日从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归来的国务卿马歇尔的经历表明:“俄国人只关心他们自己的计划,他们冷酷地决定利用欧洲这种一筹莫展的情况来发展共产主义,而不愿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合作。”^③为了充实“杜鲁门主义”,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阐述了美国对付欧洲危机的行动方针。马歇尔说:

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这是合乎逻辑的。否则就不可能有稳定的政治和有保障的和平。我们的政策不是反对任何国家或任何主义,而是反对饥谨、贫穷、冒险和混乱。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

① 张小明:《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8页。

②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28页。

③ 同上,第137页。

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减轻剂。任何愿意帮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力图阻挠其他国家复兴的政府就不可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此外,任何企图延长人类的痛苦以便从中获得政治或其他方面利益的政府、政党或集团,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①

对那些受援国来说,在最初解读这项计划时,它“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手段,现在却成了美国武器库里对付苏联的一种主要武器”。这就是美国国会批准该项计划的目的,“它是正在执行的政策,而不是一个疯狂的决定”。^②在苏联看来,马歇尔计划就是一个陷阱。莫洛托夫说:“他们拉我们入伙,但做他们的附庸。我们就可能仰人鼻息而终致一无所得,而仰人鼻息是肯定的。”^③事实上,对于杜鲁门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对苏联的敌意,斯大林并不过于惊讶。就在凯南向华盛顿发送“八千字电报”的同时,苏联情报机关就截获了该份电报。斯大林获知了电报的内容,并不甘示弱地要求苏联驻美大使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诺维科夫也起草一份“电报”。1946年9月27日,诺维科夫的电报发往莫斯科。在电报中,诺维科夫表达了他对苏美关系的未来的悲观态度。他说:“美国外交政策反映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其目标是建立世界霸权。”^④在政治局讨论1947年6月5日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时,诺维科夫在6月24日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指出:“对马歇尔计划的仔细分析表明,它最终无非是要建立一个西欧集团,作为美国政策的工具……为了使欧洲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从属于美国,为了建

①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②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3页。

③ [苏]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9页。

④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33页。

立一个反苏集团,以前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这些措施不协调。马歇尔计划不同,它打算采取更为彻底的行动,以便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①

诺维科夫的分析虽然是在莫洛托夫的影响下写成的,但却反映了斯大林的真实看法。事实上,自1946年以来与西方在伊朗、土耳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问题上的尖锐对立,特别是1948年6月爆发柏林危机时美英等国的坚定反击和1949年4月4日西欧十一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的《北大西洋公约》,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关于西方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信念和对苏联作为战胜国权利的蔑视。莫洛托夫说:“什么叫‘冷战’?就是关系紧张。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或者由于我们的攻势。他们当然拼命反对我们,而我们就应当巩固取得的成果。把德国的一部分建成社会主义的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一盘散沙,要建立秩序。排挤资本主义的秩序。这就是‘冷战’。”^②

尽管冷战发生于战后,但作为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定历史时代,却是自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与西方长期对立过程中的关键一环。“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准确说是从1945年3月开始的。当然某种意义上是苏维埃俄国在1917年10月的诞生引起了冷战。从1941年6月开始的出于现实利益的联盟只是冷战的暂停而已。”^③

2. 改革与调适: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

冷战的最终形成加剧了两大阵营之间的猜忌与对立。不过,出于对核战争的共同恐惧,美国和苏联仍然有效控制了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并避免使其走向尖锐而普遍的对抗性冲突。于是,在整个冷战期间,“和平性竞赛”就成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的经常性矛盾状态。事实上,与直接的军事性对抗冲突相比,间接的“和平性竞赛”对社会主义阵营形

① [英]杰弗里·罗伯茨:《斯大林的战争》,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

② [苏]菲利克斯·丘耶夫:《莫洛托夫秘谈录——与莫洛托夫140次谈话》,刘存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76页。

③ [英]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下),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35页。

成的威胁更具危险性和破坏性。这种危险性就是美国通过展现西方丰富的物质生活,激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人民群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反思,蓄积和挑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政治界和知识界的分化与反叛,在赢得对社会主义国家道德优越感的同时,为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和平演变奠定了潜在的社会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

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担忧和拒绝,不仅是因为接受马歇尔计划意味着苏联政治主导权的丧失,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维护苏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会遭到销蚀和瓦解,从而危及苏维埃政权本身。事实上,马歇尔计划的深远意义就在于此。从1948年7月起,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计划共持续了三年,最终耗费美国政府102亿美元。计划非常有意义,因为到1947年第二季度美国的出口盈余是平均每年125亿美元。正如英国财政大臣休·达尔顿所说:“各国美元短缺问题愈演愈烈。美国人有世界一半的收入,但是却不愿购买他国产品或者向别国贷款乃至捐出去……不知道再过多久美元短缺就会演变成一次普遍性危机?”美国平均每人每天消耗3300卡路里,而欧洲1.25亿人每人每天卡路里消耗量只有1000~1250。马歇尔计划重新利用了部分盈余,缩小了欧美卡路里消耗量的差距,为一个自给自足的西欧和南欧奠定了基础。到1950年,马歇尔计划取得巨大成功。“该计划开始了消除北美和欧洲生活水平差距的进程,同时开挖了西欧和东欧之间一条巨大的鸿沟,铁幕变成了富足和短缺之间的屏障。”^①

如果说这种富足与短缺的强烈反差促使斯大林关闭了苏联与西方的普遍联系,那么对斯大林之后执政的赫鲁晓夫来说则是促使他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内部改革的动力。对斯大林来说,这是保证社会主义阵营避免遭受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气息污染的必要举措。“斯大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帝国’,它不可战胜,各个侧翼都得到保护。但这个计划有其内在的缺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像罗马帝国、中华帝国和大英帝国这些成功的范例,对于众多全然不同的庞大的领土,除了依靠赤裸裸的武力之外,还利用别的因素去进行控制。它们招募当地的精英,对种族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差异常常

^① [英]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下),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1页。

抱着宽容的态度,而且促进自由贸易与交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帝国’利用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情绪以及社会工程,想让社会和精英们脱胎换骨。它采用单一的工业化和政党制度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剥夺了公民的自由、财富、合作以及人的尊严,代之以社会正义的幻觉。这个‘社会主义帝国’利用了作为其核心人口的无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忍耐、幻觉与苦难。”^①正是利用和过度渲染西方威胁,斯大林在要求人民忍受短缺的社会痛苦的同时,勉力维护着他的理想帝国。

然而经过剑拔弩张的战后五年,当美国和苏联开始进入20世纪50年代时,“和平性竞赛”在相当意义上已经成为对两大阵营能否迅速有效地革除内部积弊的考验。凯南在1957年重新阐释遏制观念时就说:“国人经常问我,对付苏联威胁最应从何处着手,我的回答是:在美国失败之处,在我们眼中自惭形秽的事物上,或者令我们担心惊悸之处;针对种族问题,我国大城市的情形,我国青年的教育与环境问题,以及专业知识和普遍了解之间的差距。”^②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竞争力的新看法。他说:“现在需要巩固苏维埃政权,巩固苏联的国家制度,加强社会主义因素,这里一切都取决于经济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人们所需的一切都必须保障,而且不仅要使他们活着,还要使他们的日子过好,能够享受生活。为此,就必须创造出舒适富足的生活条件。这样才能成为一面镜子,让人们一眼就能够看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区别。”^③

面对在战争废墟上迅速重建起来的西方世界,特别是随着美国经济学家J. K. 加尔布雷恩于1958年出版的《富裕社会》的畅销而使“富裕”一词流行于西方世界并宣告“短缺的日子已经过去了”^④的时候,相比于苏联国内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赫鲁晓夫充满了深深的挫败感和耻辱感。赫鲁晓夫回

①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23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晔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23页。

④ [英]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下),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8页。

忆他在出国时曾遭受的奚落:“瞧,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多少年了,可你们连面包都无法让老百姓吃饱,肉更是时有时无。可资本主义国家却样样过剩。”^①那么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在于官僚体制。赫鲁晓夫批评某些人“对每一件微不足道的舶来品都争相追逐,趋之若鹜。他们不惜花大价钱去买来,欣赏把玩”^②,结果就是采取的任何措施都跳不出行政命令的窠臼,整个苏维埃官僚主义的机器“只是在原地打转,毫无成效”^③。赫鲁晓夫下定决心要改变这一切。不过,他要改变的并非只是一部组织精密、架构完整、行动高效的官僚主义机器,而是塑造并萦绕于这架政治机器每个触角的政治灵魂——斯大林。“位于这座信仰与幻觉金字塔顶端的,是斯大林这位一贯正确的领袖本人的偶像。”^④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使党内教育的一切方式都适合于自己,适合于自己的活动:盲目服从,绝对信任。义无反顾地去赴汤蹈火,在战争期间当然是好的,然而到后来这总是走向反面,因为一个不动脑筋相信你的人,一旦知道辜负了他的信任,就会成为你的敌人。这是很危险的。我一贯主张,现在更加主张对党、对共青团、对全体人民要诚实,绝对地诚实。这才是党唯一的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⑤

在1956年2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决定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讨论是否要向代表大会作关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时,赫鲁晓夫坚持要诚实地告诉人们。他警告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我们这是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我认为我们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应当心胸坦白地向代表们讲清我党、中央委员会从上次代表大会闭幕以来的工作,但是我们作为中央委员会成员,也应该讲讲斯大林时期的事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82页。

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23页。

③ 同上,第1304页。

④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⑤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4页。

情。我们当初与斯大林一起领导国家。当全党同志从原来坐牢的人那里了解到真相,他们会对我们说:且慢,怎么会是这样呢?刚刚开过二十大,会上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这样我们就无言以对。说我们一无所知,那是撒谎: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全部真相,即了解了毫无根据的清洗的真相,也了解了斯大林恣意妄为的真相。”^①

2月25日的秘密报告揭开了苏联历史的新一页。在赫鲁晓夫看来,“党的二十大的主要成果,是它开始了党去除污点并回归到列宁和我国其他优秀儿女曾为之奋斗的生活准则的过程”^②。这种生活准则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的生产搞上去,要超过资本主义的生产水平。我们生产的东西,不管是工业产品,还是生活用品,都必须在质量、工艺和实用方面保持上乘,满足消费者的审美需求”^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赫鲁晓夫开始了战后苏联的第一次改革。根据生产专业化的要求,赫鲁晓夫开始调整党和政府的经济管理体制。他回忆说:“我认为,过去我也认为(这并不是一退休者的无聊瞎想),农业应该实行专业化管理。斯大林生前和死后我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苦于找不到一个杠杆来撬动这件事,把专业化的工作深入地搞下去,把熟悉业务的人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按照赫鲁晓夫的专业化管理设想,“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农产品生产中,都必须实行专业化;凡是当领导的人都应该掌握深厚的知识”。为此就必须建立生产管理机构,而在党内则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边区党委和州党委。赫鲁晓夫认为:“我绝对相信,这样的组织机构是很有前途的。不能让一个对工作对象一窍不通的党的权力机构来领导农业。”^④

然而赫鲁晓夫的改革最终还是触怒了整个官僚主义机器。不仅仅在于他的政治改革使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了普遍性的威胁。1966年4月8日,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部分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的决议》作出决定:“鉴于许多党的机关和共产党员的建议,考虑到党内选举时根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50页。

② 同上,第1159页。

③ 同上,第1323页。

④ 同上,第1322页。

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及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政治品质经常会更换党委会的成员,并且考虑到在这些问题上所作的规定经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在苏共章程中继续保留那些规定更新和更换党的机关的成员和党组织书记的比率的条款是不合适的。因此,取消党章第二十五条。对第二十四条作如下补充:在选举一切党的机关(从基层组织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时,应遵守党的机关的成员要经常更新、党的领导要新陈代谢的原则。”^①

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所造成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严重危机。从1965年3月起就负责军工综合体的苏共中央书记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在赫鲁晓夫下台20年后仍然余怒未消:“没有哪个敌人像赫鲁晓夫那样,用他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以及对待斯大林的做法给我们造成那么大的伤害。”^②在国内,秘密报告令整个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器不知所措。在大学和劳动场所,甚至在大街上,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官员、克格勃和告密者则集体失语。“对于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没有任何严肃的解释。它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几乎是无法估量的。而它在国内的意义如何呢?在学校里,学生们开始撕扯墙上的斯大林像,并把它踩在脚下。他们问:是谁制造了个人迷信?如果说只崇拜一个人,那党的其余的人呢?每个行政区、每个地区和每个地方的每个党委,都有自己的‘领袖’和英雄。”^③看似坚固的信仰墙壁上开始出现裂缝。

而在国外,秘密报告的影响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激烈动荡并带来了冷战开启后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党的二十大刚刚开过,各国共产党就开始经历风风雨雨。”^④波兰作为“东欧国家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出现了反苏浪潮。在向波兰统一工人党各级党组织传达秘密报告并在其讨论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应当重新评价华沙起义、对卡廷事件进行侦查、审议苏军驻扎波兰是否合法等问题,甚至有人提出要重新审议苏波关系。随着要求谴责和

① 《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第262~263页。

②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25页。

③ 同上,第222页。

④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1页。

审判“斯大林分子”的呼声和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层的分歧也在扩大和尖锐化。1956年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市的汽车厂工人上街游行,喊出了“自由”“面包”“上帝”“苏军滚出波兰”等口号。29日,随着大量市民的参与,游行变成了街头冲突并在镇压中造成了79人被打死、500多人受伤。波兹南事件的发生进一步激化了波兰社会的民族情绪。“波兰出现了一种社会风潮,大家都在痛骂苏联,几乎到了策划一场政变、让具有反苏情绪的人上台执政的地步。”^①这种社会风潮的实质在于波兰希望摆脱苏联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因而提出了“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者就是曾经被开除并被关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前领导人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0月19日,苏共中央得知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没有与莫斯科协商的情况下就准备召开中央全会,要用哥穆尔卡取代爱德华·奥哈布作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新领袖。在赫鲁晓夫强硬干涉的企图遭到拒绝后,苏共中央主席团在10月20日开会得出结论:“剩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结束波兰现在的局面。”经过苏波双方的几番较量,苏联承认了波共中央全会的选举结果——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第一书记。苏联召回了苏联元帅、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撤回苏联专家和顾问,放弃对波兰使用武力,而哥穆尔卡也声明波兰无意退出《华沙条约》,苏波关系暂时得到缓和。

然而波兰事件却在匈牙利引起了强烈反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层的分歧进一步扩大,要求拉科西下台、纳吉上台的呼声越来越高涨。1956年4月29日,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报告,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和赫格居斯不满意于将雷瓦伊和卡达尔选进政治局,党内和国内的局势正在复杂化。6月,伏罗希洛夫和拉科西进行会谈后得出结论:“拉科西在党内,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威信在下降。”^②赫鲁晓夫说:“拉科西不仅不能够发布什么指示或者对共产党员的活动施加什么影响,甚至连他的名字听起来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63页。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48年。

都有些臭了。”^①7月13日,米高扬在与拉科西的谈话中劝说其自动放弃第一书记的职务。在当天举行的匈牙利党政治局会议选举艾尔涅·格雷继任第一书记,卡达尔为书记处书记。但是格雷因无力控制局面而被迫下台,纳吉·伊雷姆被选为第一书记。然而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开始了肆无忌惮的反苏浪潮。10月12日,安德罗波夫在发给苏联外交部的电报中承认:“匈牙利国内政治局势急剧恶化,现在‘严重局势’已经不仅是党内,而且是整个国家了。”他预测:“在纳吉有可能实施自己的政策(在这个时候这种危险性是存在的)的情况下,匈牙利在最近的将来有可能发生以下变化:变化的结果是,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将像南斯拉夫现在所发生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一样,但还不如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制度。”^②10月2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如果我们保持中立,不帮助与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人们,那是不可原谅的。”^③10月24日,苏军开进布达佩斯实行戒严。11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作出出兵匈牙利的军事行动决定。11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确定了匈牙利新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卡达尔为总理,明尼赫为副总理兼武装力量和公安部部长。11月4日,行动指挥官朱可夫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今年11月4日6时15分,苏联军队开始了整顿匈牙利秩序和恢复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的行动”,“纳吉·伊雷姆反革命政府的全体成员躲藏起来。现正在搜查”。11月7日,朱可夫在报告中说:“匈牙利境内夜间很平静。”^④同日,卡达尔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总理的名义发表《告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书》,呼吁对匈牙利进行紧急援助。苏联政府作出紧急援助的决定,即把1956年向匈牙利提供的商品和1957年第一季度计划提供的商品提前供货。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使苏联深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潜存的离心倾向,并因此加强了对东欧国家的全面控制。不过,对赫鲁晓夫来说,问题的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93页。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48~349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95页。

④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352页。

根源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与人民群众物质需求的矛盾。“我们在与资本主义的竞赛中,不能在食品生产方面落后。我们的落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优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会给社会主义的敌人提供对我们说三道四的可乘之机。是啊,他们有理由这样说,我们确实落后。”在赫鲁晓夫看来,“实际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格但斯克和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城市就发生了起义。由于食品和其他消费品匮乏,便发生了冲突,确切些说,是起义。导火线是物价上涨”^①。事实上,只要解决不了这个基本问题,导火线就永远无法根除。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是要进行改革就必然会触碰到各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并因而有可能在本就不牢固的东欧社会造成政治分裂以致混乱。面对可能出现的这种可怕局面,苏联选择了强硬控制手段以保证社会主义阵营外貌的铁板一块和整齐划一。

1968年发生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成为勃列日涅夫强化东欧控制的导火索。1968年1月5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在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改革的呼声使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社会舆论迅速活跃起来,人们纷纷要求重新审议《华沙条约》。这是苏联最为担心的问题,如果在罗马尼亚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对《华沙条约》提出异议,甚至退出《华沙条约》的话,社会主义阵营就会趋于瓦解,苏联也将失去最西部的边界。3月15日,安德罗波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作的方法和形式很像匈牙利事件。”3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警告: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抗议集会、聚会、各种行动,而它们很多都有着反苏的趋势。”^②3月23日,苏共中央就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内的积极分子发出通报:“在捷克斯洛伐克,那些要求成立‘正式反对派’,‘容忍’各种反社会主义的观点和理论的不负责任分子的言论日益增加。他们错误地阐述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关于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对立的走向社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488页。

^②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24页。

会主义的特殊的建设捷克斯洛伐克道路的建议,并强调必须实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通报强调,“布拉格之春”是西方帝国主义一手操纵的,企图“使它进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①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改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共和国政府和国民议会,并通过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纲领》。《行动纲领》宣布将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杜布切克把它称为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尝试。捷共的做法深深地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在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勃列日涅夫发出公开警告:“我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对世界上整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抱漠不关心的态度”,他表示:“如果我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我就只好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②5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格列奇科元帅关于布拉格考察的情况报告。勃列日涅夫指出:“军队也崩溃了。自由化和民主化,其实质是反对革命。”^③6月11日,勃列日涅夫公开指责杜布切克:“现在,已经明显地看出,你们为达到这些目的的斗争是在反社会主义势力越来越露骨和加强反抗的条件下展开的。”^④6月27日,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一系列报刊上同时出现了《致工人、农民、职员、科学家、艺术家和全体公民的2000字宣言》(简称《2000字宣言》)。这篇宣言被苏共中央看作旨在推翻捷克斯洛伐克的苏维埃政权,威胁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切身利益的反革命宣言。7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两千言书的反革命本质》一文,并得出一致结论:“显然,我们将不得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如果需要,我们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苏共和其他兄弟党已经采取了一切政治手段,但未能使捷共领导人起来反击右翼的、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有鉴于此,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采取积极措施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并一致决定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以武装部队的援助和支持。”^⑤

①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25页。

②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③ [俄]谢尔盖·谢曼诺夫:《勃列日涅夫传》,孙静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67页。

④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26页。

⑤ 同上,第428页。

8月21日,塔斯社发表声明:“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鉴于社会主义面临威胁,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刻不容缓的援助。”^①20日—21日的午夜时分,苏联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21日凌晨,苏军逮捕了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领导人,并将他们押送回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及其领导下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强烈干预下,杜布切克所进行的改革最终失败,其本人也被逐出政府和捷共。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成百上千的作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哲学家成了锅炉工、垃圾工。50万人被开除出共产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遭到清洗的人数占到全国人口的10%。“所有这些人整整20年间被从生活中一笔勾销。”^②1970年12月,勃列日涅夫支持的胡萨克成为捷共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新领导人。

苏联通过武力镇压来终结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做法,给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尽管把捷克斯洛伐克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但是苏联的国家形象和苏共的意识形态主张却遭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的普遍敌视。就在苏军占领布拉格期间,军方的报告就明确指出:“在苏军进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一周,捷克斯洛伐克居民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转向过程。如果说在我军刚来时我们可指望大约50%~60%的居民的支 持和理解的话,那么到头一周的周末由于我们宣传工作的无所作为,该比例变得明显不利于我们,已经有75%~90%受反革命宣传恐吓而精神沮丧的居民开始把苏联出兵看作占领行动。”^③苏联军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镇压其改革的举动也使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正当性受到质疑。1968年9月15日,一个名叫莫罗戈夫的普通共产党员在给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国党和政府关于(苏军和盟国军队)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会给我们祖国的威望带来难以补救的损失。下面我列举其理由:1. 这个措施将被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认为是外国军队占领他们的国家,并将会由此产生一切后果。2. 会给国际共运带来

①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28页。

②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

③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429页。

无法挽回的危害。意大利、法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将陷入困境。3. 会给我国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相互关系造成困难。4. 会给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敌对势力的反苏宣传提供有根据的材料。在这件事上,最主要的是我们祖国将陷入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我们的后代将会把这看作我们祖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①然而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恶劣的影响还在于,它实质上扼杀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改革的动力和期望。“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后一次尝试,已被坦克的履带轧得粉碎。再也没有任何人试图改革社会主义以使之得以存续。就某种意义上而言,国家已变得不复有演进能力,任何鲜活的思想都被统统扼杀。”^②

3.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社会主义原则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布拉格之春”在其思想上留下了深刻而难以泯灭的政治印记。

1969年11月,戈尔巴乔夫随团出访捷克斯洛伐克以了解和交换该国青年运动未来的意见。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有17个青年组织,但都不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除戈尔巴乔夫外,代表团成员有托木斯克地区党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共青团中央书记帕斯图霍夫和苏联教育部副部长祖拉夫勒娃。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出国是“最为困难的一次出访”。在苏联刚刚出兵镇压“布格拉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充斥着对苏联的敌意。代表团所到之处饱受冷落与敌视。“当我们来到工厂时,没有人愿意搭理我们:工人们对我们的问候不予作答,故意转身而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是一种可怕的感受”^③。在镇压“布拉格之春”时,作为当时刚刚当选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戈尔巴乔夫严格遵守苏共政治纪律,主持边疆区党委会议并通过相关决议,赞同“旨在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成果的果断而及时的措施”。但是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来

^① [苏]莫罗戈夫:“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事件的意见”(1968年),《苏联历史档案汇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22页。

^② [俄]列·姆列钦:《勃列日涅夫时代》,王尊贤译,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第226页。

^③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63页。

说,“仍然经常出现一个问题:这一行动的意义何在,它是否恰到好处?”^①

这个疑问在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开始有了明确的回答。1987年4月6日至9日,戈尔巴乔夫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有人问及如何评价1968年事件时,戈尔巴乔夫感到这是一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把我访问之前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照本宣科地告诉他们——我感到他们对我有一种诚恳的期望——是极其令人尴尬的。”在这一时刻,戈尔巴乔夫“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那种内心矛盾”。但是很快戈尔巴乔夫就作出反思和决定:“如果1968年苏联领导人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变革,事情的发展很难说会变成什么样子。但要这样做苏联领导人自身必须得改变态度——准备进行改革,继续贯彻党的二十大的方针路线。”^②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改革不仅是解决苏联国内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重新赢得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信誉的政治需要。在契尔年科葬礼期间,戈尔巴乔夫告诉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领导人:“他们可以期望我们尊重友邦的独立和主权。各成员国的执政党领导人将负责为他们的党和人民制订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我们将继续保持和扩大我们之间广泛的联系与合作,同时重申我们已经做出的承诺。重点是我们将不会干涉他们的事务。”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③

于是,戈尔巴乔夫的“解冻”开始了。1987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评论:

几乎可以肯定,事实会证明戈尔巴乔夫将是1987年世界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领导人之一。如果到今年底他还在台上的话,《时代》周刊的编辑们将会把他列入今年的名人候选人之列。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9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26页。

^③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86~287页。

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是引人注目的，但是，他的行动又包含着一些矛盾。

一些政治犯被释放了，但是，另一些政治犯却仍然被关在牢房里。克格勃打手还殴打支持不同政见者的示威群众并粗暴对待报道这一事件的西方记者。

苏联当局说，对苏联犹太人移居外国的限制已经放松了，但是实际上苏联犹太人似乎比以前更难离开苏联。

戈尔巴乔夫想消除苏联几十年来存在的守旧和经济衰退现象，但是，他似乎是想在不改变苏联基本制度的情况下获得这种新功效。使情况好转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是下放权力和放松莫斯科的控制。但是，在苏联下放权力会对莫斯科的控制构成很大威胁，因为苏联是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一个帝国。

与此同时，一些访问苏联的西方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一些苏联官员和工人却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感到有些不快，因为这些官员知道，提高效率很可能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职务，这些工人也知道，他们将被要求更加勤奋地干活，但并不增加工资。

一些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不那么热情。有消息说，他们当中有些人正在自己的国家里封锁戈尔巴乔夫的言论。他们的担心显然是，戈尔巴乔夫正在谈论的那些改革，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控制。

总的说来，我们西方人应该欢迎政策放宽，它将给长期愚昧的苏联社会带来一点点自由。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最严重地影响我们自身的安全的正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而不是苏联国内政策的变化。

苏联的国内改革要是成功，那是否意味着苏联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会减弱？专家们说，未必如此。戈尔巴乔夫关心的是更有效地同美国竞争。而且为了在国内宣传他的新政策，他也许将不得不叫党的领导人放心，相信他将在国外继续持强硬态度。

正是在阿富汗、安哥拉、古巴和尼加拉瓜，我们可以寻找蛛丝马迹，

看一看苏联外交政策是否发生变化。尽管要看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苏联撤军时间表还为时过早,但是已有一些迹象表明苏联在阿富汗采取灵活的政策。然而在别的地方,没有迹象表明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张的苏联外交政策有任何收敛。^①

四、“颠覆”与“联盟”:西方的对苏战略

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时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由代表组成的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的。它所依靠的是恐惧和迫害、对报纸和广播的控制、指名的选举和对个人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强调:“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在贫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大大茁壮起来了。我们必须使那种愿望永不熄灭。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都在期待我们的支持,以维护他们的自由。倘若我们的领导表现出举棋不定,我们就会使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我们也必定使我国的幸福受到危害。”^②杜鲁门宣誓:美国的政策在于维护每个国家对不同生活方式选择的权利。然而华丽辞藻的背后其实就是对世界霸权赤裸裸的追求,用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尼古拉·诺维柯夫的现实主义表述就是:“杜鲁门总统及其美国统治圈内其他代表的许多陈述的真实用意,是美国有权领导世界。”^③

1. “人心之争”:自由与战略

作为“自由帝国”的美国,反对布尔什维克不仅是一种出于现实政治权

①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年2月25日。

②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③ [美]理查德·W.布利特等:《20世纪史》,陈祖洲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8页。

力的需要,更是一种基于维护自由开放的意识形态的使命。作为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美国对自己所具备的普世意义具有强烈的信念。1845年“天定命运”一词被首次运用于美国获得北美大陆的历史神话,“而这个神话无非是现实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帝国主义计划的表达”。这种信念的表达伴随着19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集中体现在对建立全球自由市场的渴望,并因而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在19世纪晚期推进工业化时,资本主义市场成为所有美国人身处其中的现实,而以各种形式参与这种交换则成为美国身份的象征。当美国出口在19、20世纪之交迅速增长时,这种对市场的信念也转变为一种对开放的国际市场的自利信念;而在这个国际市场上,美国公司以其赚钱的本事和商业组织经常成为最强有力的竞争者。虽然这种信念并不经常意味着外国人可以获得美国市场的准入,但自由市场依然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和普世自由相关优越性的一种观念和逻辑延伸。”^①

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再次阐述了民主主义之于共产主义优越的自由精神:“共产主义是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即认为人类是懦弱低能的,是不能管理自己的,因此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来统治他们。民主主义的信仰基础是,人类具有道德的和理智的能力,同时也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能够合理而公正地管理自己。共产主义逮捕一个人没有合法的理由,不按法律程序,惩处个人不经审讯,并将个人当作国家的工具,强迫他劳动。个人接受什么知识,进行什么艺术创作,追随什么样的领导人物和想些什么,共产主义都一一予以规定好了。民主主义主张,政府是为个人利益而建立的,并负责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发挥个人才能的自由。”^②然而无论对自由的描述是多么美好,当美国决定要将自由传播给世界并企图以此来瓦解苏联的时候,它仍然选择了最为强硬的方式。杜鲁门表示:“我

^①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4年,第6页。

^②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285页。

们必须把我们的信念和实力原原本本地向全世界表白清楚。”^①继任的艾森豪威尔总统更是一针见血地把冷战称为争取民众思想和意志的战争,是“自由与奴役搏斗;光明与黑暗竞争”,“自由对抗共产主义独裁最有力的武器是其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至高呼吁”^②。事实上,在杜鲁门国会演说后,美国就开始积极制订针对苏联及其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全面遏制战略,直到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解体。

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遏制苏联及其共产主义运动战略概览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47年 11月 2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1号	《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NSC1/1)	该文件是战后美国对意大利的第一份政策文件,也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后制订并由总统批准的第一份政策文件。文件称,美国对意大利政策是为了“维护意大利独立、民主、对美国友好和能够参与抵抗共产主义扩张”。
1947年 12月 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号	《协调对外信息宣传措施》(NSC4)	该文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及其势力范围进行宣传和心理战的文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A号	《心理行动》(NSC4-A)	该文件把心理战作为对苏联冷战的重要内容,并确定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来负责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心理战。
1947年 12月 17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号	《美国对意大利的立场》(NSC1/2)	该文件指出:“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苏联成功地控制以下任何一个国家: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或伊朗,整个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应该“帮助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准备充分运用政治、经济 and 军事(如果必需的话)力量执行这项政策”。
1948年 3月 1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号	《共产党通过合法方式参与政府时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NSC1/3)	该文件指出,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参与政府。

①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②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48年 5月 12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号	《专门研究小组主任》(NSC10)	该文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政策规划署关于进行有组织政治战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把秘密行动作为美国在冷战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8年 6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号	《美国对向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NSC14)	该文件建议,为了对抗共产党国家,美国应该早日制定新的立法,在自助和相互援助的基础上,确定军事援助政策,“向西欧和中东地区的那些经过选择的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1948年 6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	该文件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
1948年 7月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1号	《美国对向非共产党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政策》(NSC14/1)	该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个关于对外军事援助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1948年 11月 2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0/4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关于美国抗击苏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的目标报告注解》(NSC20/4)	该文件是第20号系列文件的最后一份,它不仅确认了苏联的威胁,提出了对苏联的战略目标,而且提出了对苏联进行遏制的措施。
1949年 9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8号	《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政策》(NSC58)	该文件专门讨论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试图用非战争手段来达到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目的。
1949年 12月 2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1号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NSC48/1)	该文件在把苏联作为主要遏制对象的条件下,评估了亚洲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并把亚洲视为苏联与美国争夺的重要地区。
1949年 12月 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9号	《对外信息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计划》(NSC59)	该文件重申了在和平时期、国家紧急时期和战争初期,由国务卿决定政策事务和处理行动协调的原则。
1949年 12月 3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	《美国对亚洲的政策》(NSC48/2)	该文件指出:“美国应当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中国的斯大林分子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的。”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0年 2月 27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4号	《美国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决定》 (NSC64)	该文件指出：“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阻止共产党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印度支那是东南亚的关键地区，并处于直接威胁之下”。“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支配的政府控制，可以预料，其邻国泰国和缅甸也会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那么，东南亚的均势将会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因此，“必须把遏制共产主义在印度支那边界扩张的决定看成是阻止共产党向东南亚地区侵略的广泛考虑的一部分”。
1950年 3月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59/1号	《对外信息宣传项目和心理战计划》 (NSC59/1)	该文件规定，心理战主要由国务院负责直到战争真正爆发前夕，并提出由一个组织来负责公开和隐蔽的心理战。
1950年 4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8号	《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 (NSC68)	该文件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定型。文件提出了与苏联的冲突根源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出对苏联的遏制就是“经过精密计算而逐步实行胁迫的政策”。
1950年 7月 1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74号	《国家心理战计划》 (NSC74)	该文件详细提出了美国国家心理战的全面计划。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准备。
1950年 8月 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73/4号	《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 (NSC73/4)	该文件评估了苏联的战略意图、爆发进一步的地区性战争和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美国应对这种形势的对策，集中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当时苏联是否会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看法。
1950年 11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8/1号	《自由战略》 (NSC68/1)	该文件是对NSC68号文件的细化和修正，明确提出了把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称为“自由战略”，赋予了遏制战略的意识形态话语，突出地把遏制苏联与在全世界扩展自由等同起来。
1950年 12月 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8/3号	《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 (NSC68/3)	该文件把美国对外援助服务于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并从冷战一开始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精心设计了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心理战。
1950年 12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68/4号	《执行秘书就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项目提交的短笺》 (NSC68/4)	该文件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参战后的战略态势的判断。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1年 1月 1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0号	《应对动荡世界格局所推荐的政策和行动》(NSC100)	该文件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 W. 斯图尔特·赛明顿就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对世界形势的评估和对美国政策建议的报告,建议对苏联从遏制防御转向遏制攻势。
1951年 2月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4号	《关于美国在经济领域中可以影响苏联集团战争潜力的政策和计划》(NSC104)	该文件认为,苏联集团的经济是战争经济,属于“资本短缺”类型。美国的“经济防卫政策”应当立足于扩大和强化对苏联集团的出口管制,防止和限制战略物资、紧缺物资直接或间接地输入苏联集团。
1951年 10月 2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5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范围与步伐的决定》(NSC10/5)	该文件指出:“给苏联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包括苏联与其卫星国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按照美国与苏联的实力和避免战争风险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努力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1952年 6月 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4/2号	《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目标和方针》(NSC124/2)	该文件指出,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目标是“阻止东南亚国家进入共产主义轨道,并帮助他们发展从内部和外部抵抗共产主义以及为巩固自由世界做贡献的意志和能力”。文件认为:“共产党无论用什么方式控制整个东南亚都会在短期内对美国安全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在较长时期构成致命威胁。”这是因为:“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作为中共的公开或秘密侵略的结果落入共产党的控制都将在心理上、政治上、经济上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陷落都将导致这一集团的其他国家相当迅速地向共产党投降或与其结盟。并且,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和印度,从长期来看,还有中东(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可能除外)将很可能随之逐步与共产主义结盟。这种广泛的结盟会威胁欧洲的稳定与安全。”
1953年 4月6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8号	《美国对远东的政策》(NSC148)	该文件指出:“美国在远东新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侵略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在远东的中期目标是主要通过分裂中苏关系、使中国不再成为“苏联政策的一个有效工具”,“减少苏联在该地区的力量和影响”。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3年 5月 2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2号	《经济防卫政策评估》(NSC152)	该文件从限制苏联集团通过贸易得到发展战略能力的条件出发,提出了如何加强管控的政策。
1953年 6月 1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1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提交至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于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再声明的备忘录》(NSC153/1)	该文件是力图把冷战以来美国已有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与艾森豪威尔本身对战略态势的理解结合起来形成的文件,突出地表现在它提出了美国必须正视两个威胁:苏联侵略所造成的威胁,和因反对苏联侵略而对美国经济造成损害的威胁。
1953年 7月 3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2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经济防卫的政策声明》(NSC153/2)	该文件强调了对苏联集团进行贸易管制的必要性,并把经济防卫政策作为与军事防卫和政治结盟并列的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3年 10月 3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	《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	该文件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问题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文件强调,美国应“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措施诋毁苏联的威信和作为其有效工具的意识形态,削弱共产党和其他亲苏分子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行的外交、政治、经济和隐蔽手段反对直接或间接接受苏联控制的政党或个人在自由世界国家获取统治权力的任何威胁”;“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
1953年 11月 6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6/1号	《美国的中共政策》(NSC166/1)	该文件把中国作为美国重要的战略对手,评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与能力,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953年 11月 2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71/1号	《美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NSC171/1)	文件指出,美国政府对印度尼西亚的首要目标是阻止其落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努力把印尼纳入同西方合作的轨道。
1954年 1月 16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05号	《美国在东南亚的行动目标和方针》(NSC5405)	文件延续了NSC124/2的基本精神。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4年 3月 1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NSC5412)	该文件指出:“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困难,破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以及它们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对国内的控制复杂化,延缓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诋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力量”;“阻止那些容易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党派或个人在一个自由世界国家获得统治权力”;“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对世界任何地区的控制”。
1954年 5月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18号	《美国对印尼的政策》(NSC5518)	文件明确美国对印尼的目标仍然是防止印尼落入共产党之手。
1954年 6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3/3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经济防卫的政策声明》(NSC153/3)	该文件是对第152号文件系列的最后版本,确定了美国的贸易管制政策。
1954年 8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0号	《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地位》(NSC5430)	该文件的第七部分描述了美国新闻署的计划。
1955年 1月 3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5/1号	《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弱点》(NSC5505/1)	该文件专门讨论了利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弱点,通过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行动等手段的运用来削弱苏联东欧集团。
1956年 3月 1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2/1号	《国家基本安全政策》(NSC5602/1)	该文件突出讨论了美苏都拥有核武器之后的战略态势,形成了美苏用核武器构成相互威慑的观点。
1956年 6月 2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7号	《东西方交流的政策阐释》(NSC5607)	该文件阐述了美国政府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该文件要求政府把东西方文化交流计划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工具”,力图通过“促进卫星国人民对更大的个人自由、福利和安全向往来削弱共党政权”。
1957年 6月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7/8号	《国安基本安全政策》(NSC5707/8)	该文件比较系统地描述了在“核武器充足时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内容,提出了美国要维护集体安全的概念,通过政治、经济、外交、新闻、文化、秘密行动等各种手段,争取中间地带国家,以分化苏联集团,改变苏联的行为。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7年 9月 16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704/3号	《美国经济防卫政策声明》(NSC5704/3)	该文件重新强调了经济防卫政策,把经济防卫政策作为对苏联集团的军事政策和政治同盟政策的一部分,用贸易管制作为武器来削弱苏联集团的发展潜力。
1960年 1月 1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001号	《美国对南部、中部和东部非洲的政策》(NSC6001)	该文件指出,美国的政策总目标是“保持该地区的自由世界方向,阻止共产主义对该地区的统治”,“把共产主义对该地区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
1961年 3月 11日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31号	《讨论古巴问题的备忘录》(NSAM31)	该文件指出,肯尼迪总统“期望授权美国支持一定数量的古巴爱国者返回他们的祖国”。
1963年 11月 26日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273号	《美国对越南的政策》(NSAM273)	该文件指出,美国对越南政策的中心目标是帮助越南政府“赢得反对受到外部指导和支持的共产主义阴谋的斗争”。
1970年 8月 10日	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76号	《美国对外援助的新计划》(NSDM76)	该文件是尼克松政府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决策。
1975年 5月 26日	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第224号	《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NSSM224)	该文件决定了美国扶持安哥拉反对派的政策。
1976年 2月 18日	总统行政令第11905号	《美国对外情报活动》(E. O. 11905)	命令指出,隐蔽行动“不同于收集和提供情报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活动,它是旨在促进美国政府在国外的计划和政策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计划和执行要使美国政府的作用不被暴露或公开承认”。
1978年 1月 24日	总统行政令第12036号	《美国对外情报活动》(E. O. 12036)	命令进一步强化了特别协调委员会管理隐蔽行动的权威性。
1978年 8月 24日	总统评估备忘录第42号	《美国对苏联的非军事竞争战略》(PRM42)	备忘录说,总统要求强化美国对苏联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如何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总统评估备忘录第43号	《美国的全球存在》(PRM43)	备忘录说,总统要求从维持和强化美国针对苏联的政治与军事地位,向重点关切国家提供信任与信心的角度,重新评估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81年 12月 4日	总统行政令第 12333号	《美国情报活动》 (E. O. 12333)	文件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对隐蔽行动进行审议、指导的最高行政机构,再次确认美国情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从事“特别活动”。
1982年 1月4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17号	《古巴和中美洲》 (NSDD17)	指令概述美国的政策是援助萨尔瓦多击败叛军,反对古巴、尼加拉瓜等国从外部地区向中美洲输入重型武器、军队,派遣受过训练的颠覆分子,或给叛乱者供应武器和军事装备。
1982年 5月 20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32号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DD32)	指令指出:“80年代将可能是二战以来决定美国生存与繁荣的最具挑战性的10年,美国的应对可能导致80年代末时东西方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指令授权采取广泛的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活动打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授权采取隐蔽行动和其他手段支持该地区的反苏组织,如秘密资助游行示威、集会、各种会议、出版印刷宣传品、制作电视节目、展览,以及诸如此类吸引人们注意苏联非法活动的活动。
1982年 5月 28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37号	《关于古巴和中美洲的国家安全决定指令》(NSDD37)	该决定目前仍处于保密状态。
1982年 9月2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54号	《美国对东欧的政策》(NSDD54)	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对东欧的预期目标是……促使其最终融入欧洲国家共同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要对东欧国家采取和苏联不同的政策,要鼓励该地区更自由的趋势,促进东欧国家的人权和公民权,加强其人民的亲西方倾向,减少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苏联的依赖,促进他们与西欧自由国家的联合,鼓励其经济发展私有市场倾向和自由工会的活动。
1982年 10月 5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59号	《古巴与中美洲》 (NSDD59)	该指令绝大部分内容处于保密状态。
1982年 11月 12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66号	《东西方经济关系及与波兰相关的制裁》(NSDD66)	指令要求美国及其盟国不再购买苏联的天然气,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上增加一些重要的技术设备项目,提高给苏联的贷款利率,限制给苏联的信贷。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83年 1月 17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75号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	指令明确指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从外部抵抗苏联的帝国主义；从内部对苏联施压以削弱苏联的帝国主义资源；通过谈判，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消除双方的突出分歧。”该指令全面阐述、具体规定了美国对苏联总的各个方面的政策任务战略措施。
1985年 3月 27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166号	《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NSDD166)	该指令要求美国要“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把苏联赶出阿富汗。
1986年 2月 10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212号	《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NSDD212)	指令指出，美国及其盟国在南部非洲有重要的政治、商业和战略利益，规定美国的政策目标之一是削弱并尽可能消除苏联及其代理人在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的影响和机会。
1986年 10月 22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248号	《中美洲》(NSDD248)	指令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力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决定为了给予尼加拉瓜民主抵抗力量相关的活动提供政策指导、协调和监督，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下面设立专门机构。
1987年 2月 27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264号	《中美洲》(NSDD248/2)	指令明确表示美国政府的政策是促进整个西半球的民主，并表示他决心看到民主在中美洲获胜。
1987年 5月7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274号	《美国对安哥拉的政策》(NSDD274)	指令决定要继续坚持 NSDD212 文件所确定的政策目标和战略。
1989年 1月 30日	国家安全指令 第1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结构》(NSD1)	指令确定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性质、职责和构成，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讨论需要总统决定的国家安全政策问题的最重要的机构，它将建议和帮助总统整合影响美国的所有国家安全政策，包括对内、对外、军事、情报和经济方面的政策。
1989年 5月1日	国家安全指令 第8号	《美国对尼加拉瓜和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政策》(NSD8)	指令指出，美国对尼加拉瓜和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目标是阻止苏联战略利用尼加拉瓜，包括要使苏联和古巴的军事力量撤出尼加拉瓜、要使苏联集团极大地减少对尼加拉瓜的援助、要通过终结尼加拉瓜的颠覆活动减少它对其邻居和其他拉美国家的威胁。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89年 9月 22日	国家安全指令 第23号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	指令对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对苏遏制战略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即“超越遏制,积极促进苏联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的政策”。指令阐述了美国的‘政治—外交’目标的是:“通过继续对朋友、盟国和自由战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限制苏联通过提供武器、派遣军队、支持傀儡等扩张实力。”

2. NSC68:美国全球冷战蓝图

冷战从一开始就被美国从心理上塑造成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950年4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号文件——《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NSC68)。这份被称为“美国全球冷战蓝图”的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定型。

NSC68号文件提出了美国与苏联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处在法治政府管理下的自由观念,和在克里姆林宫的残酷极权统治之下的奴隶制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矛盾”,“自由思想对奴隶制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破坏力,但是奴隶制思想无法破坏自由思想。奴隶制国家坚定不移的目的是力求消灭自由思想的挑战,进而使两大力量处于对立的两极地位”。^①文件强调:“自由思想的持久存在是对奴隶制社会根基的永恒威胁,因此自由在世界上的长期存在是令专制无法容忍的。力量的两极化是新的现象,引起奴隶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不可避免的对立,并造成持续的危机。”^②因此,“我们的自由社会不得不承认,苏联体制向我们提出了你死我活的挑战。从未有任何一种价值体系与我们本身固有的价值体系是如此对立;它破坏我们的价值体系的意图是如此难以改变;它是如此擅长于利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最为危险和分裂的趋势;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如此有力地在世界各地唤起人类本性中的非理性成分;没有任何别的制度能够得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4页。

^② 同上,第55~56页。

到巨大的、日益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心的支持”^①。对美国来说,在这场“自由”与“专制”的较量中,就是要通过运用除战争以外的其他遏制手段达成如下目标:①阻止苏联力量的进一步扩张;②揭露苏联意图的虚伪;③诱使克里姆林宫缩小其控制和影响;④培养苏联体系内破坏性的种子,迫使克里姆林宫至少要把它的行为限制在适合于国际准则的范围内。^②

1950年11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1号文件——《自由战略》(NSC68/1)进一步细化和修正了NSC68号文件。与其他68号文件相比,NSC68/1号文件明确地把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称为“自由战略”,赋予了遏制战略的意识形态话语,突出地把遏制苏联与在全世界扩展自由等同起来。

NSC68/1号文件指出,贯穿整个问题的原则就是“自由”。挫败克里姆林宫图谋的希望集中体现在自由战略中——该词用于此处以明确采取必要政治和经济行动的底线。这个战略要求注重力量的创造和保持并伴随着以下行动:

1. 针对苏联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野心和行动,鼓励认识和进行有效抵抗;
2. 保护可信赖的盟友,它们的力量在与我们的力量进行有效的组织和联合后可以威慑——或者,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击退——苏联的进攻;
3. 赢得和保护所有人民对我们的目标——实现确保和平自由的国际秩序——予以广泛的支持;
4. 在必要的集体机制的发展和加强方面不断取得进步,以保持和平、自由和人类福祉的发展;
5. 提高社会和经济水平,这将有助于实现前述诸目标的实现;
6. 减少与我们的立场相悖的地区革命和动乱发生的机会和危险,只有当合法性盛行、民族主义的渴望得到满足、苏联的地位得到相应的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② 同上,第67页。

削弱而不会对我们产生副作用时，应鼓励地区的革命和动乱；

7. 借助于所有这些步骤，创造苏联采取一系列妥协和调整行动所需的环境，苏联的这些变化可以通过一次次的协议谈判而反映出来，并与其力量式微的态势相一致。^①

3. “神圣联盟”：里根与教皇

1953年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就职演说中以自由的观念阐述了美苏冷战的意识形态内涵：“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很少会像现在这样，正义与邪恶的力量聚焦在一起，全副武装，针锋相对。在上帝面前，我们被称为在世界面前作证的民族，我们承诺，未来属于自由的人。自由与奴役搏斗；光明与黑暗竞争。捍卫自由，如自由本身般不可分割，对所有大陆和民族一视同仁。怎么能说种族和民族之间有贵贱之别，我们拒绝任何这样的影射。”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目的在于保护一种生活方式，而非简单地保卫财产、领土、房屋或生命。”所谓的“生活方式”意即个人自由、贸易自由、机会平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上苍的礼物”。美苏之间的冷战，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而非军事上的抗衡。艾森豪威尔相信：“自由对抗共产主义独裁最有力的武器是其对人类灵魂和精神的至高呼吁。”^②

对美国政府来说，在充分武装和使用世俗的力量来打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坚硬外壳的同时，宗教的信仰力量对在共产主义信念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人民来说无疑更具有精神上的渗透颠覆作用。于是，冷战开始不久，西方世界的世俗力量很快就与宗教力量走到了一起，发起了对共产主义的全面反击。1981年发生的波兰团结工会事件给美国政府打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统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12月17日，里根总统在声明中毫不掩饰自己的欣喜之情：“人类最基本的和无法取代的渴望之一——通往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②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3页。

自由,正激励着铁幕后面的生灵,在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大坝上打开第一个缺口。”^①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能让这次反共的革命行动失败,而不给予支持”,因为“我们一生中可能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②

为了充分利用波兰这个在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中最薄弱的环节,早在里根上台之前就认为“在决定波兰命运的过程中,罗马教皇是一位关键人物”^③。因为波兰全国绝大部分人口信奉天主教,时任罗马教皇的约翰—保罗二世即出自波兰。对苏联来说,“教皇是苏联在东欧,尤其在波兰,遭遇麻烦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1978年的教皇选举以及随后他对波兰的访问导致了波兰民族主义和自豪感的兴趣,由最初的闷烧演变成燎原之火,对抗议和罢工活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最终导致了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的出现”^④。对美国来说,波兰裔教皇的出现却是将美国代表的世俗力量与教皇代表的宗教力量结合起来的天然的黏合剂。这是因为,里根政府的关键性决策人物——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艾伦·克拉克、黑格、沃尔特斯以及里根派往梵蒂冈的第一位大使威廉·威尔逊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认为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是一种神圣联盟。因此,在里根当上总统后最早的目标之一是承认梵蒂冈是一个国家,“并与其结为盟友”。

1982年6月7日,美国总统里根和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实现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会面,并且单独会谈了50分钟。与此同时,大主教阿基莱·西尔维斯特里尼等人同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以及里根的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也举行了会谈。他们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于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但是里根和教皇只花了几分钟讨论中东局势。他们集中讨论他们更关心的问题,那就是波兰以及苏联对东欧的控制。里根和教皇在第一次会见中谈道:他们两人在1981年都遇到暗杀而大难不死,前后相差仅6个星期。两人都相信上帝救他们是为了让他们完成一项特别使命。里根和教

①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191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93页。

③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1页。

④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皇一致同意开展一场秘密运动来加速这个共产党帝国的瓦解——如果梵蒂冈和美国联手动摇波兰政府并使在 1981 年实行戒严以后被宣布为非法的团结工会运动保持活力，就可以使波兰脱离苏联集团。

不过，对于 1982 年会晤时的里根和教皇来说，他们都没有想到苏联会出现一位戈尔巴乔夫这样的领导人。由于这位“公开性”的“改革之父”的努力，给那些强有力的势力松了紧箍咒，使他失去了控制并导致苏联的解体。可以说，“共产主义的崩溃”并不是由华盛顿—梵蒂冈联盟造成的，“像所有伟大和幸运的领导人一样，教皇和总统利用了历史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无论怎么说，里根和教皇的联盟却具有历史意义。正如里根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宣称的那样：“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联盟之一。”^①

^① [美]卡尔·伯恩斯坦：“神圣联盟”，《时代》周刊，1992 年 2 月 24 日。

第二章 撒切尔、里根—布什、 科尔与戈尔巴乔夫

当冷战的时针指向 20 世纪 80 年代时,一股新的政治力量在西方世界开始产生,并酝酿着冲破美苏两大阵营长期对峙格局的内在动力。无论是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还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以及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等,都成为西方世界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重新采取进攻政策的政治强硬代表。“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相继离任,同时离任的还有那些支持缓和政策,重视军备控制,并认为这是遏制苏联强硬政策的最佳方式的人。在美国和英国,新国家领导人代表着内政外交的一股革命性改革力量。他们使人们恢复了对本国和西方社会未来前景长期缺失的信心和精神。在国际事务方面,法国和西德的新国家领导人不久也加入他们的阵营,决心挑战苏联的国家利益。”^①与之产生历史应和的则是苏联从 1982 年 11 月到 1985 年 3 月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接连失去了三位总书记。对苏联来说,“所有这些变故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停滞和衰老的血液不再具有任何活力”^②。于是,当里根于 1982 年 5 月 20 日签署第 32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NSDD32)时,他敏锐地注意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80 年代将可能是二战以来决定美国生存与繁荣的最具挑战性的 10 年,美国的应对可能导致 80 年代末时东西方关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142 页。

②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 年,第 287 页。

系发生实质性变化”^①。

一、撒切尔：不喜欢共产主义

在美苏冷战期间,英国实际上扮演着平衡美苏关系的第三方力量的政治角色。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这种政治角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无论是对坚持强硬对苏政策的里根总统,还是对刚刚接掌苏联政权的戈尔巴乔夫来说,都需要撒切尔夫人在两人中间发挥政治润滑剂的作用。就像1985年4月29日联邦德国《明镜》周刊评价的那样:“从东西方关系看来,撒切尔夫人,您的地位很特别,因为您既同里根先生也同戈尔巴乔夫先生谈过星球大战之事。”^②然而撒切尔夫人并不仅仅满足于发挥美国和苏联的中间桥梁作用。事实上,从1979年到1990年担任英国首相的这一时期,撒切尔夫人不仅是苏联从盛转衰的历史见证者,更是这一历史事变发生的参与者。在撒切尔夫人的历史行为背后,是她鲜明的政治立场——“我不喜欢苏联的体制——共产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不人道的,而且极少关注人的尊严。它既没有给你们带来繁荣,也没有带来自由”^③。

1. 撒切尔与里根:抛弃国际缓和政策

1976年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肯辛顿市政大厅对保守党议员的演讲,最为深刻地反映了她对苏联争霸世界雄心的看法和她对未来冷战发展趋势的判断。

撒切尔夫人说:“苏联人致力于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们很快获得了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帝国的方法”,“他们知道自己只在唯一意义上是超级大国,那就是军事。他们在人权和经济方面都是失败”。撒切尔夫人批评缓和

^①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32, “U. 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982.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032-hn>, May 20.

^② [联邦德国]《明镜》周刊,1985年4月29日。

^③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国际关系的决定,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政策,因为只有西方国家坚持它的目的,并服从《赫尔辛基协定》。撒切尔夫人说,“若有任何一丝苏联人真心缓和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证据,我都会是欢迎此举的第一人”,“但我担心这个证据指向另一条路”。撒切尔夫人担心英国的传统盟友美国无力面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挑战。她相信美国会是抵抗苏联冒险主义的中流砥柱,并且呼吁大家理解英美两国共同的历史。她说,“在保守党内,我们相信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继续建基于对传统盟友美国的深入了解”,“这是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传统,也是我们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承诺”。但是令撒切尔夫人焦虑的是,越战已经对美国反共产主义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们希望我们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约是我们自身安全的主要保障。”她认为,强大的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以及充足的国防开支是必需的。撒切尔夫人告诫道:“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威胁到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这种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用于继续改变我们的生存方式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难以应付局面。”^①

伦敦肯辛顿市政大厅的演说让她赢得了苏联人送给她的绰号——“铁娘子”。对这个称号,撒切尔夫人并不生气,甚至觉得开心、好笑。尽管在演讲中对尼克松以来美国政府奉行对苏缓和战略并不满意,并将之不屑地称为“迂回曲折”。但是撒切尔夫人还是受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赞赏:“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位坚韧的女性,非常有主见,意志坚强,不会认为自己对某些事不甚了解。我认为,她将是好首相。”^②不过,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来自于里根总统的友谊却是最珍贵的。里根回忆说:“在我8年的总统生涯中,我们的联盟没有一个像美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盟那样牢固。不仅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我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并持有相同的政见,而且我们的联盟由于两国长期的特殊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我们的特殊关系源于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共同的盎格鲁撒克逊祖先和共同的语言,以及在两次

^①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29页。

^② 同上,第128页。

世界大战中由肩并肩战斗而形成的深厚和成熟的友谊。”^①

事实上,撒切尔夫人得到的不仅是友谊,更是坚定的支持。她在国内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对外坚决抵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在这场孤独的奋战中,只有里根是她的战友。”于是,在1981年1月20日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时,撒切尔夫人表达了她的祝福和期望:“在你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之际,请允许我和同事向你表示祝贺。你在危机时刻要承担起领导一个国家的艰巨任务。但是,你的就职演说正是北约联盟的希望。在共同面对20世纪80年代的挑战时,你还有我们的信任和支持。下个月,我将访问华盛顿,希望届时能与你重温旧日友谊,并巩固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②

1981年2月25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抵达美国白宫,成为里根总统宣誓就职后来访的第一位国家元首。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告诉里根:“你也许会觉得现在的工作是全世界最孤独的工作,你也许会需要我最了不起的一位政治伙伴曾给我的‘深夜两点的鼓励’。我想这样的时刻一定有很多次。当你有这样的感觉时,我们就在这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百分百信任你,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捍卫普通人的自由。”^③对里根希望重整美国军备并以此战胜苏联的计划和意图,撒切尔夫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支持。1981年10月1日,里根写信给撒切尔夫人,阐释了如何取得该项计划的胜利。撒切尔夫人在回信中表示赞同:“这一计划从战略上增强了对核战争的抑制力,英国政府欢迎这样的计划。它增强了北约联盟的抵抗力,使得北约得以作为一个整体抵抗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此外,我非常欣赏美国政府加强防御能力的决心和该计划的宗旨——迫使苏联真正加入军备控制谈判。整个北约联盟都感受到这一计划的好处。”^④

1988年6月,里根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伦敦,并在伦敦市政厅大会堂向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成员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里根高度评价了撒切尔夫人在促成苏联发生变化时所发挥的历史作用: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348页。

② [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148页。

③ 同上,第156~157页。

④ 同上,第177页。

虽然历史提醒我们,我们也会遭到质疑和批评,只有那些带来希望和力量的声音才会被铭记,但我想说的是,一个坚定、有说服力的声音已经被人民铭记。在过去10年经历的所有烦恼中,它宣布了西方联盟的前进目标和人类的自由。这个声音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反共使命和对苏联的转变做出切合实际的评估。这个声音恰好来自联盟中服务时间最长的领袖,是她第一个建议我们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共事”……首相,莫斯科谈判以及日内瓦和华盛顿谈判之所以能取得成就,多亏您掌管的政府和英国人民。这证明了您的勇气和力量。^①

2. 戈尔巴乔夫: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正如里根在演讲中对撒切尔夫人的评价一样,她很明白自己和自己的国家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作用。对撒切尔夫人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就是里根的掩护者”^②。掩护的目的在于通过与苏联领导人的近距离接触,以帮助美国获得最为直观的了解。1984年12月16日,撒切尔夫人与苏联政坛的“未来之星”戈尔巴乔夫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晤。事实上,这一计划本身就是撒切尔夫人作为“里根的掩护者”的刻意安排。

为什么要选择戈尔巴乔夫呢?对撒切尔夫人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提前“政治投资”。从1982年到1984年间,苏联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连串令人瞠目结舌的剧烈变化。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接连去世,让里根迫切想要了解苏联国内政治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以此作为美国政府制订对苏战略的必要基础。于是,苏联一连串的国家葬礼开始从悲剧变成喜剧,“葬礼外交”成为西方与苏联互相进行政治试探的奇异体现。撒切尔夫人承担起了这一任务。“莫斯科的一连串国葬却给西方领导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撒切尔夫人发现这些可怕的异教仪式给了她访问莫

^①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14页。

^② 同上,第273页。

斯科的机会。这种访问完全没有国事访问的礼节和期待,同时,这也是和年轻一代苏联领导人接触的好机会,毕竟他们最终将接管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①

参加安德罗波夫的葬礼时,在与新任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短暂的会面后,撒切尔夫人果断地得出结论:“他实在太老了,体弱多病,很难再撑太久了。”撒切尔夫人必须开始关注下一代领导人。撒切尔夫人当时了解到有两位年轻的苏联政治家——格里戈里·罗曼诺夫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很有可能即将成为契尔年科之后的苏联新的最高领导人。撒切尔夫人最终选择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她迫切希望获得关于苏联领导人的最新消息,然后在1984年12月18日举行的戴维营会谈时转告里根。

1984年12月15日,戈尔巴乔夫率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团抵达伦敦并访问英国议会。代表团成员包括院士叶夫根尼·韦利霍夫以及两名外交官列昂尼德·扎米亚京和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12月16日,撒切尔夫人在首相的夏季乡村别墅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一行。在会谈中,撒切尔夫人直率地表现了她对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看法:“我不喜欢苏联的体制——共产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不人道的,而且极少关注人的尊严。它既没有给你们带来繁荣,也没有带来自由。但有一件事情我完全认同:你们有权利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也有权利延续我们的生活方式一样。同样,你们也有权利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也是如此。”^②在谈到军备控制和美、英、苏三国关系时,撒切尔夫人告诉戈尔巴乔夫:“你必须知道,长久以来,英美都是朋友和同盟。无论如何,我不会充当苏联和美国的中间人。我是美国的盟友。我们相同的信仰。我们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共同抗争。不要试图离间我们。总之,请不要浪费时间劝我对里根说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没有用的。”^③

事实上,面对撒切尔夫人的坦率发言,戈尔巴乔夫一点都不奇怪。对于

①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73页。

② 同上,第274页。

③ 同上,第275页。

这次邀请访问,戈尔巴乔夫早就认识到这是一次“摸底”。“我也觉察到了撒切尔夫人有意利用我们的这次会晤,以便对苏联领导人是否会出现新的趋向进行‘摸底’。从她的一些公开发表的言论来看,她甚至认为英国正在苏联以及全世界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戈尔巴乔夫的为人。”^①因此,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但又不失幽默地反击道:“我知道你是一位坚持原则和价值观的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但你要记住坐在你身旁的是同一种类型的人。此外,我应当告诉你的是,我没有接到政治局任何有关要劝说你加入共产党的指示。”^②

1984年12月撒切尔和戈尔巴乔夫的正式接触无疑对后来的两人关系以及冷战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对撒切尔夫人来说,戈尔巴乔夫给了她完全不同的苏联领导人的形象展示。她回忆道,“他的个性同大多数口齿不灵的苏联党政官员截然相反”,“他微笑,大笑,用各种手势强调,调节自己的声音,将一个话题争论到底。他还是一个很好的辩手。他很自信,而且当谈到富有争议的政治话题时,完全看不出他会局促不安……我对他比较有好感”。^③于是,在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向媒体说:“我很喜欢戈尔巴乔夫。我们可以共事。”^④在随后与里根举行的戴维营会谈时,撒切尔夫人转告了她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里根问:“我知道戈尔巴乔夫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对他的印象如何?”撒切尔夫人说:“他不同于一般苏联人,不那么拘束,更有魅力,也喜欢交流和辩论,不拘泥于事先准备的条条框框。”撒切尔夫人告诉里根,她对戈尔巴乔夫说里根是值得尊敬的人。^⑤

看来,与撒切尔夫人的会面也对戈尔巴乔夫产生很大触动。对戈尔巴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4页。

②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70页。

③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④ 同上,第275页。

⑤ 同上,第276页。

乔夫来说,这次访问英国是一件与过去“意义完全不同的事件”^①。因为在这次访问之前,类似的苏联代表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没有访问过英国。况且,由于苏联外交部总是把议会机构的访问视为礼节性和形式上的访问,所以并没有对这次访问给予特别重视。但是正是这次访问和在12月18日在英国议会上的演讲,促使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将有关苏联外交政策和世界秩序的观察和想法作了正式的阐述,并对其后新思维的提出产生了影响。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总的说来,1984年末我和撒切尔夫人在切克斯相见时结下的幼果是很有生命力的。我们两人都很重视已建立起来的接触,并且不久就相处得很融洽了。也许是多亏这第一次会晤,在我出任国家领导之后举行的苏英对话一下子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在我国改革初期英国政府的政策决不能说是友好的。”^②

1987年3月2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访问苏联并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尽管两人在关于人权和武器控制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是这并不妨碍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相互之间产生政治好感。苏联《真理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幅他们一起亲密地坐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张古式沙发上的照片。照片上的戈尔巴乔夫面带过于谦恭的微笑,这种现象如此反常,以致使一位莫斯科人惊叹道:“与其说他们是两位大概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持有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还不如说他们更像是一对在欢庆婚礼的新婚夫妇。”^③对戈尔巴乔夫及其他苏联官员来说,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可以与之进行有成效和对双方都有价值的对话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撒切尔夫人回国之时,戈尔巴乔夫向她表示:“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我们仍可以同你打交道。”^④

撒切尔夫人也向外界表达了她对戈尔巴乔夫及其领导下的苏联改革的看法。她说,在她同任何国家的领导人举行过的会谈中,同戈尔巴乔夫的13

①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68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4页。

③ [英]《泰晤士报》,1987年4月1日。

④ 路透社莫斯科1987年4月1日电。

小时会谈是最有价值的。撒切尔夫人强调,自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进程开始以来,苏联向西方发出的信息是,苏联社会已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其标志是,公开的程度大多了,他们管理工业和处理其他事情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说:“考虑到我们之间的差别很大,观点相去甚远,可以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她还说:“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仍然不同”,“我们可能各执己见,但其中没有任何个人的成分,也没有什么怨恨或恶感”。关于戈尔巴乔夫,撒切尔夫人表示:“我喜欢并尊重他。”^①在1988年3月3日举行的北约首脑会议上,撒切尔夫人把自己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提并论,并且要求西方国家鼓励戈尔巴乔夫开始的国内改革。撒切尔夫人说,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改革,她称戈尔巴乔夫时代是“使世界带来新希望的新篇章”^②。

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卸任英国首相一职。对撒切尔夫人的离职及其历史作用,戈尔巴乔夫给予了充满感情的评价:

对我们来说撒切尔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伙伴,特别是鉴于她强烈的反共态度,这种态度有时不免妨碍她更现实地看待事情,尽管在许多情况下她也能引用一些我们自己后来的确进行了重新评价和严肃批判的事实来印证她的指责。总的说来,她是一个维护西方利益和价值观念的辩护士。她身上大量保留了我们俄罗斯人习惯认为的英国的古老特点——崇尚各种传统和牢不可破的久经考验的价值标准。在历次正式会晤期间,她都非常专注,彬彬有礼。而当我们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尽管观点上有分歧、政治上有争论,她对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态度中都显示了人情味十足的亲切之感。^③

① 路透社伦敦1987年4月2日电。

② 路透社布鲁塞尔1988年3月3日电。

③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56~957页。

二、里根—布什：从遏制到超越

从1969年至1980年是一段超级大国朝着结束冷战的目标迈进的飘忽不定、停滞不前的时光。尽管在这一阶段苏联似乎处于全面进攻并可能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标,但实质上苏联内部已经是危机四伏。进入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新任总统里根敏锐地感觉到了苏联强势进攻的后面隐约透露出的危机味道,并及时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对苏战略,以此加速苏联内部危机的发展并将其置于濒临崩溃的状态。可以说,在苏联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在冷战后美国的历届总统中,里根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正如基辛格所言:“苏联阵营的分崩离析在里根总统第一个任期内已现迹象,到他即将卸任时已经大势底定、不能挽回。在里根总统之前的几任总统功不可没,紧接着是入主白宫的布什总统,技巧地导引着苏联寿终正寝,亦有一份功劳。不过,真正发生扭转作用的却是里根。”^①

1. 里根主义、邪恶帝国与戈尔巴乔夫

里根的“扭转作用”最集中地体现在他改变了自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以来美苏之间奉行的缓和政策,重新恢复和确立起了美国对苏联的强硬政策。

在里根看来,美苏之间的“缓和”实质上已经变成苏联单方面的全球扩张行动。“我们与苏联的关系要建立在‘缓和’的基础上。但俄国人把这个法文词解释为他们可随意在世界任何地方推行颠覆、侵略和扩张政策。从列宁直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每一代苏联领导人,都声称苏联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短暂间隙外,近65年来,俄国人实际上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政策目标一直是连续而顽固地追求摧毁民主制度和确立共产主义制度。”^②里根认为,“缓和”政策实际上就是对美国自由世界的精神领袖和民主制度首要捍卫者这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7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4页。

一历史性角色的自我放弃,是美国精神的自我消退。而这一点恰恰是最危险的。里根说:“我不明白这种撤退意识的根源是什么。或许,这与越南战争、能源危机、卡特时期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其他经济问题有关,或者说与卡特政府对伊朗政策失败所招致的沮丧情绪等因素有关。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我认为,从超级大国和自由世界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对美国来说,是毫无意义和站不住脚的,同时也是危险的。”^①

对里根来说,捍卫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就是捍卫美国的自由民主精神。里根说,美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山丘上的城市,因为它赋予所有公民“触手可及并能使之实现自己梦想的自由”。在美国,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理想抱负和工作表现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对里根来说,“每一天都是‘美利坚的清晨’”。^②里根感到,他的政治使命就是要捍卫自己理想中的美国,以及能够赋予人们机遇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在1981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仪式的演说中,里根向全世界表达了他的对苏新战略。里根表示,苏联的目标“就是要推进世界革命,在全世界推广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体制”。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保留了犯罪、撒谎和欺骗的权利”。里根回忆说:“在我的讲演中和记者招待会上,我开始有意用非常直率的语言来谈论俄国人,以使他们明白:华盛顿来了一批新人,他们对苏联之所作所为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且也不打算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③

里根态度的转变还源于他对苏联领导人的细致观察。“3年总统生涯使我对俄国人有了惊人的发现:在苏维埃统治集团的最上层,许多人确实害怕美国和美国人。也许我对此不应感到惊异,但我的确惊诧不已。实际上,开始时我难以接受我自己的这个结论。”^④不过,在与苏联领导人和了解他们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接触中,里根越来越认识到,“许多苏联官员害怕我们,这不仅是出于我们是他们的对手,而且还因为他们认为我们是可能向他们发动第一次核打击的潜在的侵略者;正因为这一点,也许还因为其根源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

②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0页。

③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④ 同上,第581页。

一直可以追溯到拿破仑和希特勒入侵俄国的不安全感和偏执妄想症”^①。

事实上,里根的态度表明了他想改变美国的“缓和”战略而代之以全面进攻。就像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观察的那样:“通过经济、军事、政治、思想和第三世界斗争,里根从就任总统的第一天起便明确表达了逆转‘美苏力量对比关系’的决心——从现实和思想两方面实现逆转,证明到底哪个国家更强大、哪个国家代表着世界的未来。对于更改长达十年的苏联优势地位,里根似乎表现出不容置疑的信心。1981年,只有里根真正意识到,苏联的体制是脆弱的。而且,这种脆弱并非模糊和长期的历史观点,而是当时的现实。他决心推动美国和西方转变策略,由防御转入进攻。”^②

很快,里根就将新的想法转变成为新的战略——里根主义,即“美国将协助反共的义军,促成其国家脱离苏联势力范围”^③。

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向欧洲宣布自己的首要外交政策——下决心引领世界朝着他希望的方向前进。在演讲中,为了回应1946年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的“铁幕”演说,里根说道:“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黑海的瓦尔纳,极权主义者建立的政权用了超过30年的时间打造他们的合法性。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权敢自由选举。刺刀下的政权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里根宣称:“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世界对建立经济秩序的需求和政治秩序之间的直接冲撞。但这种危机并没有发生在自由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而是发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故乡——苏联。正是苏联逆历史潮流而动,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和人格尊严。同时,它也深陷经济危机。”^④

1983年1月17日,里根总统签署第75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指令开宗明义地指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从外部抵抗苏联的帝国主义;从内部对苏联施压以削弱苏联的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581~582页。

② [美] 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54页。

③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16页。

④ [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22~223页。

帝国主义资源；通过谈判，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消除双方的突出分歧。”^①作为冷战期间关键的文件之一，NSDD75 提出了“一种能够按照美国的时间表将美苏斗争进行到底的长期方法”^②。该项指令全面阐述了美国对苏联所采取的五项颠覆战略：

●重心是加强美国防务力量，迫使苏联人在军事上同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竞争，在经济上把苏联拖垮。

●进行秘密活动，旨在鼓励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改革运动。

●向华约成员国提供财政援助时，根据各国保护人权和进行政治和自由市场改革的情况区别对待。

●经济上孤立苏联，不让莫斯科获得西方和日本的技术。集中力量破坏苏联向西欧提供天然气的跨洲天然气管道计划，使这条管道不能像苏联所希望的那样在 21 世纪成为其硬通货的主要来源。这条从西伯利亚通到法国的长达 5800 千米的天然气管道在 1984 年 1 月 1 日按时开通，但其规模远小于苏联人当初所希望的。

●加强解放电台、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向东欧人民转达美国政府的信息。

3 月 8 日，里根在全国福音派信徒协会年会上发表的题为“邪恶帝国”的演讲，成为他作为“冷战斗士”挑战苏联作为超级大国道德正当性的最显著标志。里根在演讲中指出：“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所认可的唯一道德，是推进他们事业的道德，而不是任何宗教的道德，也不是超越阶级观念的道德；道德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道德对于废除一个陈旧的社会制度、团结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许多有影响的人拒绝接受苏联的这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06 页。

^②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 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 635 页。

种基本理论,这本身就表明历史不愿意看到一个极权主义大国的存在。”里根指责苏联是“当今世界的罪恶之源”。他说:“历史给我们的启示是,对我们的敌人怀有纯朴的姑息和理性的愿望是愚蠢的。这意味着对我们过去的背叛和对我们自由的滥用。所以我强烈要求你们谴责那些要把美国置于军事上和道义上劣势地位的人们。在你们就冻结核武器的建议进行讨论时,我要求你们清醒地看到傲慢的诱惑力,不要轻率地宣称自我高于一切,不要同样指责双方的失误,不要忽视历史的事实和罪恶帝国的侵略本性,不要简单地把军备竞赛说成是重大误解。总之,不要使你分不清对与错,善和恶。”^①

尽管里根表现出歇斯底里式的意识形态反共形象,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与苏联领导人的交往。事实上,“里根对于结束冷战的特殊贡献并非他在思想形态上的信念,因为那并没有背离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以及卡特的信念,也并不在于他相信美国必须通过力量优势与苏联谈判,因为该观念在冷战形成阶段的那几年已被杜鲁门和艾奇逊视作通则,而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更是对其大加巩固。里根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愿意与自己所憎恨的领导层、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人打交道;他愿意以欣赏的眼光看待竞争对手所关切的内容;他愿意从经验中汲取教训”^②。

还在1984年12月18日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时,美国国务院在里根的提问单上列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想了解一下你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内容”。中央情报局在1985年2月5日向里根汇报苏联政局发展趋势时说,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有可能接替契尔年科,但是戈尔巴乔夫占有明显优势。中央情报局在汇报中认为,戈尔巴乔夫非常务实,在处理苏联经济问题的新方法上思想极为开放,同时预测了戈尔巴乔夫可能实施的改革:“如果戈尔巴乔夫被推选为总书记,可能出现一个更加高效和更加自信的苏联领导层。他可能支持以更加创新的方式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并以更大的灵活性和积极性处理国际机遇和挑战。”^③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562页。

② [美] 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9~330页。

③ [美] 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青海、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在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里根当即表态,美国将不抱“任何先入之见”同新的苏联领导人打交道。里根说:“我希望举行一次会谈,看看我们能否取得一致意见。”里根指出:“两国之间彼此存在着很大的猜疑”,“我认为我们的猜疑比他们的猜疑更有道理”。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想在首脑会晤安排好之前先“建立他的政权”。他指出,苏联人也说过,要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应当作出适当的准备,要搞出一个“合理的议事日程”而不应只是一次结识性会议。对于刚刚上任的戈尔巴乔夫,在里根看来他尽管有撒切尔夫人所描述的那种不一般的气质,但是里根还是强调,苏联领导集团不管其最高领导人是谁,“从基本上来说仍然是那一帮子人”^①。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接见驻苏大使阿尔特·哈特曼。他证实了我所认为的,即戈尔巴乔夫与其他任何苏联首脑一样,是个强硬派。如果他不是意识形态的坚定者,他就不会被政治局选中。”^②

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回信却让里根感到“欢欣鼓舞”。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回信中表示,他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与美国总统举行会谈。戈尔巴乔夫在信中说:“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同——但我们认为这不应是敌对的理由。每一种社会制度均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使用武力或军事手段而应该使用与其他社会制度和平竞争的方式来证明其优越性。所有人民均有权走他们自己选择的道路,任何人不得将他的意愿从外部强加于他们,不得干涉他们的内政。我们认为这是国家间发展关系的唯一公正和健康的基础。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在严格按照这种方式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此外,苏联领导人确信,苏联和美国拥有无可争议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决不能爆发核战争,因为这将不可避免地给双方带来灾难性后果。”^③戈尔巴乔夫表示:“总统先生,我希望你从这封信中能够感受到,苏联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都希望积极寻求得以改善我们双边关系的共同方式。”^④

① 美联社华盛顿1985年3月11日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11页。

③ 同上,第608~609页。

④ 同上,第610页。

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瑞士日内瓦实现了两人的第一次会晤。美苏两国首脑的会晤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以个人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各自的国家形象。就像撒切尔夫人观察到的那样:“虽然两人相差20岁,但看起来却和同龄人一样。里根身材挺拔,个子高过戈尔巴乔夫,肤色偏黑,笑容满面。戈尔巴乔夫带着似是而非的笑容,裹在抵御寒冷的厚重的外套里。从形象就可以看出两国政府的差异。里根生机勃勃,加上他的乐观自信,与苏联领导人立刻产生了视觉上的冲击。这位虽然年过70但仍充满朝气的总统领导下的国家,当然与苏联截然不同。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后者刚刚连续送走了4位年迈体弱的国家首脑。”^①

尽管日内瓦会晤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成果,但这一点并不出乎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意料之外。毕竟,这是两个超级大国首脑的第一次见面。不过,双方仍然颇有受益。就像戈尔巴乔夫所言:“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②

对里根来说,会晤开始改变他对苏联领导人的刻板印象。“当我们首次握手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就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预料的那样——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确有令人喜欢之处,他的脸上和作风中荡漾着热情,而不是我迄今为止所见过的绝大多数苏联高级领导人身上的那种近乎仇恨的冷漠。”^③更重要的是,通过近距离交谈,里根对戈尔巴乔夫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里根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即使很僵硬,并相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但历经五年之后,我毕竟最终找到了可以与之交谈的苏联领袖。”里根通过对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期间表现的分析得出了初步结论:“不论在我们的私下会晤,还是在全体会议中,他不止一

①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4页。

③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次地表示支持古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标,即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大同,和勃列日涅夫的扩张主义。但他却是我所知道的只说不干的第一位苏联领袖。”^①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与里根的首次会晤并不轻松。在戈尔巴乔夫看来,里根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苏联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②不过,与里根的交谈却让戈尔巴乔夫感受到了一个与苏联的宣传不一样的里根形象:“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③戈尔巴乔夫反复强调了日内瓦会晤的意义:“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来的部分偏见。”戈尔巴乔夫表示:“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破口已经打开。”^④

结束冷战的倒计时就这样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晤后启动了。对于当时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来说,谁都没有预料到曾经耗费了几代人构筑起来的冷战“铁幕”,竟会在短短的7年时间里被拆卸得一干二净——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苏联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曾几何时,戈尔巴乔夫把西方世界急于把共产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企图,只是当作一种政治妄想,“在苏联只能引为笑谈”^⑤。但是改革却终结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自信。基辛格指出:“苏联帝国崩溃之速度甚至快过当年崛起之势;美国亦以同样快的速度转变其对俄罗斯的态度,不到几个月即由敌对变为友好。这项重大变化是在两个似乎太不可能的合作对象联手庇护下展开的。里根之当选是对美国似乎离开美国例外主义传统的时代之反动。戈尔巴乔夫通过共产党高层残酷斗争而崛起,决心重振他认为高人一等的苏维埃意识形态。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笃信最后胜利属于自己这一方。然而这两位意想不到

①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39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23页。

③ 同上,第727页。

④ 同上,第735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1页。

的合作伙伴之间还是有重大差异：里根了解他的社会之主流脉动，戈尔巴乔夫则毫不了解。两人都求助于其制度最佳的部分。里根借由释放出主动创意和自信的力量，解放美国人民的精神；戈尔巴乔夫却以要求苏联进行做不到的改革，加速催动他所代表的制度之死亡。”^①

不过，对戈尔巴乔夫从事的改革事业和失败后所致的非议，里根却给予了理解和支持：

我们1985年秋天第一次见面时，他坦率地说他一心一意地相信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我从他的话中推断，他认为共产党人管理的不好，并且他意在改变旧的管理制度。

我还推测出为什么他最后决定放弃共产主义许多最基本的信条，并决定放弃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一手建立起来的东欧帝国。

当他还年轻，他的地位在腐败无能的共产党官僚机构中逐渐上升之时，也许那时他的思想已开始转变。到达了统治集团的顶峰后，他发现情况有多么糟糕，并认识到必须迅速地改变这种情况，否则苏联将陷入无以自拔的混乱之中。

我的亲身体会是，只有当一个人亲自管理这个国家时，他才能充分理解治理国家的困难。我想戈尔巴乔夫也会有同感。他可能从下述事实中有所领悟：苏联农田仅有2%由个体耕作，却生产出苏联所需肉类的40%。继8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迅速恢复，把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远远甩在后边。或许这个事实使他认识到：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和官僚式控制，只能使人民丧失生产和竞争的积极性，正如他在《改革》一书中所写的那样。

70年来的共产主义使苏联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彻底破产。戈尔巴乔夫一定认识到苏联的生死存亡对他来说更加重要。他肯定看到了他的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灾难，并决定不能继续在武器和军备竞赛上花费巨款。我在日内瓦告诉过他，我们永远也不会让他们取胜。我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6页。

确信,戈尔巴乔夫上任后一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悲剧震惊了他,使他努力消除苏联与西方的分歧。在会谈中,我想我可以帮助他理解为什么苏联及其扩张主义政策对我们是一种威胁,帮他认清苏联不必对西方那么恐惧,为了维护苏联安全而在东欧建立起来的苏维埃帝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戈尔巴乔夫有胆识承认共产主义已行不通了,有勇气为变革而斗争,有才智把民主、个人自由和自由企业的初级阶段引进到苏联。

就像我1987年在勃兰登堡门所说,苏联面临抉择:要么从根本上变革,要么变得孤立。

戈尔巴乔夫预见到了不变的严重后果,而选择了变。^①

对里根和他所从事的自由事业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幸运而又美好的时期。“因为一切都不是为独立存在的事物而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已经身陷已经存在太久的后二战国际体系中了。里根在对付苏联第三代领导人方面也具有自己的优势,那时的苏联领导人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丧失了自己的信仰,只是顽固地想扭转这个大口喘着粗气、鲜血四溅的政治机器的运转方向。”^②在1989年的离任讲话中,里根豪情满怀地宣布:“我们想要改变一个国家,但结果我们却改变了一个世界。”^③

2. 布什主义、超越遏制与戈尔巴乔夫

1989年1月20日,乔治·H. W. 布什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摆在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面前的问题是:是保持和延续里根—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形成的良好关系呢?还是重新确定美国和苏联以及布什—戈尔巴乔夫之间的政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708~709页。

②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34~735页。

③ 同上,第736页。

治关系？对布什来说，这个问题关系美国能否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个问题则关系苏联改革能否在西方的帮助下获得有力外援。可以说，无论是布什还是戈尔巴乔夫，都希望在新的任期内有一个好的开始。在布什的就职典礼当日上午，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给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电话说，戈尔巴乔夫希望他是典礼后第一个打电话向新总统祝贺的外国领导人。1月23日，布什给戈尔巴乔夫打去了电话，“通话充满着乐观的调子”。戈尔巴乔夫说：“看来有理由期待，事情不仅走上建设性的轨道，而且还会达到必要的进展速度。”不过，令戈尔巴乔夫略感失望的是，“时过数周、甚至数月，美国政府并不急于公开它的对外政策方针，特别是针对我国的方针”^①。

戈尔巴乔夫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尽管布什在作为里根的副总统时就与戈尔巴乔夫多次交往，并且在里根即将卸任时表示将会继续前政府的对苏政策，但是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忽视布什曾经拥有的另一个敏感身份——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身份和经历强调了布什制定对苏政策时的潜在认知：“这一角色的唯一例外，我觉得就是作为特殊政治决策的一部分，而关心隐蔽的战线。”^②在任职期间，布什“一直是个典型的冷战专家——担心共产主义的势力扩张，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时刻保持警惕，致力于结盟，努力实施能够获得两党支持的外交政策。他相信只有通过实力才能达到和平”^③。像里根一样，布什也认为一场民主革命正横扫全球。在1989年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布什说道：“我们知道如何才能保证全人类过上公平富足的生活：只能通过自由的市场，自由的言论，自由的选举，以及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意志的践行。”^④

布什对苏政策的谨慎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华尔街日报》在1月30日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75～876页。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页。

③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7页。

④ 同上，第408页。

的评论中写道：“布什等待戈尔巴乔夫采取具体行动，然后再奖赏苏联人的开放。”评论说：

布什总统已表示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新的政治开放持静观态度。但是，决定怎样和何时奖赏苏联的良好行为是他必须首先解决的对外政策问题之一。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愿意支持美国同苏联保持自由的外交关系和经济关系。美国企业集团切望美国放宽对苏联的贸易限制。

但是，布什总统在2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他打算在与苏联人有关的问题上谨慎行事。美国官员说，在人权问题上，他们仍在等待表明苏联行为的变化不只是象征性的姿态的迹象。

在是否用给予贸易上的好处来奖赏莫斯科的问题上，共和党的重要支持者们意见不一：保守派不相信莫斯科，因此主张采取慢慢走的政策，而企业负责人则强烈要求增加美苏贸易。

对苏联人来说，重要得多的将是消除另一个贸易障碍：杰克逊—瓦尼克法案。这项法案规定要提高俄国对美国出口品的价格，不准给予莫斯科“最惠国”贸易地位。美国企业集团强烈要求对这项措施至少停止实行一年，它们意识到，莫斯科的形象的不断改善和促进美国出口对华盛顿越来越重要这一形势有利于它们。

美国官员在今后几个月将密切注视苏联，看看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否实现他去年春季在法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作出的保证：苏联新议会将修改某些法令，其中包括这样一项法令：政府有权永久禁止掌握“国家机密”的人离开苏联。^①

2月9日，在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时，布什表现出了基于政治现实的谨慎：“最根本的是，苏联仍然持有非常强大的军事机器，其目的仍时常与我们相抵触。因此，让我们认真对待这次新的开放，但也要立足于现

^① [美]罗伯特·格林伯格：“布什等待戈尔巴乔夫采取具体行动，然后再奖赏苏联人的开放”，《华尔街日报》，1989年1月30日。

实,同时我们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①不过,1985年3月13日见到戈尔巴乔夫时的第一印象,仍然促使布什继续采取与苏联接触的政策。布什在给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电报中说:“戈尔巴乔夫将会比任何(我重复‘任何’)前任更有效地组合苏联阵营来对抗西方。他面带友善的微笑,眼神温和,他有一种在处理不愉快问题时能迅速转向和对话者形成真诚交流气氛的迷人风格。他能够非常坚定。如:当我专门提出人权问题时,他打断了发言而折回到老一套的、我们以前听腻的喋喋不休的空话,他引证说:‘在美国国内,你们并不尊重人权’,或者(涉及非洲裔美国人)‘你们粗暴地压制他们的权利’。但结果却是这样:‘我们将准备认真思考这一问题’和‘让我们友好协商来探讨这一问题’。其要旨如下:‘别在人权问题上给我们上课,不要攻击社会主义,而让我们就各自的问题进行讨论。’”^②事实上,在1988年12月7日的总督岛会面中,作为新任总统的布什就当着时任总统里根的面就对戈尔巴乔夫说,他将大体上继续里根的苏联政策。但是布什提醒戈尔巴乔夫:“我无意给事情设置障碍,但我理应要形成我自己的国家安全战略。”^③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89年3月14日向总统布什提交了《关于苏联的战略报告》(NSR-3)。但是在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看来,“它是不完善的,它总体上是一种‘粗线条’的描述,缺乏详细和实质性的内容,缺少特别的和富于想象力的创见,而欲满足美苏关系中建设性的要求则需要这种内容和创见”^④。于是,布什决定由康杜利兹·赖斯领导的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小组重新起草针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和意图的“时事评估”来代替NSR-3。赖斯在起草的报告中建议采取四个方面的战略来对付戈尔巴乔夫和苏联:

首先,我们应该从国内的角度来强化目标明确的美国外交政策理

①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③ 同上,第5页。

④ 同上,第43页。

念: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目标和工作进展不表现出信心,我们就不能迎头赶上戈尔巴乔夫。

其次,我们亟须做的是对盟友们关心的事明确表明我们的态度:通过现代化来加强北约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此外,盟国将很快要求建立一种政治战略来推进削减常规武器的谈判,在常规武器方面我们愿意让苏联领先。我们也必须去细心地准备包括“削减战略武器会谈”谈判在内的双边军备控制谈判,国际社会密切地关注着这一谈判。如果我们在军备控制谈判中准备充分,盟友们对我们处理更为复杂关系的能力的信心就会大增。

再次,在反思我们的政策后,我们就可以从事有关东欧的设想了。因为东欧人民正在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尽最大努力地控制属于自己的事务,所以在铁板一块的苏联集团内,这一地区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我们有力的武器应是承诺经济援助。

最后,也是最后的则是地区的稳定问题。近来在阿富汗和南非的事态发展,早已显示了美苏间的合作将加强彼此在世界其他地区问题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意识到苏联可能是某些、但不是所有地区的一种重要的稳定力量,我们必须放手工作来促进地区的稳定。中非则是例外,克里姆林宫没有丝毫减少其支持那里的共产党军事活动的意思。^①

赖斯的报告为美国的对苏战略预测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影响莫斯科,因为它需要西方的经济资源和技术。”^②赖斯在报告中提出的四个部分战略成为布什政府初期构建针对苏联政策的指南。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布什政府相继制订出台了关于东欧(NSR-4)和西欧(NSR-5)的战略研究报告。不过,这些报告在对苏联政策方面仍然强调采取谨慎、克制的态度。在外界看来,上述报告并没有对欧洲或苏联提出新的重大建议,也未表示支持大规模裁军或大幅度扩大同东方的经济合作。因此,5月1日发行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3~44页。

② 同上,第44页。

的《商业日报》在评论中呼吁——“布什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

显然，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狂热的和忠诚的信徒。不应该误解他为改革苏联经济和使苏联社会走向更加民主化进程所作的努力。我认为，他的目的是使像他那样认真和忠诚的共产党人来领导这个国家，即使这意味着他不得不使这个国家具有更多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色彩。

如果他不能取得成功，在美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看来，换别人上台也许要糟糕得多。因此，如果戈尔巴乔夫能成功地在苏联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看来是最符合美国和世界利益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布什政府几乎没有作出什么愿意给予帮助的表达。看来对俄国人采取太软弱的态度大概在政治上不是对乔治·布什最有利的，如果他想保住他自己党内的极右翼势力的支持的话。

戈尔巴乔夫不仅有能力渡过苏联目前的经济和政治难关，而且还会从中得到好处，对此人们不应低估。戈尔巴乔夫有对付困难局面的非凡的经历。他负责整个苏联农业的5年间（1978年至1983年），曾主持了自30年代大饥荒以来苏联农业最糟糕的几年的工作。出现这种状况有许多原因，很大一部分不是他的过错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上任前的管理不善以及恶劣的气候。这些灾难并没有妨碍他最后被提升为国家领导人。

我确信，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克服他目前的困难，那时，他会记住他的朋友是谁。但是，应该帮助他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应该想一想，如果戈尔巴乔夫不能取得成功，可能是谁来接替他呢？^①

面对国内外的关注，布什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快制订新的对苏战略。他提出要求：“这一战略认识到，苏联出现了新气象，而对苏联声明的他们将信守的原则，则要求他们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这是一个普通的战略，但它却

^① [美]斯坦福·埃里克森：“布什应该帮助戈尔巴乔夫”，《商业日报》，1989年5月1日。

表明了我们对莫斯科关系的一个重大的转折。”^①5月12日,布什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演说中宣布了这一新战略。布什在演讲中说:

战后在两种憧憬之间展开的历史性较量正接近尾声:对暴政与冲突的憧憬和对民主与自由的憧憬。我的政府刚刚完成的对美苏关系的回顾概要地指出了解决这场较量的新道路。

我们的目标是大胆的——比我的任何一位前任所能认为是有可能实现的目标雄心更大。我们的回顾工作表明,40年来坚韧不拔的努力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现在是越出遏制阶段进而为90年代制定一项新政策——一项充分承认世界各地以及苏联本身所发生的变化政策——的时候了。

总而言之,美国现在的目标不仅仅是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所谋求的是苏联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我们希望苏联的改革在引导它同过去的循环决裂——决定性地决裂。任何人都不要怀疑我们想看到苏联的改革继续下去并取得成功的真诚愿望。我们期待着持久深入的经济和政治变革。

虽然我们希望越出遏制阶段,但我们现在还只是处在我们的新道路的起点。前面存在许多危险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我们不应忘记,苏联拥有可怕的军事能力。

西方的政策应当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社会的方向演进,这项任务将是对我们的力量的考验。

但是,要实现这一憧憬,就要求苏联采取积极的步骤,其中包括:

第一,减少苏联的军事力量。

第二,遵守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承担的保证支持东欧和中欧各国自决的义务。

第三,同西方合作,采取积极的、切实可行的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步骤,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全世界的地区争端。

第四,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

第五,与我们协力解决紧迫的全球问题,其中包括国际毒品威胁和环境受破坏的危险。

这一切目标中根本的一点就是开放。开放向外移民、开放辩论,开放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让开放变成意味着在苏联出版和销售遭禁的书籍和报纸。让开放变成意味着十十足足的东西方之间人员、书刊和思想的自由交流。让开放变成还意味实现34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的“天空开放”方案,按这个方案,美国和苏联双方的非武装飞机可以飞越对方国家的领空。

苏联如果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概念,那就表明他们致力于变革。^①

5月28日,《华盛顿邮报》对布什提出的对苏新战略发表评论——布什找到对外政策的主题:“走出遏制”:

据随同布什进行第一次总统欧洲之行的白宫官员说,布什总统已发现他的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大主题是“走出遏制”,进入同苏联进行国际合作的新时代。

布什5月12日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对苏政策讲话中首次宣布了这个观念,后来在星期日在波士顿大学发表的讲话中,星期三在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的演说中,星期五在离开华盛顿时发表的讲话中和抵达罗马时发表的讲话中都重复了这个观念,并且越来越强调。然而,迄今为止,这个概念没有得到布什的助手们应该得到的重视。

布什在波士顿大学阐述他的对苏方针是“走出遏制,争取使苏联人加入国际大家庭,帮助他们分享国际合作的报酬”。布什在同一场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个观念是“大胆的”,称它为他的政府的一个目标。

^① [美]《纽约时报》,1989年5月13日。

如果果真把这个观念作为美国的一个目标,这个观念是过去40年来美国政策的显著改变。美国过去40年的政策是:遏制苏联,给苏联的扩张建立军事、经济和政治的壁垒和抵消力。他的助手们说,这一全面的改变——逐步地执行,完全以苏联的相互对等行动为条件——恰恰是布什想要做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高级成员星期四上午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进一步解说了布什的观念,称“走出遏制是对苏联改革的积极的反应和战后时期美国对苏政策在观念上的彻底改变”。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位新闻发布官对这个观念和70年代初短命的缓和政策作了明显的区分。他阐明70年代的缓和政策是试图用“详细的比赛规划”处理超级大国的竞争,因为双方都含蓄地认为,对冲突的根源无能为力。

这位新闻发布官说,“总统的政策截然不同了。我们希望苏联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名正式成员,享受到支持全世界的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的制度所带来的好处”。“由于同苏联既合作又冲突的循环周期,我们当然要谨慎。但是,苏联这一次可能准备好在根本上改变它的军事力量、机构和国际行为。我们和苏联人战后时期中第一次能在一段时期里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的和开放的关系,这种关系同过去不一样,将长久持续下去。”

随同布什前往欧洲的白宫官员今天说,这个观念是由总统和几位外交政策高级顾问之间在总统在德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演说之前的几周进行非正式的和亲切的讨论后产生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新闻发布官解释说,目前这个观念是“一个遥远的战略目标,像乞力马扎罗山一样,你能在远处把它看作目标”。

至于具体的行动,这位官员说,还没有拟出达到布什的目标的行动计划,但是,他认为,制定和宣布这个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将来的许多行动应该从趋向同莫斯科建立新的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中包括下周初将在美国和北约联盟的军事政策中和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中透露的某些变化。

这位官员说,已同国会领导人,并通过外交途径同美国盟友讨论了“走出遏制”这个观念。^①

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的重点是东欧。“多年来美国一直注重和这些苏联卫星国打交道:使它们最大限度地独立于苏联的政治路线,或者最大限度地摆脱苏联对其外交政策的控制。这种注重在给一直是对手的苏联造成不安的意义上,已经达到了一种不错的效果。”^②从7月9日至13日,布什开始访问波兰和匈牙利。这次访问是出于美国一项由来已久的政策,这项政策是要对于那些通过国内自由化或通过奉行不那么亲苏的外交政策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克里姆林宫表现出独立性的东欧国家给予奖赏。正如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所说,这是“对在波兰发生的显著变革以及在匈牙利进行的静悄悄的革命精心地设计出一种适当的对策”^③的反应。布什在出访时的讲话中把波兰和匈牙利说成是“即将跨入新时代”的国家。他说:“在这两个国家内,我们看到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值得欢迎的发展,即使在一年以前,谁也不认为是可能的。”布什表示:“我们的任务是很明确的:修补旧的裂痕,实现几十年来的梦想,出现一个安全、繁荣、和平和自由的新欧洲。”^④

布什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加剧了已经陷入混乱的东欧局势。布什给所有东欧国家留下的明确信息是:沿着改革的道路前进吧。布什对东欧的这种新政策被称为“布什主义”。7月14日,英国《卫报》发表评论:布什主义——美国对东欧的新政策:

美国总统布什对这次波匈之行极为满意,他深信,共产主义“正在急剧崩溃”,目前西方的头等任务就是制定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来处理这一衰落过程,引导它的改革进程。预料布什将在这次西方七国首脑

① [美]唐·奥伯多弗:“布什找到对外政策的主题:‘走出遏制’”,《华盛顿邮报》,1989年5月28日。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页。

③ 同上,第97页。

④ 路透社空军一号飞机1989年7月9日电。

会议上积极鼓吹这一主张。已经有人把布什政府对东欧的新政策称为“布什主义”。

所谓“布什主义”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西方援助的目标是要促进和奖励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美官员指出,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会涉及大量的失业,而且随着中央计划经济作用减弱和物价补贴的取消,人民生活费用将上涨。西方提供的信贷可以作为“随着改革而来的社会安全网”。这就是说,西方提供的援助和投资要保证,改革不至于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布什的安全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正小心地负责地鼓励历史的趋势朝前发展,但是我们不想过快地放开步伐,以免造成危险的不稳定。我们鼓励改革采取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它同苏联结盟角度看都是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那种速度。”^①

9月22日,布什总统签署第23号国家安全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该指令对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对苏遏制战略进行了总结,明确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即“超越遏制,积极促进苏联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的政策”。该指令阐述了美国的政治—外交目标的是:“通过继续对朋友、盟国和自由战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限制苏联通过提供武器、派遣军队、支持傀儡等扩张实力。”^②

从乔治·布什总统在1989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到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这是“冷战的结尾部分”^③。无论是布什还是戈尔巴乔夫,都认为在从事的共同事业——结束冷战——中表现了高度的信任和契合。1991年12月25日,就在戈尔巴乔夫即将于两小时后发表辞职声明时,他在同布什的电话通话中说:“我对我们共同所做的事评价很高——包

① [英]《卫报》,1989年7月14日。

②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6页。

③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48页。

括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两个都当总统的时候。”^①布什在电话中表示:“让我首先说听到这个电话我是多么地感动……我们将停留在一个复杂的境地,尤其是俄罗斯今年冬天一些庞大的问题有可能变得糟糕起来,我很兴奋地听到你说你不躲进深山老林之中并将继续留在复杂的政治和公众之中。我完全相信这将对新联邦有益。”对戈尔巴乔夫的电话,布什感情流露地说:

这是一个好朋友的声音,是一个历史将给他巨大荣耀的男人的声音。

这个电话是非常动人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记录。我向他提到戴维营并且想让他再回到那儿——那个他从前掷半圆形马蹄铁的地方——我想他愿意,但这是我的感觉。虽然我不想太伤感或者太感情用事,但是这样的电话,让我一字一句地感到自己像被真实的历史所缠绕,那些事是重要的,是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帝啊,能生活在我们这样的国家真幸运——我们有这么多的恩赐。^②

三、科尔:我要的是德国统一

德国问题是冷战时期美苏交锋的焦点。从1948年3月1日苏联封锁进出柏林的交通,到1949年5月12日宣布解除封锁的十四个月时间里,杜鲁门政府用空运的坚决行动表明了西方世界抵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坚定决心:“当我们拒绝被赶出柏林的时候,我们向欧洲人民证明了,当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时,我们就会在他们的合作下行动起来,而且是坚决地行动起来。从政治上说,对柏林进行空运使欧洲各国人民更加靠拢我们。”^③正是从这个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21页。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6页。

^③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时候起,柏林市及其200万居民成为“冷战首都的象征”^①,成为美苏两大阵营在欧洲直接对抗的军事和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成为苏联和西方世界能否达成相互谅解的政治风向标,成为冷战能否结束的时代标志。就像赫鲁晓夫所言:“西方决计把西德变成美好生活的一面镜子,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橱窗,以便把东德人吸引过去,使之投入反对民主德国实施的社会主义措施的斗争中去。这好像是一种允许的手段。每一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进行选择,一场争取人心的斗争正在进行。”^②

1. 柏林危机与德国的分裂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由于德国暂时处在美、英、法、苏分割占领的过渡状态,从而使德国的统一问题成为四大国必须面对的政治战略问题。这一政治战略的核心就是统一后德国的立场问题。“战后德国可以说既强又弱。因为它在1945年以前曾是欧洲最强盛的国家,所以现在美国和苏联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即一个统一的德国同自己的首要敌人结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国家的分裂是由外部强加的,并且随着冷战的揭幕而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然而一旦他们的国家被分裂,德国的弱势本身就变为一种强势。处在垮台边缘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表面上如此即可——东、西德国就可以加深这样一种担忧,即只要他们愿意,那么两大超级大国从前的劲敌将随时可能倒向未来强敌的掌控。”^③因此,无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还是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双方都不愿意冒其潜在的风险:统一后的德国加入对方的阵营”^④。

对美国来说,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德国的统一是个高于一切的问题。乔治·凯南在1946年时就认为,把“德国的技术技能有可能会和苏联的物

① [美] 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9页。

② [苏] 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97页。

③ [美]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57页。

④ [英] 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质资源相结合”是他“心中唯一认为真正危险的事”。^①因此,美国政府必须要把德国的经济潜力吸纳进西欧体系。“马歇尔计划”即是针对这种对德国发展可能的担忧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对这一点斯大林心知肚明。在他看来,美国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特别是在美英占领区即将实行的货币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成立一个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方集团,以此构筑防范苏联的反共势力。于是,斯大林决定采取封锁柏林的措施来试探西方的对抗决心。“如果西方列强选择谈判,就会使它们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复杂化。这些谈判还会让苏联驻德军政府有更多的时间在占领区落实自己的战争赔偿工作。如果西方列强拒绝谈判,它们又会有失去其在柏林的基地的危险。”^②不过,美国识破了苏联的计谋。杜鲁门说:“封锁柏林事件是试探我们进行抵抗的能力和决心的一种行动。这一行动和他们过去想夺取希腊和土耳其的企图,都是俄国人刺探在他们周围的西方盟国阵地弱点的计划的一部分。”^③

美国和西方盟友开始了大规模的空运,向西柏林输送的补给量很快就达到每天1.3万吨,最后一共持续了324天。杜鲁门甚至派出了专门执行投送原子弹任务的B-29轰炸机的两个飞行大队去英国,以表示西方世界阻止共产主义扩张的决心。斯大林最终选择了退却,但却带来了致命的战略伤害。“对于苏联在西柏林和西德的影响力来说,柏林封锁的心理与政治后果是致命的。它帮助西德人与盟友尤其是美国人结成了新的友谊和反共同盟。美英在西德和西柏林的存在,从民众那里得到了以前所没有的合法性。”^④但是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在战后曾经尝试维持“伟大的同盟”的努力付诸东流。柏林危机的爆发直接促成了德国的分裂和两大阵营的形成。1949年5月24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在西部被占领区成立。9月15日,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康拉德·阿登纳成为西德第一位总理。10月21

① [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1页。

②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③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

④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08页。

日,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盟国接受将作为第十二个州的西柏林“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来对待”。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原苏联占领区内宣告成立。由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得到苏联支持的政府。1955年5月9日,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14日,东德加入华沙条约组织,成为“欧洲的社会主义前沿阵地”^①。

尽管德国被一分为二,但是无论是美国和苏联,还是东德和西德都意识到德国统一是一个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并尝试去解决问题。1955年9月,西德总理阿登纳在同赫鲁晓夫会面时提出了两德统一的问题。但是阿登纳用联邦德国吞并民主德国的企图遭到赫鲁晓夫的激烈反对。赫鲁晓夫指责阿登纳是“利令智昏”。他说:“就意识形态而言,我们关心的不是撤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是巩固这个国家。甚至难以想象,阿登纳怎么能想到我们会同意撤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从军事战略利益上而言,“一旦此事发生,我们从地域上就会仿佛一下子后退到波兰边境。所以如果我们让这种游说或者威胁得逞,那将是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退却。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放弃它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必将鼓励西德的侵略势力施加更大的压力,以便日后将波兰边界进一步向东推移,这正是西德至今仍然在现有的世界状况下所力求达到的目的。这可能成为一场连锁反应的开端。此事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甚至脑子里有这个念头都不行”^②。

在赫鲁晓夫看来,德国问题,首先是柏林问题,不仅仅是东西德之间的双边事务,更是关系美苏两大阵营走向的重大战略问题。“西柏林问题是健康肌体上的一个毒瘤。因此我们首先抓紧解决柏林问题。柏林命运不解决,德国命运以及和约问题都无法解决。这一切都相互关联着。”^③在先后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的谈判中,赫鲁晓夫提出了苏联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以压迫西方国家在德国问题上作出让步。“美国在欧洲那只脚长着一个‘鸡眼’,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去践踏这个鸡眼,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晔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89页。

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晔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876页。

③ 同上,第2127页。

去挤压它。这个鸡眼就是西方几个强国——我们昔日的盟友——经民主德国与西柏林的交通。”^①但是美国始终不肯作出妥协并反复强调《波茨坦协定》规定存在一个德国,对德和约只能在建立起统一德国的前提下才能签订。面对赫鲁晓夫的威胁,肯尼迪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对自由的人们的直接威胁在西柏林”,但是“那个孤立的前哨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这种威胁是世界范围的”。^②于是,为了施加谈判压力和阻止东德居民逃往西德,赫鲁晓夫决定于1961年8月13日在柏林的东西德国分界线上竖起一排带刺的铁丝网,随后再建起一堵墙。“这条分界线穿过柏林,将它严格地划分为西柏林和东柏林。这样一来民主德国就有了监控自己边境的可能。经西柏林通往民主德国的自由通道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情报机关的通道。他们可以潜入我军驻地,侦察我们的装备,收集其他情报。除此之外,通过通往西柏林的自由通道,给民主德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出现了不稳定的局面: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方面人士从民主德国前往西方。”^③

赫鲁晓夫对民主德国的居民通过柏林逃往联邦德国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事实上,在西柏林成为“坐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孤岛”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德和苏联发现柏林西区这三块占领区,成为卧榻之侧的芒刺,也是共产阵营里令人失望的沉闷景象中一个繁荣的窗口。最重要的是,西柏林成为寻求移民到西方去的东德人之管道——他们只需要搭乘地下铁到西柏林任何一个车站下车,然后申请移民即可”。^④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西德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一墙之隔的东德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西方利用西柏林的有利阵地,对苏联和民主德国发起了全面的宣传攻势和颠覆活动。“西方通过西柏林开始对民主德国进行颠覆活动。此事易如反掌,因为两边都是德国人,在派遣特务时不存在语言、文化、民族相貌特征方面问题。况且东西柏林之间车辆可以自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28页。

②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37页。

④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20页。

由通行,人员可以自由往来——这里没有边界线。”^①8月13日构筑起来的铁丝网,第一次确定了柏林的东西德国边境。赫鲁晓夫的封控行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条边境一出现,立刻变得秩序井然。”^②

然而柏林墙的建立成为“东西柏林分裂、极权主义惨无人道的象征。东德政权无法让自己的公民留住在自己国家之内的破产形象,自此暴露在全世界面前”^③,因而在事实上加剧了两大阵营的冷战对抗。戴高乐在评价赫鲁晓夫的柏林政策时说:“就在苏维埃组织起来的诅咒与需索之喧嚣动乱中,出现若干反复无常与虚伪造假的事物,使人认为这可能是出于预谋发动的狂妄野心,或是为了将注意力引离其重大困难而致;这第二个假设,我比较能接受,因为尽管共产主义制度在遭其支配的国家有高压统治、孤立自主等强力行为,实际上,它的破绽、缺陷、内部失败,尤其是它不人道高压的特性,越来越为其菁英和群众所认识,因而他们越来越难骗,也越来越难驾驭。”^④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访问西柏林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讲。肯尼迪说:“所有自由的人们,无论他们居于何处,都是柏林的公民”,因此,“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怀着骄傲说‘我是柏林人’。”^⑤

2. 科尔—昂纳克:选择谁?

美苏之间关于柏林地位和德国统一问题的尖锐分歧表明:没有两个超级大国的相互妥协,德国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就如遭到赫鲁晓夫斥责的阿登纳所说:“苏联人迟早会认识到必须与西方相互谅解,他们无法强迫西方投降。在这种和平的谅解之中蕴藏着我的希望,我看到我们的机遇。只有当我们在东西方普遍一致的这一时刻能够证实我们是西方可依赖的伙伴,那我们就可获得这一机遇了。只有这样,西方才会在双方谅解中把我们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397页。

② 同上,第2139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34~535页。

④ 同上,第527页。

⑤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94页。

的利益视为他们自己的利益。”^①

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沉寂后,解决德国问题的历史机遇很快就来临了。进入80年代以后,西方和苏联主要领导人的更迭带来了冷战格局的剧烈变化。主张对苏强硬美国总统里根把柏林墙视作“就意识形态向戈尔巴乔夫施压的绝佳机会。没什么比这道丑陋的水泥墙更能说明苏联的计划经济和集权统治缺乏人性了。这道墙阻止东德人逃向西德去过更舒适的生活”。里根后来回忆说:“站在离柏林墙这么近地方,我看到了它的实体,也看到了它象征的一切,我感到非常愤怒。”^②1987年6月12日,里根在东西柏林分界线的勃兰登堡门表达了这种愤怒:

在我的身后矗立着一堵包围这座城市自由部分的墙,它也是将整个欧洲大陆分隔为二的庞大障碍体系的一部分。从波罗的海向南,由铁丝网、混凝土、岗楼和来回奔跑的军犬组成的障碍把德国分割成两半。再向南面,虽然没有能看得见的明显的墙,但还有武装士兵和检查站,依然限制旅行自由,依然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的工具。然而,只有在柏林,分裂之墙最为突出。它穿过你们的城市,新闻照片和电视屏幕已把野蛮的分割铭刻在世人之心。站在勃兰登堡门前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与他的伙伴分离的德国人,都是面对丑陋的柏林墙的柏林人……

只要勃兰登堡门关闭着,只要丑陋的柏林墙仍旧存在,就不仅仅是德国问题,而是全人类的自由问题。然而,我不是为了哀叹而来到这里的。在柏林,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这堵墙的阴影下,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寻求和平,如果你寻求苏联和东欧的繁

^①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洛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②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06页。

荣,如果你寻求自由,请到勃兰登堡门来!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毁这堵墙吧!^①

很快,1989年入夏以后民主德国发生的一连串震撼欧洲的事件表示,德国统一的历史机遇来临了——民主德国近20万人出逃;全国规模的接二连三的示威游行;党和国家领导层发生重大改组;开放柏林墙和同西德的边界等。在全国1600多万人口中,已有800多万人次去西德和西柏林探亲访友或旅游。面对欧洲局势的一系列剧烈变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预测,德国将在10年内实现统一。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德国统一将“是本世纪末的主要事情之一”。德国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政治的一大话题。计划于12月2日至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议以及4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高级首脑会议均将其列入议事日程;而密特朗和戈尔巴乔夫于12月6日在基辅的会晤也与德国问题密不可分。更有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1月9日:民主德国在这一天宣布将放松对其和西德接壤的边境控制政策。这一声明,由于官僚的失察,没有将柏林包括在内,这蕴含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特殊事变。人群开始沿着将柏林市分割开的臭名昭著的柏林墙聚集起来,人们要求卫兵打开通向西德的检查站。卫兵当时犹豫了一会,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指令,但最后士兵对人们的压力作了妥协,允许自由通行。“就在此短暂的片刻工夫,柏林墙倒了。”^②

柏林墙的倒塌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洛夫特说:“一夜间,那特殊的最为重要的‘铁幕’象征就被摧毁了,它标明了东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的转折点。迄今为止,变革都是通过有改革思想的共产党政府与其人民通力合作而实现的,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就是这样;但在东德,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猛烈冲击了‘华沙条约’集团内最顽固的政权并瓦解了它。东德政府在政治动荡刚萌芽时,就跌跌撞撞地拼命要笼住权力,但革命现在已从汹涌的浪潮骤变成冲决一切的洪流。伴随着柏林墙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83~685页。

② [美] 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

的倒塌,突然间一切事情都变得是可能的,甚至连我们谁也没想过的梦,我们也许会在有生之年看到:这是一个统一和自由的欧洲。”^①柏林墙的倒塌大大增强了德国统一的可能性。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迅速发表政府声明说,德国人自由地自决,“是我们德国政策的核心”,也是“我们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胞的愿望”。科尔认为:“现在时机已成熟,应采取主动,制定走向德国统一的计划。”^②当然,科尔也明白,尽管德国内部存在着统一的民族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和苏联的理解,德国的统一也将要经历更多的波折。事实上,就在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时,戈尔巴乔夫就向科尔发出警告,要他停止谈判两德统一问题,同时又在给布什的电话中要求美国不要作出过激反应。在给戈尔巴乔夫的回信中,布什驳斥了戈尔巴乔夫对科尔正试图利用这些事变来煽动民心的看法的指责。布什向戈尔巴乔夫保证:“我们无意于从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当前变化中捞取单方面的好处。我们将继续坚守我们对《赫尔辛基正式协定》的承诺,尤其是对和平发展和自决原则的承认。从你自己的声明中,我相信你同样是这样做的。”^③

科尔决定与美国总统布什详细解释联邦德国的统一设想。在布什看来,科尔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可能也是我所见的最老谋深算的政治家”^④。布什表达了他对科尔的尊敬:“他的政治天赋极为深厚。他长青于政坛,不是靠迎合,而是靠理解与预知他的对手,并将他们的观点融入自己的决策中。他总是消息灵通,并针对对手的计谋而改变对策。归根结底,他靠自己的自信来领导国家。”^⑤11月9日,科尔在给布什的电话中兴奋地说:“边界被完全打开了,这就像目睹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出现一样。”科尔表示:“没有美国,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变革。请转告你的人民。”^⑥对于科尔的解释,布

①⑥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2页。

②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

③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

④ 同上,第70页。

⑤ 同上,第71页。

什在11月17日的电话交谈中再次向他作出保证：“对于德国人民关于民族处决权和统一的要求，美国将给予支持。”^①

11月23日，科尔为制定旨在德国统一的总方针定下了基调。科尔坚决反对所谓的邦联主张，对此“非常反感，以此将两个国家的状态固定下来，因为邦联是各自独立，各自拥有主权的国家联合，我倾向于联邦，即联邦德国的统一”^②。经过多方努力，《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终于形成。

11月28日，科尔在联邦议院财政讨论会上主张与民主德国建立邦联性结构，并提出了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

第一，联邦政府准备在人道主义和医疗方面立即提供具体帮助。目的是实现一种尽可能不受阻碍的双向旅行交通。

第二，联邦政府将像迄今一样继续同民德进行一切领域的直接有利于双方人民的合作。

第三，如果民德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不可逆转，我提议全面扩大我们的援助和合作。

第四，莫德罗总理在政府声明中说到契约共同体，我们准备接受这种思想。德国两个国家的邻近和关系的特殊性质，要求有一个越来越密切的，包括一切领域和层次的协议网。

第五，我们还愿意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发展两个德国间的邦联结构，目标是在这之后建立一个联邦。

第六，德意志内部关系的发展仍然被列入整个欧洲的建设和东西方关系之中。德国未来的大厦必须是整个欧洲未来大厦的一部分。

第七，现在要求欧共体对中欧、东欧和东南欧倾向改革的国家采取开放和灵活的态度。

第八，欧安会进程现在和将来都是整个欧洲建筑物的核心部分，人们必须有力地推动这一进程。

①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② 同上，第124页。

第九,要求在裁军和军备控制方面取得广泛的和顺利的进展,裁军和军备控制必须跟上政治发展的步伐。

第十,采取广泛的政策谋求欧洲的和平,使德国人民能够在自由自决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统一。^①

科尔的十点纲领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国务院当天立即表示支持科尔建议。发言人玛格丽特·塔特怀勒说:“科尔总理反映了他的人民对德国统一的最深切愿望。”^②11月29日的《图片报》以“统一——开了个好头”作为标题。《法兰克福汇报》写道:“联邦总理科尔掌握了德国政治的主动权。科尔总理洞察了时代的要求,很好地利用了机遇,并服从了要求。”《世界报》认为,科尔的十点纲领“终于为两德的合并开辟了一条具体的道路”。《法兰克福评论报》得出结论:“科尔的提案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即易北河东岸具有历史意义的觉醒是否会使我们拥有共同的未来。”^③但是科尔的十点纲领引起了苏联和东德政府的反对。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发言人迈尔说,科尔的十点建议“既不符合现实,又容易造成误解”。苏联外交部发言人格列米茨基赫说,科尔计划“显然没有考虑到欧洲国家、首先是民主德国本身的利益和意见”。

不过,最为关键的还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戈尔巴乔夫认为,十点纲领“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④。在12月9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强调,不能置民主德国于不顾,它是苏联的战略盟国,是华沙集团的成员国。戈尔巴乔夫说:“一切应从二战后的既成事实出发,两个独立自主的德国便是这种既成事实。如果撇开这一事实行事,欧洲的稳定便会隐患无穷。”^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让

① 德新处波恩1989年11月28日电。

② 法新社1989年11月29日电。

③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07页。

⑤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3页。

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他下一步将会作出如何反应。“戈尔巴乔夫如何在东柏林事件上使自己的言行一致,将不仅在东德、而且也将在全东欧产生强烈影响。他会对具有代表性的东德社会主义敬而远之吗?而这种社会主义他正试图在苏联国内加以改变,或者在努力支撑苏联帝国的迅速崩溃的西部防线时,他会不守其诺言吗?戈尔巴乔夫自己恐怕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这些问题,他正设法在其自己的政治体制中除掉赫拉塞克这类人,所以东德领导人完全不是他喜欢的那类人。”^①

事实上,斯考克罗夫特的判断是正确的。东德事件迅速发酵的一个重要导火索就是戈尔巴乔夫对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昂纳克是一位勃列日涅夫式的领导人。事实上,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关系非常之好。“他们都喜欢对方。昂纳克学着勃列日涅夫的作风,两人对政府的隆重接待、授勋颁奖及别的表示,均情有独钟。”在昂纳克的统治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现行制度更像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样板。“僵化的‘垂直’纪律,不过尚未达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给地方政权机构还留有一定的灵活余地。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就像在‘社会主义女酋长’的国度里一样,只是根据党内民主的传统稍许保留一些传统习惯罢了。公民的行为由警察实行监督,不过对私人生活相对放宽一些就是。军国主义气焰嚣张,但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生活水平却是最高的。”^②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接班使德国统一社会党感到不安,他继承了安德罗波夫的彻底改革苏联经济和社会的政策。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这是不受欢迎的消息,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它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社会主义世界中最高的。就像自由德国青年联盟报纸的主编回答西德《时代》周刊记者的提问时所说的那样:“就技术和发展而言,苏联不再是我们的榜样。”^③因此,德国统一社会党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建议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6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90页。

③ [英]马丁·麦考利:“莫斯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微妙的差别”,《苏联问题分析家》1987年1月双周刊。

戈尔巴乔夫和昂纳克始终没有发展起像勃列日涅夫和昂纳克那样的亲密关系。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不仅是性格和举止的原因。“昂纳克这个人,我觉得,他总是有些拘谨,怎么都摆脱不了公事公办的外表。但最使我吃惊的是,我们的谈话他很少向自己的同事们通报,即使通报也是有选择的。而我呢,跟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一样,总是把我们会晤的记录一字不落地送给苏联领导全体成员看。”^①影响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观感的最根本因素还在于昂纳克对改革的立场和态度。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观点来看,戈尔巴乔夫建议的改革只适用于苏联,但是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改革适用于更广的范围。他说:“社会主义世界正处于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改革的时期。”^②事实上,不仅是昂纳克不喜欢戈尔巴乔夫推动的苏联民主改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层中其他领导人对苏联发生的事情都非常敏感。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的讲话与昂纳克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的差别大得简直不能再大了。戈尔巴乔夫说,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革”,而昂纳克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转得很好,“事实证明,这种经济是有效的、有活力的和灵活的”。^③从苏联传来的消息开始受到政治检查,被大加删改,或者干脆被取消。随后便是禁止如《旅伴》《新时代》这样一些出版物。比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1985年底出版的戈尔巴乔夫讲话集中,将文内所有明确谈到东欧经济改革的内容都删掉了。戈尔巴乔夫曾两次(1985年5月17日在列宁格勒和6月11日在莫斯科)非常明确地谈到自己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体制的看法,但是在已出版的戈尔巴乔夫的讲话集中,这些内容也被删掉了。到了后来,昂纳克更是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各区委第一书记的非正式会议上,明确指示参加会议的人对改革不要作积极的评价。平时宣传材料中的一条老标语“向苏联学习”已经被取消,开始贯彻旨在限制有关苏联改革进程消息的方针。于是,在戈尔巴乔夫和昂纳克之间,“相互之间的不理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92页。

②③ [英]马丁·麦考利:“莫斯科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微妙的差别”,《苏联问题分析家》,1987年1月双周刊。

解乃至疏远加大了”^①。

更令戈尔巴乔夫不满和警惕的是,在反对改革的基础上,昂纳克、日夫科夫和齐奥塞斯库三人的关系明显密切起来。“一切情况说明,昂纳克成了教条主义思想的俘虏,他不愿意或者已经无法对生活现实做出实事求是的反应了。”^②为了面对越来越加剧的社会动荡局势,1989年10月18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解除了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举克伦茨基担任这两个职务。11月8—10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全会从本质上更新了政治局的组成。“造反派”汉斯·莫德罗夫进入政治局并在不久后领导联合政府。11月9日深夜,分割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旁边聚集了大批群众。为避免发生危险的过火行为,通往西柏林的通道开放了。“柏林墙倒塌了,更确切地说,它成了一座永远不会再有的‘冷战’纪念碑。”^③

柏林墙的倒塌预示着德国统一已经势在必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德国统一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并且也是公正的现象。它决定于世界、欧洲和德国本身所发生的根本变化”^④。事实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不稳定,给联邦德国诸多相互竞争的政治势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每一个像样的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都积极展开了致力于德国统一的活动。与之相对的则是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已经丧失了统一的主动权。1989年12月1日,东德议会宣布结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党统治;12月3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解散,政府开始逮捕很多被指控为腐败和滥用权力的前政府官员;12月6日,克伦茨基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尽管如此,社会的动荡局势仍在强化升级,矛头越来越指向前东德党政军机关。到了1990年1月30日,莫德罗夫告诉戈尔巴乔夫:“民主德国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再支持两个德国合并的主张了,而且这个主张似乎也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边远地区,如图林根,统一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93页。

② 同上,第1195页。

③ 同上,第1199页。

④ 同上,第1201页。

的倾向尤为突出。不仅旧的党派,即使是新的党派,如果想扼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能的了。”^①9月12日,英、法、美、苏和两德签订一项条约,批准两个德国统一和重新取得全部主权。10月3日,德国正式获得统一。

德国的统一在事实上标志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布什发表声明说,东西方之间长达四十五年的冲突和对抗已被抛在后面。“对美国来说,以及对根本上对欧洲来说,重新统一是一个惊人的成就。”^②在斯考克罗夫特看来,“当苏联人接受一个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时冷战结束了”^③。作为实现德国统一的主要经历者和策划者,联邦德国总理科尔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

当10月2日至3日的那个夜晚,黑红黄三色国旗伴随着德国国歌在帝国议会大厦门前冉冉升起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则是一个梦想的实现。在经历了几十年痛苦的分裂之后,我们的祖国以不流一滴血和泪的和平方式重新统一了。这是当今世界的一大典范。我和我的妻子站在帝国议会大厦高大门楼下的台阶上,看着周围50多万兴高采烈的欢庆人群,此时此刻,我感到无比幸福。

在1990年10月3日之前的几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但是这个过程并未结束,那时苏联还存在,历史悠久的彼得堡依旧叫作列宁格勒。而我们当时有充分的理由期望进行改革和改善我们的大陆东半部民众的生活水平。40多年来,我们第一次有机会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为未来建成这座完整的“欧洲大厦”。而我的内心则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许多人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贡献。此时此刻有谁会忘记像乔治·布什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知名人士呢?^④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908~909页。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③ 同上,第299页。

④ [德]凯·迪珂曼、拉尔夫·格尔克·骆约特:《我要的是德国统一:科尔自述》,葛放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页。

四、戈尔巴乔夫：“人”的意义

对“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强调与尊重,使得戈尔巴乔夫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赢得了西方世界的好感。无论是英国首相撒切尔,还是美国总统里根与布什,抑或是法国总统密特朗、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交往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这是一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苏联领导人。里根说:“在戈尔巴乔夫身上确有令人喜欢之处,他的脸上和作风中荡漾着热情,而不是我迄今为止所见过的绝大多数苏联高级领导人身上的那种近乎仇恨的冷漠。”^①

1. “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国际政治观

戈尔巴乔夫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提倡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方面,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前提下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他说:“如果在思维和心理方面,在工作的安排、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在各处,既在党内,也在国家机关和领导层中不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是不行的。”^②因此,在改革的“熔炉”中,“社会,首先是人自己将重新得到熔炼”。^③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斯大林式的极权主义压抑了人性,使人的尊严受到肆意的践踏,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真正原则的。如果不恢复对人的尊重和价值的提倡,那么改革就无法真正深入进行下去。“人应当知道和体会到,需要由他来发表意见,他的尊严没有被贬低,对他抱有信任和尊重的态度。当一个人看到这一切时,他就能做出许多事。”^④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以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我们力争做到人人都有社会公正,人人权利平等,人人只有一个法律,人人只有一种纪律,人人都有崇高的义务。”^⑤可以说,“改革,就是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② [苏] 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③ 同上,第27页。

④ 同上,第28页。

⑤ 同上,第29页。

值和尊严”^①。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与人的关系的思想很快就被上升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1990年2月,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代表苏共中央向大会作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运动的目标——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使社会深刻民主化和人道化,使其成为自由的社会,为人应该过的生活创造条件。”为此,“制定了进行根本经济改革、根本改造政治体制和联邦以及建立法制国家的思想。制定了新的政治思维的基础,其核心是全人类价值占优先地位”^②。

另一方面,对“人”的价值的重新认识,使得戈尔巴乔夫开始用有别于苏联传统的国际政治观来看待和观察西方国家及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核战争的威胁下,传统的敌我意识应该被人类的共同利益所取代。“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③因此,戈尔巴乔夫主张在西方与苏联之间,首先是苏联领导人要以新的方式进行工作,即放弃“对抗”而实现“对话”。要把“对话”作为国际关系实践的基本手段。在1987年10月出版《改革与新思维》时,戈尔巴乔夫已经相信,“政治对话已开始在国际关系中起着从未起过的重要作用”^④。在频繁的出国访问中,戈尔巴乔夫获得了精神上的自足与愉悦。“在他频繁的出行当中,他显然很放松,而在国内,反对的声音和混乱的局面却愈演愈烈。”戈尔巴乔夫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记录显示得清清楚楚:“1988年之后——如果说不是更早的话——从社会民主党人到反共的保守主义者,西方人也许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最重要的资源。在他们那里,他找到了理解、倾听的意愿和——这一点十分重要——对其改革宏图的欣赏。而这些都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局同事当中,甚至是在他本人那些有才识的幕僚当中找不到的。”^⑤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4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向苏共二十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和党的任务”(1990年2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0年第5期。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117页。

④ 同上,第201页。

⑤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8页。

2. 出国访问、首脑会晤与戈尔巴乔夫

正是出于对对话能够塑造新的国际关系的坚信,相比于其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特别喜欢外事活动,尤其喜欢同西方国家元首打交道。从1985年3月到1987年10月,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长、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保守党的领袖,同欧洲、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各个级别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会见和会晤不少于150次。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些活动“是一所大学校”。在他看来,“这样的对话也不是没有益处的。当代世界所必需的文明的国际关系是在对话过程中形成和巩固起来的”^①。于是,出国访问、会见西方国家首脑成了戈尔巴乔夫的主要工作。^②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② 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为美苏首脑会谈写下了新篇章,但他们并非开先河之人。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两国举行的首脑会谈早已有之:1.日内瓦会谈(1955年7月18日—2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及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讨论了有关德国统一和裁军的问题。2.戴维营会谈(1959年9月25日—27日)赫鲁晓夫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并在美国总统行宫戴维营会见艾森豪威尔。他们商定就柏林的地位问题重新开始谈判,并推出了“戴维营精神”,即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应通过谈判来解决,认定裁军是世界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3.巴黎会谈(1960年5月16日):本次会谈流产,未能如期举行。苏联当时打下了美国的U-2间谍飞机,并且活捉驾驶员。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为此道歉,并取消了对艾森豪威尔访问莫斯科的邀请。4.维也纳会谈(1961年6月3日—4日):肯尼迪总统会见了赫鲁晓夫,但未能就取消核试验和限制军备等问题达成协议。当时正值东西方冷战紧张时期,一个月后柏林墙修成,并在1962年10月爆发了古巴导弹危机,不过,两位领导人在会谈结束时表示愿意继续接触。5.葛拉斯堡罗会谈(1967年6月23日—25日):柯西金与约翰逊总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举行了两次会谈,讨论了中东战争、阿以战争和核武器等问题,但未能消除分歧。6.莫斯科会谈(1972年5月22日—24日):尼克松会见勃列日涅夫,他成了访问莫斯科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两人在卫生、环境保护、太空和科技合作等方面签订了一些协议。7.华盛顿会谈(1973年6月18日—25日):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签订一份保证书,内容是力争在1974年结束核军备竞赛,并避免在国际上发生冲突。8.莫斯科会谈(1974年6月27日—7月3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三次会谈,签署了一些限制核武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项禁止在地下试验15万吨当量以上的核武器的文件。9.海参崴会谈(1974年11月23日—24日):福特总统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海参崴举行会晤,并且就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包括多弹头导弹)和发射装置的问题达成了临时性协议。10.赫尔辛基会谈(1975年7月30日—8月2日):福特和勃列日涅夫与另外33个国家的首脑一道就欧洲安全问题举行会谈。两人就战略武器问题举行磋商,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11.维也纳会谈(1979年6月15日—18日):卡特与勃列日涅夫使为时7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告一段落,签署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2.日内瓦会谈(1985年11月19日—21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订了几项协议,其中包括文化科技交流和航运合作等。遗憾的是,他们未在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13.冰岛会谈(1986年10月11日—12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就军备控制问题举行了详细讨论,但因在美国的“星战”计划问题上各执一词,未能达成协议。14.华盛顿会谈(1987年12月8日—10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第三次会谈,并签订了《中导条约》以消除中远程核武器。这是两个超级大国第一次商定禁止整个一个级别的核武器。

在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尤其喜欢与西方国家首脑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1988年10月24日,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会晤使戈尔巴乔夫在这一方面感受颇深。科尔以极富个人情感性的对话作为谋求两国政府建立全方位新关系的表达方式。科尔说:

我认为你我之间的个人关系十分重要。我既是以联邦德国总理的身份,又是以公民科尔的身份来到莫斯科的。你我大致是同一年龄的人,我们同属于经历过战争的一代。诚然,我有一段时间在高炮辅助部队服役。这还算不上参加战争。不过我们两人的家庭都经历过战争及其全部灾难。您的父亲当过兵,受过重伤。我的哥哥18岁阵亡。我的妻子是个难民。我们家是地道的德国家庭。您有一个女儿,我有两个儿子,一个23岁,一个25岁。两个人都是预备役军官。

你我将解决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再过12年20世纪和第二个千年即将结束。战争、暴力已经不再是政治手段。不这么想,就意味着把事情引向世界末日。在公开性的环境里,我们两人的私交也应当具有全新的性质。我愿意和您进行频繁的私下对话——书信往来,电话交谈,委派代表。^①

科尔充满个人感情的话深深打动了戈尔巴乔夫,并使戈尔巴乔夫产生了亲切之情。戈尔巴乔夫说:

我并不讳言,这种态度无论是从单纯的个人角度而言,还是从公务角度而言,都令我敬慕。我的出发点是,在已经可以感受得到的新氛围中,个人的“相容性”,理解谈话对方的动机,在国际政治中将具有越来越大的作用。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共同工作和长期交往过程中,只有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的相互考察,才有可能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由于领导人之间存在着信任而很容易、很快地得到了解决,免去了多余的外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95页。

交手段和程序。^①

戈尔巴乔夫有别于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个性化外交风格受到了西方的追捧。西方舆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具有新思想、不按照自己前任的教条行事的人,他很快成了西方人崇拜的偶像。他们不断地塞给他各种名目的奖金,向他颁发金质奖章,授予他种种荣誉称号,在电视、报纸和杂志上为他作宣传,巧妙地满足着他的自尊心。西方国家的老百姓并不知道,批判过去、打破现存结构要比搞建设容易得多。他们不明白苏联人民为什么对这个人持冷漠态度:“他开创了一项多么好的事业,却在自己的国家里受到严厉的批评。”^②于是,国内的形势愈紧张,国外的赞誉之声就愈大。西方国家对总书记—总统的所作所为依然赞不绝口,把他当作伟大人物来接待,因为他做了他们用任何武力和其他力量都办不到的事。“戈尔巴乔夫的西方崇拜者对他的称赞补偿了他在国内遭到的冷遇。”^③当然,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④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尽管失去了整个国家,但却赢得了友谊。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时,美国总统布什告诉他:“没有人阻碍我保留和你的联系,无论你的新职务是什么,欢迎来自你的建议,而且要一如既往地保持,芭芭拉和我都非常非常看重的这个友谊。”^⑤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下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95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78页。

③ 同上,第158页。

④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⑤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洛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5~596页。

第三章 意识操纵：西方价值的 灌输与渗透

艾森豪威尔说,美国所持有的信仰“不单单属于我们,而且属于全世界自由的人们”^①。事实上,冷战从开始到结束都显示了美国所肩负的意识形态传播使命:以自由民主之名抵制邪恶专制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扩张。这种源自于美国崇尚个人的政治文化传统、19世纪工业大发展以来美国商品对市场的强劲需求以及在世界战争中塑造的胜利主导者的政治自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取得胜利之时,就遭遇到苏联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欧洲地缘战略利益等方面对美国自负的“天定命运”提出的全方位挑战。“虽然美国和苏联的意识形态在背景和议程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它们各自对现代性的具体含义的界定大相径庭。大多数美国人颂扬市场,而苏联精英则拒斥市场。列宁的追随者虽然明白市场是大多数欧洲扩张赖以推行的机制,但他们也相信市场终将被奉行平等和正义的以阶级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所代替。现代性的达成要通过两个阶段:一是资本和生产力的阶段,二是民主化和被压迫者走向社会进步的阶段。共产主义是更高的现代性阶段,而俄国工人阶级被赋予了开辟通往这种现代性道路的使命。”^②于是,在作为“自由的帝国”的美国与作为“正义的帝国”的苏联全面对抗中,上演了一幕幕令人目眩神迷的意识形态操纵与反操纵的“人心之争”。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所言:“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竞争,但意识形态

①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二),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31页。

② [挪]文安利:《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7页。

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①

一、心理战略:反击共产主义政治战

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斗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尤其注重在社会思想、精神和心理领域发起反击共产主义、有组织的政治战。在由凯南负责的美国政策计划署于1948年5月4日发布的名为“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的备忘录中,明确把苏联的冷战看作政治战:“政治战是和平时期的克劳塞维茨学说的合理性应用。从广义上的定义看,政治战就是利用一切手段由国家指挥,但不会发生战争,从而来实现其国家目标。这些行动可以是秘密的,也可以是公开的。行动范围可以包括公开行动,如政治联盟、经济措施(如欧洲复兴计划)和‘善意的’宣传,以及秘密行动如秘密支持‘友好的’外国势力、‘恶意的’心理战,甚至鼓励在敌对国家进行秘密的抵抗运动。”^②

1. NSC4 - A:《心理行动》

对敌对国家开展心理行动并非美国在冷战时期开展隐蔽行动的专利。事实上,早在1917年4月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威尔逊总统就着手成立了心理行动的组织机构——“公众信息委员会”,并委任前《落基山新闻》编辑乔治·克里尔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在“公众信息委员会”和陆军部的心理战略机构发起的宣传攻势下,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对交战国双方的民心士气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出于对“宣传”“心理战”这类贬义词语和活动的憎恶情绪在国内的高涨,美国国会于1919年取消了对“公众信息委员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14页。

会”的财政拨款,并很快取消了战时的宣传机构。^①

不过,纳粹德国的崛起及其对拉丁美洲发起的心理攻势,却迫使美国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后院”。1940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任命纳尔逊·洛克菲勒为“拉丁美洲商业和文化关系的协调人”。洛克菲勒的首要职责是利用所有的经济、财政和商业手段,并结合大量的美国信息使拉丁美洲认识到轴心国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1941年7月11日,罗斯福任命威廉·多诺万为“国家信息情报协调处”负责人,其主要任务是收集、复核、分析和综合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和资料,供总统和总统指定的官员使用。1942年6月13日,罗斯福颁布总统行政命令——成立“战略情报局”,负责美国宣传心理战公开的、官方认可的行动和任务,局长由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作家埃尔默·戴维斯担任。同时,罗斯福又颁布总统军事命令——成立“战略服务局”,负责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收集、研究、分析和提供情报,同时在敌国和敌占区进行“秘密活动”,包括制造散布谣言、传单、假文件等。此前的“国家信息情报协调处”并入该机构,局长由威廉·多诺万担任。除了上述机构外,美国陆军早已建立心理战分支机构,海军部也建立了“特殊战争处”。1942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领导下还成立了“心理战联合委员会”,负责美国军队在二战各战场的宣传心理战。事实上,直接与心理战活动有关的机构还有“经济战委员会”“检察局”“军工生产委员会”和“联邦通讯委员会”。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31日发布总统行政命令,规定战略情报局的国内活动必须在1945年10月15日停止,其国外的信息活动和美洲国家间事务协调人的活动要在12月31日前编入国务院或者取消。尽管战略情报局的活动受到杜鲁门的限制,但是其对战后美苏之间的斗争形态的预测却不可忽视。在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威廉·多诺万收到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中写道:“在国际上施加压力,既有‘和平方式’,也有‘好战的方式’。原子弹的发明使两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重点将有所转移。我们应该预见到‘和平方式’的分量显然将会加重。”

^① 参见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我们的敌人将更加放手地进行攻心战,对我们进行颠覆、破坏和施加……压力,而我们也只好甘心地承受他们的侮辱。我们极力想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充分利用和平方式。在战争爆发之前瓦解敌人意志的时期、在战争已经爆发的时期以及战后控制局势的时期,‘和平方式’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①这份报告极富预见性地为冷战下了一个定义:冷战就是心理战,就是用“和平方式”屈敌,也就是用宣传的武器来瓦解敌方的立场。

随着美国和苏联在土耳其、希腊、伊朗以及德国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大,美国对心理战的作用又开始重视起来。1946年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下属的陆海军协调委员会就给国家情报局递交了一份题为“心理战”的报告,强调了心理战作为“一个在战时,或总统确定受到战争威胁时,获得国家目标和军事目标的必要因素”,提议立即建立一个负责制订心理战政策、计划并执行相关研究的委员会。该份文件在1947年4月30日获得批准,成为美国政府战后第一份心理战文件。^②

1947年6月26日,杜鲁门签署了1947年国家安全感,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心理战开始被提上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事日程。10月2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悉尼·索尔斯给国防部长福莱斯特的备忘录中提出:“需要采取心理战反击苏联鼓动的共产主义宣传,特别在法国和意大利。”他同时指出,应继续加强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公开活动;由中央情报局进行隐蔽活动;设立机构,制定政策,协调二者的行动。11月7日,美国国务院—陆海空军协调委员会下属的一个特别小组向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题为“心理战”的报告,在分析当时的形势时指出:“苏联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主要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并综合运用心理的、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以图瓦解有能力反对苏联野心的各国所有非共产党力量。”报告的结论是:“目前的世界形势要求美国立即采取协调措施以影响各国的态度,使其有利于获得美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3页。

② 参见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88页。

国的目标,抵消反美宣传的恶果。”^①在11月14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这一报告时,国务卿马歇尔表示他并不对这个心理战计划感兴趣,并提出是否应更换“战争”这个词。国家安全委员会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用“心理行动”代替“心理战”。

12月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颁发两份文件:《协调对外信息宣传措施》(NSC4)和《心理行动》(NSC4-A)。NSC4号文件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的第一份在全球范围内对苏联及其势力范围进行宣传和心理战的文件。文件提出要在世界各地加强与美国盟国的合作,在心理宣传方面展开对苏联共产主义的攻势。在NSC4-A号文件的附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索尔斯给中情局局长希伦特的草案指令中指出:

1. 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共产主义集团有着险恶用心,试图通过心理方面的攻势来诋毁、破坏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目标与行动,为此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美国政府的对外新闻活动必须通过秘密的心理战来予以配合。

2. 秘密的心理战和情报活动在行动方式上的相似性,以及出于确保行动的保密性,避免代价高昂的重复性行动,致使中情局成为采取这些行动的合乎逻辑的机构。因此,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102(d)(5)款的授权,国家安全委员会指示中情局局长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发动并开展秘密心理战方面的行动,旨在应付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或企图诋毁、破坏美国的苏联及其由苏联煽动的活动,努力推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3. 为了确保这些心理战行动遵循美国的外交政策、公开性对外新闻活动以及国外外交、军事行动和意图,中情局局长负责:

a. 获取对所有政策性指令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定小组采取这些行动的重大计划进行批示。

b. 与受这些行动直接影响的每个地区的美国外交、军事高级代表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保持协调行动。

c. 没有任何规定可视为需要中情局透露其秘密手段、来源或关联行动的详情。^①

随着苏联主导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和柏林封锁事件的连续爆发,美国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凯南建议国务院也要介入到对苏联的秘密宣传活动中去,而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为首的军方也不满由中央情报局独掌秘密行动的大权,要求军方要分享。为此,1948年6月18日,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将进行秘密心理宣传行动的权限不仅限于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甚至国家安全委员会都将对这一行动负责。

1950年7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NSC74)。NSC74号文件将心理战定义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除战争以外的其他旨在影响外国人员团体的见解、态度、情感和行为,以支持获得本国目标的传递思想观念和信息的活动。”^②这份长达五十多页的文件,详细提出了美国国家心理战的全面计划。对心理战的目标、任务和理论、心理战实施的地区和国家、心理战的组织领导机构等进行了认真的规划和准备。

1951年4月4日,杜鲁门在一份秘密的总统指令中决定成立心理战略委员会,它将接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负责公开的与隐蔽的心理战活动。“在指令条款的框架内,服务于宣传活动,为负责心理作战部门和机构提供指导,涉及整体的国家心理战术目标、政策和计划,并对国民心理进行评估和协调。”^③心理战略委员会主任为前陆军部部长、时任北卡罗来纳大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08~1209页。

②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③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25页。

学校长戈登·格雷,成员有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顾问。格雷负责心理战略委员会的议事日程、起草计划和报告、公布决议,敦促决议的执行,但不负责具体的心理战行动。

从1951年4月成立到1953年1月,心理战略委员会建立了36个特别小组,负责44个项目。1953年1月15日,杜鲁门召开最后一次心理战略委员会会议。尽管心理战略委员会解散了,但是杜鲁门之后历任美国总统并没有放弃心理战,而是把心理战作为秘密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隐蔽行动:中央情报局

中央情报局从其诞生后不久,就被赋予实施包括心理战在内的隐蔽行动的主要任务,以弥补美国政府公开性外交活动的不足。“中央情报局的建立标志着对美国传统政治规范进行了一次彻底大翻修。中央情报局借以建立的那些法律条文将‘必要的谎言’和‘说得过去的矢口否认’的概念制度化,确认其合法的和平时期战略,从长远来看,形成了一个无形的政府层次,使任何责任感都无法阻止它在国内和国外滥用权力。”^①

1947年7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杜鲁门总统提交的《美国国家安全法》。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02条规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设立中央情报局。其职责是:

(1)就政府各部、局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建议。

(2)就政府各部、局涉及国家安全的情报活动的协调问题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意见。

(3)沟通和评价有关国家安全的情报,利用当地相应机构和便利设施,将这类情报在政府内部进行适当的分发。但中央情报局不能有使用警察、传票、法律执行权和国内保安的职权;政府和政府其他部、局继续搜集、评价、沟通与分发各部门的情报。中央情报局局长将负责保护

^① [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31~32页。

未经批准泄露的情报来源和搜集情报的方法。

(4)为了现有各情报部门的利益,执行其他与国家有关共同关系的机构的决定,以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能更有效、更集中地贯彻。

(5)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常的指示,履行有关国家安全情报的其他职能和职责。^①

9月18日,根据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正式建立,希伦科特担任第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12月9日,中央情报局开始获得“采取措施执行秘密心理战行动来对抗苏联及由苏联煽动的活动”^②的权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索尔斯在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备忘录中建议:“关于在国外开展秘密心理行动,委员会认为附上的给中情局局长的草案指令是合适的、充分的。”该指令包含以下期望性条款:“a. 它详细说明委员会行动的理由和权力;b. 它赋予中情局充分的权力;c. 而同时确保中情局将以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公开对外信息行动以及在国外进行的外交、军事行动和意图的方式来开展这些行动。”^③

12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并通过了国家安全委员会4-A号文件及其附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的指令》。该指令明确指出:

1. 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集团为了诋毁和打败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目标和行为而做的各种恶毒的心理战努力,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政府的国外情报活动必须增加秘密心理战活动。

2. 秘密心理战和情报活动二者行动手段的相似性,以及对隐秘性和避免代价高昂的重复行动的要求,使中央情报局合乎逻辑地成为承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二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93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07页。

③ 同上,第1208页。

担这些行动的部门。因此,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第102(d)(5),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中央情报局局长在可取得的资金范围内,发起和指挥秘密心理战行动,来反击苏联和苏联授意的那些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或旨在诋毁和击退美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中所作努力的行动。

3. 中央情报局局长应负责确保这种心理战行动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公开的国外情报活动协调一致,国内外(包括各地的外交和军事代表机构)都必须知晓这些直接影响它们的行动。

4. 本文不包含任何可能会被解释为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公开有关其秘密技术、资源或联络的意图。^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号文件被批准后,中央情报局积极开展秘密心理战行动。12月22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在给特别行动副指挥加洛韦的指令中,明确要求其尽快确定秘密行动的相应机构建设。指令指出:

1. 本局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以秘密心理战行动作为政府外国情报活动的补充。此外,我们还负责确保美国政府国内外相应机构的此类行动与美国外交政策和公开的情报活动相一致,并随时了解这些行动对它们的直接影响。

2. 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本局的指令已经决定由特别行动办公室(the Office of Special Operations)负责进行秘密心理战行动。

3. 兹附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8号文件的副本供你参考和作为指导。这份文件将被作为行动的基本政策指导。

4. 你应立即采取行动利用你办公室和本局其他办公室的现有设施拟定秘密心理战行动。你的建议应参考下列具体事项,并尽可能早提交:

- a. 为外国情报处和特别行动办公室组织结构图;
- b. 为秘密心理战措施拟定组织表,推荐人员和战场;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11页。

- c. 拟定与政府主管部门和机构的联系计划；
- d. 估算 1948 和 1949 财政年度所需的资金。^①

1948 年 6 月 18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 10/2 号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NSC10/2 要求,和平时期在中央情报局下建立一个新的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rojects),计划并实施秘密行动;在战时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协调,为执行这些行动做好计划和准备工作。NSC10/2 特别强调,特别计划办公室主任直接向中央情报局局长汇报。“为确保行动的安全和灵活性,以及实现最大限度的有效性,特别计划办公室应该独立于中情局其他部门行事。”^②NSC10/2 把秘密行动定义为:“宣传战、经济战;直接的预防性行动,包括阴谋策划、反阴谋策划、破坏和撤离手段;对敌对国家策动颠覆行动,包括援助秘密抵抗运动、游击队和流亡解放团体,支持自由世界遭受威胁国家的本土反共力量。这些行动不包括动用被公认的武装力量、谍报活动、反谍报活动以及掩蔽性、欺骗性军事行动而产生的武装冲突。”^③

NSC10/2 之所以作出上述说明,就是为了使美国政府能够在秘密活动中“置身事外”,从而避免它承担相应责任。“该指示中所用的‘秘密行动’理解为所有由本届政府实施或资助的活动(除这儿专门注明的),这些行动是用来对付那些充满敌意的外部国家或团体或支持友好的外部国家或团体,但是要求这些行动的策划和执行对于未参与到此项行动的官员来说,不会轻易发现美国政府承担了这些行动的责任,如果行动暴露的话,美国政府也能够合理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④尽管美国政府想方设法“置身事外”以避免秘密行动给国家形象带来损害,但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就像尼克松所言:“美国必须能够以隐蔽方式采取行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12~1213页。

② 同上,第1223页。

③ 同上,第1224页。

④ 同上,第1223~1224页。

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①

事实上,在把苏联作为首要敌人的前提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秘密行动的指令。见下表:

冷战时期历届美国政府遏制共产主义的隐蔽行动战略概览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47年 12月 9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A号	《心理战行动》 (NSC4-A)	该文件把心理战作为对苏联冷战的重要内容,并确定由中央情报局局长来负责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心理战。
1947年 12月 17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号	《美国对意大利的立场》(NSC1/2)	该文件指出:“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如果苏联成功地控制以下任何一个国家: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或伊朗,整个东地中海和中东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应该“帮助意大利、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准备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如果必需的话)力量执行这项政策”。
1948年 3月 1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3号	《共产党通过合法方式参与政府时美国关于意大利的立场》(NSC1/3)	该文件指出,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进一步措施阻止意大利共产党获胜参与政府。
1948年 5月 12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号	《专门研究小组主任》(NSC10)	该文件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政策规划署关于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的基础上,正式提出把秘密行动作为美国在冷战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48年 6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2号	《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特别计划办公室的指令》(NSC10/2)	指令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认识到苏联及其卫星国和共产主义团体诋毁、败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目标与行动的恶毒的隐蔽活动,决定为了世界和平与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必须用隐蔽行动补充美国政府公开的对外活动。”
1949年 9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8号	《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政策》(NSC58)	该文件专门讨论对东欧国家的政策,试图用非战争手段来达到削弱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目的。
1950年 11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1号	《自由战略》 (NSC68/1)	该文件是对NSC68号文件的细化和修正,明确提出了把对苏联的遏制战略称为“自由战略”,赋予了遏制战略的意识形态话语,突出地把遏制苏联与在全世界扩展自由等同起来。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05页。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0年 12月 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3号	《美国国家安全的 目标与计划》 (NSC68/3)	该文件把美国对外援助服务于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并从冷战一开始就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精心设计了在全世界范围开展的心理战。
1950年 12月 14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4号	《执行秘书就美国 国家安全的目标与 项目提交的短笺》 (NSC68/4)	该文件反映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参战后的战略态势的判断。
1951年 10月 23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0/5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 范围与步伐的决 定》(NSC10/5)	该文件指出:“给苏联的权力结构造成最大的紧张,包括苏联与其卫星国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在按照美国与苏联的实力和避免战争风险的前提下,在合适的时间、地点,努力削弱苏联的力量和影响,使其不再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1953年 10月 30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	《国家安全基本政 策》(NSC162/2)	该文件指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基本问题是“对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与此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制度”。文件强调,美国应“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措施诋毁苏联的威信和作为其有效工具的意识形态,削弱共产党和其他亲苏分子的力量”;“采取一切可行的外交、政治、经济 and 隐蔽手段反对直接或间接接受苏联控制的政党或个人在自由世界国家获取统治权力的任何威胁”;“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隐蔽措施给苏联制造麻烦,利用这些麻烦,破坏苏联与共产主义中国的关系,使苏联对卫星国的控制复杂化,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
1954年 3月 15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 指令》(NSC5412)	该文件指出:“给国际共产主义制造困难,破坏苏联和共产党中国以及它们和卫星国之间的关系,使苏联、共产党中国及其卫星国对国内的控制复杂化,延缓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潜力的增长”;“诋毁国际共产主义的威信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力量”;“阻止那些容易直接或间接地接受共产主义控制的党派或个人在一个自由世界国家获得统治权力”;“削弱国际共产主义对世界任何地区的控制”。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54年 8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0号	《美国国家安全计划的地位》 (NSC5430)	该文件的第七部分描述了美国新闻署的计划。
1955年 1月 31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5/1号	《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的弱点》 (NSC5505/1)	该文件专门讨论了利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弱点,通过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行动等手段的运用来削弱苏联东欧集团。
1955年 3月 12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1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NSC5412/1)	对NSC5412号文件进行补充完善。
1955年 12月 18日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12/2号	《关于隐蔽行动的指令》(NSC5412/2)	对NSC5412号文件进行补充完善。
1961年 6月 28日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57号	《准军事行动的责任》(NSAM57)	
1962年 1月 18日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124号	《建立反叛乱特别小组》(NSAM124)	该备忘录指出:“为了确保齐心协力并最有效地使用所有可供支配的资源,以防止和抵抗在友好国家的颠覆性叛乱及与之相关的间接侵略,特成立反叛乱特别小组。”
1963年 3月2日	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第341号	《指导、协调和监督跨部门的海外活动》(NSAM341)	该备忘录是约翰逊总统为协调美国除军事行动之外的跨部门海外行动,在体制上作出安排,从而加强美国对外行动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1970年 2月 17日	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40号	《关于实施、监管、以及协调隐蔽行动的责任》(NSDM40)	该备忘录指出:“为了美国的国防、安全及其为世界和平的努力,一项基本政策是继续用隐蔽行动补充公开的对外活动。”
1970年 8月 10日	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76号	《美国对外援助的新计划》(NSDM76)	该备忘录是尼克松政府关于对外援助计划的决策。
1970年 11月 9日	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第93号	《对智利的隐蔽行动计划》(NSDM93)	该备忘录指出,尼克松总统明确指示,在一个公开的对智利“冷淡而正确”的姿态背景下,“采取有力措施确保拉美的其他政府完全明白,美国反对一个与美国和本半球其他国家利益相敌对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巩固,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他们采取相同的姿态”。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76年 2月 18日	总统行政令第 11905号	《美国对外情报活 动》(E. O. 11905)	命令指出:隐蔽行动“不同于收集和提供情报以及为此而进行的活动,它是旨在促进美国政府在国外的计划和政策的活动,这些活动的计划和执行要使美国政府的作用不被暴露或公开承认”。
1978年 1月 24日	总统行政令第 12036号	《美国对外情报活 动》(E. O. 12036)	命令进一步强化了特别协调委员会管理隐蔽行动的权威性。
1978年 8月 24日	总统评估备忘 录第42号	《美国对苏联的非 军事竞争战略》 (PRM42)	备忘录说,总统要求做好准备,强化美国对苏联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包括如何在第三世界抗衡苏联的行动,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竞争中如何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1981年 12月 4日	总统行政令第 12333号	《美国情报活动》 (E. O. 12333)	文件规定国家安全委员会为对隐蔽行动进行审议、指导的最高行政机构,再次确认美国情报机构的任务之一是从事“特别活动”。
1982年 5月 20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32号	《美国国家安全战 略》(NSDD32)	指令指出:“80年代将可能是二战以来决定美国生存与繁荣的最具挑战性的10年,美国的应对可能导致80年代末时东西方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因此,指令授权采取广泛的政治行动和隐蔽宣传活动打破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授权采取隐蔽行动和其他手段支持该地区的反苏组织,如秘密资助游行示威、集会、各种会议、出版印刷宣传品、制作电视节目、展览,以及诸如此类吸引人们注意苏联非法行动的活动。
1982年 9月2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54号	《美国对东欧的政 策》(NSDD54)	文件明确指出:“美国对东欧的预期目标是……促使其最终融入欧洲国家共同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要对东欧国家采取和苏联不同的政策,要鼓励该地区更自由的趋势,促进东欧国家的人权和公民权,加强其人民的亲西方倾向,减少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对苏联的依赖,促进他们与西欧自由国家的联合,鼓励其经济发展私有市场倾向和自由工会的活动。

续表

时期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基本精神
1985年 1月 18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159号	《隐蔽行动政策批准与协调程序》 (NSDD159)	文件指出:“美国面临着对其国家利益及促进这些利益良机的种种威胁”,“特别是苏联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继续干涉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内部事务,并采取他们认为有效的任何手段以实现其目的。这些手段包括支持其盟友、损害其对手的隐蔽的政治行动、宣传、准军事行动以及情报支持计划,如破坏民主选举、组织和支持政变、恐怖主义、叛乱以及散布旨在诋毁美国及其盟友的假情报等活动”。为此,“美国需要各种国家安全工具以保护和促进其利益……这些工具包括公开和秘密的外交信息管理,政治行动,以及包括准军事行动和情报支持计划在内的隐蔽行动”。
1987年 10月 15日	国家安全决定 指令第286号	《特别活动的批准和审查》(NSDD286)	指令强调除非总统通过一个裁决授权,认为这项活动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能采取隐蔽行动。
1989年 9月 22日	国家安全指令 第23号	《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	指令对美国长期以来实施的对苏遏制战略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新的对苏政策,即“超越遏制,积极促进苏联融入现存的国际体系的政策”。指令阐述了美国的政治—外交目标的是:“通过继续对朋友、盟国和自由战士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限制苏联通过提供武器、派遣军队、支持傀儡等扩张实力。”

从中央情报局负责开展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秘密行动以来,尽管在冷战的各个历史阶段受到程度不等的批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场争夺人心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中央情报局仍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冷战时期最后一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说:

总的来看,中情局对美国取得冷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是美国在第三世界代理人战争中的一把利剑,为苏联和东欧国家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全世界积极揭露苏联真实的压迫与颠覆行动,收集了大量关键军事信息,对苏联军事实力和弱点进行了准确评估,为美国民众系统描述了苏联危机的发展历程。从这些方面

来看,在冷战后半期,中情局成功地甚至完美地完成了总统交给它的任务。^①

3. 政治战争:美国新闻署

在责令中央情报局积极开展秘密行动的同时,美国政府成立了公开的新闻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负责美国的对外宣传。其目标是“团结自由世界,以非战争的方式减少共产主义的威胁”^②。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对舆论的控制和引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针对纳粹德国发起的宣传攻势,罗斯福总统于1942年6月13日下令成立了美国官方宣传机构——战时新闻局(the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并在欧洲、非洲以及亚洲等地建立了26个分支机构——美国新闻处(U. S. Information Service)。战时新闻局和美国新闻处的任务是向美国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与公众解释美国政府的政策。1945年8月31日,杜鲁门总统发布第9608号行政令宣布解散战时新闻局,但保留了其海外的分支机构——美国新闻处,将其划归国务院。

不过,随着冷战的逐渐兴起,杜鲁门政府迫切需要加强美国的对外宣传能力。1948年1月16日,美国第80届国会通过“史密斯—蒙特议案”。1月27日,经杜鲁门总统签署正式生效,成为《史密斯—蒙特法案》,即美国第402号公法——《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该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利用无线电、出版物、电影、展览和文化教育交流等一切手段使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根据该法案的要求,美国国务院建立了和平时期的宣传机构以进行公开的、有组织政治战。5月4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署在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备忘录中明确把政治战分成公开的和秘密的两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91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31页。

个部分。备忘录首先对苏联的政治战进行了分析。“列宁将马克思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进行综合，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政治战术就成为历史上最为精准而有效的手段。”^①随后，备忘录提出有两种主要类型的政治战：一种是公开的，一种是秘密的。“从它们的基本特性来看，国务院都应该对这两种类型进行管理和协调。当然，公开的行动是任何具有强有力领导力的外交部门所要进行的传统性政策活动，无论它们是否被认为是政治战。”备忘录要求在与苏联的竞争中，美国政府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政治战。“我们已经承担起比先前历史上更大的国际责任，并且一直与有着强大力量的克里姆林宫进行着一场政治战的较量，我们不得不动调我们采取秘密政治行动的资源。”^②

1950年12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8/3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进一步强调了政治战的重要性。该计划指出：“形成和保持对克里姆林宫图谋的心理抵制要求我们持续而深入细致地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威胁其他人民与国家的共同利益的方式。我们可以揭露克里姆林宫在言行上的矛盾，在海外宣扬的理想与苏联及其卫星国内部所普遍存在的贫困、压迫和恐怖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和平的宣言与军队规模庞大以及帝国主义式的侵略的事实之间的矛盾。我们以具体事例揭露苏联共产主义在其势力范围内做了些什么，在其代理人攫取政权的地方打算做些什么，我们就可以摧毁它代表民族自由、国际和平、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神话。”^③

为了更好地承担起组织开展公开的政治战的需要，1952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第4号公告，宣布将国务院内的美国国际新闻署和美国教育交流处合并为一个半独立的机构——国际新闻署，管理国务院的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计划。华盛顿大学校长威尔逊·康普顿博士出任署长。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后，针对苏联的“和平共处”和“新冷战”，提出以“大平衡”战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14页。

^② 同上，第1215页。

^③ 同上，第914页。

略思想为基础、用最小的代价实现遏制苏联的“新面貌战略”。这一战略强调来自苏联的心理和政治挑战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美国的信息、文化和教育交流计划,以此激发人们对美国的和平意愿的信心,从而维护和输出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根据“新面貌战略”的要求,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月29日组建了由纳尔逊·洛克菲勒担任主席的总统政府组织咨询委员会。洛克菲勒建议艾森豪威尔建立一个新的对外信息机构,整合现在由美国国际新闻署、技术合作署、共同安全署和与被占领区地区政府有关且由国务院负责实施的各种最重要的对外信息计划和文化教育交流计划。

1953年6月1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交了建立美国新闻署的1953年第8号改组文件。艾森豪威尔在论述这个改组计划时说,把各种信息计划整合进一个机构“看来是一个提供真正统一的和更富效率的合理方式。此外,这个举动把所有用于对外信息行动的资金置于统一的管理之下”。艾森豪威尔强调,由于信息活动和“处理外交事务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之间的“直接关系”,授权国务卿“掌控美国信息计划的内容”,但是“美国新闻署的署长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我汇报,并从我这里得到指示,或者我以其他方式领导他的工作”。^①这种安排使美国新闻署独立于美国国务院而成为总统的代言人。事实上,美国新闻署的历届署长几乎要么来自传统政府外交界,要么本人就是传播界的领军人物,具有丰富的对外传播和交往能力。他们作为总统直接任命的部门首长,有权参加总统召集的内阁会议。一位署长曾经自豪地告诉别人,在美国众多部门中,只有他本人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有资格出席总统召开的小型内阁会议。

7月30日,艾森豪威尔任命曾担任美国共同广播系统委员会主席和“美国之音”顾问的西奥多·斯特赖伯特担任美国新闻署的第一任署长。8月1日,美国政府1953年第5号改组计划经国会批准生效。同一天,美国新闻署正式建立。为了明确美国新闻署的使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0月22日召开的第167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美国新闻署的政策声明(NSC165/1),并交给美国新闻署署长实施。NSC165/1号文件明确规定了美国新闻署的工作

^① *Public Pap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8, pp. 342 - 354.

使命:

1. 美国新闻署的目标是利用传媒技术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表明,美国的目标和政策与他们对自由、进步与和平合法的抱负是协调一致的,并将促进他们这些抱负的实现。

2. 美国新闻署实现上述主要目标的活动包括:向外国的人民解释和阐明美国政府的目的是政策;富有想象力地描述美国的政策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的合理期望之间的相互关系;揭露和回击对美国的目的和政策进行扭曲与阻挠的敌对措施;描述美国人民生活和文化中有利于人们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和目标的重要方面。

3. 在必要的情况下,除了“美国之音”的工作外,美国新闻署有权就其他国家政府能够设想出其归属的事件与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通话。^①

收到这份政策声明后,美国新闻署署长赖特伯特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说:“它对我们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因为它清楚而详细地阐述了路线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海外信息服务能成为有效的工作。”^②

美国新闻署设署长一人,副署长一人,负责政策计划处工作的副署长一人。除政策计划处以外,设有行政处、安全处、总咨询处、研究与资料处(研究与情报处)、私人合作处。属于宣传媒介方面的机构有广播业务处、电影业务处、电视业务处、新闻中心处、新闻出版业务处。广播业务处负责领导“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拉美自由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及其转播站工作。新闻出版业务处领导美国新闻署新闻稿、宣传品出版工作。美国新闻署曾经雇用一万多名工作人员,活跃在世界各个角落。在其独立存在的46年时间里^③,紧密配合美国的外交政策,出色发挥其国际传播和交流之功能,为在国际上树立美国的正面形象,“宣讲美国的故事”传播美国的价值观,诋

①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ission of the USIA,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 - 1954, Vol. II, Part 2, pp. 1753 - 1754.

② Th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Streibert) to the President, October 27, 1953, *Ibid.*, pp. 1754 - 1755.

③ 注:1999年10月1日,美国新闻署并入美国国务院。

毁其敌人,诬陷其对手,为美国赢得冷战立下汗马功劳。正如尼古拉斯·卡尔教授在《冷战和美国新闻署——1945年至1989年的美国宣传和公共外交》一书中所言:“正是由于有了美新署,世界得以了解美国的思想和文化。在没有任何一个私人公司能够在全球传播信息的时代,美新署成为了‘全球化’的机构,在其所处的时代里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地的报纸从美新署及其办事处获得(美国领导人的)讲话稿和新闻;利用邀请世界未来的领袖人物到美国访问的机会对他们进行栽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阅读到美新署的图书和报纸,观赏它的电影。包括俄国的各国人士通过参观美新署举办的展览,或者走进美国人的家庭,或者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亲身体验美国的生活和了解美国的科技进步。”^①

二、广播政治:美国之音与自由电台

就在美国新闻署成立之时,美国参议院汤姆森·索伦森委员提交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与对外宣传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新闻署的目的是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为此需要利用各种交往工具——个人接触、交换、图书馆、新闻、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书籍、出版物等在国外造成一种有助于实现美国外交政策的舆论气候,以向全世界反映出一个强大的、民主的、充满了活力的美国的形象,使全世界各地自由人民感到值得与美国合作。在美国新闻署和中央情报局的主导下,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等发起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广播攻势。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上述电台的每周播音时间在1986年达到了2353小时,高居世界首位,以至于被称为里根政府在“军事星球大战”之外的“广播星球大战”。《国际先驱论坛报》在题为“美国大搞广播政治”的文章中就说:“现在世界上除军事上的星球大战之外,还有另一场星球大战,它所涉及的不是导弹,而是通过无线电向世界上各个偏僻地区传播新

^① 转引自黄友文:《美国教授笔下的美新署——评〈冷战和美国新闻署〉》,《对外传播》,2010年第10期。

闻和意识形态。”^①

1. 美国之音:不是搞广播而是搞革命

作为美国新闻署下辖单位的美国之音(Voice of America)其实创建于1942年2月24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归属战时新闻局,负责对法西斯控制地区宣传盟军的政策和战绩。1945年后改由国务院管理。1953年划归美国新闻署管理后,按照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关于要利用广大的无线广播网穿越“铁幕和铁幕背后的国家”,以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指示,美国之音成为美国发起反对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政治传播利器。“我们的工作并不是要消遣、娱乐或者简单地让我们的听众知情。我们也不单纯以报道新闻为最终目的。美国正在挣扎着赢取世人的认同,新闻部乃至整个美国之音的任务,就是帮助美国赢得这场争夺。”^②

从1947年2月17日起,美国之音每天进行一个小时的俄语广播,内容主要是新闻和专题报道。随着冷战的升级,特别是柏林危机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美国之音的投入。1948年3月20日,主管公众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斯通要求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为1948年美国政府信息计划提供31,381,220美元的拨款,其中14,800,098美元直接划拨给美国之音。不过,由于美国之音在美国全球心理宣传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从1949年起就遭到苏联的全面干扰。为此,杜鲁门在1949年年底就指示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干扰美国之音广播进行情报评估。1950年1月20日,中央情报局提交了一份名为“苏联干扰美国之音的历史发展”的报告,指出:“自1946年苏联干扰美国之音西班牙广播以来,到1949年4月,已成为一场世界范围行动,干扰不仅限于位于欧洲的美国之音广播,而且包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美国之音广播。”^③1950年4月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66号文件——《在信息宣传、研究和发展领域支持美国之音》(NSC66),明确

^① 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4页。

^② 林敏华:《美国之音简史:美国之音与美国国家传播战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第25页。

^③ 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5页。

表示要大力支持美国之音,并提出要建立一个专门人才小组来研究和考虑一个方案以对付苏联的干扰。这个小组的主席由国务院委派,其成员包括国防部、联邦通信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及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

国务卿艾奇逊将任务交给了由杜鲁门总统亲自提名的副国务卿詹姆斯·韦布负责。在美国军方智囊“研究和发展委员会”主任劳埃德·贝克纳的建议和推荐下,韦布邀请麻省理工学院的詹姆斯·基利安校长和人文学院的约翰·伯查德共议解决苏联干扰美国之音问题的方案。1950年8月7日,基利安给韦布的信中称,麻省理工学院愿意去研究解决国务院所关心的问题。16日,韦布在给基利安的回信中同意以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为主成立一个专门的项目组(项目代号为“特洛伊计划”),并承诺国务院会非常重视该项目组的组成和研究成果。随着项目的立项和展开,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马里兰大学、华盛顿卡耐基学院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贝尔实验室、柯林斯无线电公司等单位的科学家、工程师、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集中在一起,共同探讨破除苏联干扰的方案。用美国广播学会主席、美国原国际信息咨询委员会主席贾斯廷·米勒的话来说,就是把“美国最优秀的大脑都集中起来,去解决令人烦恼的问题,即如何把事实真相传送到‘铁幕’中去”^①。

1950年12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68/3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再次指出:“因为电台广播现在是唯一能够影响铁幕之内大批听众的媒介,尽管会有干扰,所以迅速建设能够让听众在中短波上收听到广播的中继和播送设施是必要的。为了在关键地区里影响到人口的重要部分,我们将增加广播的语种,以便包含在苏联和中亚流行的方言和土话。”^② NSC68/3号文件对项目组研究的意义再次强调道:“对铁幕的渗透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一组社会和自然科学家已经在着手研究把新闻传入苏维埃世界的每一种可能的方法。这项研究将包括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每一种方案,无论它们看起来如何不可能或毫无意义。包含在任务之中,但决不限于此的

① 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7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19页。

是全面探究所有可能的方式,以便对付苏联对《美国之音》节目的干扰。”^①

1951年2月15日,项目组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长达81页的最高机密报告。根据国务院提出的要把美国的声音穿过铁幕的要求,报告提出了五种可能克服苏联干扰播音的办法:①设立长波和中波波段广播,同时组织力量研究开发大功率长波和中波发射机;②研究开发一种小型、廉价、可以自动搜台定位的收音机,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发;③研究开发宽带通讯转播机,用来克服苏联的电波干扰;④要重新审视国家的电子通讯政策,要协调目前美国之音与欧洲国家广播在波段上的冲突;⑤“电波战”的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目前没有组织起来应付它。^② 根据项目组的建议,美国政府立即着手改进相关技术设备,使美国之音的收听率在1951年4月就由25%提高到50%。^③

简而言之,项目组的方案就是要通过对舆论的传播和控制,创造出一种新的信息交流方式。“冷战——经常被视为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无休止的口水战,在这种绝对的对立中,一种全新而强大的认识论在这些新兴力量的交汇中得以诞生。这种新的知识组织有着名目繁多的、广泛的和全球的影响力。这些组织包括推动了艺术展览、舞蹈表演、交响乐、作家代表大会以及学术会议的众多政府机构和组织,这导致了二战之后和知识文化构造的转变。伴随着这些转而变产生的,是语言表达、复制和再生的新形式和新模式。在所有被广泛使用的大众传播形式中,收音机作为一种集中的传播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作家与其读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收音机的扩张,听众再也不可能直接与作家对话;取而代之的是作家通过麦克风向听众说话。听众再也不听了。而是麦克风在听,收音机喇叭传送着收听不见身影的作家的声音的状态。”^④美国之音恰恰集中代表了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权力。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

② 参见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8~99页。

③ 同上,第101页。

④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页。

不过,美国之音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饱受国内外的批评。1956年10月以后,美国之音针对匈牙利的广播活动愈加频繁。该机构用匈牙利语每天向匈牙利播出总计1小时45分钟的节目——包括从华盛顿播音室播出两个30分钟的节目和从慕尼黑广播中心的播音室播出45分钟的节目,这些节目在24小时内重播两次。尽管美国新闻署声称美国之音对匈牙利事件的报道遵循了“公开的(白色的)”宣传,“代表美国政府的官方声音,所有节目都以事实为依据进行客观新闻报道”,但是在匈牙利事件平息后,这些所谓的“客观新闻报道”受到国内外的严厉指责——它们煽动了匈牙利事件的发生。美国之音开始受到质疑。1957年6月3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以此为由对美国之音提出了整改意见。艾森豪威尔指出:“多年以来我一直强调如果美国之音卷入到宣传领域将会严重损害它的有用性……它应该被人们视作是一个信息的准确发布者。”艾森豪威尔指示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你的一个职责就是向美国新闻署提供政策指导,我希望你就此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一些符合你身份的意见建议。”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出台《美国之音播音目标、内容和腔调的指导文件》。该文件表示:“美国之音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对新闻和政策提供有意义的阐述,美国之音应努力争取实现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没有人说‘它是在进行宣传’。”8月9日,约翰·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递交《美国之音广播政策备忘录》,重点说明了美国新闻署署长要求美国之音更加重视客观报道和可信性,以及要求美国之音呈现的新闻应该是来自美国官方的观点等内容。^①

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之音作为美国进行有组织的政治战的重要地位,于是为了改变美国之音因赤裸裸地反共宣传而招致的恶名,美国总统杰拉尔德·R.福特于1976年7月12日签署了新的《美国之音章程》明确规定:通过无线电广播与全世界人民建立直接沟通渠道,对美国的长远利益是必要的。为了取得成效,作为美国新闻署所属的美国之音必须赢得听众的注意与尊敬。美国之音的广播应遵循以下三条指导原则:第一,美国之音应该始终作为权威的、听众信任的信息来源。美国之音的新闻

^① 参见赵继珂、邓峰:《论匈牙利事件冲击下的美国之音改革》,《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必须准确、客观,并力求全面。第二,美国之音代表整个美国社会,而不代表美国社会中某一个阶层。因此,美国之音在介绍美国制度和思想时,应该做到内容广泛,报道全面。第三,美国之音应清楚地、有效地阐明美国政策,同时也报道对这些政策所发表的认真负责的意见和评论。

尽管作了相应的修正,但仍然没有改变美国之音作为美国对外传播意识形态价值的政治本色。事实上,美国国会严禁美国之音进行国内广播。根据1948年1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的“史密斯—蒙特议案”(《美国信息与教育交流法案》)第501款,明确禁止美国之音等国营媒体对美国国内广播。美国国会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法律,是要确保美国政府不会把某个媒体作为喉舌,向国内公众进行宣传。

1981年1月,里根政府一上台就扬言要使美国之音成为砸开铁幕的工具。美国之音副台长尼古拉德斯透露给《华盛顿邮报》的一份备忘录明确指出:“我们应当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进他们的人民和政府间的摩擦”;“我们要尽量在共产主义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进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相互猜疑”;“我们应当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活”。国务卿舒尔茨也强调要加强国际广播,使之成为“共产党国家的替代性的自由新闻”,从道义上满足那些共产党国家中“谋求和平改革的人士和组织”向美国“求援的要求”,“帮助他们进行争取自由的斗争”。^①可以说,在全球冷战中,美国之音的作用“不是在搞广播,而是在干革命”^②。

2. 自由欧洲电台:灰色和黑色的宣传

宣传战是心理战的主要形式。1950年7月1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4号文件——《国家心理战计划》(NSC74)将宣传战定义为:“任何通过新闻、特别论据或呼吁传播信息或一种教义的有组织的努力或运动,其目的在于影响某些群体的思想和行动。”^③NSC74号文件把宣传战分为三种类型:

① 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40~342页。

② 转引自时殷弘:《从激变战略到解放战略》,《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③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9页。

“公开的(白色的)”“隐蔽的(黑色的)”和“灰色的”。“公开的(白色的)”宣传战是指公开表明和确认来源的活动;“隐蔽的(黑色的)”宣传战是指其真实来源被掩盖了的,并且看起来像来自于除其真实来源之外的其他地方的活动;“灰色的”宣传战是指避免确定来源的活动。

对美国政府来说,为了避免与苏联引发公开的对抗冲突,除了代表官方意见的美国之音用来进行“白色宣传”外,其他的表面上表现为非官方的电台则专门用来进行“黑色宣传”和“灰色宣传”。因此,“灰色宣传”和“黑色宣传”往往被纳入情报工作的范围之内,成为中央情报局在意识形态政治战中的主要工作。在宣传实践中,“黑色宣传”完全是捏造消息和来源,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假消息”。“灰色宣传”则更具有欺骗性,它往往是通过伪装的行为者来推进本国政府的政策。例如,一个国家政府的情报部门,通过收买或诱导一个外国报纸编辑或专栏作家,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与收买者政府政策相一致的观点见解,这就是“灰色宣传”。^① 1950年12月8日颁布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3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就明确强调:“必须考虑到官方的公开宣传搞得不好很快会弄巧成拙。即便是最友好的政府和人民也不会欢迎或长期支持带有美国政府标志的新闻材料和人员蜂拥而至。因此,基本的考虑是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由本地的人员和本地的组织制作与传播新闻材料以及实施新闻活动。这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人员,向包括政府在内的本地组织提供设备和材料,鼓励并支持两国或多国的本地机构。它涉及在新闻活动上与想法类似的各国政府、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地区性组织、联合国展开全面合作并对它们予以支持。”^②正如美国驻西德指挥官卢修斯·克莱将军所说:“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不同于美国之音的电台,一个自由人民的电台,一个可以向铁幕背后每个国家进行广播的电台。它将用铁幕背后每个国家自己的语言进行广播,并由那些因

^① 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20页。

信仰自由而流亡在外的领导人亲自播音。”^①

1949年5月11日,在艾伦·杜勒斯的主持下,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Free Europe)在美国纽约登记注册。由原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担任主席。参加该组织的多为美国政府、军队、企业界、媒体、劳工组织的权势人物。比如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等。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名为民间组织,但实际上却为美国的对苏战略服务。其组织宗旨就是“利用逃亡的东欧人多种多样的来历来开展各种项目,以此积极地与苏联的统治地位作斗争”。时为杜鲁门政府国务卿的艾奇逊就公开宣称:“国务院对于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感到非常高兴。国务院认为这个组织的宗旨非常好,欢迎它加入这个行列并予以全力的支持。”美国国务院对委员会公开表示祝贺,“其用意就是掩盖它的官方背景,同时也掩饰它完全是在中央情报局的操纵下运作的事实”。在杜勒斯于1950年12月进入中央情报局后,他就成为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不挂衔的后台老板”。^②

在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指挥下,自由欧洲全国委员会很快就在慕尼黑建立了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总部,并制订了关于广播的指导性政策文件——《第1号政策指导备忘录》。1950年9月21日的备忘录明确指出:“自由欧洲电台的目标是阻止、或至少妨碍东欧国家在精神、经济和军事上融入苏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采取一切可行的宣传手段,尽可能把听过我们宣传的那些国家的人民吸引过来,破除苏联和该国共产党的影响”。备忘录把东欧国家的听众分为7类,即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军人、宗教人员、公务员、企业家,并列举了对他们进行广播的主要问题,即“解放”——使铁幕后的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这是“任何有效的长期宣传计划中最主要的问题”;“解放”后做什么——“在没有任何外部干涉的情况下自由地成立自己选择的政府”;宣传“美国的榜样”;揭露苏联“毫不掩饰地谋求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②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43页。

统治世界的目标”等等。1951年11月,自由欧洲电台在其制订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政策指南》中再次强调其目的是:“通过维持其士气,激励他们与统治着他们的、受苏联支配的政府的不合作精神,解放铁幕背后被奴役的民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欧洲电台要始终不断地提醒听众:“他们正被外国代理人统治着,其目的不是促进国家利益,而是执行着苏联统治者的帝国主义目标”;“要揭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道德和精神的空洞性,以及作为一种为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体面生活标准的统治制度,其物质上的无能”;“要通过令人信服地展示西方技术、资源和军事力量的优势,通过不断重申西方要使我们听众获得自由的保证,向他们反复灌输最终解放的希望”;“要通过揭露其官员的愚笨无能在东欧各国中挑拨离间,通过谴责存在的压迫和残暴行径,并用将受到惩罚相胁,使政府官员提心吊胆,坐卧不宁”。^①

在上述两个政策指南的指导下,自由欧洲电台对东欧各国开展了猛烈而持久的心理战和宣传战。1950年5月1日,自由欧洲电台开始试播,7月4日,开始对捷克斯洛伐克广播,7月14日对罗马尼亚广播,8月4日对匈牙利、波兰广播,8月11日对保加利亚广播,1951年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广播。自由欧洲电台每天用各种语言对东欧国家进行几乎不间断广播:“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每天的播音时间为21小时45分钟,波兰语每天播音时间为19小时45分钟,匈牙利语为19小时15分钟,罗马尼亚语为13小时45分钟,保加利亚语为9小时。”^②

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主要是通过宣传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或真假相糅、无限夸张的材料,诋毁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挑拨苏联东欧国家的党群关系和社会矛盾,鼓动人们起来造反以“从极权统治的暴政下解放出来”。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战在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中达到了顶峰。

1956年10月以来,匈牙利发生了一连串的游行示威活动,进而发展成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② 刘洪潮:《西方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策略、手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9页。

为广泛性的社会骚乱,对共产党政权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自由欧洲电台乘机大肆宣扬匈牙利事件,鼓动匈牙利人民起来反抗,以推翻共产党政府。10月24日,自由欧洲电台在《致起义工人》的广播中呼吁:“在匈牙利骚乱中唯一要坚持的是:匈牙利人民决心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革命成果”。10月27日,自由欧洲电台以“贝尔上校”为名在广播中建议匈牙利地方机构要尽一切努力确保当地储存的武器弹药等不要落入苏联或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军队手中,必须使国民军队能够获得这些武器装备。10月28日,自由欧洲电台继续以“贝尔上校”为名在广播中就如何开展游击战、设置障碍、对付装甲车等问题给匈牙利人,特别是青年人以详细指导,并再次鼓吹:“谁拥有武器谁就掌握了权力。为此我们重复了一百遍,并将继续重复一百遍:胜利的人们应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的权力。”^①在11月4日的广播中,自由欧洲电台宣称匈牙利事件已经“引起华盛顿的严重担忧,美国可能被迫干涉”,要求匈牙利人坚持下去。事实上,在整个匈牙利事件期间,美国为了避免和苏联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始终无意于武力干涉,自由欧洲电台发送的这种错误信息,徒增匈牙利人的无谓牺牲。1998年11月7日,一位曾参加过匈牙利起义的人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愤懑地说:“自由欧洲电台讲再坚持三个星期,三个多星期后,我们就来了,我们来帮助你们。因此我们一直坚持战斗,直至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但发生了什么——他们对我们撒谎。谁也没有来。”^②自由欧洲电台的煽动性广播也给匈牙利社会制造了潜在的分裂。1956年11月9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每天都在号召推翻匈牙利政权,“它们做的如此过火以至于反叛领袖们都不喜欢这些广播”^③。

尽管受到不少的指责,但是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政治攻势仍然在冷战中取得了相当的效果。1977年被迫流亡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安德烈·阿莫尔里克就说:“外国的广播对俄罗斯产生了巨大作用。对于数百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0页。

② 同上,第151页。

③ 赵继珂、邓峰:《论匈牙利事件冲击下的美国之音改革》,《安徽史学》,2013年第6期。

万苏联老百姓来说,这是他们获取信息的唯一方式。两个原因导致了广播作用的持续强化。其一,是物质因素,苏联国内收音机的数量不断增长。其二,是苏联国内反政府活动的持续发展,以及这些活动的广播传播。”^①

三、文化政治化:文化自由代表大会

事实上,在“灰色”和“黑色”的宣传活动中,中央情报局实际上“是在起着—个文化部的作用”,精心乔装打扮着“适合”人们需要的文化生活。“中央情报局极力把文化变成冷战武器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官方’团体或‘朋友’有系统地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网络,形成一支非官方的联合部队。这就是慈善性质的基金会、公司企业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创造性的联合。这些机构和个人与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提供掩护,并为该局在西欧的秘密活动提供经费来源的渠道。此外还可以依靠这些‘朋友’在国内外为美国政府的利益讲话,但是又表现得他们讲这些话纯粹出于自发。这些个人和机构保持着‘非官方的’身份,实际上却是中央情报局委任的从事冷战风险投资的资本家。”^②在冷战前期,作为冷战期间美国政府资助的最有影响的文化机构之一,由中央情报局幕后操纵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从事着“非官方”的文化政治战。“在冷战高潮中,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在西欧执行一次秘密的文化宣传计划,其目的就是‘无中生有’。这项计划是美国的情报间谍机构中央情报局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执行的。执行这项计划的主体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③正是通过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中央情报局才得以“从根本上管理和控制冷战的各种话语”^④。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②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42页。

③ 同上,前言第1页。

④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9页。

1.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文化的塑造

为了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张,必须更好地组织起欧洲和美国知识界的自由力量。这是因为,“苏联在利用文化作为政治攻心战的工具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在冷战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他们把文化作为政治工具的主要形式,曾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由于苏联缺乏美国那样的雄厚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它又不具备核力量,于是斯大林政权就集中力量,要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打一个胜仗”^①。

1947年12月7日,梅尔文·拉斯基在给美国驻柏林军事指挥官卢修斯·克莱将军的信中,表达了要从根本上改造美国的宣传工作的要求。他说:“和平与国际合作蒙住了我们的双眼,使我们看不到一场蓄谋的反美政治战已经准备就绪并正在进行中,最活跃的场所莫过于德国了。”他警告说:“冷战的主体就在文化领域,这一点千万不要搞错。在这个领域里,美国有一个重大的漏洞,美国外交政策的敌人正在利用这个漏洞大捞好处……这个漏洞……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②在克莱将军的支持下,由拉斯基担任主编的《月份》杂志在1948年10月1日正式出版。这份刊物的信念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能够把战后世界从自我消亡中拯救出来。因此,其宗旨就是要在德国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通过“对美国的对德政策和对欧洲政策总体目标的支持”,为美国外交政策利益打开一条顺畅的通道。《月份》的经费先是来自马歇尔计划的“秘密经费”,后来则取自中央情报局的金库,再后来又用福特基金会的钱,最后又回到由中央情报局资助。“仅从其经费来源看,这本刊物纯粹是美国的文化领域冷战战略的产物,而且堪称典型。”^③

然而仅仅有《月份》这样的杂志显然是不够的。为了组织起更多、更大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央情报局开始积极活动起来。1948年6月18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3页。

^② 同上,第27~28页。

^③ 同上,第29页。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10/2号(NSC10/2)文件指出,由于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已经开始执行一项进行“恶毒的”秘密行动计划,旨在“诋毁并击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目标和行动”,因此批准美国政府进行范围极其广泛的秘密行动:宣传,经济战,包括破坏、反破坏、拆台等直接预防行动;颠覆敌对国家的政权,其中包括援助地下反抗运动、游击队和难民解放组织等。根据NSC10/2指令,中央情报局建立了“政策协调处”开展秘密行动,负责人是弗兰克·威斯纳。迈克尔·乔斯尔森成为政策协调处在德国招募的首批人员中的一员。

1950年6月26日,在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操纵下,来自美国和欧洲的100多名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柏林英占区泰坦尼亚宫参加成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集会。之所以选择柏林作为召集地,其原因就在于此时的柏林已经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柏林被分割为4个占领区,整个城市则被苏联占领的领土所包围,就像一只乌鸦被困在巢中似的。从此柏林成了‘冷战痛楚的象征’。表面上,这4个占领国是在盟军指挥部里同心协力使德国非纳粹化,并‘重新为其确定发展方向’,实际上这4个大国是在惨淡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①时任柏林市长的厄恩斯特·路透在开幕词中就强调了这次柏林大会的重大意义:“自由这个词似乎已经失去了它强大的威力,但对于认识到它的价值而又失去了自由的人来说仍然有着不可比拟的意义。”^②

经过4天的激烈讨论,会议于6月29日结束并通过了影响深远的14点文化代表大会自由宣言。自由宣言说:

1. 我们认为,文化自由不言而喻乃人不可剥夺的一项权利。
2. 这种自由的内容首先是指人有坚持和发表自己见解,尤其是坚持和发表与其统治者不同的见解的权利。人若被剥夺了说“不”的权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5页。

^② 同上,第82页。

利，人就成了奴隶。

3. 自由与和平是不可分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政权的统治下，居压倒多数的平民百姓惧怕战争，反对战争。当政府压制民主代议制，拒不给予大多数人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手段时，战争的危險就加剧了。

唯有各国政府接受被统治者的监督和控制，并同意将所有与战争危險有关的问题及时提交国际权威代表机构并遵守该机构的决定，和平才得以维持。

4. 我们认为，当前世界不安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执行侈谈和平却拒不接受双重监督的政策。历史经验证明，以任何借口甚至以和平为借口，也可以筹备乃至发动一场战争。争取和平的运动若没有维持和平的行动作后盾，就如同为不正当目的而发行伪币。只有杜绝这种做法，才能恢复理智与确保安全。

5. 自由是建立在容纳不同见解的基础之上的。宽容的原则必然不允许采取偏狭的做法。

6. 任何政治哲学或经济理论无权声称是抽象自由的唯一表述。我们认为各种理论的价值要根据在实践中赋予个人多大程度实际自由来判断。

同样，我们认为任何种族、民族、阶级或宗教无权声称是自由思想的唯一代言人，也无权以任何最高理想或崇高目标的名义，拒不给予任何集团或教派以自由。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社会对历史做出的贡献，要根据这个社会的成员实际享有自由的程度和质量来判断。

7.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从社会的实际或假想利益出发，对个人的自由加以限制。我们认为此种限制应仅限于明确说明的行为，使之减少到最低程度，并应把这些限制视为临时性的，是属于个人作出牺牲的有限的权宜办法，与此同时，限制自由的措施本身应可随意批评和接受民主监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性地保证限制个人自由的紧急措施不会蜕变为长期的专制。

8. 在极权主义国家，对自由的限制不再为了也不被公众理解为要

求个人作出牺牲,恰恰相反被视为代表着进步,代表着一种优越文明的成就。我们认为这些政权的理论和实践违反了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与全人类的基本愿望背道而驰的。

9. 我们认为这些政权危险性更大,因为它们采取的强制手段是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有的专制政权所不及的。极权国家的公民不仅仅被规定和强制遵守刑法,而且被迫使其所有的思想与行动符合规定的模式。公民会被扣上“人民的敌人”或“社会不可靠分子”之类泛泛的罪名而受到迫害或指责。

10. 我们认为,只有人类依然被分成“拥有自由”和“没有自由”两类,世界就会不稳定。维护现有的自由,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以及形成新的自由,是同一斗争的奋斗内容。

11. 我们认为,极权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文明史中人类需要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

12. 我们认为,面对此种挑战而无动于衷或不偏不倚就等于背叛人类,就等于放弃自由思想。我们对此挑战的回答将决定子孙后代的命运。

13. 在今天捍卫思想自由还有一项明确的义务,这就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提出新的富有建设性的解决办法。

14. 我们向决心重新获得已丧失的自由和决心维护和扩大正享有的自由的一切人发表本宣言。^①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成立让美国政府深感满意。对中央情报局政策协调处的负责人弗兰克·威斯纳而言,现在中央情报局的宣传资产清单又增加了可以依赖的渠道。威斯纳授权中央情报局特工迈克尔·乔斯尔森负责经营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为了给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工作基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国际委员会于1950年11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开会,准备正式通过自由宣言并确定基本的组织架构:设

^① [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等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263~265页。

立由 25 人组成的国际委员会,设 5 名荣誉主席^①。其活动接受由 5 名成员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的指导^②,这 5 名执行委员分别是常务主任、编辑主任、研究主任、巴黎主任和柏林局主任,他们又都受秘书长的制约。在乔斯尔森的支持和力荐下,尼古拉斯·纳勃科夫当选为秘书长。尽管乔斯尔森在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里扮演了不起眼的角色——行政秘书—执委会秘书—执行秘书,但是他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秘书处朝气蓬勃的中心人物是迈克尔·乔斯尔森,他先是担任行政秘书,后是执委会秘书,最后担任执行秘书,此后的 17 年,文化自由同盟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③事实上,“乔斯尔森堪称世界性的无名英雄之一。他满怀激情忘我地开展对欧洲知识分子的工作”^④。

布鲁塞尔会议确定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组织结构,其实就是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组织结构的翻版。有人评价说:“中央情报局建立的这些文化基金会就像共产党的影子机构,包括其核心是保密的。它们之间实在是没有什么两样。”事实上也是如此。新任的秘书长尼古拉斯·纳勃科夫说:“在现代西方世界,还不曾有这样的组织,更没有过这样的范例。以往还没有人试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把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动员起来进行一场反对思想压迫的意识形态战争,或者用一个陈腐的说法,进行一场保卫‘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战争。到目前为止,这类的意识形态战争一直是斯大林分子和纳粹的专有领地……要领导一场理性而冷静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战,又不堕入摩尼教式的假充正直的陷阱,这一点看来对我十分重要,在美国国内正在达到歇斯底里和十字军式的偏执狂程度时,尤其如此。”^⑤在纳勃科夫看来,

① 注:5 位名誉主席是: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意大利哲学本尼德多·克罗齐、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贾斯帕。

② 注:5 位执行委员分别是:欧文·布朗、阿瑟·凯斯特勒、戴维·罗塞特、卡洛·施密德和伊尼亚齐奥·西洛尼。

③ [澳]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等译,东方出版社,1993 年,第 43 页。

④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年,第 117 页。

⑤ 同上,第 107~108 页。

代表大会的领导机构就是“我们的政治局”^①。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成立以后,为了维持正常的工作运转和实现雄心勃勃的计划,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要确保获得固定的资金来源。在柏林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其活动经费来自于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但从柏林会议到布鲁塞尔会议期间,其经费主要来源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资助。欧文·布朗作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在欧洲的代表,负责与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资金来往。随着冷战形势的迅速发展,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经常性开支最终还是由中央情报局定期支付。中央情报局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马歇尔计划中的秘密经费。马歇尔计划建议,为了使资金发挥成倍的作用,每个接受马歇尔计划的国家都应当将一笔与该计划提供的外援资金数目相等的资金存入中央银行,作为对应资金。根据接受国与美国之间签订的双边协议,美国允许这些资金由两国共同使用,这笔资金的绝大部分(95%)留为该国合法的财产,而这笔存款的5%成为美国政府的资产。这些对应资金大约有2亿美元,属秘密经费,进入了中央情报局的腰包,作为冷战之用。在秘密经费的总数中,大约有20万美元(相当于1999年的150万美元)用于1951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行政基本开支。^②

不过,随着文化自由代表大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同时为了避免暴露中央情报局是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幕后老板”,中央情报局决定通过基金会的方式来掩盖对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资金支持。

1952年12月30日,法菲尔德基金会正式登记注册,成为一个“非营利性的”法人组织。该基金会宣称:“基金会是由一些美国个人组建成立的。这些人致力于维护自由世界的文化传统,并鼓励不断扩大艺术、文学和科学领域的交流。为此目的,基金会向一切介绍和宣传最新文化成果的团体和机构以及一切致力于文学、艺术和科学事业的团体提供资助,从而可能对文化的进步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基金会为一切机构提供帮助,只有这些机构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96页。

^② 参见[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13~114页。

进行的项目有助于加强世界各国间的文化关系,并向具有同样自由文化传统的各国人民揭示极权主义对思想和文化进步所具有的固有威胁。”^①基金会的第一任会长是朱利叶斯·弗莱希曼,一个被乔斯尔森称为“美国支持世界文化事业的梅塞纳斯”。事实上,弗莱希曼是中央情报局一名最重要的外国人员。成立基金会只不过是為了掩盖作为秘密行动“幕后老板”的中央情报局而已。“法菲尔德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基金会,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基金会。我们利用各种基金会的名义做许多事,这个基金会只是空中楼阁,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会到纽约去找某位知名的富豪,对他说‘我们想成立一个基金会’,我们会告诉他我们打算做什么,但要求他保密,他就会说,‘我当然愿意效力’。然后我们就去印信纸,笺头上署上他的名字,于是一个基金会就成立了。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小事。”^②

事实上,不仅是通过空头的基金会提供秘密经费,而且也通过货真价实的基金会,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等基金会,为秘密经费提供“最好的也是最不令人怀疑的资助掩护机构”^③。据美国国会调查报告显示:1963—1966年期间,共有164个基金会为多达700个项目提供了10000美元以上的资助,其中至少有108个基金会的资金部分或全部来自于中央情报局,更重要的是,这164个基金会在这个时期资助的国际活动,几乎有二分之一用的是中央情报局的资金。事实上,为中央情报局“输送”资金提供方便的有170多个基金会,包括霍布利泽尔基金会、利陶尔基金会、普赖斯基金、拉布慈善基金会、弗农基金,等等。

1964年8月,在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主持下,美国国会对美国私人基金会的免税资格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发现的一个漏洞证实了有8家基金会是中央情报局的出面机构。它们是:戈萨姆基金会、密歇根基金、普赖斯基金、埃德塞尔基金、安德鲁·汉密尔顿基金、博登信托基金、比肯基金和肯菲尔德基金。调查揭露了这些基金会实际上只是一个“邮件地址”,除了这个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38页。

② 同上,第139页。

③ 同上,第149页。

地址以外什么都没有；建立这些基金会的目的就是让中央情报局把钱汇入，然后以完全合法的方式转移到别处去。在资金汇入这个“邮件地址”后，就有了“第二次转手”或“经手汇出”：这个出面机构把一笔“捐款”赠予一个进行合法活动的著名基金会，这些著名基金会就把这些“赠款”列入其年度990-A表，提交国内税务局备案。所有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机构都必须呈送这种表格。“第三次转手”是这样的：由中央情报局指定一个接受赠款单位，合法的基金会就把相应数额的赠款提供给这个机构。1964年9月，纽约的左派周刊《国家》就问道：“中央情报局为伦敦的，也有纽约的杂志提供经费，而这些杂志还标榜为‘反映舆论的刊物’，而且同独立的杂志竞争，能允许中央情报局这样做吗？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杂志为东欧和苏联诗人支付高额稿酬，哪怕是一首小诗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变相的贿赂鼓动他们叛变，这样的做法正当吗？中央情报局间接地出资赞助各种讨论‘文化自由’或类似问题的代表大会、专业大会、群众集会，这是它的‘合法’职能吗？”^①

尽管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由于与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关系而名声大损^②，但是从1950年至1967年间，按照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的指示要求，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后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事处，出版了《邂逅》《论坛》《月份》《证据》等二十多种颇有名声的刊物，举办各种艺术展览，拥有一家提供新闻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服务公司，组织高水平的国际会议，并为音乐家和画家颁奖，为他们提供公演和展览的机会，以此作为对他们的鼓励，其任务就是让西欧的知识分子不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转而从思想倾向上接受有利于“美国方式”的观点。

事实上，借助于美国政府的力量，文化自由代表大会通过遍布全球主要国家的分支机构，在理念和实践上形成了完整而有效的确定全球话语主导权的运作机制。这个机制就是：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与来自法国、阿根廷、英国、日本、德国、黎巴嫩、

^① [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401页。

^② 注：1967年，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更名为“国际文化自由协会”。

印度、澳大利亚、尼日利亚、肯尼亚以及墨西哥的作家建立起隶属关系,它让这些关系以及隶属关系在多种语言的各种杂志上同时呈现,并且在这些杂志之间遥相呼应。它的跨国行为引入了一整套不同的联盟关系,这种联盟关系有效地重新整接合了一个历史上独特的世界文学的思想。因此,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管理、经营以及维持的过程也标志着知识与人文实践的一个明确的历史阶段。但与此同时,表面上,世界作家们的理念似乎将要经历一个重大的动荡,这部分是跨国政治和文化杂志扩张的结果:《证据》《当前时刻》《邂逅》《月份》《笔记》以及其他已经提及的杂志。这些杂志用所有的欧洲语言共同使一批作家、知识分子和批评家被人们认识,他们似乎代表了他们民族传统中最优秀的当代思想。他们的出现以及一再出现,标志了文学与文化生产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的各个机构不仅通过简单重复和翻译其作品而使这些作家神圣化,它们还用多种语言创建以及规律性地重建作家之间的隶属关系,并将其他作家纳入进来,从而使那些在各地杂志上发表和重印文章的作家获得了相关的权威性。^①

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资助出版的主要刊物

序号	刊物名称	刊物主编	出版时间	出版地	社会影响
1	《月份》	梅尔文·拉斯基	1948年	柏林	面向联邦德国后期和西柏林德国民众的读物。
2	《证据》	弗朗索瓦·邦迪	1951年	巴黎	当之无愧地称为代表大会的机关刊物,充当它的喉舌。
3	《当代》	伊格拉齐奥·西洛尼	1951年	罗马	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叛离分子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园地。
4	《二十世纪》	乔治·里奇海姆	1951年	伦敦	
5	《邂逅》	史蒂芬·斯彭德	1953年	伦敦	代表美国利益的一匹“特洛伊木马”。
6	《纪实》	朱利安·戈尔金	1953年	巴黎	

^①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88页。

续表

序号	刊物名称	刊物主编	出版时间	出版地	社会影响
7	《科学与自由》	迈克尔·波拉尼	1953年	汉堡	
8	《苏联研究》	沃尔特·拉克尔	1955年	伦敦	
9	《探索》	尼斯姆·伊齐基尔	1955年	加尔各答	
10	《四分仪》	詹姆斯·麦考利	1956年	悉尼	向澳大利亚介绍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作家和思想的橱窗。
11	《黑色俄耳甫斯神》	尤里·贝厄	1956年	伊巴丹	
12	《自由》	约翰·亨特	1960年	东京	日本亲西方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主要喉舌。
13	《过渡》	拉加·尼吉	1961年	坎帕拉	非洲的文学政治刊物。
14	《对话》	塔菲格·赛义	1962年	贝鲁特	促进阿拉伯和西方世界的融通。

2. 乔治·奥威尔:被塑造的政治艺术形象

于是,“在冷战中,文化堕落了,这种文化生活是经过精心乔装打扮而堕落的”^①。在冷战期间,这种堕落的表现就是美国通过其资助和控制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等文化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了新的意识形态传播的结构。“冷战杂志和机构建立了新的圣化管理体制——一种文学与文化的秩序,以此使某些作家如同世界作家那样,在一个新的国际文学体制中变得特别易于辨认。传播的新技术将作者与读者都置于完全不同的流通秩序之中。整个意识形态和世界文学的模式在冷战期间经历了决定性的历史转型。”^②

乔治·奥威尔^③及其著作《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的命运就是在这种新的文学模式转移中被赋予了深刻的政治意象。“也许帝国时代的晚期没

①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13页。

②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子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7页。

③ 注:乔治·奥威尔原名为艾里克·阿瑟·布莱尔,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有哪位英国作家像乔治·奥威尔一样,对随后几代的文学与政治意识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①在《动物庄园》(1945年)和《一九八四》(1949年)这两本书中,奥威尔定义和构建了西方对极权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概念。凯南就曾断言,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对极权主义的描述,在某种程度上比他这位前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所了解的现实更能代表苏联的生活。“由奥威尔……创作的虚构和象征性的形象”,凯南写道,“我从骨子里知道”,它比苏联图片更充分地代表了极权主义。^②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的开篇写道:

走廊弥漫着一股气味,像是煮过的圆白菜跟用很久的脚踏垫。走廊的一头有张彩色大海报,看起来不像室内装潢展示,用大头钉钉在墙上。海报上只有一张巨大的人脸,超过一米宽,是个年约四十五岁的男人,留着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长相粗犷而潇洒。温斯顿走向楼梯,没必要去试电梯能不能动,因为就算是情况好的时候,电梯也很少能动,而且现在白天电力都被切断了,这是为了准备憎恨周而实施节电措施。温斯顿住在八楼,他今年三十九岁,只是在脚踝上有静脉曲张性溃疡,所以他只能慢慢爬,中途还得停下来休息好几次。每爬上一楼,总瞧见电梯对面贴着那张巨大人脸的海报,八字胡男人就从墙上盯着你看,这张海报制作得很巧妙,不论往哪移动,眼睛都会跟着你。底下的文字写着:

老大哥在看着你

屋子里传来一个圆润的声音,念出一长串的数字,好像跟生铁制造有关。声音来自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牌子,就像是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占据右面墙上的一块地方。温斯顿扭了某个开关,声音变低了一点,但内容还是听得很清楚,这项设备称为电屏,可以转小声,但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户边,看到自己矮小瘦弱的身形,穿着蓝色连身工作服更显得骨瘦如柴,但这是党制服,一定得穿。他的头发很柔顺,脸上泛

① [美]安德鲁·N·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子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7页。

② 同上,第37~38页。

着自然的血色,不过由于长年使用质量不良有肥皂、钝钝的刮胡刀,再加上寒冷的冬天刚刚结束,他的皮肤变得很粗糙。

即使是透过紧闭的窗玻璃看,外面的世界看起来还是好冷。楼下的街道上刮起一阵风,卷起了灰尘和碎纸片,虽然艳阳高照,天空蓝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一切事物却似乎都失去了色彩,只剩下随处可见的海报,每个视野最佳的地方都能看见那张大胡子脸,居高临下盯着每个人。他家门口正对面就有一张,上面写着: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对漆黑的眼睛跟温斯顿的四目交接。底下的街道旁也贴了一张海报,被人撕去一角,风一吹过便不停翻动,“英社党”这几个字不时就会显露出来。在很远的地方,直升机掠过屋顶,像只青蝇一样盘旋了一会儿,突然一个转弯就飞走了。那是警方在巡逻,从窗户窥探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不过巡逻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不断传来碎碎念的声音,还在讲生铁的事情,以及第九次三年计划的圆满大成功。电屏发送讯息的同时也在接收讯号,温斯顿不管发出什么声音,即使是非常低声的悄悄话,电屏都收得到,而且只要温斯顿待在这块金属牌的“视线范围”内,他的一切动作和一切声音都会被看到、听到。当然,你没办法知道自己当下是不是被监控,也不知道思想警察有多久接上某个人家里的电屏,又是怎么监控,只能靠猜的。说不定他们一直都看着每一个人。但不管怎么样,他们什么时候想接上你家的电屏都可以,你日常生活的前提就是有人会听到你发出的每个声音,除非周遭一片黑暗,否则就会有人看到你的每个动作,你就是得这样生活,而且生活也就是如此,已经习惯成自然了。^①

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如噩梦一般的未来,立即引起了英国外交部、美国心理战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关注。它们抓住书中对极权主义危险的考察不放,其实奥威尔痛斥的是一切政权——不管是右的还是左的——对其公民滥用权力。这本小说所指的对象虽然颇为复杂,但其总的

^① [英]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徐立妍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含义还是明确的,那就是声讨政府的一切谎言和诡计。但是对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委员会来说,这一点却是可以忽视的并立即把它确定为针对共产主义,以致一位评论家认为:“且不论奥威尔写书时究竟指的是什么,反正他为冷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惯用的陈词滥调。”^①

很快,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就在《月份》杂志上开始连载。从1949年12月第14期至1950年4月第18期,《月份》分5期刊登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因此使奥威尔成为《月份》杂志的秘密读者最赞赏的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庄园》就尤其在东德大学生和学术圈里成了秘籍,大家都在偷偷地互相传阅。不久之后,“奥威尔创造的词汇在东德被包括异议分子在内的很多人所使用:‘没落人士’‘双重思想’‘思想警察’,还有‘老大哥在监视你!’”^②对于这些读者来说,即使只能读到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响”。东德的异议分子们也被这部作品吸引,还有积极投身政治的读者起初已经认为反抗没有了意义,却又重新找到了反抗的勇气。^③就像原东德居民巴德尔·哈泽在1989年回忆说:“温斯顿·史密斯成了我的文学朋友,就像之前卡尔·麦笔下的温内图一样。我进入他的角色,并且竭力效仿他。奥威尔的书不仅激发了我个人的青春激情,我还从中找到一大幸事,大洋国的社会现象可以同我身边发生的事情类比:像大规模行军、视当权者为偶像般的个人崇拜、对内外敌人的仇恨、为了不被视作异类而必须加入的党组织和国家青年团、存在于所有街角并留着山羊胡的老大哥形象,还有用手掩着嘴开政治玩笑。当时还有国家安全部,对我来说和大洋国思想警察的意义相同。”^④

《一九八四》所引发的强烈的社会效果,以及奥威尔与拉斯基和《月份》

^① [英] 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335页。

^② [德]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5页。

^③ 参见[德]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9页。

^④ [德] 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54~255页。

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他们与美国之间发展一种文化战略，尤其是与美国之音、美国新闻署、国务院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和部门之间发展一种文化战略”。事实上，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包括《邂逅》《证据》《当前时刻》等文化自由代表大会所属刊物以及其他许多杂志纷纷加入到这一新的传播战略中来，从而推动了一种全新的跨大西洋文化形式的发展。1949年11月4日，西莉亚·柯万给美国之音总监查尔斯·塞耶的信中说，英国外交部正在将《一九八四》翻译成意大利语、法语、瑞典语、荷兰语、丹麦语、德语、西班牙语、挪威语、波兰语、乌克兰语、日语等。美国军方也于1949年在韩国出版了《一九八四》的韩语版。1951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安·艾奇逊写道，像《一九八四》这样的作品“因其反共产主义的心理攻势而具有极大的价值”。^①

美国拥有的全球传播能力，使得在情报机构的精心解构下，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里创造出来的一系列词语迅速得到传播，并成为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专有术语”。“他的新词——‘老大哥’‘思想警察’‘官腔’——虽然描述的历史和政治环境与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迥然不同，但这些词语仍然嵌在当代话语中，我们往往很少关注或者讨论文学作品中象征的或者隐藏的东西。”^②美国的全球传播体制在事实上是在重新塑造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并因此而强化了新的认知体制，“正是这一体制将《一九八四》注册在了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无休止的战争框架之内。一种认知的‘变形’，‘极权主义’——就像‘伊斯兰’‘恐怖主义’或者‘西方’一样——‘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辩论风格、一套话语以及令人不安的诸多传播机会’”^③。

① [美]安德鲁·N. 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予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65页。

② 同上，第39页。

③ 同上，第70页。

第四章 对外交往：西方与苏联的社会生活

赫鲁晓夫说：“把人都戴上枷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公正的制度，这叫什么天堂？天堂是人人都想去的。既然人们都想走，还把门锁上，这就不是天堂。假设上帝让我继续工作下去的话，我就会把门统统打开，把门和窗全都敞开。怎么，突然全都走了呢？列宁在内战后还开放苏联边界呢。有些人走了。其中有沙利亚宾、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和其他的名人。后来有的人又回来了，有的一直要求回来。难道全体人民都会走吗？有多少外国人到我们这里来，也不回去……我们为什么要害怕这一切呢？”^①“为什么要害怕这一切呢？”——这是赫鲁晓夫的疑问。然而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西方国家领导人，甚至于赫鲁晓夫本人都是心知肚明：对苏联来说，严密地监视和控制与西方国家的交往是避免被西方国家进行思想渗透和政治颠覆，以维护苏维埃政权的重要手段；对西方国家来说，打破苏联政府在与西方交往中构建起来的“铁幕”，却是其实施遏制战略的必然要求。简而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就是要通过其在传播技术上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破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信息传播隔绝状态，从而达到分化、颠覆其内部的稳定和团结的目的，造成社会对共产主义政权在道义和合法性上的不满。历史发展的事实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言，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就在于“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交流媒介，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73～1174页。

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①。

一、窗内窗外:社会的信息管制

1953年在冷战的漫长历史中具有节点性的意义。在这一年,美国和苏联都送走了充满敌视和仇恨的老一代领导人,迎来了充满希望并期望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在苏联,斯大林的逝世以及马林科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上台,使苏联出现了摆脱斯大林旧时阴影的可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接替了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杜鲁门成为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在战后封冻起来的铁幕上,一扇窗户似乎已经打开。透过这扇微微打开的窗户,从艾森豪威尔的“穿越铁幕”到卡特的“人权外交”,美国成功地打破了苏联政府的信息管制。“总之,通过公共政策和总统声明,积极运用大量广播宣传和中情局在东欧和苏联的秘密传播网,卡特政府向苏联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其决心和力度与前几届政府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挑战持续了卡特的整个任期,他的继任者继承并发展了这一策略。大量接触来自西方的信息对苏联国内危机的爆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我认为,卡特政府的思想宣传和秘密活动在苏联的统治铁幕上留下了微小的裂隙,并最终促成了它的灭亡。”^②

1. 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穿越铁幕”与“解冻”

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确立,使得苏联同西方官方和非官方的联系几近消失。相互的猜忌和敌视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下的“伟大的同盟”趋于瓦解。1947年苏联政府立法禁止涉外婚姻。该年末,苏联修改国家保密法,规定任何个人或团体不经过外交部或外贸部安排不得

^①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潘嘉玢、刘瑞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和外国人交往。苏联的隔绝行动迫使当时的杜鲁门政府不断寻求突破铁幕的办法。

1951年2月15日,由麻省理工学院负责的“特洛伊木马”项目组在向美国国务院递交的最高机密报告中,专门就“与被封闭的地区保持信息联系”提出建议,除无线电广播和气球外,有效的手段还有:经济合作组织、知识分子访问旅行、食品运输、医疗箱、电影、图书馆服务、学生交流计划等。报告特别强调,学生国际交流是将美国的真实影像传达到交流国家的最好办法之一。此外,国际邮传、专业期刊、工业和商业出版物,甚至包括进出口的药品、手电筒、自来水笔和小型收音机也都能成为海外信息交流和心理宣传的手段和工具。^①

就在美国政府想方设法希望通过苏联的开放之门来实现民主价值的传播时,机会来临了。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接掌苏联政权的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提议。1954年春,参加联合国裁军谈判的一位苏联官员“无意间”向美英代表谈道:“苏联未予公布的新决定:鼓励同西方的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苏联,这种松动的意向很快变成具体的行动:广播节目中开始播放西方音乐,展览会上出现了西方造型艺术品,苏联的科学家、艺术家、学者可以到西方国家参加国际会议、演出,西方的新闻记者也可以到苏联旅游、采访,尽管数量有限,但已表明了一种趋向——苏联准备改变斯大林时期对西方的政策。很快,这一政策转变的信号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明确。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停止军备竞赛依然是对于全人类生命攸关的问题,表示“在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②。尽管“冷战”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赫鲁晓夫强调了两个阵营、两种体系的和平共处。在国内启动改革的“解冻”的同时,赫鲁晓夫发出的国际缓和期望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两个阵营间的相互接触以缓和紧张的国际局势并非只是苏联

^① 参见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98页。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2页。

政府的一厢情愿。对于西方世界来说,它们和赫鲁晓夫一样希望能够在接触中尽量消除双方的矛盾和分歧。1953年3月4日,艾森豪威尔接到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报告,报告中说斯大林中风了,据悉已在垂危之中。艾森豪威尔在当天的演说中表达了与苏联新领导人会晤的期盼:“不论政府中掌权的是些什么人,我们美国人的祈祷总归是:愿全能的上帝照顾那个辽阔的国家的人民,并运用他的智慧使他们能有机会在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能和平友好地相处的世界中生活。”^①5月11日,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了召开美、英、法、苏大国首脑峰会的建议。他说:“尽管世界事务陷入动荡混乱之中,我认为各主要大国之间应该毫不拖延地在不久的将来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如果在最高级会议上缺乏赢得最高奖状的决心……那么浩劫临头的责任就落到了目前握有决定权的人们身上。”^②不过,出于对美国国内反共情绪的忧虑,刚刚上台执政的艾森豪威尔还是反对幕僚提出要和苏联立即进行谈判的建议。但是他明确表示支持通过宣传和文化渗透来削弱共产党政权内部支持的长期战略设想。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修改后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NSC162/2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苏联的“新面貌”战略。文件指出,美国的宣传和情报活动,仍将以改变苏联的现行制度,瓦解苏联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为基本目标,为此美国必须“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措施,以便制造和利用对苏联有麻烦的问题,损害它与中国的关系,使之控制卫星国更加困难,同时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增长”。文件要求开发苏联东欧民众的“精神资源”,煽动他们的反政府情绪,“采取公开和秘密的手段诋毁作为苏联力量有效工具的苏联威望和意识形态,削弱各国共产党和各种亲苏分子的力量”。^③

1954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430号文件对美国新闻署的活动作了特别指示。NSC5430号文件指出:“这两个主题在世界范围内的

①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二册),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②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三册),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③ 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一个具体应用就两类基础书籍的汇集，一类是关于民主的（33本，主要表现美国的民主），另一类是关于共产主义的（54本，主题是分析行动和根据事实进行质问）。这两类书籍被送到全世界所有美国新闻署的图书馆。另外，有关民主、共产主义和美国经济系统的三类基础书籍的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这些书籍都表明了美国决心不用多种方法而是用一种统一的方式去实现主题。现在，新闻署发起的任何一个电视故事，任何一篇人物文章，任何照片、展品、电影和广播都是根据当地观念的特征和当地的主要问题设置的，而且与实现主题目标的途径密切相关。”针对苏联，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示，美国新闻署主要传播：①详细表明美国的政策及其和平目标；②传达美国人民对每个苏联人民的同情。在该阶段，审查苏联的以下情况：①斯大林去世一周年；②苏联的农业危机。针对东欧的苏联卫星国，美国新闻署的宣传继续鼓励：①大众对抗苏联集团；②从苏联控制中最终获得解放的信念。特别利用到的情况是：①克林顿委员会对苏联接管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审讯；②从铁蹄下逃跑者的故事；③在自由世界安定下来的逃跑者的数量。^①按照“团结自由世界，以非战争的方式减少共产主义的威胁”“揭露红色殖民主义”的两大主题，美国新闻署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输送地下图书的秘密行动，以挑拨和分化自由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制造和挑动苏联东欧的社会不满。

1955年1月27日，艾森豪威尔批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505/1号文件——《利用苏联和东欧卫星国之弱点》（NSC5505/1）进一步确定了美国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政策目标。NSC5505/1号文件指出：“通过利用不满及其他困境，制造和增强民众和官僚机构对苏联政权的压力，以促进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演变”；“继续坚持反对苏联制度这一基本立场，继续揭露其邪恶，但强调演变而非革命”；“对于有待利用的不满和其他困境，一般不将其根源说成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消除，而应说成如果现政权愿意采取必要的行动就有可能加以纠正”。文件强调：“将这些原则运用于东欧卫星国，适当利用在这些国家里存在的特殊机会来施加巨大的压力，并且削弱使卫星

^① 参见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31～1232页。

国依附于苏联的纽带。”^①与 NSC5505/1 号文件同步出台的还有相关部门制订的“美国意识形态计划”及其行动方针。文件指出：“冷战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包括两种意识形态在政治、社会、经济、道德等领域的原则性冲突。“美国制定意识形态计划的目的是要更有效地表明美国和自由世界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揭露共产主义立场的谬误。”其基本方向是促进苏联东欧人民对美国和西方所信奉的基本原则的“思考、理解、同情和接受”，通过提供信息培育对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反对情绪，为此要“选择最有效的时机和地点”，“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手段和机会并创造新的方法和机会以达到该计划的目的”。文件甚至提出，“美国在海外的所有活动，无论私人的活动还是政府的活动，包括所有教派的宗教活动，都应该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计划相配合”，“美国政府的各种计划也‘应尽可能包括更多的意识形态内容’”。^②

从 1955 年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上述战略的具体化落实就逐步形成“东西方交流”政策。3 月 26 日，美国——非政府临时入境人员的指令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 5508/1 号文件规定，放宽对苏联东欧人民的入境限制，只要这些人的目的是短期访问，而且美国已经对他们有“适当的内部安全戒备”，原则上都可以准许入境。该文件在解释放宽入境限制时特别强调，因为一些访问者必定会被美国的繁荣面貌和科技成就所折服，而且会在回国后把这种见闻告诉亲友。随后，艾森豪威尔又批准另一项促进东西方信息和文化交流的措施：放宽原来对美国邮政部门在国内发行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出版物的各种严厉限制，以便获得在苏联发行美国政府刊物的对等权利。

5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告诉国务卿约翰·杜勒斯，“交流计划和宣传”应当不断增加，“我们不得不更加紧张地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进行了多年的心理战就是对人们心理上进行打击”，是一种“引起铁幕后不满”和赢得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目标支持的手段。约翰·杜勒斯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观点，认为宣传和交流计划能够增加“所谓的解放”东欧和苏联的成功的机会。7 月

① 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82 页。

② 同上，第 183 页。

18日,美、英、法、苏四大国在日内瓦召开峰会。作为唯一的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发言中提出了东西方人员、信息交流应当和德国、欧洲安全、裁军等问题一样,成为会议的议题。但是美国与苏联在这一议题的目标上出现巨大分歧。“苏联方面谈的是定额和限制。我们则赞成思想、文化、演讲、游客、政府和商业团体以及学者自由交流的原则。”^①事实上,双方都知道分歧的根源在哪里。在随后的四国外长会议上,约翰·杜勒斯谴责苏联拒绝西方的建议,而莫洛托夫则反驳说,西方所提议的信息中心实际上是情报活动中心,其目的是“直接反对苏联政府”,而苏联政府绝不可能开放边境任由反苏宣传肆意为之。莫洛托夫还批评西方国家将贸易放在最不重要的地位,并坚持如果贸易关系没有改善,文化联系就不可能改善。结果,四国外长会议未达成任何协议。不过,日内瓦峰会和四国外长会议上的事态表明,不管具体目的如何,双方在促进东西方交流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1956年初,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提交给总统的《东西方交流》的文件中明确阐述了美国致力于推进东西方交流政策所要达到的两大战略目标:“1. 在苏俄内部推动其政权朝最终放弃掠夺性政策、致力于实现俄国人民的愿望而非国际共产主义的全球野心并日益有赖于被统治者的同意而非专制警察权力的方向演变。2. 对于欧洲卫星国,争取使它们朝着独立于莫斯科的方向演变。”约翰·杜勒斯在阐述东方西方交流的具体目标时,特别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样板”任务。这些目标包括:

1. 增进苏联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便他们能够依靠事实而不是共产党编造的谎言作出判断。
2. 给苏联人带去令其感兴趣的观念并向苏联知识分子展示思想自由在美国受到鼓励的情况,从而鼓励思想自由。
3. 使苏联公民看到我们的宪法和法律制度所提供的个人安全的程度,从而促使他们要求更多的个人安全。

^① [美]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第三册),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11页。

4. 鼓励他们要求更多的消费品,让他们认识到自由劳动的成果多么丰富以及他们自己也能够从一个以造福民众而不是控制民众为主要目的政府那里得到多少东西。

5. 助长卫星国家的民族主义,复兴这些民族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并提醒它们,像铁托那样勇敢地采取反抗苏联的政策可以得到巨大好处。^①

6月29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07号文件——《东西方交流的政策阐释》(NSC5607),这份文件阐述了美国政府关于东西方交流的政策。该文件要求政府把东西方文化交流计划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建设性工具”,并指出当时美国政府在东西方交流的方式上“已被证明太过被动和迟钝”。NSC5607号文件力图通过“促进卫星国人民对更大的个人自由、福利和安全的向往来削弱共产党政权”。NSC5607号文件表示,新的政策将寻求促进“美国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欧国家之间的交往”。^②在该文件付诸实施后不久,美苏在10月9日进行谈判并达成一份交换期刊的协议,即双方同意美国每年在苏联发行50000本俄语版的《美国》,苏联在美国发行同样数量的英语版的《苏联》(后来改为《苏联生活》)。

虽然在1956年11月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美苏之间的交流计划有所波折,但是美国政府还是在这次事件中看到了渗透进东欧铁幕的转机。

1957年1月21日,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

整个欧洲大陆也分裂成两半。整个世界也是如此。造成这种分裂的势力就是国际共产主义及其控制的势力。尽管这股势力的目的秘而不宣,但其做法却是世人皆知。它试图永远决定受其奴役的人民的命运。它试图破坏使自由人民团结起来的纽带。而且它还试图占有全世界所有能引起变革的力量,特别是利用饥饿者的需要和被压迫者的希

^① 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85页。

^② 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70~71页。

望,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然而,国际共产主义世界本身已被一股猛烈的力量所动摇:这股力量就是热爱自由的人们准备为自己所热爱的自由献出生命。在他们被束缚的黑夜里,英雄们不可征服的意志像迅疾尖利的闪电避开黑暗。布达佩斯已不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名称;从此之后,它成了人类渴望自由的闪闪发光的新标志。^①

2月28日,约翰·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提议,“为了达到 NSC5607 文件的目标,应当逐步和慎重地重新开始由政府资助的与苏联进行的交流活动”^②。艾森豪威尔同意该意见,并重新开启“交流计划”。10月5日,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和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纽约会晤,集中讨论了放宽东西方交流事实。随后,美国取消了1952年《移民国籍法》中的“指纹”条款,为重新恢复美苏双方有关文化、教育交流协定的谈判扫除了最后的障碍。10月28日,美苏关于文化交流的谈判重新开始。

经过三个月的谈判,双方在1958年1月28日正式签订《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议》。双方同意互相交流广播电视节目、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学生和学者、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农业专家等。该项协议的签订使得自冷战以来美国越过铁幕的阻碍而直接接触苏联和东欧人民成为可能,并为美国两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第一个目标是使来自美国的信息和思想能够直接到达苏联人民那里,打破苏联对关于西方信息的垄断,抵制普遍流行的反美宣传和使苏联人民受到影响的歪曲信息;第二个目标是使美国人,特别是学术团体,更多地了解苏联的制度、文化、人民,同时,使访问美国的苏联人也能吸收一些自由社会的空气,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并不像苏联宣传的那样。”正如美国国会参议员约翰逊所说,这份战后美苏两国间的第一份双边条约标志着“开始的开始”。^③

① 王建华主编:《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267页。

② 于群主编:《新冷战史研究:美国的心理宣传战和情报战》,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71页。

③ 同上,第75页。

2. 卡特—勃列日涅夫：“人权”与《赫尔辛基协议》

从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开始，虽然美国和苏联在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经历了不同的危机和考验，但是对缓和政策的追求已经成为两国的共识。对美国来说，面对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等一系列令政府难堪的事件和国内经济的持续不景气等问题，无论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还是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都迫切需要与苏联达成妥协以赢取恢复力量的时机；对苏联来说，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其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尤其是后者的长期执政生涯，也要求政府在获得西方世界承认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后，努力维持与美国的缓和政策。事实上，在普遍性的核恐惧的威胁下，美苏之间的缓和共识很快就建立起来了。就像美国总统肯尼迪在 1961 年 1 月 20 日发表就职演说时所说：

对那些想与我们作对的国家，我们提出一个要求而不是一项保证：在科学释放出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卷入预谋或意外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当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时，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些军备。

但是，这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都无法从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发展现代武器所需的费用使双方负担过重，致命的原子武器的不断扩散理所当然使双方忧心忡忡，但是，双方却在争着去改变那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双方重新开始——双方都要牢记，礼貌并不意味着怯弱，诚意永远有待于验证。让我们决不要因畏惧而谈判。但我们决不能畏惧谈判。^①

1975 年签订的《赫尔辛基协议》实际上就是美苏两国政府坚持缓和政策

^① 王建华主编：《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 年，第 277～278 页。

的顶峰和标志。始于1969年关于武器谈判的赫尔辛基会议之所以能够在漫长的谈判中,于1975年成为三十五国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的最终结果,关键在于这一时期的美苏两国领导人对冷战的看法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力图在现实主义的实质政治基础之上重新构建超级大国的新型关系。

在勃列日涅夫看来,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他有足够的底气要求西方国家承认苏联的大国领袖地位,而不是像他的前任赫鲁晓夫一样通过叫嚣与恐吓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召开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就成为勃列日涅夫追求苏联安全环境的外交首要目标。于是,“这一个规模庞大、旷日费时的外交程序产生了赫尔辛基协议,这是出自莫斯科根深蒂固的缺乏安全感,以及难以遏制的渴求合理性的心理。即使她建立了庞大的军事体制,也控制了相当多的国家,克里姆林宫却似乎需要不断得到保证。虽然核子兵力强而又强,苏联却要求受她威胁数十年的国家,以及已被她丢进历史尘埃中的国家,给予她可以用以供奉其侵略成果的承诺。因此,欧洲安全会议成为勃列日涅夫的最爱,用以代替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想求而未得的德国和约——换言之,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状加以确认”^①。况且,在苏联看来,美国政府的新领导人尼克松和基辛格与前几届领导人的最大区别就是:少了充满意识形态侵略性的咄咄逼人,多了现实主义的政治考量。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就敏锐地感觉到:“尽管美国的那些敌视同苏联合作的有影响的势力仍很活跃,但华盛顿领导集团内部还是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苏美关系总是绷得这么紧,孕育着引起严重麻烦的危险,甚至武装冲突的威胁,这是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同苏联保持相互关系的可靠基础只能是和平共处,两国都要考虑彼此的安全利益。”^②

更令苏联领导人感到欣慰的是,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从未试图在苏联国内制造麻烦,从未试图质疑苏联的国内政策及政府的合法性。葛罗米柯评价尼克松说:“同尼克松会晤后,通常都使人觉得他倾向于寻求同苏联相互谅解。也应当指出,同总统的各次会晤一般来说,都能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0页。

②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放——葛罗米柯回忆录》(下),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51页。

在解决所讨论的问题方面有某种进展。讨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我不记得尼克松有离开正题去谈论两国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情况。在同我多次谈话中,他从未谈到这一题目。他谈起话来总是像个实用主义者。实际上,他并不掩饰,他不想就问题的理论方面大做文章,他喜欢更接近于实际需要的那种讨论。”^①

尼克松政府之所以接受苏联政府召开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的提议,主要是在苏联议题与欧洲现状的高度吻合性基础上作出的现实主义决策。在1969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尼克松向世界表达了他的意愿:“让我们确立这样的目标:让不知道有和平的地方欢迎和平;让脆弱的和平得到巩固;让暂时的和平变为永恒……对抗的时期过去了,我们正进入谈判的时代。”^②面对勃列日涅夫的提议,尼克松在仔细衡量后便接受了。一方面,这有利于美国从越南脱身。尼克松在他第一次就任总统之前就认为,越南问题与同苏联的缓和是明显地联系在一起。“在越南问题上,尼克松及时看出,在按照他可以接受的条件停止越南战争之前,必须先与苏联搞缓和并和中国达成谅解。缓和是一个长远的目标,而越南问题尽管令人烦恼,却是一个短时期内存在的问题。”^③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总统的尼克松还是身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基辛格都相信,由于受到1971年美国对中国释放的开放含义的刺激,缓和政策也将成为苏联政府的迫切需要。况且,此时的欧洲分裂现状早已在事实上得到了当时冷战双方的默认,美国所要做的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基辛格说:“我们认识到苏联她自己一套截然不同的议程,却仍认为就长期而言有着良好机会。东欧国家的国境线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由战时的同盟国和德国的战时东欧附庸,签订和约给予承认。它又进一步经由勃兰特透过联邦共和国与东欧国家的双边协定所明白确认,而且其他的北约组织民主国家(尤其是法国),也与波兰、苏联等东欧国家分别加以承认。甚至,北约组织全体盟国也主张召开欧洲安全会议;每一次与苏联

^①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放——葛罗米柯回忆录》(下),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58~259页。

^② [美]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上册),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页。

^③ 同上,第8页。

代表开会后,西方领袖就更倾向于接受苏联的议程。”^①

于是,尼克松政府决定把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的召开作为鼓励苏联温和政策的诱因之一。从1972年11月22日开始,33个欧洲国家和美国、加拿大的代表分别在日内瓦和赫尔辛基召开筹备会议。经过各方的艰苦谈判,于1975年草拟了《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赫尔辛基协议》),同时决定在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在赫尔辛基召开高峰会议签署协定。该文件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是核心,或称三个篮子。“一号篮子”和“二号篮子”分别规定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不过,《赫尔辛基协议》最重要的部分是“三号篮子”——“有关人权的第三类条款”。这是西方与会者的“发明”,目的是为了消除一种错误认识——这次会议只是为了再次重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政治和军事的现状。在英国的提议下,“三号篮子”包括了人员和思想的“自由移动”。文件规定:人员接触的指导原则是“促进与会国家人员、机构和组织之间在个人与集体、私人或官方基础上更为自由的活动与接触,并解决由此而产生的人道主义问题”;情报交流是“促进各种情报更为自由和广泛的传播,促进情报领域中的合作和同其他国家的情报交流,改善与会国记者在其他与会国进行工作的条件”;在文化领域“加强相互之间的了解;改善物质条件,促进人员的接触与合作”、教育领域要“继续交流经验,促进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的有关组织、机构和人员之间的接触”。^②

对苏联来说,尽管“三号篮子”的条款让其略感不快,但是《赫尔辛基协议》的签署仍然被勃列日涅夫视为苏联外交的重大胜利。“这份长达一百页、三万余字,由欧洲三十三国首脑以及美国总统和加拿大总理共同签署的协议却并非是一份条约。它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尽管如此,对勃列日涅夫而言,它代表着他作为一名政治家职业生涯的顶峰,代表着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1954年发起的争取欧洲和美国领导人承认二战后中欧和东欧领土边境,尤其是奥得河—尼斯河一线的波兰和民主德国边境合法性努力的巅峰。它同时意味着再次确认德国分立为两个国家的现状,以及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承认,意味着在牺牲东欧邻国的代价下使斯大林所攫取的领土合法

①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0页。

②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733~734页。

化。简而言之,它意味着苏联边界的合法化,苏联的国土安全得到保障,并且确认半个欧洲接受认可他们的生活方式——同时,这样也为美苏缓和建立起来一个不可或缺的框架体系。”^①

与苏联的欣喜相比,对美国来说,《赫尔辛基协议》带来的政治影响却大为不同。尽管福特总统出席会议并签署了最终协议,但是福特的这一举动却被美国国内的反共势力斥责为“历史性地卖国”^②。“东欧流亡者和保守人士普遍认为,这是西方为维持缓和政策而采取的单方面让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有关人权问题的三号篮子只是一个面子工程,是一个毫无结果的文字游戏。”^③不过,从后续的历史发展来看,以《赫尔辛基协议》为代表的缓和政策的最大赢家却是美国。看似毫不引人注目的“三号篮子”很快就发挥其瓦解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的政治效应。“如果说苏联帝国开始瓦解存在一个初始点的话,那就是赫尔辛基会议。”确实,“欧安会的确是一个火种,点燃了反对共产党统治的燎原之火,东欧乃至苏联的无数独立组织决心实施变革。仅仅数月之后,这个火种在波兰引发了大火,不久便在整个苏联帝国内蔓延开来。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结果,所有苏联人更不会想到”。^④事实上,《赫尔辛基协议》造成的反政府活动远远超过了苏联的预期。“通过签署《赫尔辛基协议》,苏联和东欧附庸国不得不允许自己国民和西方国家根据文件精神处理人权和自由移动问题。这进一步刺激了东欧和苏联内部的人员流动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历史进程的改变起到了促进作用。”^⑤正如基辛格观察的那样,“随着情势的发展,东欧国家英勇的改革派利用第三类条款号召同志奋斗,促成国家脱离苏联宰制。捷克的哈维尔和波兰的瓦文萨在国内外运用这些条款,不仅破坏了苏联霸权,也推翻了自己国内的共产党政权,而在自由斗士殿堂里替自己取得一席之地”^⑥。

①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冈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222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2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④ 同上,第56页。

⑤ 同上,第57页。

⑥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01页。

事实上,在福特之后的吉米·卡特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敏锐地观察到了《赫尔辛基协议》关于“人权”条款对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威力。1977年2月18日,中央情报局在向布热津斯基提交的备忘录中,解释了苏联对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特别敏感的原因。这份备忘录说:“最近,苏联通过公开和私下方式就美国人权运动释放的不满信号,说明他们的忧虑比对苏联内部矛盾的担忧还要严重。”备忘录进一步指出,苏联对东欧局势发展更为忧虑,西方对东欧官方行为的批评使原本严重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备忘录补充说:“从1976年年初在东欧开始出现的反政府活动使原本十分严重的东德和波兰问题雪上加霜。苏联认为,这与其国内的反政府行为存在联系,对它是一个挑战,西方试图以此鼓励反政府势力破坏东方的现有秩序。”^①

然而令勃列日涅夫头疼的不仅仅是卡特政府就人权问题向苏联发难带来的政治困扰,更令他忧心的是卡特政府似乎开始放弃缓和政策,转而重新采取杜鲁门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意识形态敌视政策。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1977年1月20日宣誓就职的卡特总统为美国勾勒出一个新方向。与基辛格热衷于追求实力的平衡,或者肯尼迪诉诸强势的实力,抑或杜鲁门对遏制的追求都不同,卡特旨在恢复国民对“一个远古就存在的梦想——对人类自由的梦想”的信心。卡特在就职演说中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怀有无限自豪的理想主义国家,但是我们不允许别人把我们的理想主义误认为是软弱。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绝不能对其他地方的自由的命运漠不关心。我们的道德观使我们明显地偏爱那些同我们一样一贯尊重个人人权的社会。我们并不试图恫吓他人,可是,一个由他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加以支配的世界,不仅有悖情理,而且也是对全人类幸福的一种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②在卡特看来,“当我们在对外政策中非常明确地强调道义和赞成自由、民主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是最强大、最有效能的时候”。但是自杜鲁门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② 王建华主编:《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22页。

任总统以后,往往不是对这种外交政策给予坚决支持。“很长时间,我们未能显示出美国所特有的杰斐逊或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这过程中,我们缺少对付来自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和激发我国人民精神的最有效的办法。由于我们过于强调苏美竞争,所以我们在国际交往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这些国家是否拥护反共路线。有时候,右翼君主和军事独裁者所采取的压制行动,自然而然地并不受到任何批评。显然,我们的任务在于预防他们受到国内任何政治运动的冲击,这种运动可能导致组成更为自由的统治集团。我们的政府不是去促进自由和民主的原则,而似乎相信:如果要同邪恶作斗争,除非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或者像作恶者那样不按规章办事,否则我们就不能有效地与之抗衡。”^①卡特相信,人权问题将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在他看来,“人权不仅仅是要减少立即处决政治犯或虐待政治犯的事,它还包括像我们人权法案中所表述的促进民主原则,包括移民和家庭团圆的权利,防止因种族、性别、宗教或部族的歧视”^②。

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在人权外交的政策转变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着波兰裔身份的布热津斯基对前任政府对苏联的缓和政策持相当严厉的批评态度。在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布热津斯基就决定要以人权为突破口来提升美国对全世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我感到,加强美国的思想意识对世界的影响,以及赋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更多的历史乐观主义,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在前几年中美国对世界的影响大大降低,我相信,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的使者,未来的潮流之所在。”^③布热津斯基认为,卡特总统的人权外交既是一种非常好的地缘政治战略,也是绝妙的理想主义。“对人权问题承担义务反映了卡特自己的宗教信仰以及他在政治上的敏锐性。他笃信人权,在他整个任职期间这一信念是始终如一的。同时我认为他意识到这一问题很得人心,因为这使他和尼克

① [美]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128~129页。

② 同上,第130页。

③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6页。

松及基辛格的政策形成强烈对比。”^①

于是，苏联政府开始感受到卡特政府政策转变带来的强烈不适。葛罗米柯指出，在卡特政府的政策中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军国主义意向，“所追求的目标说到底是为了打破业已形成的东西方军事力量平衡”^②。在葛罗米柯看来，卡特成了威胁和平事业和各国人民自由这一危险观念的“教父”^③。事实上，早在卡特刚刚上台后的1977年3月就批准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在苏联国内进行秘密宣传的活动计划。5月10日，布热津斯基主持召开了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针对苏联的公开和秘密活动提出建议和进行评估。10月26日，特别协调委员会提交的秘密图书计划和发行计划获得批准并上报卡特总统。除了加大图书和期刊秘密渗透的规模外，布热津斯基还非常热衷于利用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1978年6月20日，布热津斯基主持召开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务院发布的有关苏联民族的文件。与此同时，布热津斯基建议卡特总统加强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的支持，以强化和提升对苏联国内民众的广播宣传。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虽然广播不应该用来唆使东方发生起义，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它可以作为一种工具，促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变革。”^④

那么如何评价卡特政府的人权外交对苏联的影响呢？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罗伯特·盖茨指出：“事实上，卡特打破了长期存在的冷战规则。通过人权政策，他成为继杜鲁门之后，美国人眼中第一个直接挑战苏联政府法理基础的总统。苏联人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根本性挑战：他们认为，卡特试图推翻他们的政治制度。卡特放弃了尼克松—基辛格—福特秉承的避免意识形态问题的对苏策略，没有一味安抚国内关注移民问题的公众，而是从一开始便关注苏联国内事务，给萨卡洛写信，然后又

^①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9～60页。

^②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放——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78页。

^③ 同上，第283页。

^④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63页。

公开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苏联人非常清楚卡特的行动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所以对他恨之入骨。”^①

二、外交往来：政治态度的转变

如果说卡特发起的人权外交攻势只是让苏联感到超级大国的尊严受到冒犯和厌烦，“卡特本人直接参加了关于‘人权’问题的挑衅性运动。这个话题像喋喋不休的商业广告一样充斥于他的讲演中。卡特差不多每次同苏联代表会见时，都把谈人权问题几乎看成是自己的义务”^②。那么击败卡特连任梦想的里根则让苏联再次感受到杜鲁门、肯尼迪时期美国的咄咄逼人。对于里根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重新恢复美国的信心，带领美国人民重新走向“美国最伟大的日子”。在1981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典礼演说中，里根庄严宣誓：“我相信，我们这些当代美国人正准备采取无愧于我们自己的行动，准确做确保我们自己和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和自由所必需的事情。随着我们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除旧布新，全世界必将认为我们的实力更为强大。对于那些现在尚未获得自由的人来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③有着“冷战斗士”之称的里根，就是要用非常直率的语言来谈论俄国人以使他们明白：“华盛顿来了一批新人，他们对苏联之所作所为持现实主义的态度，并且也不打算让他们继续为所欲为。”^④

1. 外交老一代：葛罗米柯——苏维埃利益的维护者

作为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首先感受到了来自里根政府的冰冷凉意。“1980年随着里根政府上台，由于华盛顿的过错，苏美关系开始出现了越来越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63～64页。

②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放——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79页。

③ 王建华主编：《美国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精萃》，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④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越紧张的形势。国际政治气候骤然转入寒冷时期。这届政府费了不少力气来破坏它的前任为苏美关系所做的工作。它是这样干的：一会儿攻击这个协议，一会儿攻击那个协议，阉割这些协议的内容，或宣布这些协议无效，就如同对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所做的那样。白宫不断地葬送一个又一个条约，竭力追求一个最小的数值——零。”^①尽管如此，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愿意滑向失控的对抗，而是希望重新回到新的轨道上来。在苏美高级政治交流中断4年之后的1984年9月28日，葛罗米柯实现了与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的首次会晤。事实上，在短暂的安德罗波夫时期之后，契尔年科虽然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在里根政府看来，他们实际上要打交道的却是掌握了苏联外交政策走向的葛罗米柯。根据里根政府的分析：“契尔年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取得像勃列日涅夫，甚至也没有取得像安德罗波夫那样的对苏共或政治局的控制权，他只是其中的一员，并作为这个专制统治集团取得一致意见时的发言人。”里根回忆说：“他们告诉我，契尔年科与安德罗波夫一样，身体不好，也许活不了很久。在他公开露面时，他很少离开稿子讲话。决定苏联对外政策的是安德烈·葛罗米柯，他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另一个老强硬分子。正是根据他的建议，苏联抵制了奥林匹克运动会。”^②

尽管里根和葛罗米柯互不喜欢，但是9月28日的会晤对双方来说却是必要的。在里根的眼里，葛罗米柯就是一位“冷酷的葛罗”——“言辞锋利，态度僵硬，毫无笑容，外表毫无幽默之感，或许他把这种感情隐匿在他那冰冷的目光之后”^③。在会晤中，里根深切地感到葛罗米柯强硬的立场：“葛罗米柯坚信苏联的立场是正确的。我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位坚定的老斯大林分子的信念：共产主义尽管存在很多问题，但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将只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共产主义国家。”^④而对葛罗米柯来说，里根则是典型的西方政客。“里根同他周围的人一样，在会见时表现得很客气。没有听到冷落的

①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忘——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90~291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596~597页。

③ 同上，第598页。

④ 同上，第599页。

语调,尽管实际上可察觉到一种内在的不自然和感情上的二重性,总统的表现更是这样。因为他在过去差不多4年的时间里讲了很多对苏联不友好的话,现在,却又同苏联代表就重大而尖锐的问题进行一次交谈。”^①在葛罗米柯看来,里根关于会晤的企图只不过是其为了马上面临的1984年竞选连任活动的一种策略转变。“当里根面临要通过1984年总统竞选时,美国政府自己就把这种虚假的观念撇在一边。随着竞选的临近,总统及其同僚们猛然醒悟过来,认识到,苏美两大国之间还没有总统直接参与的政治接触,将会对竞选的结果产生不利的影晌。”因此,在决定参加会晤的时候,葛罗米柯表示:“苏联领导人无须改变方针。”^②在会晤时,葛罗米柯告诉里根:“我们的政治哲学的实质在于,一种社会形态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不可避免地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取代。在当前具体情况下,我们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形态将被社会主义形态所取代。我们相信这一点,正如人们相信明天早晨太阳一定要升起一样。”^③葛罗米柯的话让里根认识到,这是一位像“花岗岩一样强硬”^④的苏联外交决策者。

不过,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苏联的外交决策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事实上,1984年访问英国一事所带来的影响让戈尔巴乔夫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葛罗米柯的强硬、固执甚至霸道。戈尔巴乔夫说,在英国之行后,“葛罗米柯对我的态度也出现一些新的嫉妒性的成分”。“安德罗波夫还在世时,为了使葛罗米柯高兴,就让他当上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仿佛是赠送自己的朋友和伙伴一份礼物。当时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有办公室,在斯摩棱斯克广场拥有一座官邸。安德罗波夫身边的人开始议论葛罗米柯对权力的贪婪和巨大的虚荣心。”^⑤甚至于在苏联外交决策方面,葛罗米柯也表现出了他独揽大权的“领地意识”。戈尔巴乔夫说:“在制定外交文件和声明方面,可

① [苏]安·安·葛罗米柯:《永志不放——葛罗米柯回忆录》(下卷),伊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18~319页。

② 同上,第314页。

③ 同上,第315页。

④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599~600页。

⑤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澂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7页。

以清楚地看出两条路线。一条从党中央国际部经过 A. M. 亚历山德罗夫通向契尔年科,另一条是外交部的。第一条路线包括邀请对手进行谈判、寻求协议、放宽限制和改善关系。第二条路线则较强硬,可说是钢筋混凝土一块。葛罗米柯公然向契尔年科施加压力,在同国外代表团会谈时往往打断或不礼貌地纠正契尔年科的话。他明目张胆地对外交领域实行垄断。顺便说一句,我访问英国后他产生不满正是这个原因。”^①戈尔巴乔夫 1984 年的英国之行,英国报刊给予了大量报道。但是苏联国内的媒体却是“有人下令尽可能不予报道”^②。后来在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的提醒下才知道这个人是葛罗米柯。多勃雷宁当时把美国媒体关于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的报道做了详细的摘要后发给了外交部,结果却遭到葛罗米柯的严厉斥责:“你是有经验的政治家、有智慧的外交官和相对成熟的人。你发了两份电报报告一个议会代表团的访问!难道这个很重要吗?”^③

尽管在 1985 年 3 月 11 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是由于葛罗米柯的一锤定音,决定了总书记人选的讨论进程——“葛罗米柯是党的领导人中的元老,不久前,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在政治局的‘老人’中,他是毋庸置疑的首领。他的支持意味着,‘老人们’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推到党内最高职位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事先达成了妥协”^④。但是当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并立志在外交事务上取得新的成功的时候,葛罗米柯当时的妥协的政治支持就必须让位于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戈尔巴乔夫说:“我事实上处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地位之后,便一直不容许外交部的活动不受监督。”^⑤戈尔巴乔夫采取的第一步就是逐步削弱葛罗米柯在外交领域的影响力——更换外交部部长。为什么必须更换外交部部长呢?戈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7~308页。

② [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③ 同上,第272页。

④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3页。

⑤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08页。

尔巴乔夫指出,这是因为需要彻底改革外交政策,“而这显然会触及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为数众多的伙伴:有同盟者,有中立派,也有需要与之共同寻求和解途径的对手。外交部门不进行新老交替,就不可能实现这个领域的迅疾转变。这样的任务,葛罗米柯是无力量担当的”^①。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葛罗米柯的外交思维是典型的苏维埃式思维。或者说,是苏联传统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说:“他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捍卫他认为是国家利益的东西,而首当其冲的是捍卫我们在打败纳粹德国的残酷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作为斯大林的门徒,虽然他是一个诚实而正派的人,但他不太重视外交政策中如人权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不相信这样的抽象命题在政策上或在影响早日与西方达成基本协议的可能性上会成为重要因素。”^②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看来,葛罗米柯不仅代表了“冷战”的政策和时代,而且代表了整个苏联思维的学派,这个学派按自己的逻辑认为,只有将从雅尔塔协定时代即保证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战后原状“冻结”起来,才能保证苏联在世界上的重要价值。由此便挑衅性地拒不接受可能动摇、撼动这个原状和使之模糊化的一切。由此也产生了策略:“拖延”、模拟谈判,顶多同意停止军备竞赛,而不能同意裁减军备,更不用说“不均衡裁军”了。^③

戈尔巴乔夫认为,葛罗米柯在国际上的“不先生”名声使苏联形象不佳,是对贯彻外交新思维的一大障碍。他认为,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要想推动国内改革,首先要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而不能再延续“冷战”的政策了。“按照遵循新政治思维的浪漫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信念(他自然自认为是个脚踏实地的实践家),试图将处于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的苏联的国内局势和周边局势冻结起来,只会导致体制以致国家的历史性崩溃。他相信,只有经过改革之后的苏联,方可在植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价值观念的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34页。

②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50页。

③ 参见[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73页。

基础上‘平起平坐地’与西方世界一争高下,这样的价值观念使得苏联比她的历史性对手更加适应 21 世纪和未来世界。”^①而戈尔巴乔夫与葛罗米柯(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之间在观点上的原则区别,“毕竟不在于对美国人的评价——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用实力的语言还是用新思维的论据说话,而在于对苏联历史前景的估计。在现实主义者葛罗米柯看来,可以保住苏联超级大国地位的‘国王的最后一个论据’、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一张王牌,就是对世界其他各国起威慑作用的潜力”^②。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观察到,葛罗米柯之所以逐渐失去对外交部门的直接领导权,是因为他一贯奉行强硬的外交路线,不“谦让西方”。应该由一个听话的部长来代替他,并借助新部长在国际事务中实行所谓的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种合适人选。”^③

于是,为了贯彻外交“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决定任命新的外交部部长。戈尔巴乔夫向葛罗米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希望他继续保持对外交领导的垄断。戈尔巴乔夫说:“这是我无法接受的。”但是葛罗米柯毕竟“是一位大政治家和外交家,阅历极为丰富,总之,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常常主动与我联系,一再表示愿意精诚合作”。戈尔巴乔夫决定给予葛罗米柯以足够的政治“礼物”来打动这位元老人物放弃对外交领域的垄断。戈尔巴乔夫说:“当时最紧要的事情是安排外交部部长的交替工作,而除了将葛罗米柯推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位外,别无他法。”^④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推荐的职位相当体面,“葛罗米柯很乐意接受,并将其视作对他有功于国的恰当评价”^⑤。在 1985 年 6 月 29 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在建议由葛罗米柯担任国家正式的二号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时说:“让苏共中央总书记把精力集中在党领导社会的问题上……更

①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173 页。

③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 年,第 228 页。

④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333 页。

⑤ 同上,第 334 页。

多地关注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发展问题……是适宜的。为此我提议,选举最老的党员之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仅闻名国内,而且闻名世界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所有这一切符合目前的形势,有利于根据当前的任务最合理地配置力量。”^①

1985年7月2日,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选举葛罗米柯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葛罗米柯的职位调动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在美国看来,葛罗米柯实质上是“名升实降”,这样戈尔巴乔夫就可以接管对外政策。美国官员认为,葛罗米柯的作用将是礼仪性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在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评论葛罗米柯的提升时说:“我认为这是对长期忠实于一个为国大添光彩的职务的奖赏。”有人问到这一行动是否表明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有所丧失时,沃尔特斯说:“不,我认为,戈尔巴乔夫能提名他当主席,能使他同意当主席,能在政治局进行其他人事变动,这说明戈尔巴乔夫正在牢牢地打下权力基础。”^②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明确指出:“这是受尊重然而却是荣誉性的职位,虽然有国家领导人的头衔,但却无权制定政策。”^③

7月4日,法国《世界报》发表评论:“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统治的结束。”评论指出:

希望最近在莫斯科发生的变动导致苏联外交政策的改变,这是轻率的。苏联的外交首脑无论是不是葛罗米柯,将仍然是大国的外交,仍然是服务于同一战略和利益的外交。另外,新的班子还需要一段熟悉和巩固权力的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特别是并不意味着在风格、对待问题的方式和地理重点方面不发生变化。葛罗米柯担任外长长达二十八年之久,这是本世纪中大国的政治家担任同一职务时间最长的。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20页。

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985年7月2日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8页。

在这二十八年中，葛罗米柯把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他个人的能力结合起来了。但他的这种经历也进一步突出了他的缺点：他的顽强变成了固执和毫不妥协，自信变成了傲慢，起初的谨慎变成了自满。在苏联外交部历史的各个阶段，逐渐确立了他的风格和思想。但他的这种风格和思想早已是莫洛托夫的风格和思想。苏联的三代或四代外交官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然而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思想呢？“葛罗米柯系统”的关键思想显然是绝对优先重视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葛罗米柯一贯希望同美国友好，也不是由于他对世界其他地区出现的危机不感兴趣（不过对于他来说，这些危机是在同华盛顿的全球关系中需要处理的附带的问题）。在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整个时期中，葛罗米柯没有访问过撒哈拉以南的任何国家，也没有访问过任何拉丁美洲国家（只有古巴除外）。除了任期创纪录以外，这又是一个使他更为引人注目的创纪录的事实。

葛罗米柯的另一个思想是喜欢外交的传统手法，在处理国家关系时喜欢死扣法律条文，在谈到军备竞赛的原因时喜欢谈军备控制，此外还喜欢宣传手段。他虽然学过经济，但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他几乎不考虑经济方面的问题，在讨论冲突的原因时他也不甚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

现在很清楚的是，随着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统治外交部时期的结束，某些新的思想将会出现。人们还不知道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方面是否有新的主张，但这个格鲁吉亚人很可能会比较重视南方，他很可能主张苏联外交多样化从而带有较多的第三世界主义色彩。谢瓦尔德纳泽还将更巧妙地处理同发达世界的关系。葛罗米柯很善于一有机会就讨好联邦德国、法国或意大利，但他所偏爱的仍是美国问题。在处理同华盛顿的关系时，葛罗米柯曾根据形势需要把这几个欧洲国家作为他们的脚踏板、陪衬或诱饵。最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发现，在苏联的报刊上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出现了重视同欧洲、日本和其他美国的盟友的关系的调子。

这很可能只是微小的变化,只是为同一战略服务的新的灵活战术。虽然,这不会把美国撇在一边不理,也不会停止把美国视为主要的对手。但葛罗米柯的离开外交部可能是采取更协调一致、更多样化和更富有想象力的主动行动的机会。

葛罗米柯的离开外交部开始了由戈尔巴乔夫承担外交政策的最高责任的进程。谢瓦尔德纳泽不是葛罗米柯的人,而是总书记的人,他将按总书记的意志办事。

在葛罗米柯离开外交部的当天,苏联宣布准备苏—美首脑会晤。葛罗米柯现在虽已是国家元首,但人们现在只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晤。^①

尽管戈尔巴乔夫再也不会允许葛罗米柯插手外交事务,但是他仍然无法忽视葛罗米柯所拥有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随着“新思维”的提出和改革的逐步深入,在戈尔巴乔夫与葛罗米柯之间的分歧也不断加深。在1986年10月2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就意识形态问题发表了严肃讲话。他强调指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任自流,哪怕是在个别地方。而且必须记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比党、党中央及其政治局更高的裁判员。显然,使用警察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必须首先使用信念和解释的力量。但是,毕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想让我们回头重新评价过去,再次对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提出异议的人在我们这里并没有绝迹。这简直不能容许。”^②在1988年3月24日—25日讨论安德列耶娃事件的政治局会议上,葛罗米柯再次强调了改革中的党的领导和团结问题。他说:“我认为,对于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相互理解。我们有责任维护团结。改革的实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准备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都是已经确定了的。这一切都包含在代表大会和全会的决议中,在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大会的报告里。我们讨论过这份报告,而且对它的评价是一致的。

① [法]米歇尔·塔蒂:“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统治的结束”,《世界报》,1985年7月4日。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5页。

如果在这些问题上产生裂痕,那很快就会延及各个方面。”^①葛罗米柯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发言,让戈尔巴乔夫深感失望。戈尔巴乔夫感觉到,“有些同志步调已经不一致了,他们很勉强地在拖着脚步走,很吃力,同时还要压抑内心的‘跃动欲望’。只是他们还没有失去权力,没有失去和权力相关联的福利。但这总不能无限期地沿袭下去吧。分裂将不可避免”^②。戈尔巴乔夫决定迈出最后一步。在1988年9月30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作出了最后的决定:解除葛罗米柯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梅德韦杰夫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过,对于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请求退休的举动,戈尔巴乔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葛罗米柯“真是一位保持晚节、忠诚于他那个时代的非凡人物”^③。

2. 外交新一代:谢瓦尔德纳泽——“新思维”的执行人

1985年6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职务进行了重新分配,力量布局发生了变化。首先确定了契尔年科去世后一直空缺的国家正式的二号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的人选。以前的协议兑现了,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出任这一荣誉职位,然而代价就是他必须放弃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按照戈尔巴乔夫与葛罗米柯会前的协商,戈尔巴乔夫提议由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④出任外交部部长。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决定推荐爱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54页。

② 同上,第458页。

③ 同上,第487页。

④ 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格鲁吉亚人,1928年出生于一个教师家庭。194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先后毕业于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党校、国立库塔伊斯师范学校。1946—1961年间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先后担任区团委指导员、部长、格鲁吉亚团中央指导员、库塔伊斯市团委第一书记、格鲁吉亚共产党库塔伊斯市委指导员。1957年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61年当选为格鲁吉亚共产党姆茨赫塔区委第一书记、第比利斯市五一区党委第一书记。1964年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和国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72年为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同年升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1978年10月,谢瓦尔德纳泽被提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5年7月1日,晋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2日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成为十月革命后苏联第十任外交部部长(先后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的是:托洛茨基、契切林、李维诺夫、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谢皮洛夫、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别斯梅尔特内赫、潘金。),时年57岁。

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我和他谈过。他对我说：什么事都能料到，只有这件事料不到。他是一个成熟的活动家，讲原则，注意维护党的利益。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个久经考验、坚定沉着、善于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必须使这一点在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中得到反映。我深信，同志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①于是，“富有经验的政治局委员们明白，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打算亲自领导国家的外交活动。他不需要固执的葛罗米柯或者追求功名、受外交部传统和常规束缚的外交官留在这个岗位上。外交官应当执行总书记的指示。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具备虽不丰富但是成功的外交活动经验，他想让谢瓦尔德纳泽扮演不折不扣执行他意志的角色”^②。

7月1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政治局里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好久！并提名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担任外交部部长。即使是对接近上层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这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对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名声并不是很好。“这个党的官员、不久前的内务部领导人，既没有任何国际事务的经验，在这方面也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但是，他对上司说话投其所好的本事是有名的，因此，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是个让人厌烦的人。”^③

7月2日，第十一届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提议，选举谢瓦尔德纳泽为苏联外交部部长。这引起了外界的猜测，因为全世界几乎不甚了解这位新任外长。就像叶利钦说的那样：“任命谢瓦尔德纳泽担任苏联外交部部长职务曾使许多人大吃一惊。尽管他是一个加盟共和国（但不是最大的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没有外交经验。”^④看来，这是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为了推行改革而在外交领域的一次重大人事调整。西方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人事变动看来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时代的开始。”^⑤中央情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20～521页。

②③ 同上，第521页。

④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⑤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5年7月2日电。

报局在给国务卿舒尔茨提交的关于谢瓦尔德纳泽的简历文件中指出，谢瓦尔德纳泽绝非一个毫无个性的政策执行者。他性格鲜明、勇敢、果断、富有智慧，在解决问题时富有想象力。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他必将对苏联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产生明确影响。”^①

7月3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谢瓦尔德纳泽强硬但没有经验，“在很大程度上与老派人物决裂”。评论指出：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昨天说，戈尔巴乔夫已挑选了一位按照他自己的模式铸造的外长，此人将会使戈尔巴乔夫在长时期内制定他自己的外交政策。

据美国若干研究苏联政治问题的人说，五十七岁的新一任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可能缺乏经验，但是这位前格鲁吉亚领导人“富有想象力”“谈笑风生”，并且很有力量。

卡内基争取国际和平奖励基金会的苏联问题专家赛姆斯预言，谢瓦尔德纳泽首先可能改变执行外交政策的方式，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外交政策的内容。

布鲁金斯学会的苏联问题专家霍夫说：“如果你想在外交政策非常复杂的时刻起用自己的人，你就得这样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老派人物决裂。”

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政治基础相似。如赛姆斯所说，两人“都属于六十年代富有生气和雄心的愤怒的年轻人派”。

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强调说，除了上司政治上亲近以外，谢瓦尔德纳泽在格鲁吉亚当政期间还以具有独特风格的实干家著称——“一个知道怎样奉承人的强硬的警察”。

霍夫说：“如果你要找一名给公众好印象、举行一些记者招待会并使其发挥作用的外长，他显然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在强调谢瓦尔德纳泽和他的前任葛罗米柯的作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84页。

风方面的差别时说,在短期内,苏联对外政策不可能有很大的改变。他们注意到,葛罗米柯仍然身居高位,至少负有礼仪上的责任,而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的人马还不会下台。

美国国务院的要求不透露姓名的苏联问题专家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内容早日改变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认为,葛罗米柯并没有被撵出对外政策舞台;他是高升了。

但是,他们指出,考虑到葛罗米柯二十八年来非常了解华盛顿,挑一个从未到过美国,看来对美国的政治和政策都不很了解的人当外长可能使美国处于一种不利地位。

霍夫说,谢瓦尔德纳泽的轻松风格最终将会发展成一种按本身的条件同西方打交道的习惯。另一些人指出,新部长强大的吸引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将会受到舆论的欢迎。^①

7月31日,苏联新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赫尔辛基国际舞台的首次露面,让西方外交官们感到了苏联外交的新面貌。与前任葛罗米柯总是大声谴责的作风相比,每当谢瓦尔德纳泽被人引到应站的位置让摄影记者摄影或结结巴巴地照本宣读主旨讲话时,他总是紧张地扯袖子的链扣。大多数观察家认为,好像谢瓦尔德纳泽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世界上高级的外交活动中应付自如。西方的一位高级外交官叹息说:“他看来倒非常文雅,但是,大家听不见葛罗米柯激昂的声明,看不见他摇晃指头,也完全见不到他到会了。”其他外交官说,这两人明显的不同可能对克里姆林宫推行外交政策的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将引来一个重点在悄悄地辩论而不是超级大国唇枪舌剑的时代。谢瓦尔德纳泽抵达赫尔辛基时对记者们笑容可掬,并停下来同他们交谈,他得到了西方新闻界的好评。虽然他仍然含着微笑,但是他后来同三十五国外长聚在一起时,和蔼与自信的神气基本上消失了。外长们集合起来合影,这位五十七岁的外长紧张地整整领带和袖口,惴惴不安地环顾四周求援,直到有人引他到队列中站好。他在会上发表主旨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5年7月3日。

讲话,评价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缓和协议在过去十年中起了什么作用,此时,人们感到他有些怯场的印象加深了。谢瓦尔德纳泽用几乎毫无抑扬顿挫的语调照本宣科,埋头看着讲稿,他的格鲁吉亚口音自始至终很浓,以致他的俄语发音不清晰。每逢这种场合,葛罗米柯总是不看讲稿,连珠炮般地指责美国,并教训其他国家如何认识缓和的意义。相比之下,谢瓦尔德纳泽的讲话是温和的,他没有像葛罗米柯那样狠狠地谴责华盛顿,也没有像这位老资格外交家那样令人不快地警告说,如果“帝国主义西方不改弦易辙,注定要遭到毁灭”^①。《华尔街日报》对此作出评论:“苏联外长是一位懂得如何讨好和冷酷无情的格鲁吉亚人。”^②

除了外交部部长,戈尔巴乔夫还任命了新的副部长,更换了驻四十多个国家(相当于苏联与之保持着外交关系的所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大使。并且在外交部新设裁军局、人道问题和文化联系司、新闻局和太平洋司4个新的单位,分别负责处理武器控制问题、人道主义问题、新闻问题和与太平洋岛国关系问题。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对外交部的控制,戈尔巴乔夫任命前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苏共中央书记,负责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并授权其监督外交人员的任命。换句话说,苏共中央国际部拥有了控制外交部人员的相当大的权力。^③简言之,戈尔巴乔夫直接控制了外交部。“从给外交官以活力,到提出内容广泛的削减军备建议,戈尔巴乔夫个人对苏联对外政策的控制在苏联可能是史无前例的。”^④

1986年5月23日,戈尔巴乔夫在对苏联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明确要求:“要让新思维在外交中占统治地位,要让外交与时代同步前进,大力清除老模式和过去的烙印。”^⑤苏联外交新时代开始了。谢瓦尔德纳泽——苏联外交政策的执行者而不是设计者——将按照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外交新思维开启新的航程。在马特洛克看来,“谢瓦尔德纳泽负责处理国家外交事务,与此同时,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创立了理论依据,使苏联外交政策置

① 路透社赫尔辛基1985年7月31日电。

② [美]《华尔街日报》,1985年7月31日。

③ 参见[美]《自由欧洲电台研究材料》,1986年7月16日。

④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6年12月18日电。

⑤ [苏]戈尔巴乔夫:“新的政治思维是时代的迫切召唤”,《苏联外交部通报》,1987年第1期。

于新的基础之上”^①。然而在克留奇科夫看来,戈尔巴乔夫“创立”与奉行新的外交路线,“实质上是一条破坏的路线、改变立场的路线、背叛的路线”^②。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选择谢瓦尔德纳泽呢?

毕竟,他的这一举动在事实上打破了苏联的政治传统。据多勃雷宁分析,在选择葛罗米柯的接班人时,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苏联和西方许多国家的旧传统,没有选择外交官,而是选择了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告诉政治局,外交政策应由党来直接控制了,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由党的领导层的一员来担任这一工作的原因。在党的其他领导人看来,谢瓦尔德纳泽从未在莫斯科任过什么职,他一直在格鲁吉亚供职。另外他没有任何外交经验。这些都是谢瓦尔德纳泽担任外交部部长的最大缺陷。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看重这些东西,他说:“他将边干边学。”对戈尔巴乔夫来说,“重要的是要一位站在他一边的精明的人,而且要求他不受旧政策陈规旧套的困扰,准备将戈氏的计划付诸实践。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里也需要一位和他志同道合的人。当时他的外交政策新思维在政治局里并不是得到一致赞同的”,而“谢瓦尔德纳泽在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中没有什么他自己的关系,这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因为由一个外来人担任新的外交部部长的职位有助于保证他对总书记的忠贞不二”。^③

谢瓦尔德纳泽又是如何贯彻总书记的外交“新思维”的呢?

一是改变了苏联的外交程序,从而使苏共丧失了对外交的控制。克留奇科夫指出,谢瓦尔德纳泽作为外长,他处于国际事务和苏联整个对外政治的中心。当然,许多问题都取决于他,在他之前,一般是集体作决定,得益于集体的仔细讨论,所以未发生过有危险性的纰漏。政治局始终把外交政策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当时葛罗米柯也很尊重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从未发生过不听取政治局意见的情况。那时,一些人,首先是戈尔巴乔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81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29页。

③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王为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651页。

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认为事情进展得太慢，为达成协议需要太长的时间，如果不能尽快达成协议的话，将来则更困难，还得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确信：政治局的“顽固”妨碍了与美国等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事实上，这是政治欺骗。但遗憾的是，它竟然得逞了。”^①

二是片面曲解地搞外交妥协，从而使苏联丧失了多年的外交成果。谢瓦尔德纳泽的特点是：迅速地作出决定，不分析细节，最主要的是不考虑这些决定将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这一特点被融入他的工作作风中，而且在他所领导的部门内蔓延开来，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如此一来，外交部巨大的智能、专业潜力根本没有被利用起来，外交人员都变成了单纯的执行者，或者彻底成为消极的旁观者。克留奇科夫指出，在公正解决国家关系中日积月累的矛盾时，除了相互让步与妥协之外，别无他途。然而谢瓦尔德纳泽不是去耐心地寻找能考虑到多方利益的解决办法，而是与戈尔巴乔夫一起主动提出单方面的让步，放弃原有的立场。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万事开头难”，苏联在裁军谈判中作出许多让步之后，裁军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国防潜力却被削弱到了危险的地步。在许多方面，苏联都没有得到具体明确的协定和坚实的保障。为了解开国际关系中的症结和与西方达成妥协，苏联决定与社会主义国家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如纸牌搭成的楼房顷刻间便七零八落了，“我们昔日的朋友纷纷变成了论敌”。^②

于是，在国际舞台上，谢瓦尔德纳泽成了比戈尔巴乔夫并不逊色多少的一个人物。在叶利钦看来，这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苏联新的政策原则成为现实，成为可以与之打交道的原则”^③。

那么谢瓦尔德纳泽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雷日科夫指出：

我认识谢瓦尔德纳泽已有 25 年了。这些年里我仔细观察过这个

①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82页。

② 同上，第281页。

③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人。他是个不寻常的人。他的不寻常之处不是表现在才干、知识的渊博、政见的卓越上。他是一只“白狐狸”——媒体就是这样称呼他的。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不可思议地随机应变、看风使舵，对上级领导极尽阿谀奉迎之能事。他隐蔽了真面目成功地适应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又同样轻而易举地像变色龙一样换了一身资产阶级的外皮。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没受到过专门教育，没有国际政治领域的工作经验，一门外语也不懂，却把苏联外交部门的最高职务弄到了手。戈尔巴乔夫十分赏识这个人。是什么原因使他对这个人倍加宠爱——天知道。但在苏联崩溃和苏共解体后，在接受采访时，他们才流露出了真心话：在谢瓦尔德纳泽任格鲁吉亚一把手时，他们就已经促膝交谈，公开表示了对现存制度的厌恶。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坚持要把这位志同道合者拉到自己身边，拉进中央，这绝非偶然。^①

三、社会落差：戈尔巴乔夫惊叹

不管里根政府如何批评艾森豪威尔到卡特政府时期的缓和政策，从历史发展的进展及其结果来看，缓和政策的最大赢家其实还是美国。“缓和政策的最大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促成了美苏之间的连续接触——双方在很多层面和很多领域的交流日益强化。多年以后，这种接触使苏联逐步开启国门，越来越多地接受来自西方的信息、人员和思想。同时，它还将促进东西方的持续对话，从而影响众多苏联官员和公众的思想。”^②罗伯特·盖茨的判断是对的。事实上，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的破除铁幕战略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实施后，已经开始在苏联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尤为关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74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2页。

键的是,当时能够出国访问的恰恰是苏维埃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国内宣传与国外生活的强烈反差,不能不对这些精英心灵的最深处产生触动和反思——再完美的理论也需要坚实的物质来做基础,不能总是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吧!就像老百姓们所说的那样:“您是在向我们许诺死后过幸福生活吗?您至少得让我们尝到一点人间幸福的滋味呀。”^①

1. 国内与国外: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

这种高层触动首先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在不断的出国访问活动中,赫鲁晓夫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与苏维埃社会进行对比。

关于教育问题。在访问美国时,赫鲁晓夫比较了美国和苏联的教育制度。赫鲁晓夫很喜欢美国农业学院培养学生的方式。他说:“是什么东西让我喜欢呢?这些学院的学生一开始便边学习边干活,从事各种农业劳动:耕地、筹备和加工种子、播种、收割庄稼,亲自完成全过程——从播种到将产品入库。在畜牧部门,所有的工作也都是亲手去干:清除厩肥、给牲畜清洗和饮水、加工牛奶。结果农学院培养出的是一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训练有素的专家。给他们所灌输的理论,他们马上就运用于实际。日后走上固定工作岗位,他们就已经不是新手了,尽管他们年轻的外貌似乎不值得信任。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领导者和能出谋划策的人才。”赫鲁晓夫很欣赏这种培养方法,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②回国后,赫鲁晓夫开始不断宣传所见到的情况,但无论教授还是大学生都不喜欢听。“这也不难理解。住在莫斯科,在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工作,那该多么惬意。这是一所拥有齐全的设备 and 经验丰富的教员的名声卓著的古老农学院,偏偏坐落在城里!学生都不愿去集体农庄,因为那就得远赴外省,生活在穷乡僻壤。他们想方设法躲在莫斯科,挤进某个研究所或规划机关。有许多空子可钻,花国家的钱接受教育之后,却不愿以工作做出回报:不是去生产部门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9页。

^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攸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79页。

创造价值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是去服务部门。”^①赫鲁晓夫感到:“我国生活中的这种反常现象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谈过这个问题。这简直是健康的苏维埃躯体上的异物和肿瘤。”^②

关于住房问题。赫鲁晓夫回忆说,莫洛托夫曾经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讲到住房问题时“言语中流露出惶恐不安”。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的这种表现很惊讶:“觉得他好像是个新生儿似的。他这是怎么啦,直到现在才知道我们缺少住房、人们都住在臭虫窝里吗?难道他现在才知道公共住宅里经常为一些生活琐事而吵闹不休吗?”^③在访问法国波尔多市时,赫鲁晓夫面对该市的拆迁计划时禁不住感慨:“我们未能满足我国居民,首先是莫斯科居民当时最急迫的住房需求。其他城市的状况也并不好些。人们忍受着不便,住得像臭虫一样,挤在每个夹缝里,一间房住着好几个人,一套住宅挤进许多个家庭。这在他们那里是完全不可思议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人就居住在这种环境里。”^④赫鲁晓夫说,在他1914年结婚时就有了房子。“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一个普通做钳工的,老板还满足了我的住房需求。令我感到痛心的是,我,一个昔日的工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住房条件比我的弟兄们现在还要好。当时我家里有卧室,有厨房和餐厅,起居室也很像样子,有木地板和过道,下面是地窖,用来存放食物。每个家庭主妇冬天都要腌制咸菜。在顿巴斯,蔬菜的品种非常丰富,花色比20世纪50年代的莫斯科还要多。此外,房屋旁边还有一个棚子,里面堆放煤炭和木柴。愿意的话,工人们还可以在棚子里喂养奶牛、猪和鸡,而且许多人家都养了。可现在呢?”^⑤

关于农业问题。赫鲁晓夫承认,革命后,农业在苏联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在参观莫斯科农业展览会看到美国人饲养家禽时的高效高质时,赫鲁晓夫算了一下,一只苏联的鸡每年平均产蛋130个,美国的鸡则能产蛋300

①②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80页。

③ 同上,第1216页。

④ 同上,第2027页。

⑤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218~1219页。

个左右。也就是说，“几乎每天下一个蛋”，“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赫鲁晓夫总结说：“为什么我们社会主义的母鸡赶不上资本主义的母鸡呢？怎么，难道它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吗？不！不是！我们老是吹嘘科研院所全是新成果。有这么多‘鸡教授’、副博士和博士，可是我国的鸡明显不如资本主义的鸡。这里有问题。问题在于科研工作，但这不是所有问题的唯一所在。”^①

要改变这一连串非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有的问题，唯一的方式就是改革。然而改革的教训表明：“我国并不是每一个国家官员都对事业有着思想认识，常常表现出庸俗的冷漠态度，只顾追求舒适的生活，社会主义却因此蒙受损失。”^②赫鲁晓夫感叹：“唉，一个人即便拥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也并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办到。最可怕的反抗方式就是诺诺连声。苏联社会中的许多人都掌握了这套策略，并将其广泛运用。”^③然而生活毕竟在前进，苏联社会再也不会回到斯大林的高压统治时代了。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意愿正在持续不断地增加。领导者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变化，就会在政治上犯错误。“斯大林去世后，人们嘴上的封条揭掉了，他们批评起来用不着左顾右盼，不必害怕被关进监狱了。我可以这样说，这是老百姓破天荒头一次能够比较自由地说出自己的需要了。我说‘比较自由地’，那是因为真正的声音还没有发出来。大家还心有余悸，昔日斯大林的阴影和威胁还在：一说出来就会坐牢，一提出问题就会被关起来；即使不关起来，也会受到某种惩治或降级、降职的处分。这样的伤害太司空见惯了。有时甚至被关进监狱。遗憾的是这种事确实发生过。可是上面却以为，风平浪静就是天堂般的日子，人民安居乐业，悠然自在。”^④

事实上，在勃列日涅夫长达 18 年的统治时期，人民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累积。一切都似乎在昭示着苏维埃政权陷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309 页。

②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国务活动家》（第三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982 页。

④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276～1277 页。

人一场全面的危机之中。1982年8月3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在向里根总统提交的报告中,描绘了勃列日涅夫统治末期莫斯科的气氛。据来自苏共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消息,政治腐败、暴力犯罪和经济困境给人们带来了一种不安全感。有人甚至认为:“整个党的制度都应该彻底抛弃。官员无所不在的腐败与盗窃行为,使其他人也开始思考如何从这一制度下谋取私利,所以经济犯罪变得愈发猖獗。”凯西在报告最后指出:“缓和政策的影响和苏联社会泛滥成灾的腐败现象,使人们对苏联体制和政权进行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实施改革都将是灾难性的(此处特别加了强调)。在东欧,某种程度的试验是可以容忍的。假如那里的局势失控,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干预;但是,如果苏联本身出现问题,根本没有人来保护苏共。”^①

作为曾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继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对苏联内部的社会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短暂的执政生涯使他根本无法扭转苏联这艘庞大战舰的航行方向。不过,安德罗波夫培植的“小灌木丛”——戈尔巴乔夫却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他开创的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和苏维埃政权的颠覆者。这一切的发生,似乎都起始于1983年5月的戈尔巴乔夫加拿大之行。

1983年5月16日,应加拿大农业部长尤金·韦兰的邀请,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开始访问加拿大,并受到了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高规格接见。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这次访问收获很多,不仅考察了加拿大先进的农业技术,更重要的是通过加拿大向西方国家展示了年轻的政治局委员的开明形象。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在这里,戈尔巴乔夫遇到了自己的“知音”——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大使,雅科夫列夫促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加拿大之行,并使之受到了加拿大政府的高规格接待。雅科夫列夫明白无误地告诉特鲁多,戈尔巴乔夫将是苏联未来的国家领袖。来自雅科夫列夫的消息,使得英国在综合其他信息后,决定采纳特鲁多的建议——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在访问加拿大期间,戈尔巴乔夫与雅科夫列夫进行了深入的交谈。雅科夫列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46页。

夫回忆说:“他讲到苏联亟待解决的问题,用了诸如国家的落后、在解决重大的政治问题 and 经济问题时的目光短浅、教条主义、根本变革的必要性之类的定义。我也仿佛全无顾忌。开诚布公地谈道,从这里、从地球的另一面去看,苏联的政策显得多么的肤浅和令人脸红。再说由于在国外待了十年,我的神经已经极度紧张。后来,当我们周游全国各地,访问农场主、科学机构,同普通加拿大人、神甫和石油工人会见时,我俩之间的所有谈话始终是在高度相互信任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也说了个痛快淋漓。未来苏联变革的轮廓,仿佛就在所有这些谈话中逐渐形成。”^①雅科夫列夫告诉戈尔巴乔夫,苏联的现行政策是:“乞丐在教富翁如何生活得更好。”^②

2. 人道与民主:戈尔巴乔夫的新社会主义

不管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对戈尔巴乔夫是否真正产生了影响,但是从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实践来看,改革恰恰就是针对不能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提出的。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社会出现的反常现象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的必然结果。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维埃社会的“荒谬的局面”^③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而是在事实上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疾病”。

(1)经济生活。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无可匹敌,但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做饲料。苏联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了国民经济的需要而在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更为可怕的是,浓厚刻板的意识形态教条从根本上扼制了变革的苗头。雷日科夫说,早在1983年苏共中央就已

①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2~313页。

② 同上,第314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6页。

经开始着手解决意识形态教条问题并通过了有关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到底是怎么用意识形态的僵化来表述的呢？“我们曾竭力用万能的意识形态教给我们的那些标准的套话和刻板的公式来遮盖自然的、合理的、主要还是现实的措施。比如，为什么纪律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难道资本家的生产中就没有纪律？难道纪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某种意识形态的修饰？直到后来，我们也没有马上摆脱文字的羁绊，竭力不愿理解，我们是在怎么样糟蹋俄罗斯的语言。我们的多元化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不是他们那样的。比如，决议中有这样的说法：‘存在一部分工作人员……不发挥遵守纪律模范作用的现象……’还有：‘有的工人、农庄庄员和职员工作不全力以赴……’正如经典作家笔下所描述的那样：‘你在读什么书？’——波洛尼问。‘空话，空话，全是空话……’——哈姆雷特忧郁地回答他。”^①

(2) 意识形态。戈尔巴乔夫指出：“如果认为一切都要来自中央，或者更糟，都要来自一个人或是一批人，那么说不定我们会滑向思想僵化。这将对改革的致命打击，甚至是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致命打击。”^②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确实存在这样的障碍机制。它有很大的能量，以致对迫切问题进行建设性分析的种种尝试和新的思想都遇到越来越大的阻力。宣扬成绩（真的和假的成绩）的做法占了上风，同时又忽视普通劳动者和公众的正确要求和意见。在社会科学方面，烦琐的理论研究成风。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挤出社会科学领域，而肤浅的、唯意志论的评价和推断却成为只能加注释而不容反驳的真理。学术的、理论的和其他的讨论遭到阉割，没有这种讨论就不可能使思想得到发展或形成有创造性的生活。文化、艺术、政论乃至教育、医学也未能避免消极倾向，粗制滥造、形式主义、无谓的空谈也在那里露头了。尤其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歌颂“勃列日涅夫的伟大”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常态。就像雅科夫列夫批评的那样：“把只会签字的勃列日涅夫变成杰出作家，给他颁发文学领域的列宁奖金。政治学习时间学他的书。将他的英明捧上了天。哈萨克斯坦似乎根据《小地》一书创作了清唱剧。莫斯科小

①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53页。

剧院演出了根据勃列日涅夫生平排演的戏。剧作者为《星火》杂志主编萨弗罗诺夫。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佳热利尼科夫在战前的工厂小报中找到了关于青年勃列日涅夫的短文，在党代表大会上雷鸣般的掌声中朗读了这篇短文。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第一书记梅杜诺夫说人民对勃列日涅夫‘无限热爱’、勃列日涅夫‘以天才的说服力揭示了’等等。全国上下胡话连篇。仿佛大家都发疯了。”^①

(3) 社会生活。戈尔巴乔夫指出：“思想和道德价值好像在悄悄地，似乎不知不觉地开始磨损了。”^②把现实说成“没有问题”的做法起了不好的作用：造成言行不一，产生了社会消极性和对提出的口号的不信任。“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所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③社会道德开始堕落，在革命的英勇时期、头几个五年计划时期、卫国战争和战后复兴时期锻造出来的人和人彼此同心同德的伟大感情被削弱了，酗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与我们格格不入的、公式化的“大众文化”更严重地涌入苏联社会，“把下流无耻、低级趣味和精神空虚强加给我们”^④。

(4) 政治生活。戈尔巴乔夫指出，苏共的领导被削弱了，某些重大社会活动中的创举被忽视了。领导方面的停滞不前已十分明显，领导人更迭的自然过程遭到破坏。在某个阶段，这导致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以及整个苏共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的削弱。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形成了对一切都原谅的局面，严格要求、纪律性、责任心被削弱了。所有这一切都企图用冠冕堂皇的活动和宣传声势、在中央以及地方上庆祝种种纪念日的办法来加以掩饰。“日常的现实世界和被粉饰的太平世界越来越发生矛盾。”^⑤雅科夫列夫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腐败蔓延到整个社会。“盗窃国库，经营不善，靠吃掉国家资源来匆匆弥补无数的

①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3~314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页。

③ 同上，第17~18页。

④⑤ 同上，第18页。

漏洞,这些都愈来愈清楚地说明体制正陷入日益加剧的危机。还有普遍的欺骗行为,专给人看的信息。大家都争着写巧妙的关于成绩的报告:啊,干得真棒,硕果累累!每篇报告都是哀求:请关注党的忠诚战士吧。假话愈多,仕途的基础就愈牢固。”^①

(5)党内生活。地方上的许多党组织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党员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了工作中的失败和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在某些领导环节中,出现了无视法律、容忍种种弄虚作假和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有些工作人员的行径引起劳动人民的愤慨,他们辜负了人民对其的信任和重托,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某些人甚至成为犯罪行为的同谋,有的还是主谋。尽管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是应当承认,“在那些年代里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②。

“荒谬的局面”表明: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戈尔巴乔夫指出:“变革的潜力不仅在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社会意识中,都已成熟了。”^③然而在关于如何改革以及推进改革的实践中,戈尔巴乔夫越来越认为,造成“荒谬的局面”的所有根源在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扭曲认识和由此而形成的兵营式的极权主义政治模式。戈尔巴乔夫决定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理解,并借此希望改造苏联共产党以使之适应和融入新的政治生活。

1990年7月15日,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纲领性声明——《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声明认为:发生危机的深刻原因不在于社会主义思想本身有什么缺陷,而在于它过去被扭曲了。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国有化、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的专制,都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因此,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条道路尽管艰难,但

^①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69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③ 同上,第20页。

却是通往像样的生活，通往发挥国家物质和精神潜力的唯一正确之路。^①

声明指出，我们所理解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为人创造无愧于现代文明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克服人与政权，与他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参加社会管理；

——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的基础上，确保使劳动者变成生产的主人，有高效率劳动的强烈愿望，为生产力进步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提供最佳条件，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

——人民的自主意志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受社会监督的国家，保证保护人的权利和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在法律范围内行动的所有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②

在走向真正的人民政权的过程中，苏联共产党坚决主张：

——建立文明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的存在不是为了国家，而是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人；所有社会集团和团体都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以及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实际可能性；

——加强法制国家。在法制国家中，排除任何阶级、政党、集团、官僚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保证全体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担任任何职务；国家和公民互相负责，民主通过的法律绝对至高无上，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社会政治组织在宪法范围内自由竞争；

——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选权原则。^③

^① 参见“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90年7月），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部，1990年，第68页。

^② 同上，第69页。

^③ 同上，第73页。

声明认为,苏联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国内形成的局面负有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苏联共产党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放弃取代国家和经济管理机关的做法。苏联共产党正在变成这样一个政治组织,它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建设性立场捍卫在同其他社会政治力量自由竞争中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利。为此,苏联共产党将实现下列职能:

在理论方面。党在科学地分析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从理论上估计社会发展前景,认清并考虑各种社会集团利益的基础上制订社会主义革新的战略和策略,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其他计划。

在意识形态方面。党捍卫它的世界观和道德价值观,宣传它的纲领性目标和政策,将公民吸引到苏共方面来并参加苏共队伍。

在政治方面。苏共平时在群众中,在劳动集体中进行工作,同社会团体和运动进行协作,在选举中为在各级权力机关当选而斗争并在取胜的情况下建立相应的执行机关,进行议会活动,完成自己的竞选纲领。

在组织方面。苏共进行组织工作是为了实现它的纲领性原则和决定。在干部工作中,党将放弃形式主义、指定名单的做法。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作出干部决定的权利属于这些机关,而党本身作出干部决定的权力则由上级机关转交给党组织和全体党员。^①

与此同时,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苏共历史上最后一个党章——《苏联共产党章程》。新的党章按照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对苏联共产党实施根本性改造。该党章规定:“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按自愿原则联合苏联公民实施以全人类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为基础的纲领性目标的政治组织。它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利用进步的社会思想的成果,捍卫国际主义,它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90年7月),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部,1990年,第75~76页。

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苏共表达和捍卫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忠于社会主义选择的社会阶层的利益,努力实现公民和睦和多民族苏联社会的团结。”^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提出,其目的就像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三月中央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所说的那样:“党要从作为直接管理全部中心进程的国家体制中彻底退出来。”^②

四、思想共鸣:西方的价值植入

当1983年加拿大报纸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称为在西方“发现了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当1984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来访的戈尔巴乔夫称为“可以值得交往的人”的时候;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的对苏遏制战略正式进入决定性的关键历史阶段,戈尔巴乔夫的言语举动及其奉行的改革路线不得不让很多人认为,这是西方世界摧毁苏联的“共谋”结果。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谜》一书中谈及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就说:“连许多西方人都清楚这样的选举显然是美国相关特工机关行动的一部分,总共挑选出8个人来是有意安排的。他们以某种借口阻留可能会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飞离美国。没有通知另外一位正在度假的政治局委员有关选举的事情,这个人就是大概同样会反对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罗曼诺夫。假如哪怕就只有这两个人投反对票,那么戈尔巴乔夫也当不成总书记,因为他是仅以一票之差的微弱优势通过选举的。”^③无论舍维亚金的结论多么具有“阴谋论”的气息,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对西方价值的认同以及由此在思想上产生的政治共鸣,是苏维埃政权在戈尔巴乔夫改革进程中最终走向历史末路的关键性因素。

①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90年7月),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部,1990年,第77页。

②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90年),王力力等选编:《苏联东欧国家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文件选编》,中央党校教务办公室,1990年,第93页。

③ [俄]亚·舍维亚金:《苏联灭亡之谜》,李锦霞等译,东方出版社,2011年,第209~210页。

1. 工业化、信息化与思想控制的销蚀

然而在解释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变的时候,还必须对一个因素给予特别的关注,这就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国家意识形态控制的挑战。就像戈尔巴乔夫自己所说,改革实际上是苏联社会的普遍诉求。因此,改革的思想尽管遭到各种诘难,但仍然被党、国家和社会所接受。在这其中发挥作用的虽然有布尔什维克威权主义传统的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在工业化、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下,被不断壮大的社会销蚀、融化,从而开始丧失对思想的引导控制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的信息环境已与20世纪50年代有了大大改变。50年代仅有2%的苏联公民拥有短波收音机。到1980年,可以获得这种收音机的人已增至居民的半数。苏联领导尽管采取了干扰措施,但是完完全全被监控的信息世界到20世纪80年代已经成为过去。“苏联公民中活跃的一部分人,已经获得国家监控渠道之外可供选择的有关所发生事件的信息。”^①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不得不承认:“自由思考和公开性以及开放社会信息取代了意识形态专制的气氛。”^②

事实上,里根政府之所以能够发起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全面进攻,就在于美国已经充分认识到信息时代对打破冷战格局的新作用。就像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在勃列日涅夫体制使苏联沦为一个不思上进的国家时,世界上却出现了激光和私人电脑,并爆发了后工业革命。仅仅以1983年每百万人拥有的电脑数量为标准来对比:在大、中型电脑方面,美国拥有96500台、苏联拥有3040台;在小型电脑方面,美国拥有1000000台,苏联拥有22000台。^③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明确提出在加强广播宣传的同时,更要注重对信息技术成果的充分利用。他说:“要打好

① [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99页。

② “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1990年7月),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中央党校科研部,1990年,第45页。

③ 参见[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意识形态仗,我们还必须设法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微电脑、卫星、录像等等。”^①作为里根总统国务卿的舒尔茨及时地关注到了这一点。就在戈尔巴乔夫刚刚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的1985年3月21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巴黎斯坦福大学校友会上发表了有关信息革命的讲话——《信息时代的形式、规模及后果》。舒尔茨在讲话中指出:

地理因素和边界一向使日常生活受到约束,今天,信息革命正在打破这种自古以来的约束,改变国家之间财富和实力的对比,对现有体制和价值观念提出挑战,改变政治对话的议程。

信息革命可望像上个世纪工业革命那样决定性地改变我们星球的常规。现在工业时代行将结束。一个世纪以前,我们的发展从农业阶段进入工业阶段。如今,我们仍然是工农业生产的经济,但是我们的经济基础正在迅速地从工业生产转变为以信息为基础的货物和劳务。

信息时代引起的变化最明显地反映在我们的技术本领中,尤其是反映在信息的开发、存储、处理和传送中。信息时代的象征也许是计算机,也许是机器人,也许是直播卫星。再过二十年,计算机的功效将是今天的一千倍。

再过短短的几年,一九八五年的最先进技术在我们看来将过时,就像四十年前出现的半导体今天已过时一样。我们的科学进步正在对从生物学到国防的一切事物产生影响。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它由于减少对进攻性核武器的依赖而有希望使威慑力量更加可靠——就是智力和科学的变化影响我们处理世界事务方法的一个明显事例。实际上,战略防御计划完全可以被称为一个巨大的信息处理系统。

信息是我们的新国际标准。财富将根据信息传播的情况增加或减少。随着信息“实时”传送的到来,玫瑰园宣布的消息两分钟后就会反映在新加坡的股票市场上。信息时代不仅给企业家和公司,而且给整个世界市场带来一个新的经济效益概念。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信息的激增也引起对国家安全的新的担心。信息本来是中立的,它可以用于多种目的,好的和坏的。各国政府都发现,对重要的情报部门和国防部门的机密信息传播的控制更加困难了。

信息时代对社会方面的影响同样深远。到一九九〇年,全国将有一半的家庭——以及数不清的学校、机关和工厂——计算机化。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明天的技术将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

信息时代已向世界各国提出了深刻的政治挑战。经济规律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即使是作出最普通的决定(比如,在何时何地开一家工厂)也必须考虑社会和政治现实以及从经济方面考虑。

东方集团的领导人也担心他们在信息时代技术的研究、发展和销售方面无法同西方竞争。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为追求技术进步所必需的自由而开放自己的社会,要么冒更加落后于西方的风险。中国共产党人正试图解放十亿人民的聪明才智,他们的经验仍将是人们极感兴趣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可证明一个曾经是封闭的社会能否开放。

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决定如同看待这些新的国际市场。如果它们害怕外来影响并限制技术交易,它们只会更落后于发达国家并加宽我们之间的鸿沟,相反,如果它们坚持开放,就会发现它们将得到开发其物质和人力资源并加速实现现代化的难得的机会。

由于信息革命,所有国家必定面对一个主要挑战,即各国贸易方式。除非自由国家同意这些革命性的产品和劳务进行自由贸易而不进行限制性贸易,否则我们面前的所有机会都不会结出硕果。

同样的挑战也正在影响着我们的外交。甚至就在我们谈判向国外转让技术的同时,技术已在发展变化。

美国强烈要求举行一轮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国间的多边贸易谈判,以确保能解决那些与新兴技术的贸易有关的主要问题。同时,我们也为扩大双边自由贸易提供一切机会。^①

① 美新署巴黎 1985 年 3 月 21 日电。

舒尔茨的讲话在1985年春季号的《外交》季刊上以“新现实及新思想方法”为名发表。在这篇文章中,舒尔茨再次阐述了美国的对苏战略与信息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说:“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正在发生全世界范围的革命。这场革命来得正是时候,因为这场革命正好与另一场革命,即全球经济的技术基础的革命同时发生。这就是沃尔特·里斯顿所说的‘奔腾向前的信息技术时代’。微型集成电路计算机、先进的通信技术和不断革新的进程结合在一起不仅改变了通信和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且恰恰向国家主权和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概念提出挑战。全球通信革命迫使所有国家重新考虑有关国家主权的传统想法。”^①如果舒尔茨的预言照顾到了美苏两国的关系,那么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副国务卿、基辛格联合公司总经理伊格尔伯格则是毫不留情地指出苏联将在这场信息革命中走向失败。伊格尔伯格说:“苏联制度的性质决定了苏联人不能成为信息革命中的主角。”^②

面对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带来的美苏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失衡,苏联不得不承认它在这场争夺人心的心理战中已经开始走向失败。1987年4月,苏联杂志《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第2期发表题为“最新技术与美国的文化输出”的文章,流露出对美国挟持信息革命而来的意识形态进攻威势的无奈。文章指出:

科学技术革命,特别是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开创了文化传播的新阶段。40年代和50年代的重大科学技术成就——电视,是美国加速文化和新闻扩张的重要条件。80年代中期,126个国家已有了电视广播,将近25亿人从6亿多台电视机屏幕上收看节目。美国还广泛使用电子邮件、电缆电视和通信卫星。

报纸业也发生了革命。现在,每天上午仅在几分钟之内就能通过通信卫星或者电缆电视把消息传送到巴黎、伦敦、苏黎世、海牙和香港。巴黎的消息用文字传真装置仅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复制并传送到新加坡。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每天上午就放在了读者的桌上。

① [美]舒尔茨:“新现实及新思想方法”,《外交》季刊,1985年春季号。

② 新华社华盛顿1985年9月18日电。

美国的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通讯社——合众国际社和美联社,正在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广泛采用科学技术进步的最新成果。受计算机控制并使用卫星的通讯线路,使得在1天之内可广播3000万个单词。美联社在国内和国外建有220个分社,向国内1300家报纸和5.6万家电台提供消息。除美国外,近100个国家的1万多用户订了美联社的消息和新闻图片。合众国际社则向1040家报纸和大约3.8万家电台和电视台提供消息和照片。它还在1天之内用48种语言广播1100万个单词。

在80年代,美国出现了电视录像带。为了进行广告宣传和唤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录像带被免费提供给欧洲电视台。这种兜售文化产品的做法使人回想起推销麻醉剂的情况:起初是无偿供应一些,使人养成服用的习性。欧洲观众不得不为新的麻醉剂——美国的电视音乐作品付款。

由于信息可以无限制地传播,拥有强大技术基础的国家能够变成世界舆论的操纵者。这首先对那些通讯事业不发达的国家造成威胁。日益加强的新闻侵蚀无疑会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美国在宇宙电视节目帮助下进行的总体文化渗透到80年代末有可能将对30多亿人产生影响,向他们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

美国继续投资几十亿美元用于保持自己在现代通信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美国希望,这能保证它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颠覆活动。^①

然而重要的因素还在于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苏联社会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84年12月10日,戈尔巴乔夫在全苏意识形态工作学术实践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诞生的苏联人民的新一代今天开始了积极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我们制度的历史成果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自然和不可分离。苏联青年在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下,在四

^① [苏]《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1987年第2期。

十年的和平局势中成长和受教育。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我们的现实生活不是同过去,而是同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相比较。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当代思想状况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共同关心的是,培养青年准备劳动、参加国防工作,坚持教给他们现代军事业务,用热爱我军和忠于军人义务的精神培养他们。”^①以青年人为代表的苏联“新一代”已经显现出其在思想、行为与心理上的变化。苏联青年人占全苏人口的一半以上,其中在工业部门占32%,在非生产部门占28%,每年有三百万青年人补充到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的队伍。尽管大多数青年人都能做到助人为乐,注意文明礼貌,有一定的觉悟和爱国热情,但是当代青年人的社会行为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以至于一部分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当代青年人“今不如昔”。

事实上,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身上的这种思想变化早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就已经引起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度重视。1958年10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部分青年行业表现的报告中指出,在战后年代,部分莫斯科青年的品行开始表现出与共产主义道德原则不相容的行为和倾向。这些行为主要表现出轻视劳动、追求空虚的“美好”生活、低级趣味、道德败坏、丧失原则、逃避社会生活、不问政治、对自己个人评价过高、希望与众不同(着装、行为、语言)等,按他们的说法,他们是“灰色的”苏联人。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提交的结论是:“这部分青年已成为众所周知的被称为‘阿飞’的人,严重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性影响,因而他们不仅思想上经常产生动摇,而且对苏联的一切采取否定态度,赞美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而有时还直接有反苏表现。”^②1968年1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年级大学生是大学生中最危险的社会群体。他们喜欢长时间一起闲逛、谈话和交换意见。“这种谈话的典型主题是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学校新闻,最主要的话题是淫欲和喝酒。”^③大学生都定时收听广播,但他们偏爱西方广播电

① [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年)》,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莫斯科局关于部分青年行为表现的报告”(1958年10月23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③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2页。

台,因为西方电台对新闻的报道比我们及时,节目组织得比我们有趣,包含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此外,朋友之间总是津津有味地叙述刚刚收听到的最新消息。国家安全委员会强调,苏联大学生从西方电台获得的信息量不能忽视。官方的态度(停止“干扰”),使收听西方广播成为合法的事,大学生交谈时常常会有这样的话:“现在《美国之音》在广播……”住宿学生的生活有所改善,实际上每个房子都有收音机。美国之音和法国浪潮是最受欢迎的电台。最引起国家安全委员会警惕的是,大学生对苏联共产党的认识形成了两种意见:“自己和官方的。”“因此大学生对入党以后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良心作出让步这种思想已经习惯了。然而如果你想飞黄腾达,这就是完全必要的。因此在谈到未来时,一定会有这样的话:‘我想过两年申请入党,这是应当的。’”学生之间的谈话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作“红色的浮子”。对大学生的这种心理状况可能带来的危害,国家安全委员会一针见血地指出:“显而易见,他们会违背自己的良心,成为毫无巩固的思想基础的党员,随大流的心理就是这种行为的基础。”^①

更应该引起注意的就是,苏联工业化的发展在增强了国家实力的同时,也带来了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变革力量。戈尔巴乔夫承认:“还在70年代,许多人就懂得,如果在思维和心理方面,在工作的安排、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在各地,既在党内,也在国家机关领导层中不发生急剧的变化,那是不行的。而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其中既包括在党中央,也包括在政府内。”^②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张之所以能够在苏共党内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和支持,就在于工业社会本身培养了一大批寄身于体制之内的“异见者”。“在这一小群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开始自己的事业、自诩为‘党的二十大的孩子’的‘开明’官员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直接而热情的拥护。这个充满生气的小集团的人员构成包括:作为笔杆子曾经在安德罗波夫和勃列日涅夫身边工作过的人、学术智库的负责人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的国际关系专家。有些人曾经是勃列日涅夫的笔杆子和‘开明’顾问,但这些见多识广

^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的人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都陷入了幻灭感和犬儒化。他们对僵化和腐败深恶痛绝,希望仍然采取20世纪60年代后期被叫停的去斯大林化及文化‘解冻’政策。”^①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本身就代表了这种新的社会局面的形成。布热津斯基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出现并非是偶然事件,这一点至关重要。他的执政代表着一种崭新的现实局面在苏联的出现,无论是以客观的还是以主观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如此。换言之,即使戈尔巴乔夫不上台,也极有可能有另外一个苏联改革派人物在80年代中期登台。尽管苏联人民的物质贫乏,并长期遭受政治灌输之苦,但到80年代初,他们已具有了相当的文化素养,其中许多上层人士对外界情况已相当熟悉,因而不再像以前那样容易轻信那些欺骗性的思想宣传。在上层的职业经济学家、世界事务专家以及在主管国际事务的党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尤其普遍地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即危机日益加深,改革势在必行。而推行改革的实践反过来又有可能为上述问题提供答案。”^②

面对在信息时代苏联体制的内外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急速改革无疑是加速了危机的到来。就像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所言:“戈尔巴乔夫没有意识到,苏联的根本矛盾注定了他的失败。失去了对经济和社会的独裁性集中控制,以及神秘和恐惧的辅助作用,苏联的体制根本不可能生存。后工业化时代高度依赖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新技术的快速融合,集中控制的经济和社会不可能生存——至少从军事和经济竞争角度来看是不可能的。集中控制注定了苏联经济的失败,但是失去了这种控制,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又不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从未理解他改革措施的根本性错误——他认为,苏联的制度问题能够得到‘纠正’。它的问题可以‘慢慢稳定下来’,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但是,这个制度已经千疮百孔,改革只能加速它的灭亡。”^③

①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②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2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

2. 公开性、民主化与思想闸机的开放

什么是“公开性”？

从字面上看,意为“公开讲话”或“公布事实”。在尼克松看来,“这是个时髦的字眼,指的是对苏联的问题采取公开化的新态度并对不同政见更为容忍”。简单地说,公开性的直译就是“透明”。^①据马特洛克分析:“这个俄语词没有确切的英语对应词,这就使美国弄不清楚该政策的真实含义。它并不像某些外国观察家所认为的那样,是指言论自由或新闻自由,而是指官方机构的运作应该是开放的,因而它同我们的概念‘透明度’相似。其目标不是新闻媒介的自由,而是为政策的变化进行更为有效的宣传。”^②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助理看来:“公开性已成为国际上的称谓。它是伟大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象征,并成为世界语汇中与‘改革’一词一起排列的词汇。”^③

为什么需要“公开性”?戈尔巴乔夫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这是由苏联改革的制度特性——党和国家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定的。戈尔巴乔夫指出:“在苏联的条件下根本性的改革只能由上而下,由党与国家的领导开始。这是由这种制度的‘性质’本身决定的,那就是对社会和国家生活的超集中领导。这同样是由于习惯于执行‘上面’作出的指示和决定的群众的惯性。从改革一开始,国家的领导人就特别重视坦率地、开诚布公地并通过同群众直接交往的途径解释新方针。因为没有公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会寸步难移的。”^④

其次,这是旧的生活再也无法维持的需要。当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当局已经无法阻止“窗帘外面”的生活洪流,于是便尽量封锁来自“山那边”的消息。出国几乎成了主要的职务特权。进入图书馆的珍品部和

① 参见[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9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4页。

③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6页。

专用阅览室,同进入特殊供应商店一样受到严格控制。在科技进步一日千里和全球通信联系飞速发展的时代,苏联当局通过克格勃对复印和传真严加禁止。电话簿上带有“用于公务”的字样,地图和大城市的平面图在出版时故意出错,以便迷惑潜在的侵略者。问讯处禁止向普通公民提供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对“敌对之声”的无线电干扰开到最大功率,苏联曾经向世界贡献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而葛罗米柯代表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一条主要外交倡议却是禁止卫星电视广播,因为据说它侵犯了国家的边界。“安装卫星电视天线自然被定为政治上持不同政见,也就是刑事犯罪的一种方式。”^①但是生活的洪流汹涌而又澎湃,改革要求打开国门,重新认识“窗帘外面”的世界,对“山那边”的迫切认知为“公开性”提供了生存土壤。

最后,这是获取人民支持改革的必然要求。根据改革政策的发展逻辑,要求“公开性”的另一个因素也就出现了:需要人民真正了解改革并支持改革。从1985年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到1986年初的近一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这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个极为不好的现象。因此,迫切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以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改革方针的必要性。于是,戈尔巴乔夫释放了“公开性”这一话题。他说:“没有公开性就没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②在初始阶段,戈尔巴乔夫本人还没有把它同言论自由等量齐观。那时在他的态度中,尚有许多传统的、“列宁的”东西——从党(被正式宣布为改革的先锋)的教育宣传作用的立场出发、为“动员群众”来实现新的政治方针。^③

1986年7月底至8月初,戈尔巴乔夫去了远东。这次巡视带来的更多是失望:戈尔巴乔夫感到人们期待着巨大和迅速的变革,他们充满了热情。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③ 参见[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但是特别让人感到失望的是,不管是这些人,还是各级领导人,都不会、不知道、也不想按新的方式来做任何事情。戈尔巴乔夫说:

谁也没有现成的药方,政治局没有,政府也没有。大家都要去想,大家都要学习、试验、冒险。每个人都要从自己开始!在工作里会领悟到真理。主要的是一切都要凭良心办事,每人都要负起责任,努力战胜自我。我们对缺乏公开性和批评的局面已有所习惯。这里涉及的既有普通的工作人员,也有主管人员。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谈论民主,而现在应该运用它和重视它。如果有人开始折腾人们,把他们的积极性变成对自己有利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道。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要给地方新闻部门充分的自由。公开性——这就是社会主义……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来说,这是真正的革命事业……很多东西要取决于领导人自己的行为。我们将坚决反对把自己的职权看作世袭领地、看作对权力和真理的垄断的态度……^①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公开性”就是要把一切事情都摆在明处,这是破除僵化的专断体制,防止社会谣言形成的有效方法。“封闭的社会相信谣传。由于正常的信息来源不可靠,人们就转向亲友、家属、同事,甚至是道听途说,信口开河。尤其是,出自某某认识的某某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嫂子或小姨子的话可能比政客和大众传媒更为可信。”^②同时,这又是在改革形势下对国家管理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更是社会民主的价值体现。“社会的正常的民主发展不允许把处处保密,处处搞黑箱操作当作国家管理方法,它要求有透明度、公开性、公民获得信息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政治、宗教与其他观点与信念的自由、充分进行批评的自由。”^③

1989年5月,《苏共中央通报》公布了苏联社会科学院在1988年年底进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00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10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行的一次关于“公开性”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表明,80%以上的苏联人认为“有必要”发展“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只有6%~8%的人认为“公开性”“走得太远了”。《苏共中央通报》指出:“恐惧综合征”正在慢慢消失,“害怕”批评领导人和官方机构的情况也在慢慢消失。^①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相信开诚布公、公开性就是那把珍贵的钥匙,可以用来打开通往体制的城堡和装甲保险柜密码的路径:“不要害怕自己的人民!公开性就是社会主义。”此后,不仅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的话题,在涉及更多的社会事件时,戈尔巴乔夫都高举“公开性”的旗帜,宣称这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民主的体现。格拉乔夫回忆说,有一次切布里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反对发表瓦西里·贝科夫的中篇小说《苦难的标志》,警惕地认为小说是在“挖集体化的墙角”,戈尔巴乔夫大声地抱怨说:“不错,过激的东西是会有有的。大浪一起,泥沙俱下。会有泡沫,会有垃圾,可这都是春天的标志,革新的标志,民主的伴生物。但民主的飞轮要转动起来……不要害怕。主要是人民做出了反应,昂起了头。打他们的头,再来发号施令,那就是对民主的背叛。”^②

戈尔巴乔夫坚信,只要他是真诚地释放“公开性”,那么人民就会以真诚对待他,从而按照他的改革路线跟着他走。但是政治现实是残酷的。当戈尔巴乔夫决心打开封闭已久的房门时,也许最初他根本没有想到在一个充满了“人民敌人”的国度里,“公开性”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在一个各阶层人们对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没有养成甚至摒弃独立思考习惯的国家,要搞诚实的政治多么艰难啊!很多人不能透过漂亮言辞的包装看穿历史性的欺骗、理论的贫困和露骨的平民主义!”^③事实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揭露,对共产党官员在公众中的形象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它表明苏共以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参与了大规模隐瞒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事实真相的活动。对许多人来说,大多数人只知道过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这些年不断曝光的那些具体证据则激起了全

① 参见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5月10日电。

②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③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国民众对当局的憎恨。利加乔夫的一个判断是绝对正确的：“新闻媒体发起的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和现存体制缺点的运动，直接动摇了这一帝国的根基。”^①

就像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所言：“在1986年和1987年，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拆除斯大林建设起来的苏联大厦时，他在懵懵懂懂之中实际加速了整个制度的崩溃。通过公开化和重新认识苏联历史，他揭露了确保中央和共产党赖以生存的神秘性和谎言。通过经济改革，他开始削弱中央管理组织结构。在不提供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它至少可以满足基本的材料需求。通过民主化改革，他揭示了共产党的内在运行机制，并在一段时间内证明了（包括向他自己证明）共产党不能解决苏联面临的问题。通过无知与疏忽，他激起了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情绪，最终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通过公开性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亲手点燃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之火。“他认为，这些燎原之火可以让苏联摆脱过去的束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但是，他和当时所有人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些燎原之火将超出他的控制能力，演变成一场灾难，将他和他希望挽救的制度一起吞没。”^②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册），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333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28页。

第五章 政治渗透：西方与苏联的政治运动

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政治分化与瓦解,是西方国家实施遏制战略的主要目标和内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 68/3 号文件附件——《对外新闻计划》明确指出:“在普遍的政治制度、社会形式、文化传统和教育水平上,被认为在这些地区里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团体和个人各不相同。在政府权力很大程度上用独裁方法加以控制和传导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构成了最重要的目标。在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处于民众控制下传承的地区里,这些团体在新闻界、大学和会议室里所发挥的影响力依然重要,这种影响力与其人数并不相称。在另一个极端,甚至在文盲率高而民众拥护的政府不存在的地区,我们必须考虑到农民和城市无产者的力量与作用,哪怕他们是惰性的。通过专注于那些广泛代表它的分子,才能最有效、最实际地影响某个特定的人群。在许多地区,劳工和青年人是力量与作用新近增大的群体,他们也是态度可能在危急时刻决定国家行动的性质的群体。因此,他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而且他们代表了所有地区集中进行特别行动的近半数人群。”^①在具体的战略操作阶段,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声援、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政治反对派,来达到其渗透与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目标。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18~919页。

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西方的机会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依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不光是私下对自己的妻子或挚友发发牢骚而已。”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具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他们所反对的是合法当局。第二，他们不愿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将其公诸于世。”^①从总体上来说，持不同政见者只是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活动方式一般是通过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写公开信和向外国新闻界发表声明来表达不满。当然，他们也组织政治讨论小组，不过却很少参加群众性的示威活动。麦德维杰夫指出：“持不同政见者的确形成了一个相对来说很小的圈子，并且一般说来和群众也没有什么联系。我这里指的是一些个别的人，他们往往在无意之中表达了群众的观点。的确，整个地说他们只是一批知识分子，然而他们的立场却反映出有一部分很有影响的人的感情，虽然很可能他们的人数并不多。”^②尽管持不同政见者人数很少，但在如铁幕一般的笼罩而显得神秘的苏联社会来说，他们却像一道闪电引发了苏维埃上层的忧虑。对企图穿透铁幕的西方国家来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及其活动表明，在斯大林之后苏联的高压统治在政治生活领域发生了缓慢而又显著的变化——斯大林时代必须遵守“要是不告诉你，你就别问，这与你无关”的政治规矩被打破了——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在西方国家看来，这就是机会！

①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洪历建、陈为汉译，群众出版社，1984年，第1页。

② 同上，第2页。

1. “解冻”与“春潮”：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在苏维埃政权史上，知识分子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赫鲁晓夫的“解冻”而带来的苏联国内政治环境的宽松，在知识分子中间促成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出现，使其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加剧这种紧张关系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持不同政见者B.奥西波夫说：“赫鲁晓夫的报告是在莫霍瓦的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共产主义礼堂里举行的共青团秘密大会上向我们宣读的。当时会议大厅的墙上还挂着四幅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自然，我被这份报告惊呆了。立即感到全身发冷。”^①

这种紧张与其说是在政治制度上的对抗，不如说是在思想信念上的冲突。麦德维杰夫指出：“苏维埃国家在它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被构建为一个专制型的专政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不同意党的政策的合法反对派和对党的领导人的公开批评都是被禁止的。但是各种批评和抗议形式正好在60年代末开始发展和增多了，我们的历史政论文章中人们把这种批评和抗议形式称作‘持不同政见者运动’。”^②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有许多人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唯一武器就是言语、音乐和绘画。他们是用自己的文章、小说、歌曲来维护自己的信念的，而不是用暴力、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我们的报刊那样广为宣传的‘苏联人民政治道义上的一致’，实际上不过是苏联宣传中的一个神话。甚至在我们国内曾处于金字塔顶峰的那些人中，有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一窍不通，但仅仅是由于提升职务和保持权力的需要而把自己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③

持不同政见者由于大多批判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运动、不赞成苏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垄断等而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他们人数虽少，但声誉高、影响大，不仅受到苏联社会内部不满现实者的广泛同情，而且也

①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第295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③ 同上，第129页。

受到西方国家的吹捧而沦为其攻击苏联的证据。安德罗波夫说：“应该说‘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名词本身就是宣传家们狡猾杜撰出来的，其目的在于蒙骗社会舆论。众所周知，这个词翻译过来就是‘思想不同的人’，资产阶级宣传使用这个名词，是打算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苏维埃制度不容许它的公民进行独立思考并迫害任何‘有不同想法的’，即不像官方所规定的那样。”^①不过，就整个运动来说，这主要不是由外国煽动起来的，“它是由苏联社会和国家本身的缺点和弊病引发起来的，它的根还在斯大林时期的阴暗岁月里就扎下了，那里毫无人性的恐怖和国家的罪行成了家常便饭。这个运动也是对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恢复名誉和重新极力限制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宗教、民族团体的合法权利的企图的回答。这个运动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国内状况、供应短缺和生产组织中的缺点的普遍不满，是由于苏联的党政等级制中许多环节上和各个级别中还存在着专横和腐败而产生的”^②。

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苏联政府的严密管控。越来越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引起了苏共中央的高度警惕。在1966年11月10日召开的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指出，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可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无法克服的危害，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有一个领域我们做得还很少，这就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缺点，而在有些地方则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已经开始让人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它们不能不令我们忐忑不安，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认真警惕。”^③勃列日涅夫尤其强调了学术文艺作品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潜在危害。他说：“有一种情况特别值得引起警觉，那就是某些意识形态工作手段，诸如某些学术著作、文学作品、艺术、电影，以及报刊，在我们这里竟被利用来污蔑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历史。而有人在这样做的时候还假借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摆出种种貌似高尚的出发点。这样做更坏，危害更大。”^④勃列

① [苏]安德罗波夫：“共产主义信仰——新世界建设者的伟大力量”（1977年9月），《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173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③ “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国内意识形态问题讨论的记录摘抄”（1966年11月10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④ 同上，第115页。

日涅夫责成苏共中央书记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共同制订意识形态工作的相关措施。

安德罗波夫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赋予了监控持不同政见者的主要职责。1967年7月3日,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呈送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建议:在中央和地方建立一个克格勃的独立部门,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去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作斗争”。苏共中央政治局赞成安德罗波夫的建议。^①1967年7月底,克格勃第五局成立。第五局接受的第一批案件中,就有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案^②和安德烈·萨哈罗夫案^③。

①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② 注: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1967年5月,在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0年,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迫于形势,他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③ 注: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被称为“苏联氢弹之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萨哈罗夫开始关注他工作所牵涉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反对核武器扩散。1968年5月,萨哈罗夫发表了《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智力自由的思考》的文章,指出反弹道导弹是核战威胁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篇文章作为地下出版物被传播并在苏联境外出版后,萨哈罗夫被禁止参与与军事有关的研究。1972年,萨哈罗夫与同为入人权行动主义者的叶连娜·邦纳(ЕленаГеоргиевнаБоннер)结婚。1973年,萨哈罗夫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翌年他获得了奇诺·德尔杜卡世界奖(Prixmondial Cino Del Duca)。197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他被苏联禁止离境领奖,他的妻子叶连娜在颁奖典礼上代他宣读演讲词。1980年1月22日,他因为示威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而被捕,随后他被流放到一个保密行政区高尔基,即现在的下诺夫哥罗德。在1980—1986年间,萨哈罗夫受到苏联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声称他在高尔基的寓所经常被搜查和抢掠。1985年12月13日,欧洲议会设立了“欧洲议会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以奖励他在维护人权方面的工作。1986年1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展开重建和开放的政策,萨哈罗夫被释放。1988年,萨哈罗夫获得国际人道和伦理联合会(International Humanist and Ethical Union)颁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奖。之后,萨哈罗夫协助了苏联最早的一批独立政治组织的成立,并成为苏联反对势力中主要一员。1989年3月,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Съезды Советов),成为民主改革势力的领导者之一。

苏联政府一般采取严厉批评、解除工作、开除出党、驱逐出国、送进精神病院,甚至搜查逮捕被判入狱等办法惩治持不同政见者。随着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政治环境的日趋保守,刑法典里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条第一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谣言和消息的人,要进行惩罚。“这就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得以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思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等待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是监狱。”^①据不完全统计,因从事反苏与散布“攻击苏联国家与社会制度的故意造谣诽谤”而被判罪的人数,在1956—1960年为4676人;1961—1965年为1072人;1965年为20人,1966年为48人,1967年为103人,1968年为129人,1969年为195人,1970年为204人;1976—1980年总共为347人。^②

然而不论苏联政府采取何种方式实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其目的:“在苏联晚期,驱使知识分子对党以及领袖本人的‘慈父般的关怀’感激涕零的,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养成的恐惧心理,而且还有无法克服的不知是先决性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种力求得到上司器重的内心需要,至于已经多次描述过的御用知识分子对于执政者尤其是暴君的着迷综合征,就不在话下了。”^③但是一旦思想的闸门被打开,哪怕其后又再关闭,都无法阻挡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独立思考。推动这一变化的正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1988年7月1日,在听取了萨哈罗夫等人的建议后,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说:“还有一个在代表会议前夕和在代表会议上提出的问题——为受迫害者建造纪念碑的问题。你们可能都记得,在党二十二大的闭幕词中提到过这一点,当时得到支持。在党的二十七次上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作出实际决议。正如报告中所说,对无法无天时代的受害者恢复公正,是我们的政治义务和道德义务。让我们通过在

①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② 参见[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14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莫斯科建造一座纪念碑来履行这项义务吧。我相信,这一措施将得到全体苏联人民的支持。”^①7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建议,在莫斯科为斯大林统治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1989年2月27日,美国的一批医生开始执行一项空前的了解苏联精神病院状况的使命。据持不同政见者和西方专家们说,苏联利用精神病院监禁政治犯。19名专家(其中有5名能讲流利的俄语)两周之内将会见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病人或刚出院不久的人,并参观苏联的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这个医生代表团团长罗伯特·法兰德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是估价……苏联在有争议的精神病学方面的政策、法令和治疗方法的变化。”法兰德是负责人权和人道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高级帮办,他说苏联官员对于他们能看些什么和会见什么人没有加以限制。代表团的官员们说,苏联官员在提供代表团要求得到的许多文件方面行动迟缓,但是最终还是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信息。^②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持不同政见者迅速转变为政治民主化时期的激进的“民主斗士”,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掘墓人。

持不同政见者并不是促成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像近代俄罗斯历史上各次重大转变(18世纪初期向西方的转变,1861年结束封建主义,1929年后的集体化和工业化大跃进)一样,这次变革的力量主要也是来自最高层。戈尔巴乔夫富有改革的勇气,但却走错了改革的方向,他试图改革不能改的东西,结果是改变了苏维埃制度,并最终毁灭了苏联。但是,在改变苏联高层的政治意识方面,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70年代中期的一份克格勃报告引述索尔仁尼琴的话称,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作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尽管他们经受了挫折,但持不同政见者们基本上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们人数很少,又遭受迫害,除了来自自己信念的力量和勇气外,他们手无寸铁,而西方也

^①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27页。

^② 参见路透社莫斯科1989年2月27日电。

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软弱无力的声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安全与情报部门向他们全力发起的要使他们保持沉默的运动。在20世纪最后的30多年中,世界上没有哪个地区的进步知识分子能像他们那样为推翻反民主的政治制度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①

2. “立场”与“偏见”:秘密行动与诺贝尔文学奖

对西方国家来说,针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采取秘密行动的重要方式,就是通过扶持和资助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或其他关联人物出版相关图书——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晦的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只要能够破坏苏联的共产主义声誉和制造苏联社会内部的不满。中央情报局隐蔽行动处的负责人就指出:“书籍同所有其他宣传媒体不同,因为一本书就可以使读者的态度和行为发生重大变化,这是其他任何单一媒体所不及的,所以要把书籍当作(长期)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②据资料显示,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图书出版计划确定了以下目标:“通过秘密资助外国出版社或图书销售商,在海外出版或发行书籍而不暴露美国插手其事。出版图书不应与美国政府有任何公开的联系以免受到‘污染’,对于立场‘敏感’的作品尤其要注意。出版图书是出于行动的需要,不要顾及商业上是否有利可图。提倡并资助当地的国家的或国际组织的图书出版或发行。鼓励不知名的外国作家撰写具有政治意义的书籍,其方式是,如果公开联系可行,可以直接资助作者,否则就通过文学经纪人或出版商间接资助。”^③

事实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早已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洞悉。1970年12月21日,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传播的所谓“私下出版”的书籍表明,“私

① [俄]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第533~534页。

②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第275~276页。

③ 同上,第276页。

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传阅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从1965年至今这一时期已出现400多种研究经济、政治和哲学问题的各种学术著作和文章,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批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对苏共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进行修正,提出了各种对立活动的纲领。”^①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忧虑的是,在写作和传播“私下出版”的书籍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图谋”^②。安德罗波夫指出,西方的宣传工具和国外敌视苏联的一些中心和组织把“私下出版物”看作影响苏联政治局势的重要因素。非法出版的杂志和文集被称作“民主的地下工作者”的机关刊物、“自由民主的出版物”,等等。在西方看来,在苏联存在一个“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它具有越来越清楚的轮廓和越来越明确的政治纲领”。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及与它们有联系的反苏移民组织不仅注意到反对派意向的存在,而且企图支持它们,呼吁炮制和宣传伪造文件。在许多这样的文件里,如《苏联的民主运动纲领》《策略原理》《时不我待》中,阐述了关于组织反对苏共的地下斗争的纲领性目标和建议。安德罗波夫在报告中建议,不仅要根据现行法律追究这些人的刑事责任,还要对受他们影响的人实行预防措施。与此同时,安德罗波夫提出应委托意识形态部门在研究问题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思想和政治措施去消除和揭露“私下出版物”中表现的反社会潮流,并拟定在政策中注意促使“私下出版的材料”出现和传播的因素的建议。^③

尽管苏联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加以防范,但是仍然无法阻止西方国家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支持反映对苏联国内怀有“敌意”作品的出版。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看来,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的作品被评为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西方国家遏制苏联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6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将其所著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49

① “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

② 同上,第198页。

③ 参见“安德罗波夫关于‘私下出版物’问题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2月21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

年)的手稿,通过意大利共产党员、广播电台播音员德安捷洛转交给意大利出版商费尔特里内利,并同意在意大利出版这部书。1957年,这部长篇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之后又在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调查中指出,到了1958年夏天,国外开展了一场大肆宣扬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的宣传运动。在美国人的策动下,许多反动的和反苏的团体、组织都参与其事。其中包括“人民劳动联盟”的首领们企图把帕斯捷尔纳克变成似乎在苏联存在着的文学反对派的象征,并把他推崇为“新的民主俄罗斯”的化身。^①

1958年10月,瑞典科学院决定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文学奖。针对这一事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10月23日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这是针对苏维埃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旨在煽动冷战的手段”。苏斯洛夫建议劝告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受奖并在报刊上发表相应的声明。^②苏共中央主席团同意苏斯洛夫提出的建议。11月1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表示:“无论我的过失与迷误有多么巨大,我不可能设想到,我竟会处于西方一些人围绕我的名字而掀起的这样一场政治运动的中心。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③11月5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致《真理报》编辑部的道歉信中说:“授予我诺贝尔奖,我是作为取得文学优异成绩来接受的,为此兴高采烈,并在致瑞典科学院秘书安德斯·艾斯特林的电报中表示了这一切。但是我错了。我之所以犯了这样的错误,是有原因的,只因为在此之前,例如5年以前,我就曾被推荐为这个奖项的候选人,而当时我的长篇小说还不存在。一周以来,我看到了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

① 参见“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2月20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3页。

② 参见“苏斯洛夫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采取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8年10月23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0页。

③ 参见“帕斯捷尔纳克关于被迫离开苏联致赫鲁晓夫的信”(1958年11月1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的通知。”^①

1959年2月20日,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处理意见。报告建议不追究帕斯捷尔纳克的刑事责任,也不对他的案件进行审判。因为按照现行法律,法院无法做到其中任何一条。但是鲁坚科指出,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做出了背叛苏联人民的行为,而且由于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堕落使自己背离了苏联社会,因此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38年8月19日颁行的苏联国籍法第7条“B”款的规定,更合适的做法是作出决定褫夺他的苏联国籍,并驱逐出苏联。^②不过,2月2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经过讨论没有通过该项提议。

在反思苏联政府就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应对措施时,赫鲁晓夫说:“我至今也不能对这部作品妄加评论。我始终没有读过。不过据同我见面的人说,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高。这是个特殊的问题。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去评论作者和作品。我觉得遗憾的是这部作品没有发表。不能以警察的方式去给创作者下判决书。设若《日瓦戈医生》当时就发表了,还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什么也不会发生,我敢肯定!有人会反驳我说:‘你醒悟得太晚了。’是晚了,然而晚了总比没有好。我在此类问题上不该支持苏斯洛夫的。对作者承认与否,就让读者去决定吧。结果是另外一种情况:作者付出了劳动,得到全世界的承认,苏联却用行政手段对此加以禁止……”^③结果就是,“这一禁令带来了诸多祸害,给苏联造成了直接损失。国外的知识界纷纷起来反对我们,其中包括原则上并不敌视社会主义,却坚守言论自由立场的人”^④。

1970年7月,曾经撰写《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法国“艺术与进步”协会的活动家们提交申报1970年的

① “帕斯捷尔纳克关于承认错误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1958年11月5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② 参见“鲁坚科关于对帕斯捷尔纳克采取措施致苏共中央的报告”(1959年2月20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47页。

③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0页。

④ 同上,第1506页。

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再次引起苏联政府的高度重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曾被赫鲁晓夫视为“唤醒了许多人的意识”^①的著作。它激起了人们对于斯大林统治下劳改营发生的事情、对于伊万·杰尼索维奇和他的朋友们在劳改营内的生存条件的憎恶。10月1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阻止向亚·伊·索尔仁尼琴授予诺贝尔奖的措施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指出,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的宣传机构卖力地利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作品以求达到他们的反苏目的。这些国家的报刊不断刊载吹嘘索尔仁尼琴作品的文章,发表“捍卫”这个文学家个人的言论。苏共中央文化部在报告中建议,可以在苏联报刊上刊登简短的材料,向社会公众表明:“提名亚·索尔仁尼琴获奖一事具有政治性质,而不是文学方面的问题,是由不明情况的和公开敌视苏联的人士予以支持的。”^②10月8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继承俄罗斯文学自古以来传统的道德力量”^③。10月9日,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再次向苏共中央书记处呈送报告,明确强调“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和行为早就被资产阶级宣传机构利用于反苏目的。授予他诺贝尔奖旨在进一步强化这种宣传运动”^④。报告建议苏共中央书记处采取措施回应西方国家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的挑衅行为。

1973年12月28日,索尔仁尼琴从1965年至1966年连续两个冬天撰写完成的、反映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古拉格群岛》,在俄裔法国人萨沙·安德烈耶夫的帮助下带出国外,并在俄国侨民出版社——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秘密地排版和印刷。《古拉格群岛》的出版发行,顿时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普遍

①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改革家》(第二卷),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501页。

② “苏共中央文化部关于阻止向亚·伊·索尔仁尼琴授予诺贝尔奖的措施送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70年10月1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③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娜塔丽娅·索尔仁尼琴娜:《古拉格群岛》,胡学星译,群众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7页。

④ “苏共中央文化部和宣传部‘关于针对授予亚·伊·索尔仁尼琴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措施’呈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1970年10月9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关注和大力宣扬。西方报刊大肆鼓吹《古拉格群岛》的问世是苏联共产主义体制开始瓦解的标志。西方的宣传攻势促使苏联政府决定对索尔仁尼琴采取坚决措施。

1974年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根据我国驻外代表机构的报告和外国报刊的报道,在法国和美国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一部新作——《古拉格群岛》。苏斯洛夫同志告诉我说,书记处决定在我国报刊上开展工作,揭露索尔仁尼琴所写的货色和这本书的出版而掀起的资产阶级宣传运动。目前还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但其内容已经为人所知。这是粗暴的反苏诽谤。我们今天需要就此商议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按照我国的法律,我们完全有根据把索尔仁尼琴关进监狱,因为他胆敢攻击最神圣的东西——攻击列宁,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攻击苏维埃政权,攻击一切我们最为珍贵的东西。”^①会议决定追究索尔仁尼琴的法律责任,并责成安德罗波夫和鲁坚科根据政治局交换意见的结果拟定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侦察和审判的程序手续。2月12日,苏联检察院批捕了索尔仁尼琴,并把他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指控他“背叛祖国”。2月13日,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

历史似乎又验证了赫鲁晓夫的话,用警察的方式是解决不了思想问题的。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和流亡美国后撰写的《红轮》,不断引起世人的关注。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如果苏维埃政权以前没有自己的荷马,那么它现在有了。那就是索尔仁尼琴……”^②在美苏冷战格局下,这一点恰恰就被利用起来。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不给历史留空白点”的倡议下,面对索尔仁尼琴发起的“常识”挑战,“在正统意识形态训练下的庞大官方史学界竟然没有一点招架能力”。随着档案的解密,人们发现那些俨然金科玉律式经典片段的历史,有太多的虚构和伪造成分在里面。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索尔仁尼琴的解释和从档案中披露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噩梦中苏醒过来”。

^① “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处置索尔仁尼琴的会议记录摘抄”(1974年1月7日),沈志华总编:《苏联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②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娜塔丽娅·索尔仁尼琴娜:《古拉格群岛》,胡学星译,群众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12页。

作为这股浪潮的开创者,索尔仁尼琴被评论为“一个人用一支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①

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内部的革命

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新进程。”^②因此,作为为了巩固社会主义、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改革的倡导者、思想动力、组织者、领导者——苏联共产党是“改革的保证人”^③。但是戈尔巴乔夫也强调,改革的特殊性和力量在于,改革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改革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④只有充分培养和发挥民主的力量和作用,才能使改革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需要一场彻底的内部革命来重新塑造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政治领域上的巨大“成功”,不过是“为苏联的毁灭以及他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埋下了致命的种子”^⑤。

1. 改革与民主: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人民的事业。只有人民,只有富有多种多样创造力的人才是历史的主角。因此,改革开头的任务、改革必要的条件和成功的保证,就是唤起人们,使他们真正积极起来,关心改革,使人人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自己的企业或机关的、自己的研究所的主人。同时,戈尔巴乔夫又认为,完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要完善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予其巨大的关注,正确地、不抱偏见地分析问题,坚决抛弃一切过时的

① 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13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③ 同上,第150页。

④ 参见[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5页。

⑤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22页。

东西。在这一方面不能仅仅局限于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那么这就要依靠群众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依靠最广大的劳动者阶层积极参加实施既定的改造,也就是进一步民主化。简言之,需要全部社会生活的广泛的民主化。这就是业已开始的过程不可逆转的主要保证。只有通过始终如一地发展社会主义固有的民主形式,扩大自治,我们才可能在生产、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觉的纪律。“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能实现。”^①

改革正是以民主变革的进程开始的,因此实现改革的手段必须争取做到的也是民主的。“实质上,公开性也就成了吸引人们参与政治和使他们参与建设新生活的手段,他们的参与完全符合改革的实质。公开性不仅创造了实现已确定的改革的条件,而且有助于克服对改革政策的抵制。由于公开性,我们得以在社会意识中实现有利于民主、自由文明的人道主义价值的深刻的心理上转变。对于那个时期的基本成就不可逆转的保障之一就在这里。”^②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根据苏联共产党的倡议开始并且在它的领导下进行的。党认为自己有勇气、有力量制定新的政策,并能够领导和开展社会的革命进程。“党首先是从自己,从纯洁自身开始的。”^③戈尔巴乔夫承认党是改革的保证人,但是“这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④。另一个方面就是,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察觉到:党既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但也是改革的最强阻力。“我当时认为现实社会主义应该而且可以进行改革。1985年和1986年这个认识一直激励着我的行动。尽管从1986年秋天起我就发现改革的进程在中层和下层遇到了阻力。”^⑤

1986年4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对他的战友们说:机关“又成了清谈馆。文牍主义泛滥,不干实事。目前情况下最危险的是惰性”。他作出的第一个组织结论就是“要从首脑机关入手。精简机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31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④ 同上,第64页。

⑤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构,让他们自己淹没在文山会海里吧。否则就会出现赫鲁晓夫遇到的情况,机关要了他的命”。戈尔巴乔夫的想法受到主管党内人事的利加乔夫的有力支持。于是,“尽管未能找到可以拖动沉重的改革链条的‘主要环节’,起码已经确定了改革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中间环节,这是呈褐色的官僚化的党机关、刀枪不入的保守阶层,它阻碍着锐意改革的领导层同愿意热情支持他们的大多数居民的重新联合。政治局找准目标,校准标尺,决定转而采取果断措施”^①。

1986年6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戈尔巴乔夫严肃批评了管理机关的文牍主义弊病。他说:“就拿管理机关为例吧。如果你直接了解一下它们的活动,你就会发现,一些部长、总局和企业的领导人相互根本就不交谈,不建立直接的事务联系,一切都通过公文往来。是同志们不能打个电话、碰碰头来解决问题呢,还是企图用公文来推卸责任呢?党的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比如,塔什干市党委和各区党委4个月内向基层党组织下达的决定比去年同期多半倍到一倍。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碰到这种文牍主义作风。”^②戈尔巴乔夫强调:“文牍主义绝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请看一下我们搞的一切检查都是什么吧。不过是研究材料、报表、记录、活动计划,不过是查明问题是否讨论过和是否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总之,习惯于同文件打交道,而不是同人打交道,而且还是通过文件来看人。至于人们如何劳动,如何生活,想些什么,他们有哪些问题,情绪如何,所有这一切都被弃之一边。要知道,党的工作的实质就在于此。”戈尔巴乔夫发出警告:“如果党及其各级组织不形成对缺点、对怠慢工作、对华而不实和空谈不容忍的气氛,就谈不上任何改革。”^③

1986年7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就关于党的作用问题继续讲话:“所有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改革,但是要从党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原则,而且还因为不这样的话,将一事无成。要改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关于苏联1986年至199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和各级党组织在实现这一计划方面的任务”(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6—1987.6)》,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4~35页。

③ 同上,第35页。

革一切东西。也要改造党。这是具有历史规模的任务,并会有巨大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已经开始。不要怕这个词。”^①

1986年9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指出:“我们的意图是实现生活各个领域的根本变化。就其实质来讲,我把这些变化叫作革命的变化。显而易见,在这些变化过程中,触及各个劳动集体和各个家庭的利益、状况、地位及命运,触及各级地方党政机关、苏维埃机关、经济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以及国家各级政权的活动。”^②

1986年9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戈尔巴乔夫补充了他在前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正式宣布要“炮打司令部”:改革,首先要从党的首脑机关开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沃罗特尼科夫在回忆此次政治局会议时写道:“正是在那时戈尔巴乔夫宣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口号。”^③

到了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推进民主化进程的目标已经明确了。在他看来,苏联就是民主力量复活的主要障碍。只有通过公开性的倡导,才能打碎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官僚极权机制,才能释放民主所需的水和空气。但是让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公开性的提倡犹如一个火花,迅速点燃了社会的炸药桶。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指出:“苏联共产党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神秘与谎言。它不仅完全控制现在的信息,还彻底控制着历史事实。我并不认为,戈尔巴乔夫理解这一点。或者说,他并不知道,通过为艺术家、记者和历史学家解绑,他将严重削弱苏联政权的合法性和生存基础,所以他的改革也不可能成功。公开化、包括苏联历史真相的公开化,戈尔巴乔夫放弃国内的高压政治策略——解除绝大多数苏联人的恐惧心理——与其他因素一样,导致了苏联最后的崩溃。”^④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99页。

^② [苏]戈尔巴乔夫:“在会见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时的讲话”(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4页。

^④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

2. 权力与野心：反对派与失控民主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公开性和民主化并没有发挥他所想要的效果——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苏联稳步推进改革。相反，戈尔巴乔夫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反对派。在攫取政治权力的欲望驱动下，所有的反对派顿时化身为嗜血的狼群，向苏联共产党发起了连绵不断的政治攻势。就像雷日科夫批评的那样：“率先搞公开性，为国家机构的活动奠定民主的基础绝不是容易的事情。应当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困难还不止是党中央不愿意放弃管理新闻媒体的努力。我们在社会上贯彻开放原则时遇到的不少困难，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困难均来自那些不择手段地全盘否定苏维埃时期历史的颠覆势力。”^①

夺取权力的过程恰恰就是在戈尔巴乔夫高举“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下公然发生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既是戈尔巴乔夫对列宁政治思想的继承，同时又是戈尔巴乔夫打破苏联共产党政治垄断，推进人民自治、人民政权建设的逻辑必然，更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政治体现。戈尔巴乔夫指出：“改革并不是暴力革命，而是一个排除激变及由此引起的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人民灾祸和苦难的和平改良过程。它要求高超的技巧以便最好地选择权力交接的时机。这种交接只有在自由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利用它深化民主制、继续推进旨在建立法治国家和社会目标明确的市场经济的改革时，方能完成。”^②

不过，戈尔巴乔夫似乎忘记了，政治从来就不是在玩拼图游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而随意更换。“为了用改革的杠杆撬开党的官僚这块水泥板，就得有个支点，有几个支点更好。在一党独霸天下的情况下，要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这些支点，谈何容易。如同招魂会中一样，又呼唤‘列宁精神’前来帮忙。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离开列宁我们就迷失方向，忘记了苏维埃。’在苏维埃政权成立70周年的时候想起苏维埃，想起革命领袖赋予苏维埃的

^①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43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

意义,大概只能是出于绝望。然而戈尔巴乔夫没有别的选择:需要利用手中的资源组建自己的军队。然而,无论是苏维埃,工会,还是他在反复阅读列宁的政治遗嘱时也会想起的‘文明的合作社’,他都未能依靠。所有这些‘传动带’都是靠苏共中央这个唯一的飞轮来驱动的。”^①

于是,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政治宣言中,庞大而复杂的苏联政治体系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被戈尔巴乔夫简单而又彻底地更换掉,留下了政治上的一片狼藉。“现在很清楚:国家从一种政体向另一种转变需要一段时间。遗憾的是,一时冲动和感情用事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时甚至能决定一切。党的领导体系在瞬间便被从上到下地拆除了,而各级苏维埃却缺乏单独行使管理职能所必需的干部和经验,政权的瘫痪无力很快就遍及全国。”^②

1989年初的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运动加速了政权瓦解的进程。3月26日,全苏各地进行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4月4日,苏共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结果。各选区的选举是在3月26日进行的,各社会团体的选举是在前两个星期进行的。在2250个代表名额中,已选出1958名人民代表,其余的人民代表将重新选举。在当选者中,妇女占17.1%,工人占18.6%,集体农民占11.2%。当选者中的苏共党员比例为87.6%。居住在苏联的60个民族的公民被选入国家最高政权机关。4月27日,戈尔巴乔夫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再次商讨关于政治改革的方案。戈尔巴乔夫回忆,这次讨论可不是关于起草发言稿的事,而是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晔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32~133页。

^②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40页。

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①

从1989年5月至1991年9月,号称代表人民意志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总共召开了五届会议就结束了它的政治使命——重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但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却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分裂和混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政治反对派夺取政权的主要政治舞台。最终,这一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一纸决议不仅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且亲身参加了把自己赖以为基础的政治载体——苏联——送入坟墓的政治大狂欢中。雷日科夫指出:“改革宣布的公开性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变成激发群众积极性的动力,变成净化与创造的力量,而是变成了破坏的武器。期待已久的畅所欲言的机会到来了,人们为此欢欣鼓舞,但是政治和经济方面没有同时发生迅速的变化。思想和愿望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脱节,被破坏力量用来贬低改革的目的和任务。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历史狂躁’综合征,人们觉得一切积极的变化都来得太缓慢,总认为当局不愿意立即将人们的意向和愿望付诸实践。这就加剧了社会上的紧张气氛,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这点来破坏国家和国家的社会制度。”^②

苏联人民代表瓦连京·拉斯普京深刻描述了政治反对派是如何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变成政治夺权工具的实际情况。他说:

作为一名“人民当政机构”的代表,历次代表大会,甚至每一次会议,我都从来没有缺席过,因此有权多说几句:那真是一种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把已经白热化的气氛炒作得更加炽热了。不过,这种白热化气氛当时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边疆地区,而1989年5—6月间对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两个星期转播,却把仇恨的种子撒遍了每一个角落。“革命者”对此作了精心策划,并有精确分工。不排除大会开幕前一个半月发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经过精心策划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

^②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49页。

的，它正好安排在这个时间。否则怎么会这么巧，恰好给肆无忌惮地向联盟政权展开进攻提供炮弹呢？这一来全国都可以看到当局有多么软弱，它正在退让。代表大会开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闭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发生了血洗费尔干纳事件。1990年1月，巴库再次出现更恐怖的血腥屠杀。而且，紧随从“人民监狱”里跑出来的自发暴徒之后，维尔纽斯又发生了电视塔挑衅事件，还动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谁都知道，血总是越搅越腥的。

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出现的野蛮行径简直难以名状。为了让非正义事业取得胜利，不仅要求不讲道德，不知羞耻，还要不顾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讨论！那些家伙像划分战斗队似的按地区划分小组，在没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况下，受到初战告捷的鼓舞，在国内外公开的和隐藏的敌人的支持下，经常用打冲锋的办法来抢话筒，对与会代表横加谩骂，而且讲的话常常根本不是冲着人去的，而冲着电视镜头，更不许别人开口。只要见到谁对他们构成威胁，谁能阻拦他们的那种破坏的杀气，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罗季奥诺夫上将等，他们就会像一群疯狗似的扑上去，刻意罗织罪名，提供伪证，以最无耻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势。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会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样的方式传入政权机关。最后，政权终于被夺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罗斯的主子。^①

三、政治反对派：叶利钦与西方国家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最初伙伴中的第三个人，在权力阶梯上的地位低于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他是共产党政治局的候

^①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3页。

补委员,不是正式委员。但他显然注定要成为这三个人中最重要的一个”^①。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就认为,分析苏联灭亡的主要前提条件,不能不考虑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相互关系这个因素,亚纳耶夫把这种关系定位为“动物学上的相互憎恨”。同时,他们实质上完成了同一个任务——动摇和毁灭了苏联。“正如当时有人说的那样,两只狗熊待在一个洞穴里,显得太挤了。”^②从1991年初开始,叶利钦发动了积极反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运动,并且在这场赌博中最终成为最大的政治赢家。

1. 改革的“佐罗”: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

莫斯科市委书记一职在苏共党内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这是全国各地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位,因为它包括统治着广大帝国的中央官僚机构。”^③1985年12月24日,苏共莫斯科市委召开全体会议,选举叶利钦为市委第一书记,原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被免职。

选择叶利钦执掌首都党组织,戈尔巴乔夫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一方面,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关系。1983年,戈尔巴乔夫在接受安德罗波夫交代的更新党政干部的任务时,就把叶利钦列入干部提升名单。利加乔夫回忆:“1983年12月底,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从医院里给我打来电话,说我有机会时走趟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去‘看看’叶利钦。不久这种机会来了。1984年1月我到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那里参加了州的党代表会议,还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一起去访问过劳动集体。坦率地讲,叶利钦同人们交往的活跃,他的精力充沛和办事果断吸引了我。显然,很多人对他都很尊重。”^④但是由于安德罗波夫的去逝,这项干部更换的设想暂时不能实现。不过,当戈尔巴乔夫就任总书记后,叶利钦的机会来了。于

①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②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362页。

是,利加乔夫向戈尔巴乔夫推荐了他。利加乔夫的推荐为他后来招来了非议。亚纳耶夫在苏联解体后说:“我认为,利加乔夫犯了个大错误:邀请当时担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党委第一书记的叶利钦到莫斯科工作——起初担任建设部部长,然后是中央书记。当叶利钦被选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他的举止完全符合时代精神,第一件事就是赢得‘群众爱戴’。”^①另一方面,正如利加乔夫当年观察到的那样,叶利钦是一个有魅力的领导人。而这一点,对于戈尔巴乔夫清除莫斯科存在的腐败现象是迫切需要的。作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最大的政治竞争对手,格里申是此前莫斯科党组织的首脑。叶利钦被任命为该市党委第一书记,他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自勃列日涅夫和契尔年科以来在这个关键的党组织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腐败”^②。对于叶利钦的工作,戈尔巴乔夫给予了强力支持。他对斯拉文说,当时莫斯科确实存在黑社会组织。而且,“摧毁这些黑社会组织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此,在叶利钦刚来莫斯科工作的那些日子里,我是支持他的”^③。

精力充沛的叶利钦也对总书记的器重投桃报李,非常认真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叶利钦的警卫科尔扎柯夫回忆:“最初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奉若神明。他和苏共中央总书记之间有一条专用的热线电话。只要这部电话一响,叶利钦就飞快地跑过去。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电话相当频繁。但是接近1987年时,电话铃声就越来越稀少。叶利钦是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热心参加各种党内活动,当时他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丝毫不感厌倦。在这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他可能是最忠诚的党员,比任何别的党内首领都更愿竭尽全力去改善生活。”^④叶利钦真心实意地接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并以自己的方式来体现改革成果。“例如在莫斯科,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建起了农贸市场,当时莫斯科人买菜、水果、禽蛋、蜂蜜都十分方便。叶利钦当时自己

①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④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41页。

看报,他个人认为改革是雷声大、雨点小,除了公开性之外,全国上下没有新鲜货色。报纸杂志上大块文章也只是强调公开性。”^①不久,叶利钦“就成为普通莫斯科人心目中的英雄,成为有很强权势欲、并对其领导层同僚构成潜在威胁的对手”^②。但是叶利钦工作上的粗暴做法也开始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满。戈尔巴乔夫说:“不久他的一些极端做法和庸俗的工作作风就表露出来。他在工作中对干部采取粗暴的态度。他对各区委会的工作不是检查,而是严厉斥责。有些区委会派人到中央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有些人甚至不知该如何摆脱这种工作方式。这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市委常委会可以在夜里11~12点开会,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他是如何工作的,而其他的人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他把这种工作方式称之为创新。实际上,这是典型的庸俗外省风习。”^③

叶利钦在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印象从1987年1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开始发生转变。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戈尔巴乔夫在1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关于干部政策的报告发生了争论。争论是由报告中的以下措辞引起的:“首先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苏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未能及时、充分地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和社会中危机现象增加的危险性……”叶利钦建议应该具体说明是哪些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表示:“反对在评价过去中把事情搞成评价前几届领导成员和党中央成员。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政治结论以及为未来汲取教训。”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进度缓慢的原因在于干部政策和管理机构的错误。政治局内的这次争论非同寻常。如果说在此之前政治局内部最激进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智囊团”,那么此次政治局成员中则出现了一个竟然敢于批评他们立场、坚持更加激进立场的人。“戈尔巴乔夫针对叶利钦说了一番话:国家需要改革,而不是折腾干部,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在莫斯科所做工作的评价。

①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②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69页。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套马车散伙了。这对叶利钦是个有力打击,因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所必不可少的靠山没有了。”^①9月12日,叶利钦致函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抱怨他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并请求辞职。“叶利钦的信——党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文件之一。他自愿要求从党的最高层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没有先例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称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党的政策——口头上大喊拥护改革,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依然如故。他认为,利加乔夫是党机关固步自封的代表人物。从叶利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经心灰意懒,对国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②

然而戈尔巴乔夫也不相信叶利钦了。戈尔巴乔夫后来对斯拉文说,叶利钦虽然穿着改革的外衣,可实际上仍然是一个严厉的党阀。“因为自己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感到压抑。这是他的致命点,他权力欲望极强又容不得人。至于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民主派,那纯粹是演戏。所有民主派都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所有的人都‘利用’了。在全会上他说,我们对总书记有吹捧的成分,报告中要明确反对个人迷信,反对集权主义,反对专制,而我们却允许对总书记搞个人迷信……他当时讲的这些话非常有意思。叶利钦通过打击那些掌握大权的人使自己成了英雄,他开始千方百计在民主化的道路上砸碎一切,但是他在逐步进行的,当时他也只能如此。”^③

10月21日,在苏共中央召开关于戈尔巴乔夫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全会上,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的矛盾彻底公开化。这次全会本来只是走过场地讨论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报告的草稿。但是叶利钦坚持要求发言。他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讨论过多次了,今天也没有什么好说的。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49~550页。

^② 同上,第567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8~29页。

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住。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和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而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① 叶利钦的发言使全会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随后,有26个人起来发言批评叶利钦。“在公开的速记记录上,叶利钦的全部讲话不到两页,而谴责他的讲话有48页,这是竞相指责、侮辱叶利钦的48页……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无一例外地指责叶利钦。”叶利钦最后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发言是个错误”,全会给他“上了严峻的一课”。这次会议通过的专门决议指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结合中央全会上形成的意见,研究鲍·尼·叶利钦同志要求解除其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②

10月31日,苏共中央书记卢基扬诺夫对外界宣布,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有“政治错误”。

11月1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列·尼·扎伊科夫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11月11日,苏共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批评叶利钦的错误,并解除他的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同时选举扎伊科夫为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会议上发言,指责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是“故意歪曲”,“实质上是

^① 参见[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孜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68~572页。

企图使人怀疑四月全会以来党的改革工作”,还批评叶利钦的作风和方法是“假革命的辞句和假坚决”。^①

11月12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例会。戈尔巴乔夫指出:“第一……叶利钦实质上对改革发起了进攻,对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表现出不理解。更有甚者,他从蛊惑人心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受到全会的一致谴责。总而言之,应当首先对他进行政治谴责,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即所谓递交辞呈问题,必须指出,大家并不支持他,虽说当初支持过他,那是在最初阶段,高呼口号的时候,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②

1988年1月14日,叶利钦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此时叶利钦依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③

尽管此时的叶利钦看起来似乎已经走到了仕途的终点,但是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民主选举运动却使叶利钦绝处逢生,开始以苏共党内的激进改革派自居,并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拥护与支持。1989年4月7日,法国《快报》对此发表评论:“叶利钦:一位圣人。”该评论指出:

他的一绺白发已像瓦文萨的小胡子那样出名了。叶利钦198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而且也成了一位国际明星。无论如何,他是苏联历史上进行首次差额选举所产生的英雄。

上调莫斯科。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叶利钦应雷日科夫之召到重要的工业和建筑部门去整顿秩序,他是在4月到达莫斯科的。他的工作能力和直言不讳吸引了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7月1日,叶利钦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处。12月24日,戈尔巴乔夫排挤了他的前政敌莫斯科市委书记维克托·格里申。戈尔巴乔夫挑选了叶利钦替代格里申。

叶利钦的任务是治理首都。他提出了许许多多大胆的建议,推倒了

^①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年,第65页。

^②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73页。

^③ 参见[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72页。

所有的旧习。他和大家一起乘车,隐名埋姓地在商店门前排队,突如其来地巡视工厂。他辛辣的讲话和蔑视禁忌使记者们感到欣喜。他反对官僚的麻木不仁、弄虚作假和受贿使他获得了改革的佐罗形象。由于他有戈尔巴乔夫撑腰,他发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清洗,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把莫斯科市委的干部换掉了2/3,让几百名贪污腐化的公职人员受审,把几千名无所事事的官僚分子的职务给解除了。更有甚者,他开展了反特权运动,关闭向领导人供应物品的特供商店,怒斥购买黑市伏特加的行政官员的妻子们。他的活动范围是无边界的,因为他在1986年4月说,“我们挖呀挖呀,然而,我们始终看不到这口脏井的底部”。

过分了,这太过分了。共产党的常务机构惊慌失措,继而起来反抗,还组织反击。叶利钦无法无天,听不进政治局的警告,甚至置戈尔巴乔夫的警告于不顾。几个月后,在1987年10月21日中央委员会举行值得纪念的全体会议时,他从高位上跌下来。因为他毫无节制地抨击改革的对手,又由于他在政治局内部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差别,叶利钦让所有的人都对他感到讨厌。甚至戈尔巴乔夫也奈何他不得。叶利钦这根保险丝必须得掐断。11月11日,一个在政治上被消灭的人做了可怜巴巴的自我批评之后,他的辞呈被接受了。然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1月18日,叶利钦得知他被任命为与部平级的国家建委第一副主任。他仍然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是他的老朋友们给他的安慰吗?还是戈尔巴乔夫为了缩小克里姆林宫保守分子的胜利的一种方式?叶利钦简直是本性难移,因为当他再次走马上任时,他把来交给他特供商店的出入证的公职人员拒之门外……当选人民代表半年以后,他参加竞选。在党的第19次全苏党代表会议的前夕,他接受了几次火药味很浓的专访。他虽然在莫斯科遇到障碍,可是他被选为卡累利阿的代表,而在这小型的代表大会的讲坛上,他攻击党的第2号人物利加乔夫,从而闹出另一场乱子。叶利钦是不是性格暴躁、欠谨慎、好虚荣,还好哗众取宠呢?当然是。

但是,他并不是天真。他特别乖巧。他拒绝苏联全国各地向他提出的几十条建议,他选择了作为莫斯科市委下台书记的身份在首都的

选区内竞选人民代表，因为他有 700 万选民。吉尔汽车厂厂长叶夫根尼·布拉科夫将代表党的立场决定阻拦这个惹人讨厌的人。而且在最高层发动了一场反叶利钦运动。

太迟了，因为大家没法让叶利钦保持沉默。莫斯科街头支持他的示威游行不断增多，有人在地铁贴了颂扬他的诗，有人收集了成千人的签名，有人出售他的模拟像章。不仅民意测验表明叶利钦独占鳌头，而且著名的社会学家塔季扬娜·扎斯拉夫斯卡娅透露他在苏联的民望仅次于戈尔巴乔夫！

3月26日，叶利钦获得了 89.44% 的选票。取得这样的成功，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①

2. 叶利钦与美国之一：苏联人民代表

1989 年当选苏联人民代表的叶利钦此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明显关注。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说：“我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主动与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其他苏联改革派建立联系。”^②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就是其中的积极主张者。他认为，作为一位著名的公开反对派，叶利钦对苏联事务渐渐开始发挥重大的影响，而且得到了某种认可，美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与其进行接触。对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来讲，他自己也确实想见见这位苏联的反对派，以进一步摸清苏联的国内事务。布什说：“我想见见叶利钦，因为他在苏联支持那种我们希望的、根本性的变革。苏联人长期以来一直接待竞选总统的各种美国人，所以他们对他们愿意会见他们的反对派应该理解，而且特别的是，这些反对派还是些支持改革的人，我想听听叶利钦自己对苏联变化的看法。”^③

事实上，对叶利钦来说，能够出访美国也具有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访

^① [法]贝尔纳·勒孔特：“叶利钦：一位圣人”，《快报》，1989年4月7日。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11页。

^③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1~132页。

问美国的举动背后表明了叶利钦作为激进改革家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并非是作为前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样的仅限于国内的政治影响。叶利钦的目标很明确:“他要达到的重要目的是,要让美国领导人把他看做一位政治活动家,承认他是反对派领袖,能够与戈尔巴乔夫竞争。”^①1989年9月,叶利钦以私人资助的方式应邀到美国演讲。

9月9日,在得到苏共中央驻外干部和出国工作部的批准后,叶利钦启程前往美国进行为期8天的巡回演说。陪同叶利钦访问的有助手列夫·苏哈诺夫、人民代表维克多·亚罗申科和《共青团真理报》观察家巴维尔·沃夏诺夫。

9月11日,叶利钦在美全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中露面时,有人问他,戈尔巴乔夫还有多少时间在苏联拿出成绩来。叶利钦通过一名译员回答说:“我敢说,不超过一年,很可能半年左右。他剩下的时间就是这些了。”叶利钦说,如果苏联没能取得进展,将会出现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最终导致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这正是我想同美国政府讨论的。”^②

9月12日,叶利钦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演讲。他说,改革的胜利之一是苏联承认了派军队驻阿富汗是错误的。叶利钦认为他的这番话应该得到的不仅仅是现场观众全神贯注的沉默。最后他博得了一阵笑声。当叶利钦拿共产主义打趣的时候又赢得了几次最热烈的掌声。他说:“我不知道共产主义能在哪一天、哪个时辰在苏联实现。请记住,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理想,是空中楼阁,我们根本不应该试图在这里实行共产主义。”在美国听众看来,叶利钦除了西服翻领上那一枚红色的苏联徽章之外,他看起来更像一位美国高级参议员,而不像苏联政治家。^③

演讲完后,叶利钦按照事先计划前往白宫会见斯考克罗夫特。不过,叶利钦的目的还是在于能够与布什会面。因此,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待叶利钦时观察到他在布什总统出现前后的戏剧性表现:“有点抑郁的叶利钦,沉浸

①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2页。

② 路透社纽约1989年9月11日电。

③ 参见路透社华盛顿1989年9月13日电。

于滔滔不绝地大谈十全十美的计划概要。他称,通过此计划美国可以援助苏联的经济改革。其演讲的核心是他胸中酝酿已久的如何来管理苏联的见解。布什总统的中途光临打断了他的表演,但他显然来了精神,变得更加热情澎湃。布什总统的顺便会见只有几分钟,在此期间他告诉叶利钦,他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有种积极的关系,并重申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布什总统离开后不久,副总统奎尔也为合影和简短的交流而来顺便看望了一下。在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结束了会谈,然后叶利钦起身离去。”^①作为会谈的参与者,盖茨也观察到了这一有趣的一幕。“叶利钦发表了漫长而枯燥的讲话,就美国如何帮助苏联解决经济问题提出了十点建议。在他慢吞吞的讲话过程中,我发现布伦特越来越没有精神,似乎马上就要睡着了一样。最后,我们都失去了注意力。当鲍里斯·叶利钦阐述如何管理苏联时,布伦特竟然发出了鼾声。然而,叶利钦似乎非常专注自己的讲话,竟然完全没有注意到听众的反应。不过,当总统走进房间坐下时,他的态度发生了彻底改变。他就像一条变色龙,完全换成了另外一副神态。他重新恢复了活力、充满了热情与幽默。在他看来,真正值得交谈,真正拥有权力的人终于到场了。”^②

事实上,“临时顺道”出现的布什总统是美国政府事先安排好的出场计划。斯考克罗夫特说,尽管布什与叶利钦都有接触的意愿,但是毕竟此时的叶利钦还处在最困难、最失意的日子里,美国政府对他的政治前景并不看好。因此,在如何接待叶利钦的问题上斯考克罗夫特颇费心思。他回忆说:“叶利钦的美国之行广受关注。他是一位秉性粗犷的人物,他的作派,特别是他的豪饮,往往是记者们大做文章的好材料。因为不满改革的步骤与进程,他也在利用一切机会来贬损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包括某些人身攻击,如在接受早间电视新闻节目采访中,他就是这样做的。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在美国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高兴,这不是由于戈氏不喜欢他。在俄罗斯叶利钦是一位著名的公开的反对派,他对苏联事务渐渐开始发挥重大的影响,而且得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11~412页。

到了某种认可。但是值得总统在白宫会见他吗？而如果不，又用什么方式来接待他呢？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让他利用这次访问来打击戈尔巴乔夫。”^①因此，在和布什协商后，斯考克罗夫特制定了一个由他来陪同叶利钦，而后布什总统“顺便拜访一下”以示对来访者表示欢迎，但严格限定接待时间的计划。这样的目的是为了避开引起美国国内舆论的猜测和戈尔巴乔夫的不满。盖茨说：“布什总统和布伦特担心，如果在椭圆形办公室正式接见叶利钦并有众多媒体采访报道，戈尔巴乔夫一定不会高兴。于是，他们决定将叶利钦迎至布伦特的办公室，由他和我与其会晤。然后，总统‘顺便造访’。”^②

尽管只是“顺便拜访”，但是叶利钦还是抓住了这一难得的机会展示自己的政治形象。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将叶利钦带到西隧道入口处，以避免撞上记者。当他的车开上西公务大道时，他一定看见了草坪上的一些记者，他们在这里拍摄白宫的景物。叶利钦停下车并钻了出来，于是立即引起了注意。他迅即被记者包围，趁机进行了一场即席的新闻发布会。”^③在其后的巡回演说中，叶利钦越来越公然地表示对戈尔巴乔夫的不满，并向美国听众展示他自己的改革计划。

9月14日，叶利钦在访美期间接受公共广播社的采访时回答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

问：苏联能否实现改革目标，正如您说过的，人们希望达到改革目标，同时仍然保留共产主义国家？

答：照我看来，“共产主义”这个词大体上仍然只应理解为是一种能够经常提到（也只是提到）却不能享受的幻想或主张……需要的是某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时不单单要考虑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而且也要考虑诸如美国这样国家的经验。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11页。

③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2页。

美国已经有200多年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经验了。从民主的观点看,你们这里是有东西可学的。在制定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时也必须采用学到的这些。

问:就是说你们可以把共产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

答:我再说一遍,共产主义是头脑中的东西,是幻想中的东西。要是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那就是更新的社会主义了,不是口号式的,也不是兵营式的了,而是更新了的,以社会主义新模式表现出来的东西了……这就是与民主相结合。

问:您是否认为自己还是共产党员?

答:是的,我并没有被开除出党。

问:但是思想,我指的是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在左右您的头脑吗?

答:可以说,共产主义思想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①

9月15日,叶利钦对达拉斯世界事务委员会说:“为了减轻右翼对戈尔巴乔夫施加的压力,我们必须召开第28次党代会,将那些保守派清除出政治局。”他说:“有5人必须离开政治局。”他点了名字的几个人是:利加乔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和乌克兰的谢尔比茨基。叶利钦说,尽管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位苏联领导人是“极不可能”被推翻的。^②

尽管布什和叶利钦通过取巧的方式举行了会晤,但是结果对双方来说都不令人满意。在美国政府看来,叶利钦的访问给其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那次访问之后,美国政府官员一直批评他,不喜欢他。”^③对叶利钦来说,在与布什的会晤中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明确支持。事实上,布什重申了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

不过,叶利钦与布什的会晤仍然表现出极大的政治意义。“戈尔巴乔夫

^① 塔斯社华盛顿1989年9月14日电。

^② 参见合众国际社达拉斯1989年9月16日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34页。

正满怀醋意地关注着自己对手的美国之行。叶利钦也可以说与美国总统作了交谈。”^①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访问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叶利钦的思想转变。在返程飞机上,叶利钦双手抱头坐在那里,脸上明显反映出内心深处的斗争。他充满感情地宣泄着不满:“都把我们可怜的人民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一辈子都在讲神话,一辈子都在发明什么,可世界上什么都已发明了。”在姆列钦看来,“‘品种丰富’这一点不是那么容易使叶利钦感到惊奇的,我们不要忘了,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也享有高消费的特权。但是,看来,老百姓无法看到的党内商品供应库,尽管闪耀着‘特权官员’的光彩,但总是带有陈腐的印记。同美国平平常常的超市相比,更显得可怜兮兮的。我认为有这种可能,即从休斯敦回来之后,叶利钦的布尔什维克意识里的最后支柱彻底坍塌了……”^②

3. 叶利钦与美国之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尽管叶利钦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并没有给美国政府留下良好的印象,但是很快叶利钦就以自己的行动让美国政府对重新重视起来。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选举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5月22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主权宣言草案的提案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纲领。他说:“俄罗斯应该像个主权国家那样,自主地与别国签署经济、科技、文化合作、贸易往来的条约和协议。”叶利钦的发言令苏共中央和戈尔巴乔夫大为震惊。很明显,如果由叶利钦来领导最高苏维埃,那么他将站在苏联政权反对派的立场上。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应当阻止叶利钦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5月24日,人民代表大会开始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大会并对代表们发表了强硬的讲话,反对叶利钦的俄罗斯主权的提法。戈尔巴乔夫寄希望于由80%的共产党员组成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能够阻止叶利钦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希望落空了。5月29日,叶利钦以535

^①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4~195页。

^② 同上,第192页。

票战胜竞争对手成功当选为苏联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

5月30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对记者说: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得非常带劲儿,是民主的并且是第一次没有按事先安排的方案进行的。记者们向叶利钦提出的许多问题涉及了他将来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叶利钦承认:“是的,我们有分歧。”“但是,一部分问题逐渐消失,有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但是一系列问题暂时还留了下来。我想,同国家总统的关系应当是公务性的,是建立在对话、谈判的基础上的,应当是一种有原则的关系,不损害俄罗斯的主权和问题。”“我将完全抛掉我过去和现在在这种关系中的一切个人的东西。”^①

对叶利钦政治地位的上升,美国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就在叶利钦当选的5月2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对媒体表示,美国需要密切观察苏联的改革者——叶利钦地位上升一事。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在密切注意苏联局势时,贝克答道:“是的,我们在密切注视着苏联的局势,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态发展,我丝毫不想贬低它的重要意义。”贝克说,叶利钦是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为激进的改革者,但是贝克又说,人们对他有許多看法,他经常触怒戈尔巴乔夫。一位要求不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他是一个改革者,但他也是一个蛊惑民心的政客。至于他在情感上是否稳定,还是有疑问的。他和戈尔巴乔夫显然互不喜欢,他们可能发生争吵。”^②

6月6日,盖茨在中央情报局给布什总统的备忘录中发出警告说:“由于1989年那次会晤的影响,我们可能低估了叶利钦。”盖茨指出:“他用行动证明自己非常擅长利用新制度规则,并再次成为了一名政治领导人。尽管有些古怪,他看起来是一位工作高效和受公众支持的政治家……”最后,盖茨建议:“他将成为苏联政坛上的一名主要参与者,至少一段时间内是这样。我们必须停止对他进行公开批评,将来有一天,我们有可能要和他坐下来协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5月30日电。

② 路透社华盛顿1990年5月29日电。

商问题。”布什在页面空白处写道：“我赞同这一点。”^①从这以后，美国针对叶利钦的负面报道大为减少。

7月12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在苏共二十八大会上发表关于退出苏共的声明。这是他在被提为苏共中央委员候选人时宣布的。在说明自己决定的理由时，叶利钦说，鉴于他已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对俄罗斯各族人民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考虑到社会向多党制过渡，他不可能“只执行苏共的决定”。叶利钦继续说，作为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首脑，“我应当服从人民和人民全权代表的意志。因此，根据在竞选前自己保证要承担的义务，我宣布自己退出苏共”。^②

从这一刻起，叶利钦正式成为苏共的反对者，成为戈尔巴乔夫走上政治末路的主要推手。根据苏联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就苏联居民对政治活动家们的态度问题的民意测验显示：在2680名被调查者中有61.3%的人对叶利钦的活动表示完全赞成，21%的人不完全赞成，5.3%的人不赞成。而对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只有28.5%的被调查者完全赞成，40%的人不完全赞成，19.5%的人不赞成。在回答“谁的行为你最喜欢”这一问题时，有34.2%的被调查者提到叶利钦，10.2%的人提到戈尔巴乔夫。^③到了1991年1月，70%的人认为最理想的政治家是叶利钦，只有14%的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④调查结果表明：叶利钦的威望已远远超过戈尔巴乔夫。

4. 叶利钦与美国之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

进入1991年以后，叶利钦的政治野心不断膨胀并日益明确了其政治目标——摧毁苏维埃制度。叶利钦说：“俄罗斯的主要怪诞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怕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34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90年7月12日电。

③ 参见[苏]《国际文传电讯》，1990年9月，转引自《参考消息》，1990年9月18日。

④ 参见[日]《每日新闻》，1991年1月1日报道，转引自《参考消息》，1991年1月3日。

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①

2月19日，叶利钦通过公开广播猛烈抨击戈尔巴乔夫40分钟：总统欺骗了全国，他的政策是反人民的。他的身上有民族冲突的鲜血。他使国家完蛋。他是使人民贫困的罪魁祸首。他的许诺毫不兑现。叶利钦要求总统辞职。^②

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发表讲话，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回击共产党复仇的努力。^③叶利钦宣布：“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央——庞大的、官僚主义的中央……我们应当摆脱它。”“举行全民公决是为了国家领导人的现行政策得到支持，其目的是为了保留联盟的帝国单一制实质，为了保留制度。”^④

3月28日，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不但保住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而且还得到了代表大会赋予的实行改革所需要的补充权力。在3月29日的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他在苏联发生了变革条件下的政治纲领。他号召各共和国和政治力量按照圆桌会议原则开始进行对话，形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

4月24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总统选举法》，规定凡是满18岁的俄罗斯公民都有权参加俄罗斯总统的选举。选举将在普遍平等和行使直接选举权利的基础上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

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获得了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2页。

② 参见[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17页。

③ 参见[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91页。

④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47页。

57.3%的选票、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在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前期的准备过程中,叶利钦、雷日科夫、日里诺夫斯基之间的选举斗争表明:从实质上讲,这是苏共和成分复杂的政治运动——“民主联盟党”之间的斗争,这也是苏联支持者和俄罗斯独立支持者之间的斗争。“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面埋下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了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上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现出了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①

成功当选总统的叶利钦决定在第一时间出访美国,以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力。而对美国政府来说,苏联政治局势的剧烈变化也要求其迅速与叶利钦这位苏联最大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更为紧密的接触。布什总统认为,叶利钦的当选及其对戈尔巴乔夫和苏联共产党的抨击,并反复强调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自身利益的举动表明:“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挑战不仅是因为他们间的敌意,而且是因为叶利钦是苏联中心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从历史上看,苏联与俄罗斯本质上不可分的。现在叶利钦第一次在苏联与俄罗斯之间作了区分,而且肯定俄罗斯的利益反对苏联的利益。”^②斯考克罗夫特也看出了叶利钦的意图。“当叶利钦开始拒绝苏联和党的权威、重新肯定俄罗斯对其共和国自身事务的控制时,他攻击的是苏联国家的基础,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政治结构。”^③6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在白宫会晤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此时的叶利钦与1989年见面时已经是焕然一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崭新’的叶利钦。随着责任的加重,他也成熟了许多。他穿着得体、举止高雅严肃。他的行为像一个大人物,也希望别人将他当大人物看待。即使斯考克罗夫特也不得不承认叶利钦让他感到耳目一新。”^④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26页。

③ 同上,第527页。

④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

这次会见叶利钦给布什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布什说:“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次访问很愉快。他是个很投入也很有趣的人,他富有感染力的大笑使他很讨人喜欢。与他以前的访问不同,他似乎已经翻过了戈尔巴乔夫这一页,显得干净利落、进取心十足。”布什对与叶利钦的谈话也深感满意。“在谈到改革时,叶利钦讲了所有我们愿意听到的话,而且他把自己与戈尔巴乔夫放在同等的政治地位上。感觉到他正在对作为联邦和加盟共和国的外交主渠道的中央政府的作用提出挑战,我试图在支持这位新总统与支持中央政府方面保持平衡。我一遍遍向他解释我们非常尊敬他,并且尽可能多地与他们做生意,但是我不能削弱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说他理解并向我保证他与戈尔巴乔夫关系很好,他说,戈尔巴乔夫完全同意他所做的事情。”^①叶利钦向布什保证,俄罗斯坚定地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没有他(戈尔巴乔夫)我们(美国和叶利钦)不能活动,我们只能在一起行动。叶利钦声称:“戈尔巴乔夫的离任和其他人上任将是个悲剧,人民可能上街,内战可能爆发。”^②当会晤结束后,戈尔巴乔夫询问布什对叶利钦印象如何时,布什回答:“他是在民主选举中赢得了巨大支持后来访的,这是个重要的事实。令人满意的是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交谈,他都表示准备与你合作。过去你们之间可能有的深刻矛盾曾经使我不安。这会给我们也造成尴尬的局面……美国新闻界注意到了这一事实,他们写道:叶利钦举止正确。我也认为他不会挖你的墙角……”^③

7月10日,俄罗斯联邦第五次非例行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叶利钦宣誓就任俄罗斯历史上第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参加了叶利钦的宣誓仪式。“这个不仅隆重而且意味深长的仪式,大家都看出这两位对抗4年有余的政治家的心情有很大差别。叶利钦处在成功的顶峰,他感到喜气洋洋。他正在接受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总统的全权。戈尔巴乔夫则抑郁不欢。从表现上看,戈尔巴乔夫当然还是苏联总统,俄罗斯联邦不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

② 同上,第535页。

③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71页。

过是苏联的一个共和国而已。但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个职务的,不是全体公民,而是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而且还不是一致通过。更何况,俄罗斯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共和国,而且还是苏联整个构造的基础,这种构造的坚固性遭到很大的破坏。”^①

7月2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颁布关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非党化的命令。命令规定:不允许各政党及群众性社会运动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委员会和其他组织机构中活动。马特洛克指出,这是一项极具潜在破坏力的法令,禁止任何政党在俄罗斯领土上的国家机关中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如果法令得以实施,就将对俄国共产党形成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是建立在基层组织的基础之上的。每个机关、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军事单位都有共产党组织,而共产党正是通过这些组织来进行统治的。即使共产党放弃了在法律上的统治权,这些机构仍会完好无损,一如既往。如果取消了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和他们所提供的特权,许多成员将会默默放弃党员资格。“共产党组织一直全力反对叶利钦,而这个法令就是他的报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私人仇怨。如果一个党独享国家级组织的利益,且暗中得到国家统治机构的支持,那么,一个真正民主、多党制的政府就不可能在这个国家里诞生。”^②

7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叶利钦非党化命令发表声明。声明指出,叶利钦的命令违反了苏联宪法第48条、第51条和俄联邦宪法第49条,“苏共中央政治局深表遗憾”。据马特洛克观察,苏共党内官员拼命向戈尔巴乔夫游说取消叶利钦的法令,但是他拒绝了。“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他与顽固派的联盟正在分裂。全体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叶利钦的法令,但这当然完全没有法律效果,共产党干部只好就此罢休。”^③

7月29日,美国总统布什抵达莫斯科,参加美苏之间最后一次峰会。7月30日上午,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谈。叶利钦拒绝参加。“他上午推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2~53页。

②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6页。

掉了我们与戈尔巴乔夫以及另外两三个加盟共和国总统的多边会议,说他拒绝参加进‘无脸的大众听众’的行列。”于是,布什决定下午前往最高苏维埃与叶利钦举行单独会谈。“在我们的个别会晤中,很明显他最重要的是保护俄罗斯的观念以及保证像对待苏联一样同等地对待俄罗斯。他告诉我说我是第一个他在新位置上接待的外国元首。”^①

在布什看来,叶利钦的一系列举动就是为了显示其与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的“平起平坐”。

5. 叶利钦与美国之四:“八一九事件”

很快,叶利钦的这一想法成为了现实。

1991年8月19日6:25,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00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是: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和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

6:34,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指出国家“面临着致命的危险”,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死胡同”,呼吁公民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但是叶利钦在白宫广场上却登上一辆装甲车,呼吁俄罗斯人民立即举行总罢工予以回击。

11:30,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政府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

1991年8月19日凌晨,合法选举出的国家总统被解职了。无论用什么理由来为解除总统职务一事辩解,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反宪法的政变。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武力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它损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2页。

害了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声誉,破坏了我们在国际社会中的威信,使我们回到冷战时代,使苏联与国际社会隔绝开来。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个夺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宣布这个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我们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毫无疑问,必须保证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对全国人民讲话。我们要求紧急召开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些要求得到实现之前,我们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无限期地总罢工。^①

叶利钦的举动表明在苏联实施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仍然有反对力量存在,这让美国顿时松了一口气。布什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返回,以及一场持续的民主运动。我不能肯定如何到达那里——这路新人是强硬派和专制主义者。亚纳耶夫,他的某些原话说他是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他的确是。他们看到了这个党的衰败,他们看到了改革者反对他们所被教导去相信的所有东西,对此他们无法适应。我的观点是民主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们不可能被扼杀,因此我们相信并努力施加影响让戈尔巴乔夫返回,而叶利钦的当选是民主运动向前推进的标志。”^②

8月20日,布什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叶利钦。叶利钦告诉布什,目前的局势非常复杂。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被绝对控制了,没有办法与他联系。现在,“一个八人委员会接管了总统权力并且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地区建立了一种紧急状态。军队被调进莫斯科,不仅是城市,而且是莫斯科市区和郊区。作出这些决定以后,这八个人自我暴露为右翼小集团。我出现在人民和士兵前面,向他们说委员会的行动是违宪的,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是无效的”^③。叶利钦要求布什和戈尔巴乔夫通话,并联合世界上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布什当即赞同叶利钦的提议并保证说,在

① [苏]《国际文传电讯》,1991年8月19日。

②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58页。

③ 同上,第559页。

戈尔巴乔夫和合法政府复位问题上,美国政府将全力支持他。

8月21日,布什再次联系叶利钦。通过电话,布什明显感觉到此时的叶利钦显得更有自信。“我们花了两天时间坐在议会大楼前未移开一步,”他用一种戏剧气氛开始,“总统先生,我想告诉你我与克留奇科夫以及军方谈了话,武力已经停止。上万人把他们截住了,不让他们向大楼开火”。叶利钦解释说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已经决定宣布政变的图谋是非法的,他们支持叶利钦的所有命令与行动。“他们还给我一项特别权力,如果地方当局支持小集团,他们将被撤职。”^①布什对叶利钦的行动表示完全肯定,并承诺将继续支持他。“除了伊拉克、利比亚、古巴以外,全世界人民都在支持你们,”布什说,“人民对你的支持超出了你的想象。”叶利钦大声回答:“我将尽我所能挽救俄罗斯与全苏联的民主。”^②在与叶利钦通完电话后,布什又联系上了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向布什的支持表示感谢,说他一旦返回莫斯科把事情处理妥当后立即打电话过来。“我们希望与你保持联系,”戈尔巴乔夫说,“因为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已经不能再迟疑。这事是被民主制止的,这是我们的保证。我们将在国内外保持合作”。布什称赞戈尔巴乔夫:“这才像老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充满生命力与自信。你一回去我们就联系,看看有什么新进展。”^③

当天晚上,叶利钦再次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感谢。“我想因我们国家民主的巨大胜利而感谢你,”叶利钦说,“我们必须紧密合作以使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非常感谢你的巨大的帮助。我自己对你与美国人民也表示感谢”。布什当即表示,“我的朋友,你的股票现在是牛气冲天”,“你显示了对法律与民主原则的尊重,值得庆贺。你是个站在前线的人,排除障碍的人——我们所做的就是支持你。你使戈尔巴乔夫未受损伤地返回。你恢复了他的权力,你在全世界赢得了大量的朋友。我们支持你并因为你的勇气与作为感谢你”。^④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的通话,让布什深感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0页。

② 同上,第562页。

③ 同上,第564页。

④ 同上,第565页。

美国在挫败苏联政变中发挥的“恰当”作用。他在8月21日的日记中写道：“所有这些使我认识到美国的反应是多么重要。我们可以反应太激，可以派兵救那里的人民于水火。我们在可能说那地方无论是谁我们都能对付。但是我想我这一次得到的劝告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发现了恰当的平衡。在这场事件中，肯定地说，我们在苏联的关键性人物那里得到了巨大的信任。”^①

布什的支持和政变的失败加速了苏共中央权力的衰退，特别是对苏共的不信任和戈尔巴乔夫个人政治生涯的结束，它预示着以人气较旺的叶利钦为首的共和国的出现。事实上，八月政变的最大赢家就是叶利钦。布什说：“叶利钦在事件平息后的确是一位铁腕人物，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彻底交出权力。我知道他们俩彼此不喜欢对方，那时叶利钦以全然蔑视的眼光看待政治上软弱的戈尔巴乔夫，终于他赢得了这一天，并且声望越来越高，他几乎不客气和不温和地将戈尔巴乔夫推出了历史画面。”^②据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秘书格拉乔夫观察，从福罗斯回来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了自己的死对头叶利钦的政治债务人，多亏叶利钦的果断行动，他才重新回到克里姆林宫”。总统的所有这些致命的失误、新的有缺损的地位都对他的执政者威信打击甚大。因为在俄国（以及苏联）公民心目中，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民族领导人就是上帝恩赐的君主、天赐的“生父”的观念，无论他身着沙皇的紫袍还是顶着总书记的称号，都是如此。主要的是，在八月动荡之后，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个千百万人将他们的生活迅速而奇妙地得以改观的希望同他所开始的改革、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思想上的解放、令人陶醉的变革空气和政治自由，不能永久充当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紧张局势加剧的补偿。八月事件还表明，改革已经“误入歧途”，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不能预示着美好前景（戈尔巴乔夫本人将自己上台执政的最初几年称为“美好的时期”），而是预示着阴霾的日子和悲剧性的问题。“曾几何时，改革的首倡者和鼓动家还几乎被当成救

①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5页。

② 同上，第568页。

世主，如今则已失去昔日的神圣光环和永远正确的声誉。”^①

戈尔巴乔夫在 2001 年接受采访时沮丧地说道：

您知道吗，猫是如何收拾被逮住的老鼠的：老鼠已经流血了，猫还在不断折磨它，却又不想马上把它吃掉，只是想羞辱它。叶利钦就是这样对待我的。有报纸曾经这样写道：与叶利钦会面之后，我们看到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他看起来就像跟随在训斥它的主人后面的一条灰溜溜的走狗。^②

四、苏联的独立运动：波罗的海三国

在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中，波罗的海三国的地位相对比较特殊。它们是在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基础上于 1940 年被苏联吞并的，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始终不予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精英也暗中积蓄着独立的政治力量。以 1987 年为标志，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发生了变化。在 1987 年以前，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求把本民族语言变成国语，在共和国实行双语制。如果说这一阶段的民族运动还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民族文化教育权利的范围之内，那么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民主化”的改革浪潮下，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运动则开始进入为谋求国家独立的有组织的政治运动阶段。

1. 走向独立：波罗的海三国的政治运动

1987 年 8 月 23 日，爱沙尼亚首都举行了一次由美国之音电台、颠覆性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以及一小批曾因反苏活动而受审的人策动的集会。这场在塔林市中心鹿园按照怀疑 1939 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权限的反苏分子制定的方案上演的宣传“闹剧”聚集了数百名好奇者。与会者在一个

^①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戡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年，第 329 页。

^②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51 页。

名叫季特·马迪松的人的带领下蛊惑人心地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解释了条约的某些条款。他们挑拨爱沙尼亚人的民族感情,向民族史诗《卡列维波艾格》中非凡的英雄人物的遗孀琳达塑像献了花。挑拨者试图通过这个行动歪曲和诬蔑爱沙尼亚劳动人民的革命历史、苏联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国外的广播电台老早就开始为这次集会作准备了。这些电台下达了直接的指示,指明了如何准备采取这样一项行动,歪曲了苏维埃国家在战前年代的目标和政策、苏德条约的实质。^①

8月22日,立陶宛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纳维茨卡斯在《真理报》上撰文写道:“立陶宛选择的社会主义和同苏联各族人民兄弟团结的道路,迄今一直不仅使立陶宛的民族主义流亡者,而且也使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国家的政府耿耿于怀。”这位学者追述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来自西方的侵略势力开始向立陶宛施加压力,当时统治立陶宛的是以法西斯政变方式掌权的斯梅托纳总统。波兰于1938年迫使立陶宛接受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最后通牒,以这种方式使立陶宛对侵占立陶宛自古以来的首都维尔纽斯一事表示容忍。1939年春,希特勒侵占了克莱佩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1940年的立陶宛社会主义革命。从实质上讲,这是恢复了1919—1920年的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是资产阶级在国际帝国主义——协约国、德国和美国的积极慷慨援助下被扼杀掉的。在自由普选的过程中,广大人民阶层的代表被送进人民议会,议会宣布在立陶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恢复苏维埃政权,主张加入苏联各族人民大家庭。《真理报》在发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一批来信的同时追述道,在法西斯占领的年代里,立陶宛民族主义分子死心塌地地为占领者效劳。请看当时的德国警察局长、前党卫军分队长艾凯恩对这些波罗的海吉斯林分子的评价:“我经常能碰见拉脱维亚‘自治’领导人丹克尔斯和边格尔斯基斯、立陶宛‘自治’领导人库比柳纳斯和爱沙尼亚‘自治’领导人米亚耶博士。应当说,他们都是德国人的好朋友。这些人只知道维护我们德国人的利益,根本不考虑本国人民的命运。这些人只不过是德国的傀儡。”^②

① 参见塔斯社塔林1987年8月23日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7年8月22日电。

8月23日,在市中心自由纪念碑附近大批汽车被迫停下来。这里,在刻有每个人都懂、每个人都感到亲切的“献给祖国和自由”字样的纪念碑附近聚集了一批企图歪曲这两个神圣概念的人。这批人在西方广播和美国一些国会议员的煽动下选择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的日子——举行集会。这批人歪曲了这一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他们认为这件事不是苏联在法西斯主义威胁面前对本国人民和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安全的关怀,而是“奴役”拉脱维亚人的开始。这次集会的组织者企图提出民族主义口号。70岁的瓦利娅·兹韦伊尼耶科思含着眼泪对周围的人说:“这伙人还有良心吗!他们有什么权利利用由包括我的钱在内的人民的钱建立的纪念碑来达到自己卑鄙的目的?”她和许多里加人一样不由自主地来到这一群人中间。一个叫齐尔韦利斯的人说自己是“赫尔辛基-86”权利捍卫者团体的成员,他企图说服周围的人相信,他们的团体是争取公民权利的真正斗士。原来,这个人曾是法西斯的一个小走卒和间谍。1945年他毕业于间谍学校,而后被空投到苏联境内进行恐怖活动,为此被判处10年徒刑。齐尔韦利斯之流根本不关心完善民主,不关心经济的健康化,不关心改善人口形势和提高拉脱维亚人民的物质福利。他们的目的是,散布对拉脱维亚人民1940年选择的道路的正确性的怀疑。从1940年起,拉脱维亚自愿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赫尔辛基-86”团体的另一个成员、28岁的巴尔坎斯也不掩饰这一点。10年前他由于严重的流氓罪行被判刑,6年后第二次被判刑,4年前第三次被判刑。^①

1988年11月10日,宪法修正案引起争议。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派遣三名政治局委员到波罗的海共和国去,他们的使命是消除一场因民族主义者的要求而出现的日益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者要求享有更大的自治权,要求制止会使一些苏维埃共和国丧失分离权的制宪改革。苏联外交部的一位发言人证实三名政治局委员已被派遣出去,但是他不肯进一步提供详细情况。苏联新闻媒介没有正式宣布三名政治局委员出访的消息,但是民族主义人士证实,三名政治局委员分别到达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① 参见塔斯社里加1987年8月23日电。

这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解释莫斯科对这些修正案的立场。三名政治局委员是在政治局于10日晚上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之后到达这三个共和国的。政治局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波罗的海地区继续存在的危机。斯柳尼科夫被派到立陶宛,梅德韦杰夫被派往爱沙尼亚,切布里科夫被派往拉脱维亚。这三名政治局委员是在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同爱沙尼亚领导人会谈的两天之后出访的。戈尔巴乔夫同爱沙尼亚领导人的会谈显然是讨论已在所有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引起和平方式的群众抗议活动的宪法修正案。目前正在讨论之中的宪法修改将取消第72条,这一条保证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分离出去的权利。这一条与其说反映苏联一个加盟共和国享有独立的现实可能性,倒不如说只具有象征的意义,但是它仍然体现波罗的海地区许多民族主义者的最终目标。^①

11月1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地方自治政府法》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讨论通过。这显然是戈尔巴乔夫对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者的让步。

11月19日,戈尔巴乔夫在参观各纪念地时,外国记者向他提出了有关爱沙尼亚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说:“爱沙尼亚同全国一样,正在进行改革。在我国,许多事情开始变得可以理解,无论是有关经济的事情,还是有关其他领域的事情,这个进程具有公开性。目前正在对未来的联盟,对解决遗留下来的民族关系问题的看法进行广泛的讨论,最主要的是:协调中央同共和国的关系问题成了中心问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起码要经过三个阶段:我们现在所料理的是中央的工作。国家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但中央应该从琐碎事务中摆脱出来。下一阶段是加盟共和国、自治州、自治共和国的地位问题。对这一问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解决。因此,我们决定把它交付全会讨论,现在正在为全会做准备工作。现在已经收到了大量的建议。第三阶段是基层苏维埃。将颁布一项地方自治的法令。昨天,雷日科夫同志(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召集各共和国的代表,讨论了地方经济核算的问题。我们早就吸收爱沙尼亚的同志来研究和率先解决发扬主动精神的问题。”^②

① 参见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8年11月11日电。

② 塔斯社德里1988年11月19日电。

12月7日，爱沙尼亚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再次投票赞成有权否决莫斯科通过的法律条款，同时决定爱沙尼亚语为该共和国的官方语言。

1989年2月4日，波恩把希特勒—斯大林秘密协议的附本给了立陶宛。一家报纸说，西德把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议定书附本交给了立陶宛苏维埃共和国。这项条约结束了立陶宛的独立。《法兰克福评论报》说，立陶宛官员在断定他们无法从苏联政府（它不承认拥有这样一个文件）得到这个附本后，他们向波恩索取。当希特勒和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一个附加议定书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波兰东部给了苏联，波兰其余部分给了纳粹德国。该报援引西德外交部官员给立陶宛党报的信说：“我们乐意满足你们的要求，向你们提供一份秘密议定书附本。”^①

2月16日，立陶宛举行了支持独立的群众集会，这一立陶宛民族主义运动的激进化给正努力重新规定莫斯科和15个加盟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克里姆林宫构成了新的挑战。争取改革运动的新闻发言人里曼塔斯·卡纳捷米斯说：“现在，正在制订一项有关公民投票的法律。我们将举行一次公民投票，随后就脱离苏联。”在立陶宛，350万人口中有80%是立陶宛族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执政的共产党推动了这一新的寻求独立的运动。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执政的共产党已使独立时的立陶宛国的国旗合法化，并将立陶宛语提高到了正式的地位，此外还承认了立陶宛的国歌。立陶宛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940年同它的邻邦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起被苏联吞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官方苏联报纸都对立陶宛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震惊，因为它可能在毗邻的波罗的海共和国造成滚雪球般的作用。^②

3月1日，《真理报》评拉脱维亚局势：“今天的政治任务就是团结。”^③《真理报》特派记者在发自里加的文章中写道：“是我们大家都该明白的时候了，大会民主时期越来越应当让位于创造性的民主。”在里加，两派市民继续

① 路透社法兰克福1989年2月4日电。

② 参见法新社立陶宛维尔纽斯1989年2月17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3月1日电。

对抗,一派是拉脱维亚民族阵线,在这一阵线保护下参加集会的主要是拉脱维亚人,另一派是国际运动,包括非拉脱维亚居民的代表。文章说:“今天的政治任务就是团结。拉脱维亚民族阵线还在两个月之前就郑重宣布成立为改革而斗争的联合团体,然而,在维护拉脱维亚对经济自主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时,对维护诸如语言、文化、传统和风俗这些无条件的民族的有重要价值东西的无可争辩的权利时,拉脱维亚民族阵线仿佛‘忘记’,在共和国中完全是多民族的大家庭。”文章对强烈的激动情绪、人的宝贵精力没有用于为团结目的而是白白浪费表示遗憾。这不能增加共和国所需要的住宅、食品和日用品。这样一来,拉脱维亚住宅建设的全部计划被搞垮了。这里还能观察到停滞,观察到变了形的经济。局势的本身要求联合共和国的一切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方面,共产党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文章指出,共和国共产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旨在支持真正的改革和民主化。

4月17日,立陶宛共和国首都大约有两万人举行集会要求恢复立陶宛的独立地位。这次集会是由该共和国新成立的政党“民主党”组织的。

5月5日,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该共和国语言法同意把拉脱维亚语作为国语。该语言法还规定不应妨碍其他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苏共爱沙尼亚党中央解除了二十二名党的领导人的职务。被解职的人中包括党中央前主要负责人。这一行动加强了改革派的力量。

6月1日,拉脱维亚共和国代表建议最高苏维埃承认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为主权国家,拥有立法等主要权力。

9月22日,立陶宛的议员们通过一个经济独立的新法令,从党政两个方面向莫斯科当局提出了挑战。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即立陶宛议会22日批准了一项经济独立法,宣称立陶宛所有的自然资源都属于该共和国而不属于全苏政府。苏联当局抨击了立陶宛共产党提出的这一计划,实现这项计划便意味着苏联共产党组织的分裂。塔斯社指责立陶宛共产党制订它自己的计划,“尤其是因为该计划的主要章节含有使苏联共产党联邦化的意思”。塔斯社指出,戈尔巴乔夫主席在本周召开的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上已经抨击了使苏联共产党联邦化的想法。塔斯社说,立陶宛的计划规定,“为了成为创建一个独立的、以立陶宛的法律为基础的国家政治势力,立

陶宛共产党本身应当在改革过程中成为一个独立的党”^①。

10月28日,苏联《红星报》说,拉脱维亚民族主义者在—个招兵中心设立了警戒哨,要求青年们拒绝在“占领军”服役。目前,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中正掀起—场反征兵运动。该报说,今秋-的征兵活动遭到妇女界、拉脱维亚独立组织及其他非正式组织的诽谤。杰米尼什上将在发自里加的一份报道中说:“在非官方组织中,反对‘军队的占领性和非法基础’的情绪十分普遍。在—个地区招兵中心,专门设有警戒哨所,并贴着各种标语。”—个横幅上写着:“青年人,宁愿去监狱也别到占领军中服役。”另—张标语上写着:“如果你到苏联帝国军中服役,当心被别人家的妇女、孩子们杀死。”杰米尼什说:“青年人因政治信念而拒绝服兵役,这还是第—次。”他说,家长们拿着信拥到招兵办,要求他们的孩子只在拉脱维亚或至少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服役。^②

12月7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取消宪法中有关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此举是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采取的最极端的藐视莫斯科的行动。

12月20日,立陶宛共产党人决定脱离苏联共产党。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士说,立陶宛共产党人无视莫斯科和它自己对民主集中制的承诺,以多数票决定脱离苏联共产党。根据初步投票结果,大约850票赞成,180票反对。这次表决是在立陶宛共和国首府维尔纽斯举行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进入第二天时进行的。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不顾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多次呼吁反对使该党“分裂”或“结成联邦”的企图,要求党的代表大会批准宣布该党独立。立陶宛共产党将单独制定自己的党纲和党章,它将不受与之保持平等关系的苏共其他党的支配。^③

12月22日,苏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立陶宛共产党决定脱离莫斯科的领导的严峻事态,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内部这种分裂行为表示“担心和震惊”。

12月23日,苏联人代会否决宣布苏德条约非法的提案。苏联人代会就

① 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9月23日电。

② 参见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9年10月28日电。

③ 参见法新社莫斯科1989年12月20日电。

这一提案的表决结果表明,赞成宣布该协议非法的有 676 人,反对宣布其非法的代表为 1052 人。

1990 年 1 月 3 日,戈尔巴乔夫把立陶宛十九名领导人全部召到莫斯科举行会谈,预计会谈旨在设法同要求摆脱苏共领导的立陶宛共产党实现和解。戈尔巴乔夫希望说服他们改变两周前作出的从苏共脱离出去的决定,但会谈没有取得成果。

1 月 13 日,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发表文章:“立陶宛人使克里姆林宫首脑戈尔巴乔夫陷入困境。”文章指出,立陶宛共产党关于脱离苏共的决议使克里姆林宫领导惊恐不安。它担心这一决定会对正在争取更大独立的其他加盟共和国发生“多米诺效应”。确实可以估计其他地方的人会模仿立陶宛人的做法。脱离莫斯科的趋势可能加强。从长远来看苏维埃联盟的分裂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决定性的时刻正在临近。戈尔巴乔夫担心苏共统一的结束也将导致苏维埃国家统一的告终”^①。

2 月 25 日,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表明,在已统计出结果的六十个选区中,争取改革运动已获得五十六个议会席位。

3 月 11 日,立陶宛共和国新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在自己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法令。^② 文件指出,立陶宛 1940 年加

^① [奥地利]赫尔穆特·L. 米勒:“立陶宛人使克里姆林宫首脑戈尔巴乔夫陷入困境”,《萨尔茨堡新闻》,1990 年 1 月 13 日。

^② 注:立陶宛于 1940 年 8 月 3 日并入苏联。地理面积:6.52 万平方千米,是波罗的海 3 个加盟共和国中最大的。立陶宛与波兰、拉脱维亚、白俄罗斯、俄罗斯接壤,濒临波罗的海,海岸线长达 99 千米。人口:369 万,其中 80% 是立陶宛人,其余是少数民族,主要有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首都:维尔纽斯,56.6 万人。官方语言:自 1989 年 1 月起使用立陶宛语。宗教:天主教。历史:公元 13 世纪,立陶宛抵抗条顿骑士团的进攻,是一个不信教的王朝。1386 年,立陶宛大公亚盖沃和波兰女王雅德维加结婚,立陶宛开始信奉天主教。波兰—立陶宛军队的格伦瓦尔德大捷(1410 年)制止了日耳曼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立陶宛和波兰的联合持续到 18 世纪末波兰被肢解。1795 年,立陶宛被俄国吞并。19 世纪,立陶宛爆发了许多反抗俄国的起义。1919 年,《凡尔赛条约》建立了一个立陶宛共和国。1939 年被德国人占领,后被苏联人占领。1940 年 8 月,根据 1939 年缔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立陶宛并入苏联。1941 年至 1944 年,立陶宛再次被德国军队占领。1944 年 9 月,占领立陶宛的德军向苏联红军投降。政治:要求独立和承认它的国家主权。1989 年,立陶宛同苏联疏远,确定了可用于苏联法律的否决权,并在立陶宛共产党分为两派之后实际上实行了多党制。党内多数派是独立派,提出的目标是“恢复自由民主的立陶宛国”。另一派是少数派,忠于莫斯科。与此同时,立陶宛“争取改革社会运动”的势力日益扩大。立陶宛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是文化水准最高的国家。据 1979 年统计,1/3 的立陶宛人在接受教育。维尔纽斯有苏联最古老的大学(400 年)。

入苏联是“外来力量限制”立陶宛国家的主权。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国家的新名称——立陶宛共和国，以及国徽。通过了废除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宪法和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的效力的法律。批准了以1938年立陶宛共和国宪法为基础的立陶宛共和国临时基本法。^①立陶宛宣布独立的目的是要迫使莫斯科就准许这个地处波罗的海的加盟共和国享有充分自由一事举行谈判。立法机构发布的命令说：“从现在开始，立陶宛再次成为一个主权国家。”^②对此，时事社作出评论：戈尔巴乔夫政权面临崩溃的现实。评论指出：立陶宛独立宣言对缺乏有效解决办法的戈尔巴乔夫政权提出了最大的挑战。可以预料，日趋强烈的要求独立的运动也将波及其他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外高加索共和国。对于戈尔巴乔夫政权来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崩溃的“噩梦”将被迫成为现实。^③

5月8日，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决定去掉国名中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字样，并以过去的三色国旗取代社会主义的红旗。同时，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在通过的一项祝贺拉脱维亚宣布独立的决议中说：“通往获得我们主权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但我们相信，3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要争取恢复独立，行动一致要比孤军奋战更能取得成效。”^④

5月10日，爱沙尼亚提议恢复波罗的海三国委员会以在争取独立运动中互相帮助。爱沙尼亚外交部发言人瓦列·费尔德曼说，爱沙尼亚提议恢复1934年当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还是独立国家时成立的波罗的海三国委员会。如果恢复，该委员会将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主席、总理和外交部部长。实施直接的农业交流计划和提出恢复波罗的海三国委员会表明，这三个共和国决心克服克里姆林宫为它们的独立设置的障碍。

5月12日，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在它们采取脱离苏联而独立的战斗中通力合作，恢复它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波罗的海委员会同盟并且发誓加强经济合作。担当这次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首脑会议的东道主的爱

① 参见塔斯社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电。

② 美联社苏联维尔纽斯1990年3月11日电。

③ 参见时事社莫斯科1990年3月11日电。

④ 美联社塔林1990年5月8日电。

沙尼亚主席阿诺尔德·吕特尔说：“我们必须永远紧密结合在一起。”吕特尔和立陶宛主席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以及拉脱维亚主席阿纳托利·戈尔布诺夫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重申了他们各自的独立宣言。三位领导人还联名写信，呼吁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布什，在两个超级大国准备本月底举行华盛顿首脑会谈时承认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独立是进一步实现世界和平的一种办法。这三位领导人致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说，波罗的海共和国应该享有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失去独立地位的”东欧国家的同等待遇。爱沙尼亚政府的一位官员说，致布什的信的内容同致戈尔巴乔夫的“非常相似”。三位领导人签署的一项联合公报说，这三位领导人重申了他们决心坚持“实现自由和独立的主张”。联合公报说：“波罗的海三国政府打算同苏联进行谈判，它们已经商定了一项不背离独立原则的立场。”吕特尔说，他收到了戈尔巴乔夫打来的一份电报。电报说，总统的联邦委员会已经举行了会议，并且要求波罗的海共和国提出建立新的苏维埃联邦的建议。但是吕特尔说，建议以前提出过，但是“它们不能满足爱沙尼亚人民的愿望”^①。

6月6日，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再次举行高级会谈。这是三国领导人一个月内第二次举行这种会谈，旨在要求同戈尔巴乔夫就独立问题举行谈判。

6月12日，戈尔巴乔夫会见苏波罗的海三国领导人。此举表明莫斯科和波罗的海三国之间几个月来第一次打破僵局。

6月14日，莫斯科市政委员会不顾克里姆林宫的禁令讨论向立陶宛提供汽油问题。莫斯科市政委员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担心立陶宛停止向苏联其他地方提供奶制品。

6月15日，苏联宣布放松对立陶宛的封锁，同时表示愿与立陶宛谈判。

6月30日，苏联恢复对立陶宛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立陶宛每天可得到两万吨石油。布什表示对苏联恢复向立陶宛提供石油和天然气感到鼓舞。

2. 寻求外援：波罗的海运动与西方国家

当波罗的海三国独立运动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国家开始不断给戈尔

^① 合众国际社爱沙尼亚塔林1990年5月12日电。

巴乔夫和苏联政府施压,希望不要采用武力镇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否则,西方将会慎重考虑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问题。

1990年3月11日,就在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国家的法令后,为了防止苏联政府对此作出过激反应,美国政府敦促苏联尊重立陶宛议会所作出的独立决定,并呼吁苏联与立陶宛政府进行谈判和有关各方避免出现暴力。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说:“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苏联对立陶宛的合并……我们希望,(对立陶宛的)承认应考虑到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最终政府。”“立陶宛新议会已宣布其恢复立陶宛独立的打算。美国将要敦促苏联政府尊重立陶宛公民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所表达的意愿。”^①此外,英国外交大臣威廉·沃尔德格雷夫在接受电台记者采访时说,英国对立陶宛发生的事情表示欢迎,但是恐怕不得不拒绝任何要现在就承认立陶宛的请求。法国外交部说:“法国希望苏联和立陶宛现在能够通过谈判建立新的关系。”^②

3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将于本周末在维尔纽斯和考纳斯举行军事演习。面对骤然紧张的局势,美国参议院迅速在22日以93:0的表决通过决议,要求苏联停止恫吓立陶宛,并敦促布什考虑立陶宛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的要求。

3月23日,布什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支持立陶宛人的自决权。他警告苏联政府,对脱离苏联的立陶宛共和国采取的任何恫吓或动用武力的行动“注定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布什宣称美国与立陶宛人民站在一起,同时又说:“这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时期,要求各方领导人保持现实、冷静的头脑。”^③

4月5日,美国众议院以绝对多数要求美国政府承认立陶宛,重申支持立陶宛脱离苏联。

4月11日,布什再次告诫戈尔巴乔夫不要对立陶宛使用武力。布什说,现在立陶宛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坦克。

①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3月11日电。

② 路透社伦敦1990年3月12日电。

③ 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3月23日电。

4月18日,法国外交部部长罗朗·迪马在国民议会上宣布,他要求欧共体12国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以便研究立陶宛问题和考虑西方将可能为立陶宛人民而采取的行动。

4月2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国会发言时说,苏联必须让立陶宛人来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贝克说:“我们专注于悄悄外交,以努力促进这种对话。我们在决定我们的政策时应该考虑到实现自由和自决的脆弱的环境。”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美国政府已经拒绝了派遣一名大使驻立陶宛的建议。^①

5月3日,布什在白宫会见立陶宛总理普伦斯克涅。布什重申他强烈支持立陶宛人民的自决权。

6月13日,布什对戈尔巴乔夫开始同波罗的海三位共和国领导人会谈表示赞赏,说这是一则“好消息”。

12月23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米切尔说,如果苏联退回到冷战思想,用武力来达到其预期目的,国会就应拒绝向苏联提供任何财政援助。米切尔说:“我认为,那里在过去的几天中出现的迹象是不祥的。(镇压的)可能性在增加。但是我认为,如果苏联采取镇压行动并恢复权威统治,我们就不应再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说:“我希望西方做的事情,是向地方政府、各加盟共和国和戈尔巴乔夫提供大量援助。只有提供大量援助,才能促使苏联同西方保持关系。但是,同时应说明,如果发生流血事件,采取镇压行动,那就不会有援助。”^②

1991年1月维尔纽斯事件后,立陶宛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国务卿贝克严厉谴责苏联在立陶宛的镇压行动,并说这种行动将损害美苏关系。他说:“持久的美苏合作关系即实际上的伙伴关系最终取决于改革是否推行下去,因为如果价值观念不同,那么伙伴关系就不可能存在了。”^③

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特怀勒发表谈话,对苏联军队在立陶宛首都加强警戒措施提出批评。她说:“我们不理解这种公开显示武力的做法

① 参见美联社华盛顿1990年4月25日电。

②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1990年12月23日电。

③ 法新社安卡拉1991年1月13日电。

怎么能与莫斯科表示要避免暴力的意愿相吻合。我们继续要求立陶宛和莫斯科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通过诚意谈判加以解决。”^①

8月24日,丹麦正式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丹麦成为第一个全面承认这三个共和国独立的国家。

在舆论声援的同时,西方国家也以各种秘密的组织行动介入波罗的海的独立运动之中。

一是广泛利用波罗的海三国在国外流亡的民族主义组织。如旅美立陶宛人民委员会、旅加立陶宛人委员会、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员会、立陶宛国际联合会、加拿大“立陶宛复兴运动”等。这些流亡组织的政治目标明确,就是通过利用一切方式使立陶宛脱离苏联而独立。1989年8月30日,立陶宛解放最高委员会(简称“立解”)主席K. 鲍比亚利斯在自由欧洲电台声称:“立解注视着立陶宛的事件并做出一切努力,向世界,特别是不承认对立陶宛占领状态的西方政府表明立陶宛人满怀信心的步骤、他们为独立而进行的斗争。”^②

二是派遣人员全面接触、拉拢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的领导人。1991年3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根纳季·季托夫对《工人论坛报》记者说,美国人近几个月已进入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这是美国制订的“推翻苏维埃制度、摧毁苏维埃帝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大约有15名美国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美国国务院顾问,已进入立陶宛对那里要求独立的好斗分子进行军事训练。一位曾在阿富汗反政府军任教官、名叫安德鲁斯·艾维的人已用旅游签证进入立陶宛,目前在立陶宛议会防务组织任顾问,“教他们掌握游击战和恐怖活动手段”。在这15名美国“顾问”中,还包括“前白宫官员科亚利斯·利纳斯、目前在国务院任职的萨卡多尔斯基斯·罗马斯、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的百万富翁卡茨卡斯·朱奥扎斯及其女儿朱莉特”。季托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人员装扮成外交官、新闻记者、旅游者的身份与苏联公民接触,“特别是同政界、新闻界人士、非官方组织、各种民族团体和宗教团体的成员接触”。季托夫还说,西方情报机构对议会代表、罢工

^① 美联社华盛顿1991年6月4日电。

^② [俄]维·什罗宁:《克格勃X档案》,赵云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145页。

委员会的负责人感兴趣，“准备把他们送到波兰学习团结工会的经验”。美国、日本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右翼团体“直接介入了试图摧毁苏联的活动”。^①

五、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东欧剧变

东欧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身处东西方之间的独特地理位置、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和特殊的革命建国道路等诸多因素，使其从冷战开始后就成为西方与苏联进行角力的政治焦点。渗透、拉拢和扶持东欧国家内部的政治反对派，挑拨、煽动和蛊惑东欧国家民众对共产党政权和苏联霸权的不满，进而达成其颠覆共产主义的政治企图，就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战略的主要内容。1949年9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58号文件——《美国对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政策》（NSC58），明确提出把瓦解东方阵营作为自己的战略目标，突出的就是如何分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以利用其矛盾，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该文件指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东欧出现非极权主义的、能适应并参加自由世界大家庭的政体。”^②文件提出了要充分运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对斯大林主义关于卫星国必须依靠和从属于苏联的教条展开攻势的同时，也应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间断地向这个重要的教条进攻。“应该积极鼓励斯大林主义教条的反面——民族主义。应该不仅公开地而且秘密地保持这种攻势。”^③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企图，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性措施。从斯大林、赫鲁晓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逐渐形成，并最终表现为以“有限主权论”为内容、以军事力量为支撑、以政治控制为手段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形成及其实施，在强化了东欧国家各国共产党政府对苏联

① 法新社莫斯科1991年3月30日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③ 同上，第42页。

的政治依赖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刺激了东欧国家社会普遍性不满的蔓延和民族自我认同的政治心理重塑。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及其在“新思维”指导下的以不干涉他国内政为内涵的“辛纳屈主义”,在揭开东欧国家沸腾的社会“高压锅”的同时,也为西方国家的遏制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终,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在内部政治反对派和外部干预势力的群起攻击之下纷纷垮台,标志着东西方之间冷战铁幕的落幕,预示着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即将溃败。

1. 西方的机会:东欧的新危机

东欧危机首先是由波兰这个“苏联帝国最明亮的闪光点”^①的动荡局势引发的。自1945年以来,波兰就是华约组织最重要的非苏联成员。不论是从军事力量还是从经济实力来衡量,波兰在非苏联国家中对华约组织的贡献都是最大的。“在苏联的东欧霸权体系中,波兰在地缘政治方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国家。但是,苏联对波兰的控制渐渐失去了控制。”^②在1981年里根上台时,波兰政府正面临着国内国外形势的严峻挑战。从国内来讲,波兰共产党政府与已经发展壮大的政治反对派团结工会之间的政治对抗陷入胶着状态,不断实施着包围和反包围战略。从国外来讲,尽管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处于对抗关系,但是双方都有理由担心紧张的国内政治态势有可能引发更为危险的后果——苏联的军事干涉。事实上,以社会主义阵营“有限主权论”为代表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正是在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意愿赤裸裸的军事镇压的基础上形成的。波兰局势的持续动荡已经令勃列日涅夫大为不满,并开始作好强力干预的准备。1980年12月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重新控制波兰局势的华约峰会上,新任波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斯塔尼斯拉夫·卡尼亚为波兰立足自身解决国内问题争取到了苏联的谅解,从而暂时将波兰从苏联军事入侵的边缘拉了回来。但是苏联仍然怀疑而警惕地关注着局势发展,并随时作好军事干涉的准备。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5页。

② 同上,第79页。

不过,此时的波兰局势发展由于有了新因素的加入而出现了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这个新因素就是1981年1月20日就任美国第四十任总统的里根。作为坚定的反共斗士,里根在上台伊始就表现出了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咄咄逼人,并始终提醒自己:“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怎样利用苏联体制中的裂缝来加速其崩溃的进程。”^①面对波兰的政治动荡和团结工会的出现,里根第一次看到了遏制苏联共产主义的希望。“我们目睹铁幕第一次被捅破,波兰在摆脱苏联的共产主义。但那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东欧即将发生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先兆。”^②

1月23日,里根就波兰局势召开了第一次政府部门间研讨会。时任苏联和东欧事务国家情报官的罗伯特·盖茨向与会官员介绍了波兰局势:团结工会不断以有限度的“警告性罢工”向政府施压,苏联的关切越来越严重。盖茨在介绍中预测,波兰人很可能实施强制措施,阻止苏联干预,不会发生苏联入侵波兰的局势。不过,会议初步形成的危机应对计划则是建立在可能出现的最糟糕局面基础之上——包括苏联入侵、波兰抵抗和严重的流血事件,并认为美国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相应实施报复措施。

1月30日,里根再次召开会议并对危机应对计划作了进一步充实修改。与会人员同意实施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报复行动。例如,以大幅削减经济往来作威胁;以磋商名义召回美国大使;对波兰从西方银行和其他机构的巨额债务和过期债务执行更加严厉的条款;终止农业信贷;终止任何新的进出口银行贷款;向西方银行释放信号,表明美国政府希望它们减少与波兰的联系,等等。

4月9日,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在给里根总统的评估报告中分析了苏联对波兰局势的观点。报告称,如果苏联放任局势变化,它肯定会失去一个重要的具有缓冲作用的国家,“这个国家对它的欧洲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凯西在评估报告上附加了一份写给总统的说明,指出苏联发现自己陷入“进退维谷”的艰难境地:“如果它实施军事干预,债务问题将引发经济混乱,波兰的国民经济将陷入衰退,数百万波兰人将通过游击战进行抵抗。如

①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

② 同上,第290页。

果它不实施军事干预,势必遭受西方的渗透,一股政治势力将破坏它的同盟体系。在向波兰发兵之前,它会想尽一切办法促使波兰的分裂。”^①

面对复杂危急的波兰局势,里根政府尽管作出了危机应对计划,但仍然局限于严厉警告与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上,甚至没有讨论更为严厉的应对措施。不过,波兰的动荡让里根看到了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的口实和极好的机会。

4月24日,里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提醒他美国再也不打算接受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里根说,如果苏联发动侵略,那就别指望同美国签署任何新的核武器条约或同美国保持良好贸易关系,而且美国将实行最严厉的经济制裁。里根在信中抨击了苏联关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赋予了苏联维护其特定政府形式的特殊权利与义务”的声明。里根告诉勃列日涅夫:“我必须坦率和明确地告诉你,美国反对任何诸如此类有悖于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文件的政策声明。不管如何定义,所谓的特殊‘权利’,不能用作侵犯任何国家决定自身政策、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一最高权力的工具。”^②

12月13日,波兰宣布实施军事管制,成立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军事管制法》的发布,成为美国政府对苏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它坚定地幕后支持一项击退苏联势力的进攻战略”^③。12月17日,里根严厉批评波兰的军事管制:“波兰一年半来所出现的朝着比较自由的社会发展的动向已发生了急剧的逆转,高压统治和大规模侵犯人权已取代了谈判和妥协。”里根表示:“在波兰人民为反抗苏联对他们的改革的反对态度而进行的斗争中,我们对波兰人民怀有一种特殊的亲人般的感情。”里根称波兰事件令人紧张激动。“人类最基本和无法代替的渴望之一——通往自由,正激励铁幕后面的生灵,在共产主义的极权统治大坝上打开第一个缺口。”“我们不要做任何阻碍这一进程的事,我们要尽可能做一切去推进这一进程,这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86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60页。

^③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正是我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等待的事情。在波兰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东欧。”^①

波兰局势的发展以及美国可能采取的反制措施的有限,促使里根政府进一步寻求更为积极主动的遏制战略。1982年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第32号——《美国对东欧的政策》(NSDD32)。国家安全顾问比尔·克拉克评价该文件“是一份与过去告别的前瞻性文件”。该指令指出:“80年代将可能是二战以来决定美国生存与繁荣的最具挑战性的10年,美国的应对可能导致80年代末时东西方关系发生实质性变化。”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克拉克说:“罗纳德·里根明确指出,美国不会屈从于苏联支配东欧的现状。我们要努力形成一项多头战略,以削弱苏联的影响,加强本地区的自由力量。相对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国家而言,波兰提供了一次独特的机遇。这并不是说,我们不继续采取行动了。为了使其他国家摆脱莫斯科的控制,我们还要继续采取行动,而不管这些行动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②NSDD32号指令概括叙述了美国的下列主要目标:

- 秘密支持该地区为了摆脱共产主义统治而发动的地下运动。
- 加强针对该地区的心理战,尤其是要加强诸如“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无线电广播。
- 寻求外交与贸易途径,使该地区的各国政府抛弃对莫斯科的信任。^③

根据NSDD32号指令,里根政府采取了公开和隐蔽的行动:

一方面,里根政府采取经济制裁等公开方式迫使苏联和波兰军政府放松国内的政治管制,尤其是对团结工会的打压。1981年4月,美国宣布推迟

^① 刘金质:《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191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90~91页。

^③ 同上,第91页。

波兰本应在6月30日偿还的大约8000万美元的还款时间,并先后向波兰提供价值7000万美元的黄油和奶粉以及价值8000万美元的谷物。里根政府在提供这些援助时警告说,无论是波兰还是苏联压制团结工会,都会导致西方对波兰经济援助的自动中止。12月23日,在波兰宣布实施军管后,里根政府决定对波兰进行经济制裁,中止两国间的大量协议。1982年10月9日,在波兰宣布解散团结工会时,里根政府决定取消波兰的贸易最惠国待遇,这使波兰向美国出口产品的关税增加了300%~400%,有效地将它们挤出美国市场。经济制裁使波兰与西方的贸易额锐减,由1980年的75亿美元减少到1986年的10亿美元,贷款额从1980年的80亿美元减少到1985年的3亿美元。据波通社报道,经济制裁使波兰的损失超过了15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天从我们的总口袋里掏走800万美元”^①。1983年7月,波兰宣布解除军事管制,但是里根政府仍然要求波兰政府释放政治犯,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与团结工会进行政治对话。波兰政府先后实行了4次大赦,至1986年释放了全部政治犯。在此期间,团结工会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公开支持。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向团结工会提供1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到了1988年则增加到500万美元。可以说,团结工会实际上已成为美国在波兰,乃至整个苏联集团最大的代理人。就像瓦文萨自己所言:“我们团结工会在波兰取得的胜利好比是空中楼阁,如果没有财政上的保证,它就有可能崩溃。”^②

另一方面,在公开的经济制裁和政治拉拢的同时,里根政府还要求中央情报局对苏联控制的东欧地区展开大规模秘密行动。盖茨指出:“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实施了一些较为温和的行动,在波兰以外为团结工会提供支持。但是,1981年3月举行的跨部门会议上,我们已经开始讨论加强这方面的秘密活动了。”^③1982年2月中旬,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批准了资助团结工会的计划。该计划主要由4个部分组成:

^① 转引自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4页。

^② 美联社西德社塞尔多夫1989年9月5日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90页。

●向团结工会提供具有决定意义的资金,以维持其活动。这些资金可以美元和波兰兹提罗的现金形式支付。

●提供先进的通讯设备,为团结工会组建一个有效的地下C³I网络。这将使团结工会即使在《军事管制法》之下也能够进行通信联络。

●对经过挑选的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使用所提供的先进通讯设备。

●动用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资源来充当团结工会的耳目,在适当的场合下可以与其分享中央情报局的重要情报。^①

1982年3月,中央情报局开通向团结工会提供资金的秘密渠道,开始向其提供大量经费,以支持地下印刷品的出版与发行,购买广播通信设备等。团结工会很快用中央情报局提供的资金购买了15套便携式无线电广播发射机。4月12日,华沙居民便听到了团结工会电台的首次播音。为了把购买的设备安全转交给团结工会,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前往瑞典说服了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使其同意将援助团结工会的物资设备通过瑞典转运到波兰。这样,中央情报局为团结工会建立了一条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再到波兰的长期性运输通道。即首先将购买的物资设备集中到布鲁塞尔的团结工会办事处,这是团结工会在国外最大、最活跃的办事处之一,团结工会的人在这里把物资重新包装,然后运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用板条箱重新包装,贴上“拖拉机零件”“机床”“渔具”等伪标签,然后装运上船,运往波兰。^②

中央情报局开展秘密行动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东欧政权对地下组织的压迫和人权遭受侵犯的情况,同时对反抗活动进行宣传。尤其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启动后,中央情报局的宣传工作变得更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② 参见转引自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39~340页。

加容易。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盖茨说,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1985年3月,中央情报局将四万张明信片偷偷运送到波兰。明信片上有一张波皮鲁斯科神父^①的照片,上面还印着他的一些布道词。教皇对这些明信片十分喜欢。5月,在波兰与比利时举行足球比赛期间,中央情报局组织了一场支持团结工会的示威活动,制作了一面6米多宽的横幅,清晰地出现在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电视屏幕上。6月,中央情报局找到了一份纳粹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交部部长V. M. 莫洛托夫于1939年9月在莫斯科会晤时曾经用过的一张地图,这次会议导致了波兰分裂。中央情报局制作了数百份缩微件,然后运入波兰。在地图背后,中央情报局用波兰语印上了这次会议的秘密协议。1987年春,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转运的广播设备抵达目标群体。很快,“我们支持的团结工会广播电台,打破了当局对媒体的垄断,开始宣传未来抵抗活动,并播出新闻”。1988年春末,中央情报局利用边境检查放松的机会,通过匈牙利向波兰和捷克输送了设备和材料。10月,中央情报局组织通过西欧将第一个卫星电视节目输入波兰。这是一个十分钟的电视节目,介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近况。团结工会领导人作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我们获悉,几乎每一个波兰工厂委员会都能发行自己的新闻通讯,最近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大大提高了刊印需求,印刷设备运转接近极限状态。”^②

经过公开与隐蔽的双重行动,美国对东欧的演变战略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9年成为冷战史上的“东欧年”。在这一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东欧演变战略开始收获果实。团结工会在波兰取得了合法地位,并拥有了参政的权利。1989年1月20日就任的美国总统的布什加紧了对东欧的演变步伐。3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对东欧援助的问题。4月17日,也就是团结工会合法化当日,布什在密歇根州哈姆特拉米克发表演讲,阐述了美国政府对东欧地区的政策。布什回顾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发展,指出波兰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宣布了美国将要采取一

^① 注:波皮鲁斯科是一名波兰牧师,被波兰安全人员殴打致死。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青海、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86页。

系列措施以推动波兰的改革进程。布什的讲话在苏联、东欧引起了普遍关注。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应是谨慎的乐观,保加利亚是犹豫迟疑,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则是消极的,罗马尼亚则保持沉默。苏联的反应是复杂的:《真理报》在总体上持欢迎态度;莫斯科的国际电台更多的则是批评,指责布什的讲话充满了冷战的意味。此后的四五月份里,布什连续发表系列演说,阐述了美国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政策——“超越遏制战略”,也就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促使其对西方国家政治价值的认同。

1989年7月9日—13日,布什访问波兰和匈牙利。他向东欧表明,美国支持并鼓励它们的改革进程。布什希望透彻地阐明美国的下述观点:“在欧洲占一半面积的共产党国家里出现的重大变化说明,与其说人们是在接受经过改革的苏联式共产主义,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接受已有200年历史的美国政治自由的观念。”^①许多批评家认为,布什的访问是对东欧保守势力的同情。事实上,布什通过展示对这些人的尊敬,并假装认为他们在开拓国家历史进程方面起到了建设性作用。“他的真实目的是,为这些人让出权力铺平道路。如果暴力能够避免,我们知道改革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布什在波兰等地向这些不久就要退出历史舞台领导人展示的友善与热情,旨在消除改革过渡期的障碍,避免为他们和他们的政权做垂死挣扎制造流血事件提供任何借口。”^②

布什的东欧之行掀起了东欧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热情,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在挣扎中纷纷被赶下历史舞台。

(1)波兰。1989年2月6日—4月5日,瓦文萨率13名团结工会的代表出席“圆桌会议”。4月7日,团结工会恢复合法地位。8月24日,波兰议会正式批准了以团结工会为首组成的联合政府。11月14日,瓦文萨以私人身份受邀访问美国。布什授予瓦文萨美国最高文职勋章——“总统自由勋章”,并宣称瓦文萨是“新一代民主的精神教父”。同时,瓦文萨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个以私人身份在这里

^① 路透社华沙1989年7月9日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99~400页。

发表讲话的人。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领导作用的条款。1990年1月16日,波兰政府通过政党法案,为实行多党制奠定了法律基础。1990年12月,瓦文萨当选为波兰总统。

(2)匈牙利。1989年2月10日—11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中央全会并通过了实行多党制的决定。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决议中表示,工人党愿意同一切合法存在的组织就新的执政方式举行会谈。4月8日,匈牙利8个组织成立了“反对派圆桌会议”。6月13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与反对派举行第一次圆桌会议。10月6日—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举行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党的主席涅尔什·雷热宣布党的“历史作用已经完结”。大会以1005票赞成、159票反对、38票弃权通过决议,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修改草案,改匈牙利社会主义共和国为匈牙利共和国。10月19日,通过政党法,禁止在工厂建立政治组织,各政党均不得接受国内预算机构、国营企业和外国的援助。11月26日举行全民公决。在19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的自由选举中,民主党论坛获得多数票,并掌握了国家政权。

(3)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24日,捷克共产党举行中央全会,选举乌尔班内为总书记,政治局进行大改组。全会决定与政治反对派进行对话。11月29日,捷克联邦议会经过讨论批准修改现行宪法,取消了其中关于共产党领导作用的条款。12月29日,哈维尔被议会选举为共和国总统。捷克共产党丢掉了掌握长达四十余年的政权。

(4)保加利亚。1989年11月7日—10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召开中央全会,决定“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改变党的领导方法,把开放和公开性确定为党和国家政策的根本原则”。全会接受日夫科夫的辞职,选举佩·姆拉德诺夫为党中央总书记。他表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下进行改革。12月8日,共产党中央举行特别全会,确定1990年进行自由选举,取消宪法第一条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从1990年1月—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了各党派政治力量的圆桌会议。1990年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第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该宣言规定党

的任务是进行非斯大林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建设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更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在1991年举行的新一届国民议会选举中,作为反对派的民主力量联盟赢得了对社会党的微弱多数,统揽了总统、议会主席和政府总理职位。共产党失去了执政46年的政权。

(5)罗马尼亚。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反政府的群众示威游行,并迅速波及首都和全国。20日,齐奥塞斯库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21日,齐奥塞斯库决定运用军队进行镇压,但是军队发生哗变,并同保安部队交火。22日,齐奥塞斯库仓皇出逃并于当晚被捕。23日,罗马尼亚救国委员会宣告成立并接管政权。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立即执行。28日,改国名为罗马尼亚共和国。31日,颁布政党法,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

(6)阿尔巴尼亚。1991年3月31日,在首次多元差额选举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阿利雅当选为总统。4月29日,人民议会通过《宪法主要条款法》,改国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定为“民主法治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治多元化。6月10日—13日,劳动党中央召开第10次代表大会,改组为社会党,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7)南斯拉夫联盟。1989年10月21日,南共联盟在第二十六次中央全会上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纲》,决定把多党制引入南斯拉夫政治生活。1989年7月25日,南联邦议会通过《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但是随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马其顿共和国就先后退出南斯拉夫联盟并宣布独立。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在1992年4月27日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由铁托缔造的南联盟彻底瓦解。

2. 辛纳屈主义:苏联的新政策

在1989年短短的九个月时间内,除罗马尼亚外,一场不流血的革命席卷了整个东欧。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者、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将其称为“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尽管布什在“天鹅绒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决定因素仍然掌握在苏联和戈

尔巴乔夫的手中。盖茨指出:“由于苏联拒绝动用自己的军队保护这些失去合法性并被公众痛恨的政权,除阿尔巴尼亚以外,所有东欧共产党政府都被愤怒的人民以暴力方式赶下了台。苏联帝国大厦西翼眨眼间轰然坍塌。始于东欧的冷战已经结束。”^①布什明白,东欧发生的大多数变化,尤其在没有任何流血事件这一点上,最重要的因素来自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归根结底,他是一位让帝国大厦平缓倒塌的苏联领导人。”^②

那么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拒绝使用武力来保护东欧卫星国的共产党政权呢?

从思想演变来看,戈尔巴乔夫主张“多一点社会主义,多一点民主”的国内改革新思维,要求他在对待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改革的要求时,也必须同等对待,以树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形象。在过去,苏共认为自己是完成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义务的主要保证,并认为这是苏联作为大国的力量源泉之一。但是改革使这一切情况都发生了变化。“改革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的人民有自由,苏联领导人开始了这个改革之后,就不能再对中东欧国家的关系采用另外的标准了。对邻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停止了。莫斯科不再发出劝告,更不会有指示了。苏联在实施改革,而且坚信到处都需要摆脱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但是并没有力图‘输出’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打算。”^③1985年10月22日,戈尔巴乔夫到索非亚参加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戈尔巴乔夫在发言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各国共产党尚需认识当代的进程,并制定新的方针……要用理解的态度对待各国共产党的困难,这种困难很多,还有许多新问题,不管各国共产党情况怎样,要尊重它们的独立性。”^④1989年11月,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记者的采访时发表了一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03页。

② 同上,第404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50~251页。

④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3页。

个众所周知的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理论已经过时，我们用西纳特拉理论^①代替了它。”他解释说：“应由每个国家来决定它们自己要走的路。”^②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大大消除了苏联和东欧的政治恐怖气氛。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些改革措施将促使更加民主、更为高效的共产党政府的出现，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但是，无论在东欧，还是在苏联，他的预测都是错误的。恐惧感消失以后，东欧政权极端的道德和政治腐败（以及它们的无能）便彻底暴露出来。”^③在政治反对派的组织策动下，早已心存不满的社会民众迅速向共产党政权发起政治攻势，最终促使各国政权的瓦解与倒台。

从现实抉择来看，东欧事变让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两难选择：要么维护各国共产党政权从而再次陷入与西方的对抗；要么放弃对各国共产党政权的支持而承担可能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政治崩溃的后果。事实上，面对苏联可能的武力干涉，美国政府竭尽所能地向戈尔巴乔夫发出警告，要求其避免作出决策以破坏美苏关系。1989年11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警告说，如果苏联对东欧采取武力镇压的行动，美国将作出反应。尽管抉择很艰难，但是戈尔巴乔夫仍然以其犹豫不决的方式选择了后者。就像盖茨分析的那样：“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知道，军事行动必然破坏他与西方的关系，从而失去帮助苏联经济振兴的机会。因为莫斯科从未遇到东欧多数国家同时爆发危机的状况，如果动用武力镇压，苏联势必付出难以估量的代价。因为他知道，在东欧实施军事镇压，必然彻底挫败苏联国内正在实施的改革。因为他没有真正理解东欧国家人民真挚的爱国热情，以及对苏联控制的强烈仇恨。我想，他本人也不愿意发生流血事件。在战争和东欧独立的两难选择上，他选择了后者。”^④

1990年12月29日，联邦德国《时代》周报发表题为“走钢丝——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推动因素东欧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的政治评论，对戈尔巴乔夫

^① 注：“西纳特拉理论”，又译为“辛纳屈主义”，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用来戏称其允许周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政的政策的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屈的歌 *My Way*——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走他们自己的路。

^② [法]《快报》，1990年7月6日。

^{③④}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04页。

在东欧剧变中所充当的角色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评论指出:

当华沙条约中的最后一个国家以流血方式争得了走向莫斯科所预示的自由的道路时,当苏联的人民代表正争吵得难分难解,但由于罗马尼亚发生戏剧性事件而突然一致地等待戈尔巴乔夫作提示时,这位克里姆林宫首脑闪电般地抓住了机会。他有把握地感觉到,罗马尼亚的大屠杀会使莫斯科所有煽动由中央采取武力解决办法的人的血液凝固起来,他以尖锐的语言把别国的自由和自己国内的局限性区别开来。他手指向前方,顿挫音越来越强,把自己又一次放在中间派守卫者的位置上,把自己扮演成一个采取强烈政治手段的理想主义者,他同左派和右派都保持距离,他在搞分化组合,在把已故的经典作家像棋子一样在棋盘上移来移去,以马步从共产主义跑到了赞成趋同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这个改变世界的人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并且时间紧迫了。

西方对苏联党首脑改变国际形势的回答不可能比这更明确了。事实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从阿富汗撤走了苏联军队,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一个销毁核武器的协定,通过拒绝国际阶级斗争创造了一个由超级大国组成的社团,否定了斯大林留下的关于两种世界经济的理论,并且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欧共体(通过上周的一项贸易和合作协定)表示了爱慕之情,通过访问梵蒂冈和北京弥合了同罗马天主教上帝之国和中国的裂痕。

戈尔巴乔夫所创造的奇迹在于,他在失败了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保持一党专政的僵化结构继续存在的情况下,着手建立一种符合人的尊严的社会,并且已解放了想象不到的社会力量。他通过在幕后的许多次会晤促进了东欧的完全革命,除罗马尼亚这一悲剧性例子以外,还成功地提供了庇护,例如在民德帮助阻止了昂纳克采取齐奥塞斯库式的暴力行为。

可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罗马尼亚蓝黄红三色旗中去掉共产主义标志之后,华约所有国家的改革的这位庇护人终于被人以飞快的速度超过了。民德最彻底地摧毁了老的统治结构。齐奥塞斯库和保安部

队在血泊中覆灭,在莫斯科引起了一致的掌声,而德国同志那里政治局委员的被捕和安全机构的解体则引起了忧虑。这些结果使戈尔巴乔夫的中间道路成了一种走钢丝。通过1989年3月26日的选举,戈尔巴乔夫大胆地跳出了克里姆林宫的墙,以便从外面借助于不怎么陶醉于改革、却成百万人地举行抗议的人民来推翻旧的体制。从此开始了一个建立法治国家议事基础和体制基础的既艰难又扣人心弦的过程。对于激进的改革者来说,戈尔巴乔夫仍是个搞密谋的教皇,对于共产主义的教廷来说,他像个路德。^①

3. 东欧的民主:治病的良药吗?

当西方世界为“民主”在东欧取得胜利而击掌欢庆时,东欧社会的政治复仇与混乱却紧紧地困扰着社会复兴的健康力量。

1990年7月16日,美联社发表公开评论——“民主解决不了东欧的所有问题”。评论指出:

千百万东欧人期望去年把共产党赶下台的民主潮流能解决他们所有问题,但这是不可能的。不满情绪在蔓延。

布达佩斯的问题也许与布加勒斯特、东柏林、布拉格、索非亚或华沙不同,在一些东欧人还在自问为民主而进行的战斗是否已经真正获胜,或对通向繁荣的道路太长而感到沮丧的时候,失望情绪遍及匈牙利。

匈牙利人已经遭受到价格上涨、新税收、导致失业的企业破产的打击,人们心情忧郁。许多人认为,新政府不能胜任以最少的痛苦改善现状的任务。今年头一季度,通货膨胀超过30%,工业生产下降8%以上,估计有5万人失业。外债为206亿美元,按人均计算,在东欧是最高的。

任何地方也没有像波兰那样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关系如此分

^① [联邦德国]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伊泽尔:“走钢丝——没有克里姆林宫的推动因素东欧的变化是不可想象的”,《时代》周报,1990年12月29日。

明。商店里商品供应比较丰富,人们也似乎善于经营,但工人已经因物价上涨和工资受控不断罢工。

甚至经济比较健康的捷克斯洛伐克也面临经济调整的困难。从7月11日起食品价格上涨25%,租赁和能源价格计划在秋季提高,明年初价格将完全放开并加速向私有企业的转变。

东德人相信,通过与西德统一可以比较迅速地致富,但面临短期的动乱。这个国家8000个大企业中有1/3到1/2在几个月内将破产。数百万人将失业,许多人已预言,秋季会出现罢工热潮。

政治动乱仍然使保加利亚给人一种不安全感。罢工升级的威胁迫使姆拉德诺夫总统于7月辞职。人们对一个被抗议活动弄得残缺不全的政府能否处理紧迫的经济问题感到担心,从而加剧了保加利亚人的悲观情绪。估计有60%的工业不盈利,失业在增加。在罗马尼亚,政治局势似乎不那么有希望。虽然5月的多党大选一般来说还算是公正的,但上月新政府就职仪式前发生了暴力袭击政府机关及其后的镇压矿工事件,许多人仍然害怕和不信任取胜的救国阵线。^①

1992年2月1日,《经济学家》周刊以“东欧的民主”为题,对1989年剧变以来的东欧社会作了总体性观察。周刊指出:

除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在东欧倾覆并没有使民主制度得以恢复。1989年,东欧的反共势力得胜了。但是,这种民族团结的英勇时刻是短命的,因为反共运动分裂成执政派和反对派。

民主制度的反共阶段分4种形式。匈牙利和波兰的变化是渐进的。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像一个空蛋壳那样碎裂。保加利亚的共产党人分两步走。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在1990年6月的第一次民主选举中获胜。但是,接着由于诸多困难在1991年10月的第二次选举中输给了反共势力联合组成的民主力量联盟。阿尔巴尼亚不久也可能出现这种

^① 美联社维也纳1990年7月16日电。

情况,那里的共产党人1991年4月在多党参加的选举中获胜,但是掌权地位脆弱。第四种类型是罗马尼亚。那里同旧政权的决裂比较含糊。1989年12月,齐奥塞斯库被推翻,接管政权的是民族救国阵线。这个阵线反齐奥塞斯库是毫无疑问的,但民主到什么程度,仍有争议。

除了若干例外,东欧已进入民主的第二阶段:成立新政党,起草或修改宪法。东欧在最初的混乱后出现新的政党制度,接着建立秩序,然后又出现混乱,这是正常的。从表面上看,每个国家都有无数政党。大多数政党是徒有虚名。有些政党看上去似曾相识,从左到右都有。在大多数议会里,都有几个通常称为社会党人的前共产党,也有几个民主社会党人。然后是中左:自由民主党人和青年民主党人(匈牙利)、民主联盟(波兰)和公民论坛中的左翼(捷克斯洛伐克)。属于中右的有民主论坛(匈牙利)、中间派联盟(波兰)和公民论坛中的右翼(捷克斯洛伐克)。这两派都是赞成资本主义的。中左主张搞福利和公民自由。中右包括基督教政党,比较倾向于传统。

但是,“左”和“右”都是虚的。宪法关心的是总统和议会如何分权,怎样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第一条规定意味着要在议会混乱和一人统治之间找出一条路。罗马尼亚把权力归于总统。匈牙利则归于议会。波兰议会中有20多个政党,哪个政党的得票率都不超过13%。瓦文萨总统要求得到现在属于议会的任命总理的权力,以及让总理有更大的颁布法令的权力。哈维尔总统则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以防范捷克(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紧张关系导致联邦政府瓦解。至于保护少数民族,规定是模糊的。这些都是东欧国家70年前已经遇到过的、哪个国家都没有妥善解决的问题。

问题看来像是老问题,但现在条件不同。东欧人的教育程度较好,比较依靠自立;他们有过去的(在南斯拉夫则是当前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在他们西边已经不是经常发生战争的西欧大陆,而是欧洲共同体。^①

^① [英]《经济学家》周刊,1992年2月1日。

第六章 经济援助：西方与苏联的经济改革

通过经济援助来实现预定政治目标,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职能之一,又是其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渗透和演变的重要方式。“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主要目标就是复兴世界经济,并把其视为建立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必由之路。”^①事实上,苏联东欧集团的瓦解与崩溃,就是西方实施经济战略的主要结果。“打败共产主义和复兴美国精神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自1983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发展。除了在1990年有一段为期九个月的经济不景气外,这种发展一直持续到2000年。世界上都知道,美国在80年代的军事建设几乎就是很轻松地再次进行武装。这些都得益于包含减税在内的政策、接触管制(建立在吉米·卡特时期的良好纪录基础之上)、通货膨胀率在1982年底降到5%以及自由市场的扩张等因素。”^②正是充分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希望获取西方经济援助来支持国内改革的政治诉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引导、诱劝和规制戈尔巴乔夫朝着偏离社会主义的改革之路上越走越远。可以说,西方阵营最终取得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胜利,归根结底就在于其强劲而雄厚的经济实力。就像尼克松所言:“在美苏谈判中,尤其是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中,我们最大的王牌是我们的经济实力。”^③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93页。

②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720页。

③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一、西方的经济战略：政治的目标

美国的经济战略实质上就是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实施体现,是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进行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发表演说以动员对岌岌可危的希腊和土耳其施以经济援助的时候,他强调了美国经济战略的政治本意:“极权制度的种子是靠灾难和匮乏发育滋长的。它们散布在贫穷和不和的秽土中,并在其中成长。当人们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破灭时,它们便大大茁壮起来了。我们必须使那种愿望永不熄灭。”^①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明确指出,苏联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反对,实质上“构成了对世界和平,接着,便是对美国的威胁”^②。正是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美国正式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援助视作与苏联进行长期对抗的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援助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全球霸权。正如雷日科夫所言:“长达数十年的‘冷战’表明,两个世界之间的矛盾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围。意识形态在这里只是一个幌子。实际上,主要是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地缘政治利益的对抗。它们之间的矛盾最突出地表现在西方集团在经济、贸易和科技领域歧视苏联及其盟国并且企图控制这些国家。”^③

1. 目标:削弱共产主义的生存潜力

在冷战中,美国实施经济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削弱共产主义的生存潜力,壮大自由世界的民主力量。

1947年12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控制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东欧国家的出口》报告中指出:“为保卫美国的安全,应终止从美

①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下卷),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93页。

③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国运输诸如美国紧缺的，或是可能有利于苏联军事发展的商品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东欧的卫星国。这种目标有可能完成，如果美国不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东欧的卫星国作出公开的专横的挑衅动作的话。”^①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考虑到经济复兴、世界和平、美国的国家安全，在欧洲，包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东欧的卫星国，像国务卿所规划的一样，应该划出一个复兴地区。在那里所有的出口都将被管制。不论是对此区域哪个国家的出口，都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①美国政府要求那些有需要的国家对其需求提出充足的理由证明其确实需要此种商品；②要为世界的和平和欧洲的复兴服务；③保证美国的地位不会因此受到负面的影响。”^②

1949年4月21日，杜鲁门政府首次向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秘密听证会提出《共同防卫援助法案》草案。7月25日，向国会正式提出《共同防卫援助法案》。法案第402条规定：美国政府在提供军事援助时必须与受援国签署《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第408条规定：凡是与美国缔结集体安全保障条约、地区防卫协定的国家，美国政府都向其提供军事援助。

1950年8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美国应当在即将召开的纽约外长会议上劝说欧洲各国，并通过北约防务、军事委员会的途径促进西欧各国提高贸易管制水平。如果确认西欧各国向苏联、东欧输出禁运物资，不论何时，立即停止向西欧各国出口战略物资。

11月2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决定，所有巴黎统筹委员会成员国，不论是哪一个国家，除非他们保证不向苏联及其卫星国出口战略物资，否则，美国将禁止向其出口美国认为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物资。

12月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3号文件的附件——《对外军事与经济援助计划》指出：“我们在提供经济援助上的目标是在自由世界里形成政治和经济的强势局面，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地区里，它们所展现的弱点可能会引起苏联的强力推进。”^③在该附件的附录《经济合作总署新闻计划》中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93页。

② 同上，第893～894页。

③ 同上，第903页。

明确强调了对外新闻必须服务于经济援助计划的开展。“这种新闻工作的绝大部分在于让马歇尔计划对象国的人民全面了解该计划的成就与目标。”尤其是要达到以下四个新闻目的：①提高人民的意志和活力，这些人民的政府是经济合作总署援助的受援者；②推动对苏联共产主义性质的认识并在有关国家里鼓励对它敌视的态度；③通过利用传统、忠诚、希望与恐惧，推动欧洲各国建立更密切的经济联系；④加深自由世界联合与协同防御的紧迫感以及为之牺牲的认识。①

1951年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NSC102号文件，建议对所有向苏联集团国家出口的物品，一律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禁止外国船舶经美国向苏联集团国家运输各种美国许可证清单内的物资；国际贸易办公室应该制定一份“消极商品清单”，收录那些没有战略意义或战略价值较小的商品，在一定的数量范围内，这类商品可以出口；对那些既不属于许可证清单也不属于消极商品清单的物资，一律禁止其出口。

2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在可能影响苏联集团战争潜力的经济领域里的政策与计划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专门报告，主张美国和西方国家应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防御，以削弱苏联集团的战争潜力，增强西方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报告指出，破坏苏联战争潜力的消极措施始于1948年3月对战略货物运往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所实施的出口管制或禁运令。随着管制措施越来越严密，而且通过国际谈判，延伸到包括西欧各国出口的类似物品。报告指出，苏联集团的经济在与制造战争的潜力相关部分存在着易受到外部压力影响的脆弱点。这些脆弱点主要体现在机械与设备、精密工具、抗摩擦轴承、电子器件、橡胶等物品方面。对这些弱点实施有针对性的管制可以达到通过全面禁运所达到的大多数效果。报告宣称：“今天，自由世界向苏联主宰的地区的出口的重要部分受到了禁止或管制。”②

① 参见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②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26页。

10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规定:“禁止以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原子能物资、石油、有战略价值之运输器材以及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之首要战略性物资输往威胁美国安全之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联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乃系美国之政策,其目的为:①增强美国及各与美国合作国家之国力;②妨碍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作军事活动之能力;③扶助在外国侵略者统治下的国家之人民重新建立其自由。”^①

从杜鲁门政府开始的经济援助、出口管制成为美国“经济防卫政策”的重要战略组成,它不仅成为美国保持自身经济技术垄断地位的强大利器,更是对来自苏联东欧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威胁的有力遏制,并且最终成为美国通过从外部施压来改变苏联体制的战略路径。

1982年11月12日,里根总统签署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的第66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东西方经济关系及与波兰相关的制裁》(NSDD66)。该项指令要求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不再购买苏联的天然气,禁止向苏联出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在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禁运清单上增加一些重要的技术设备项目,提高给苏联的贷款利率,限制给苏联的信贷。具体来说,NSDD66号指令主要包括三个核心因素:

●美国的政策就是要取得欧洲盟国的赞同,不能以优于市场的利率向莫斯科提供信贷。

●美国不允许苏联利用西方关键的高技术来维持自己的军事与经济体制。巴黎统筹委员会(COCOM)对此要加强管制。

●美国将努力以一种前瞻性的方式与盟国合作,开发可供选择的能源,以减少欧洲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在这方面也要规定一个阈值,其目标就是防止欧洲对苏联天然气的依赖程度超过30%。(即,不能建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三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35页。

造第二条长达 3600 英里的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也不能签订新的合同)。^①

1983 年 1 月 17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颁布第 75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该项指令明确指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由三个方面组成:从外部抵抗苏联的帝国主义;从内部对苏联施压以削弱苏联的帝国主义资源;通过谈判,在严格互惠的基础上,消除双方的突出分歧。”^②NSDD75 号指令是里根政府时期有关美国对苏联的战略与目标的第一份,也是唯一的一份总统指令,并且成为美国政府的最高机密之一。NSDD75 号指令清楚地阐述了美国的“工作原则”——美国的目标再也不是和苏联共存了,而是要改变苏联的体制:

●美国不接受目前苏联将其影响范围扩大到边境之外的做法,而且美国将设法击退苏联的这种行为。

●美国将不会为他人做嫁衣裳,从而使苏联的经济体制获得利益,并且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限制这种结果的出现;文件还特别提到苏联通过能源出口而获得技术、信贷和硬通货收入。

●美国将伺机压制苏联在国外的影响。^③

NSDD75 号指令重申了美国将设法利用苏联弱点的战略,并且对这些弱点进行攻击。在苏联的所有弱点中,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经济。“我们确实感到以前忽视了经济领域,也就是说没有用这种经济武器使苏联受到伤害,”波因德克斯特说,“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中,有许多人对经济领域缺乏信心。我记得有些高级官员认为,美国没有办法可以使苏联经济崩溃。从表面看来,我对此也不大相信,因为它太过武断和不讲究科学了。不过,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对 NSDD 还是相信的,因为它是总统签署的,而且是为了一个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 年,第 147~148 页。

^{②③} 同上,第 153 页。

特殊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通过减少苏联的收入并迫使它增加支出,从而对它的经济体制进行挤压。^①

2. 手段:巴黎统筹委员会与经济战

为了协调美国与欧洲盟国共同实施对苏联东欧集团的贸易管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于1950年1月9日正式达成协议:由与会国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代表组成“协商团体”,每三个月举行一次会议,下设处理具体事务的机构,并将该机构正式定名为“对共产党国家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由成员国事务级官员组成,总部设在巴黎的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内。因此,“协调团体”和“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一般被统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或“巴统”。

巴黎统筹委员会虽然是非正式的国际组织,但是除了日本、澳大利亚以外,巴统组织的成员国本身又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日本、澳大利亚也通过与美国的双边防务条约而承担着西方世界的防卫责任。这种一身而二任的双重角色,就使得巴统组织的作用远非一般的非正式的国际组织可比。巴黎统筹委员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秘密组织。1951年1月30日,巴统第267号文件规定:巴统组织成员国必须保守有关巴统组织存在、成员国及其活动的秘密。1953年以前,巴统组织没有发布过任何有关其工作情况的公报,就连其名称本身也是极端保密的。1962年,巴统组织规定:巴统组织的所有文件保密期限为12年。正因为如此,直到1989年出版的《国际组织年鉴》虽然确认了巴统组织的存在,但是还是弄不清楚巴统组织与北约组织的真正关系,误认为巴统是北约的一个机构。

可以说,从1950年建立到1994年3月31日解散,巴黎统筹委员会“使美国在推行冷战战略方面有了一个新的工具,它使美国单方面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变成为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②。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运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54页。

^② 崔丕:《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年—1994年)》,中华书局,2005年,第147~148页。

作,美国成功拉拢其他西方国家对苏联集团实施了以贸易控制战略为主要内容的隐蔽的经济战,阻止给苏联、东欧国家出口能增强其经济军事实力的技术设备,“实际上将苏联集团阻隔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大潮之外,使苏联、东欧国家很难获得走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前列的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使苏联的科学技术除了重点发展的航天工业和核武器制造、军事工业外,其余均大大落后于西方,加剧了苏联、东欧的困难”^①。以至于依靠非理性经济资源来维持大国地位的代价逐渐使苏联成为盗版国家。据估计,在苏联约有十几万人专职翻译那些从西方偷窃过来的工业技术文件。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讲,“窃取西方技术是这个体制维持生存的生命线”^②。工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使苏联渐渐成为主要出口农产品和矿物的国家,不能和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输出国竞争。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年度报告,苏联在出口工业品方面已从1973年的世界第十一位降到1985年的第十五位。^③

如果说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出口管制,限制和延缓了苏联整体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因而造成苏联资源消耗型经济模式的转型困难。那么通过操纵石油价格的涨跌,美国又进一步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并使苏联资源消耗型经济难以为继。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的弱点已经日益暴露出来。里根政府认为苏联的经济已经毫无希望,决心利用苏联的弱点对其基本经济与政治弱点进行攻击。里根说:“俄国人永远也不会赢得军备竞赛,我们总能比他们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刺激因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它意味着,我们有能力永远保持对苏联的技术优势。”^④在通过“星球大战”计划加剧军备竞赛等公开手段外,积极实施隐蔽的经济战,向苏联脆弱的经济发起攻击。其中,最为典型的案

① 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8页。

②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48页。

③ 参见[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④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例就是加强对苏联国际融资渠道的监管和控制以及操纵全球石油价格的涨跌。

1979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国际部苏联—东欧处副总裁小罗杰·罗宾逊发现了苏联通过奥伦堡天然气管道,向西欧进行双重融资的企图。按照约定,这种石油和天然气工程一直是通过物物交换来实现融资的。苏联通过向西欧输送天然气获得的收入来向西方购买设备和技术。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苏联通过其控制的国际投资银行,将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大通银行的贷款进行了大规模秘密转移。例如,从大通银行流出的贷款表面上看被转到了巴黎的里昂信贷银行,但之后这些钱就消失了。罗宾逊在仔细追踪后发现,苏联向西方的贷款实质上大部分被用于对第三世界进行军事援助。“西方的贷款与苏联军事开支的疯狂增长,苏联向安哥拉、越南以及埃塞俄比亚的慷慨援助,欧洲和中东地区的恐怖活动得到大力支持出现了令人奇怪的巧合。”^①

1980年,苏联宣布了一项更加庞大的能源项目——修建亚马尔天然气双线管道。这条管道可以将西伯利亚北部的天然气输送到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然后输送到德国和奥地利的能源网。这项工程每年能够为苏联带来多达300亿美元的硬通货收入,这项收入对苏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苏共中央委员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说:“对于莫斯科而言,这条管道对它的经济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莫斯科究竟对这个项目的价值寄予多大的希望,则很难估计。”美国国防部前副部长弗雷德·伊克尔说:“它是一棵摇钱树,真可谓一本万利。”^②更有影响的是,西欧在总的天然气供应量中对苏联的依赖度也可能至少达到60%,苏联将有可能打“供应牌”和“价格牌”,实现其政治目的,但就第一影响来说,将会直接削弱挪威巨人气田的开发。同时,西方公司为了得到管道建造合同相互竞争投标,也会使苏联能够通过谈判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并同意向苏联出售精密设备。里根政府反对

^①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50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1页。

这项计划，“因为它害怕进口的增长会使苏联对欧洲施加政治影响，也不愿看到苏联人挣得更多的硬通货，以此巩固苏联的经济和军事实力”^①。

1982年1月底，就在美国政府寻求针对波兰军事管制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时，罗宾逊提交了一份证词和一系列具有煽动性的文章，呼吁西欧支持建设更加安全的石油来源，比如从挪威进口，以避免对苏联能源的依赖，并且要求他们要规范地与东方进行金融往来。他说：“假如你们真想使莫斯科受到损害，那么我们就要把目标指示器偏转好几度，直接对苏联施加金融压力，因为苏联毕竟是波兰发布《军事管制法》的催生剂和发起者。我们要推迟阻挠天然气管道工程第一条管线的建设和停止阻挠第二条管线的建设，而要代之以中断对官方信贷的补贴以及向莫斯科转让与军事相关的高技术。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②

1982年3月，罗宾逊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主任，开始从事对苏联融资的监管工作。3月26日，里根总统在召开内阁会议听取有关经济情况汇报后得出结论：“苏联人的情况很糟，如果我们能够卡断他们的贷款，他们将不得不向‘山姆大叔’乞讨，否则就将陷于饥饿。”^③7月，国家安全顾问威廉·克拉克在里根总统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国际经济政策高级小组，罗宾逊成为该部门的执行秘书。跨部门国际经济政策高级小组的作用是“非常令人敬畏的”^④，它是冷战期间唯一的一个由CIA、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负责人组成的高级政策策划机构，其主要目的是要将国际经济和金融问题与国家安全事务结合在一起。10月，在加拿大的拉斯皮尼举行的峰会上，美国强迫西欧盟国同意与其对苏联、东欧的出口管制政策保持一致。12月29日，里根总统在电视里宣布对苏联实施禁运，美国将禁止参与天然气管道项目。1983年5月，美国在威廉斯堡经济

① [美]丹尼尔·耶金：《石油大博弈：追逐石油、金钱与权力的斗争》（下），艾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4页。

③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④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峰会上通过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放宽西方对出口信贷利率的补贴、加强技术出口管制和为西欧开发可选择性天然气供应来源。这些措施的影响是决定性的。苏联石油部的专家承认:“当我们指责美国的制裁导致工期推迟时,这并不是找借口,而是事实。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首先,我们没有涡轮机,于是想自己制造,并且打算以后可以重复使用。然而,一切都是那么的混乱,工作计划全被中断了。这种状态长达两年之久,浪费了我们数十亿美元的资金。”^①

事实上,“一旦技术转让停止后就能对莫斯科产生戏剧性效果的关键领域之一,就是石油与天然气工业”^②。据苏联中央情报局能源分析专家的报告显示,苏联估计其石油储量为60亿~120亿吨,但是如果利用目前的开采办法将越来越难以开采了。据估计,苏联每年都要花费巨资来维持油田的生存。20世纪70年代初,每年要向石油工业投资46亿美元。1976—1978年,每年的投资超过60亿美元。80年代初期,每年的投资额急速增长到90亿美元。^③苏联需要通过大量购买西方的技术来减缓这些难题。但是从1981年10月开始,美国海关开始实施的严格的出口管制政策立即对苏联产生了深刻影响。亚马尔管道第一阶段的建造成本得到提高,与真实价格非常接近。苏联失去了融资的空间,并为此损失了更多的收入。“欧洲和日本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信贷关系发生了矛盾,苏联的财政生命线被缩短,苏联经济和交通危机正在加深。苏联至少另外花了10亿美元的硬通货去弥补因部分管道建设的零部件遭西方禁运而带来的额外开支,更别提不得不将大部分人力转移到制造替代品所遭受的损失了。”此后,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该项目直到1999年才完成,比原计划晚了10年。尽管这看似只是一场商业上的争执,但实际上就是一场削弱苏联实力的经济战。就像时任美国国防部部长的理查德·珀尔所言:“尽管我们在那个时候只能采取

①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4~245页。

② 同上,第59页。

③ 参见[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59~60页。

否认的态度,但这当然是一场经济战。”^①

在冷战期间,能源是一个重要的战场。沙特阿拉伯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生产国成为美国政府对苏联进行经济战的政策焦点。美国政府承诺支持沙特阿拉伯,“实际上就是充当他们的保护人,以此换取沙特阿拉伯采取使美国经济受益、加重莫斯科经济负担的石油政策”^②。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越来越成为苏联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在1981年至1984年,增加石油供应数量成为苏联政府克服其外贸中日益增长的困难的唯一手段。据统计,石油产量已从1975年的9310万吨提高至1980年的11900万吨和1983年的13000万吨。^③对石油的高度依赖让美国看到了苏联经济的巨大弱点。于是,里根政府果断实施了“沙特行动”计划,即通过设法使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产量的做法使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暴跌,从而使原油输出大国苏联的外汇收入锐减。1985年8月,沙特阿拉伯将石油总产量从日产200万桶迅速增加到900万桶,导致石油价格急剧下跌。据苏联中央情报局一份秘密报告说,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苏联每年就会损失5亿~10亿美元。1985年11月每桶石油价格为30美元,5个月后跌至12美元,据此推算,苏联因此损失90亿~180亿美元。就像叶夫根尼·诺维科夫所说:“石油价格的下跌是破坏性的,它使数百亿美元一扫而空。”事实上,石油、天然气、武器和黄金收入占了苏联硬通货总收入的80%,而石油和天然气又占了总收入的2/3。^④

里根政府操纵石油价格的经济战,给苏联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⑤,使苏联本来还可以勉力维持的财政收入来源进一步萎缩,苏联经济开

①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55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③ 参见[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1页。

④ 参见[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50页。

⑤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

始不断滑向崩溃的深渊。正如盖达尔所言:“1970—1980年代初期,这些问题还可以依靠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进行调节。但要保全最后的帝国,这可不是足够牢固的基础。”^①

二、苏联的艰难改革:沉重的经济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暴跌及其对苏联经济的整体性影响的恶化后果日益显现,迫使苏联政府不得不重新启动改革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结构性危机。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指出:“1986年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暴跌,而我国的出口传统一向是能源载体占有很大的比重。怎么办呢?最合乎逻辑的办法就是改变出口结构。可惜,能迅速做到这点的只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我国的工业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比如,就拿机器制造业来说吧,其产品的出口规模在1986年并无变化,但事实上仅只行销到经互会国家。‘资本家们’所购买的大概还不到整个机器制造业出口量的6%!这就是我们基本上只能出口原料的原因。”^②

1. 国民经济的军事化及其发展的困境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暴跌只是引发苏联经济滑坡的导火索。事实上,苏联国民经济的高度军事化结构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以至于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经济其实就是“永久性的战时经济”^③。国民经济的军事化使得苏联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到与军事相关的领域,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结构的畸形和发展的难以为继。

庞大的军费开支是苏联领导人最为重视的优先项目。苏联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国防支出从1940年的57亿卢布增加到1970年的179亿卢

^① [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② 同上,第160页。

^③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版,第53页。

布;此后的1971年、1972年、1973年连续维持在179亿卢布;从1974年开始,国防开支下降;1980年削减到171亿卢布,之后直到1984年都始终维持在171亿卢布;1985年才增加到191亿卢布。但是上述公布的数据并不足以取信于人。事实上,苏联军费开支规模之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之高,甚至连国家和军队领导人也不甚了解。戈尔巴乔夫说,举凡牵涉实际军费开支、军队的整体状况、军工综合体科研情况、国防资金和物资有效利用的资料等,一切都是秘而不宣的。不仅是老百姓,就连政治局委员也不了解真相并在实际上成了“人质”,对高度秘密的问题只能在现成决定上签字画押,根本无权提问和讨论。在乌斯季诺夫主管国防口的时候,实际上他就一手垄断了这方面的工作。“除了勃列日涅夫以外,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敢过问一句,更不必说要求了解这方面的什么情况了。”^①

1988年8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在苏联总参谋部学院对士官生和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公然要求苏联公开军事开支预算,揭开自1917年革命以来一直笼罩着苏联军事的保密帷幕。他说,他的苏联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看一看,“公开性是否将像它在苏联生活的其他方面开始做到的那样,拉开笼罩在苏联军事上的保密帷幕”^②。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军费支出的评估如下:

年份	军费开支(亿卢布)	国民生产总值(亿卢布)	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960	230~310	2323	9.9~13.3
1965	350~430	2968	11.8~14.5
1970	440~530	3833	11.5~13.8
1975	530~650	4597	11.5~14.1
1980	620~790	5254	11.8~15.0
1981	700~750	—	—
1983	(2350亿美元)	—	—

资料来源: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5—1986年军事平衡》,美国《苏联》杂志,1983年,第293页。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8~149页。

②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8年8月1日电。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苏联的军费开支评估如下:

年份	军费开支(亿卢布)	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972	433	11.4
1973	440	10.8
1974	447	10.4
1975	454	10.3
1976	460	9.9
1977	467	9.5
1978	474	9.2
1979	480	9.0
1980	487	8.8
1981	495	8.7
1982	502	—

资料来源: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世界军备与裁军》,1982年和1983年年鉴。

按照美国和苏联人口平均的军费开支比较如下:

(单位:美元)

	1975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美国	645	632	669	723	766	846
苏联	481	496	499	503	506	516

资料来源: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世界军备与裁军》,1985年年鉴。

尽管统计的结果略有不同,但仍然显示出军费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的巨大比例,并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盖达尔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经济规模仅仅约为美国的1/4,却要与美国及其盟国保持军事均势,而且还要维持40个师的兵力以控制中国边境的局势,那么,处于清醒理智水平的人即不难明白:所有这一切都代价昂贵。大规模的军费开支制约了苏联经济中民用部门的发展。”^①

^① [俄]叶·季·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应从中汲取的教训》,王尊贤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49页。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开始,这种资源规模型经济的生产效率变得明显低于西方国家。根据统计,苏美之间的国力差距是巨大的。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苏美国民生产总值(GNP)对比

(单位:亿美元,以 1974/75 年价格计)

年代	1960	1970	1975	1980	1985
苏联	3800	6260	7510	8560	9420
美国	9020	13280	15290	18700	21260
苏/美(%)	42	47	49	45.7	44.3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译丛》,1994 年第 1 期。

波兰经济学家简·威尼艾基在 1987 年出版的《东西方经济展望》一书中分析了苏联模式的经济每生产一件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西欧国家所需能源的两到三倍。^①

	能源 每千美元国内总产值	钢铁 每千美元国内总产值
苏联集团		
苏联	1490	135
波兰	1515	135
东德	1356	88
匈牙利	1058	88
西欧国家		
法国	502	42
西德	565	52
英国	820	38

1985 年 3 月 11 日,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就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形势。在他看来,改革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就是:与军事相关的领域,特别是军事工业过多地侵占了有限的国家资源,从而导致改革无论在资金来源还是智力支持方面都无法获得有效支撑。戈尔巴乔夫说:“全国只有两

^① 参见[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 年,第 44 页。

三个可以接触军工综合体的数据资料。当然,我们都明白不堪重负的军费开支对经济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但只是在当了总书记之后,我才了解国家军国主义化的真正规模。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来自军工综合体头头们的阻力,公布了这些资料。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 16%,而是 40%! 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 6%,而是 20%。250 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 200 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①

1989 年 5 月 30 日,戈尔巴乔夫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披露,1989 年苏联的军事预算为 773 亿卢布(1290 亿美元)。美国的军事预算为 3000 亿美元。新闻发言人格拉西莫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苏、美军事预算)在结构和价格标准方面存在根本区别。比如,苏联士兵的津贴每月只有 7 卢布(12 美元)。苏联总参谋部副部长弗·库克列夫少将说,戈尔巴乔夫所引用的数字中还包括购置军事装备以及用于生产、研究和发展方面的开支,而早些时候公布的官方数字中不包括上述款项。先前,苏联关于整个军事开支的数字均是保密的,而早些时候官方公布的总额为 200 亿卢布(330 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被西方认为是大大低估了的数字。^②

面对窘迫的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决定中止军事上的“烧钱游戏”。他说:“追求在军事上一下子对所有可能的对手都占优势(而这样的方针是有过的),结果是在一些年份里,用于军事准备的开支达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25%~30%,也就是说,比美国和欧洲北约国家的同类指标高出了 4~5 倍。很明显,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应该停止奔向深渊。”^③

2. 加速战略与戈尔巴乔夫的最初努力

1985 年 4 月 23 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上表示,要忠于列宁,信守社会主义理想,肯定了 1983 年安德罗波夫时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成就。同时,也表示要继承安德罗波夫时代确定的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59~160 页。

^② 参见路透社莫斯科 1989 年 5 月 30 日电。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 年,第 211 页。

国家发展战略——“加速”战略，并决心采用安德罗波夫的办法——整顿纪律、重塑秩序。戈尔巴乔夫的这一选择，既是对安德罗波夫的政治尊重和继承，也表明了在他发起改革的时候，苏联社会对党的总书记传统做法的承认与顺从。“注明改革的时间在共产党中已成惯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于1985年4月，他当选为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那次会议以‘四月全会’而著称。实际上，这次会议批准的计划并不是最终为世界所了解的那个改革计划，即政治和经济的根本改革计划，而是一个十分有限的计划。它应更准确地称为‘安德罗波夫宣言’，因为它基本上是在他的鼓动下写出来的。”^①

1986年2月25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路透社预评“此次划时代的代表大会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在戈尔巴乔夫的坚定领导下，苏联的经济增长幅度将增大”^②。这次大会是例行的代表大会，在1985年4月的中央全会上已经决定大会召开的日期和需要讨论通过的主要文件。大会的主要任务是确认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我国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制定改革的战略和策略，动员全国力量去实现它。

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广泛地按照列宁的方式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制定出一个现实主义的经过全面考虑的行动纲领。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将确定我们今后几年和几十年向前进、向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崭新状态前进的性质和速度。”在对已取得的成就作出应有评价的同时，戈尔巴乔夫说：“苏共领导人认为，有责任把我们在政治活动和实践活动中出现的失误、经济和社会精神领域的不良倾向，以及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如实地、直率地告诉党和人民。一些年来，不仅是由于客观因素，而首先是主观原因，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国家发展中问题的积累要比问题的解决快。惰性、管理方式方法的僵化、干劲不足、官僚主义滋长——这一切都给事业造成不少

^①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1页。

^② 路透社布鲁塞尔1986年2月20日电。

损失,社会生活中开始出现停滞现象。形势要求变革。”^①

戈尔巴乔夫指出：“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他说：“我们所理解的加速指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但不仅仅是如此。其实质在于发展的新质量：在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结构改造、有效的管理、劳动组织和刺激形式的基础上尽一切可能使生产集约化。加速发展的方针不能只归结为经济领域中的改造。它还规定执行积极的社会政策，始终如一地确立社会主义公正原则。加速的战略要求完善社会关系，更新政治机关和意识形态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加深社会主义民主，坚决消除怠惰、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即消除阻止社会进步的一切东西。应当保证我们成功的主要一点是，群众生动的创造活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可能性和优越性。”总之，“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些问题包括近期的和远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内部的和外部的。苏联社会的崭新状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达到，并且应当达到”。^②

简而言之，为了摆脱苏联经济的发展困境，戈尔巴乔夫最初采用的方法是“加速”，换句话说，“就是加快现在已存在的趋势。只要有更严密的纪律、更严格的管理、更少的腐败、更多的节制和对传统管理方法的某些调整，就能够达到这一目标”^③。对此，切尔尼亚耶夫给出的结论是：“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如何将我们国家引向世界水平的问题上已经有了某种明确的构想。只不过有一些个别的想法而已：如建立‘秩序’，加强‘合同纪律’，对最敏感的管理权和计划工作分散化问题还仅仅局限于作战略考虑的范围之内。”^④具体而言，作为用行政命令方式来推进“加速战略”实施的典型做法，就是继续安德罗波夫时期提出的反酗酒运动，并以此作为强化劳动纪律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主要途径。

^{①②} 报告内容均引自：“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上的政治报告”（1986年2月），《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6年第3期。

^③ [美]小杰克·F. 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2页。

^④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44页。

酗酒早已成为一种痼疾,一种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痼疾。酗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历史根源、社会生活条件、生活放纵、缺乏与这一痼疾作斗争的意志和其他许多原因。所以问题并不在于酒类的生产总量。但是戈尔巴乔夫决心已下。上任伊始他就在工作日记中写道:“1985年3月27日。1. 质量,2. 反酗酒,3. 低收入居民……”在1985年4月4日—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在就“与酗酒和酒癖作斗争”问题的讨论时,戈尔巴乔夫坚持加强与酗酒作斗争,指出了酗酒的社会和生产遗传后果,提出要采取强硬措施加以整顿。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受到与会的苏联计划委员会、商业部、加工工业的领导和一些农业专家的质疑。他们极力坚持自己对“酒”的态度。他们说,这样一来国家在预算方面要损失几百亿卢布,葡萄种植园也会遭受损失,许多葡萄酒厂的机器设备将要报废。但是“要唤起那些自认为在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人的理智是不可能的,当时那些聪明之士提出了那么多理由和意见,再争论下去是没有意义的,主张逐步降低酒类产量的人自然被斥责为保守派,说他们故意教唆人民喝酒。这是一场颇为激烈的斗争,不过政治局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①。在国家计委副主席试图证明限制酒类销售会冲击预算,无法弥补50亿卢布的“伏特加酒钱”时,戈尔巴乔夫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打算坐着伏特加进入共产主义!”^②

于是,禁酒运动在社会范围内展开。减产的不光是白酒,还有白兰地、干葡萄酒、香槟酒。进口酒类的数量也急剧减少,这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酿酒业面临经济破产的危险。运动高潮时甚至连酸牛奶也差点遭禁,因为它被怀疑是酒精饮料!“所有这一切即便不是有害和危险的,也是可笑的。”^③在未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家管理法律体系之前,“唯意志论就始终是现实危险,它会带来一切可能的恶果”^④。

首先,国家财政受到严重削弱。反酗酒运动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减少了数百亿卢布的税收,并第一次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雷日科夫估计,1986—

①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

②③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09页。

④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90页。

1988年3年的时间，国家税收减少了670亿卢布，按照当时的官方兑换率为1000亿美元。^①在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人们试图放慢一下解决问题的速度，至少遵守决定中规定的数字，然而这件事主要由党的监察委员会监管，他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不过应当说一句，当大家肩并肩坐在政治局会议室里时，都慷慨激昂地主张根治酒害，而当我私下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个别交谈时，他们却一个劲地咒骂那些决定，反对降低酒类生产的速度，据我所知，他们自己的嗜好都没有改变。”^②

其次，社会犯罪现象急剧滋生。对伏特加的需求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机会，该政策导致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突然增长。与美国的禁酒时期相类似，当然是出于良好意图的改革者反酗酒即兴之作，尚在俄国的“芝加哥男孩”出现之前，就生出了苏联的“芝加哥黑手党”。往后除了酒类黑手党之外，又新增了石油黑手党、铝业黑手党、银行黑手党等“弟兄”。紧跟他们之后，“政治黑手党也理所当然地出现”。^③

再次，损害了人民的改革热情。就负面影响来看，这场运动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后果也不小。让人不禁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你强迫傻瓜祷告上帝，他会把脑袋磕破。”酗酒如同在全世界不受欢迎一样，在俄罗斯也从未有过好名声。正常的劳动道德谴责工作时间酗酒。但是饮酒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婚礼、丧礼和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标志。不能用自己的钱购买没有被禁的伏特加，全国所有成年人处于被控犯有酗酒罪的状态，只会使行为能力被限制者火冒三丈。在整个城市或大城区的两三个商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成千上万的人用生动、“慷慨激昂的语言”数落禁酒运动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可是对投机的酒商来说，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不管白天还是夜间，只要付出两倍的价钱，任何时候都能从出租车司机手中买到酒。“官方反酗酒斗争的愚蠢在于，它使国

① 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3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3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11页。

内切实可行的不饮酒运动告吹。”^①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声望受损。如此轻率地作出的决定给国家的经济和领导人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人民不理解也不接受这些仓促采取的措施。许多人后来认为,禁酒令是改革计划中唯一实现的决定。“但这种看法不对,这项决定并未贯彻到底。中央委员会收到数千封愤怒的来信,那些当初呼吁同酗酒现象作斗争以挽救自己濒临离散的家庭、使丈夫和孩子免受病痛折磨的妇女们,这时却请求增加白酒销售量,因为男人们又改喝香水和牙粉了。在国内,人民同政府和执法部门展开了一场地下斗争,最主要的是,国家的酒类专卖权被破坏了,而且简直无法恢复,到处都有人私自酿酒,而酿酒原料主要是糖。从那时起,酒和食糖的问题成了居民最紧迫、最头疼的问题,同时对党和戈尔巴乔夫也造成很不好的影响。”^②

禁酒运动声名狼藉,到1988年便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了。但是反酗酒运动却成了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改革标志。它足以说明戈尔巴乔夫最初的实际步骤是怎样地考虑不周,其中包含了他的政治失误、经济失误和心理失误。“果然不出所料,就连专制时代或者极权主义时代最果断的执政者都未敢尝试的、通过命令方式达到俄国人人清醒的做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它在国家预算中留下了第一个、不过也许是致命的窟窿,还留下了理所当然地冒出的生产和地下销售家酿烧酒和伏特加酒代用品的黑手党……以及数百则笑话,嘲讽的对象自然是‘改革之父’。”^③

三、西方的经济援助:致命的毒药

然而戈尔巴乔夫所提出和实施的“加速战略”却在实践中遭到抵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第一个极端口号就是加快发展速度,而且只强调数量,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10~511页。

②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33~134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07页。

而不管质量。他不提目标和明确的发展道路,只是简单地号召,这些号召又被粗制滥造般地完成。一切仍是老样子,只是干工作必须更快更多。”^①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后,无论“加速”的格言还是对每个人发出的“在工作中加把劲儿”的号召,均未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更遑论改变已经陷入困境的苏联经济了。罗伯特·盖茨指出:“面对一个正在承受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庞大国家,戈尔巴乔夫既没有战略,也没有‘修复’体制的计划。在西方掌握的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文章和私人讲话中,根本没有任何修改苏联体制的内容。他的经济和政治策略完全是一种试验,是一种尝试,一条路走不通,再尝试另外一条路。”^②

不过,正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经济困境让里根政府看到了战胜共产主义的历史机遇。1988年美国综合长远战略委员会的预测表明,到2010年,在世界经济大国中,美国仍将名列首位,而苏联可能仅居第五位。届时其国民生产总值将远不及美国的半数。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这种前景预测加剧了苏联领导人的忧虑和恐慌。“这种前景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所包含的内容,已使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感到震惊。那些将权力建立在共产主义必将打开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门这样一种信念上的人,对此更是惊恐万状,坐立不安。”^③里根政府和继任的布什政府恰恰利用了这种惊恐的政治心理。正如戈尔巴乔夫在后来所讲到的,里根友好地将他带到深渊的边缘,之后平静地叫他“再向前跨一步”^④。

1. 经济改革的阻力:官僚阶层

包括反酗酒运动在内的“加速”政策的虎头蛇尾和它们所引起的社会动荡,让戈尔巴乔夫这位改革的“设计师”感到难堪与不解。

①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230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21~322页。

③ [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④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76页。

在改革一周年之际,外界给戈尔巴乔夫的成绩作了评论。在西方分析家们看来是“感到困惑不解”：“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一直是个令人生畏的名人。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奇怪地不愿或不能把自己的干劲和决心输入苏联社会。”^①其原因在于：“这位新总书记本身就是传统势力的产物,传统势力明显地限制他实施自己的计划。因此,在他要求振兴苏联时,这些传统势力造成的障碍成为最强大的阻力。”“苏联领导集团的状况也是阻碍戈尔巴乔夫取得进展的另一个因素,各级党政领导机构都进入了很多人,但是,这些人不是决心干一番新事业的有胆有识之士。新领导人基本上是旧秩序的代表……他的统治,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统治的效力遇到的挑战,不是来自最高领导集团(在最高领导集团里是他说了算),而是来自基层的惰性和中下层干部中的拖后腿的势力。如果在国内不能取得有力的、持续的发展,戈尔巴乔夫一帮人在国际舞台上为确保苏联霸权地位的努力几乎肯定会归于失败。除非苏联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革”。^②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改革中存在着严重的“原始森林效应”。上面轰轰烈烈,下面寂静无声。感觉好像倒退了,什么变化都没有!戈尔巴乔夫说,我收到过一封信,是一位哲学系毕业生、共青团书记给戈尔巴乔夫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想告诉您,人民在您一边,大家都希望变革,但是地方领导人不让您知道实情。他们在极力抵制。”戈尔巴乔夫也收到了从家乡斯塔夫罗波尔寄来的一封信：“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苏共二十七大的鼓舞下,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找到自己的党领导谈心。您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别激动,这类运动我们见得多了。这次运动也会过去的。我们从来也未做什么,现在仍然如此。”^③戈尔巴乔夫自己在总结原因的时候认为,这是因为改革没有按照自己的方案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也就是说,他过高地估计了旧的体制的活力,不得不承认：“30至40年代形成的管理体制逐渐开始同经济

① 《是“摇荡器”不是“发动机”——美报评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周年》,《参考消息》,1986年3月13日。

②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1986年3月3日。

③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合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

发展的条件和要求发生矛盾。它的优点越来越不起作用了,相反,障碍作用却不断增长,从而形成了障碍机制,这种机制后来则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由于采取在非常条件下产生的工作方法,在已经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便受到了阻碍。”^①

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强烈批评党和国家的“经济官僚”。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向中央机关干部,主要是计划委员会发动了猛烈的进攻。这次全会后,在他接见部级干部时仍继续进行攻击。国家计委遭到最强烈的攻击绝非偶然,因为这一中央机构是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的中枢。戈尔巴乔夫总爱说:“在国家计委眼里没有领导,没有总书记、没有中央,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散布说,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们不希望推行“改革”,因为改革损害他们的特权。因此,从1986年6月,大约在他上台一年后,他改变了政治斗争的性质和方向,从针对社会经济方面转向了针对个人,他触及官僚主义的敏感神经,给改革的机器中注入了更多的燃料。反对特权,这成了总书记手中最肮脏、最不光彩的武器。最有特权的人利用这一武器来反对其他有特权的人。这样,目标就发生了变化,从经济和社会领域转到了干部身上。残酷的干部斗争一直持续了整整一年。接下来的1986年8月政治局会议对经贸部干部进行了从未有过的打击。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面改组整个党的体制的任务,“从基层党组织直到中央政治局”^②。1987年夏天,戈尔巴乔夫起草了一份关于经济改革的方案,7月份又专为批准方案召开过中央全会。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意图,在为社会民主化扫清道路的“政治”一月全会上,经济民主化就该进行了。于是,由于管理者的消极怠工,由于拒绝“民主地”投票赞成提价的社会不够“觉悟”,经济改革受阻,戈尔巴乔夫便只剩下唯一的推进改革的办法:“加大政治攻势。”^③

此时,看似强大的“障碍机制”在改革时期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消极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1页。

② [澳大利亚]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

③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44~145页。

作用,从而使得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实施坚决的“政治手术”。雅科夫列夫对此进行分析:^①

首先,时间在始终不渝地冲毁着党垄断一切的局面。导致这种结果的过程,不仅在苏共本身(领导机关越来越脱离人民,尤其是脱离知识分子,教条主义和空谈成风,社会思潮麻痹,不愿意看到也不愿意承认现实现象),而且在整个社会上都得到了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苏共的无上权力已走下坡路,尽管仍然保持着外表上的“体统”和仪式。可是仪式仅仅是信仰的外表,而已经十分明显的言行脱节已成为潜在的危险事实,而且已渗透到生活方式本身。

其次,党的领导机关对国内事态的控制越来越蜕变成本位主义利益和地方利益对党本身的控制。部门和地区的帮派风气已明显加强,且早就开始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区的区党委以及州内有联盟所属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的州党委都处于这种状况。这样的党委形式上是掌权,实际上越来越听命于企业经理和部队长官。从70年代初起,部委本位主义利益也笼罩了苏共中央。各部委的权力已如此之大,以致在改革时期它们常常对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总统隐瞒已有的危险信息,继续保存了“一国中多国”的做法。

再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党内高级干部结构中,纯粹党的机关权势分子越来越让位于专家们——不仅是那些只是在本部门工作的专家,而且是那些定期在部门和党的领导机关任职的专家。升官发财成了主要动机,而官官相护则是确保升官发财的条件。结果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经济上的刑事讹诈成了党的领导机关控制高级干部,特别是经济部门高级干部的主要手段。这种讹诈的基础是什么呢?从20年代起,经济干部就不得不随机应变和说假话。他们在法律的边缘上或在法律之外玩手法,绕开由计划体制、高度集中和唯意志论决策以及大量的、互相矛盾的、烦琐细小的官僚主义指示和细则所规定的程序使自己“摆脱困境”。那时违法乱纪现象简直无孔不入,到处都是,它们是绝对避免不了的,这种违法乱纪的本身,使

^①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98~200页。

违法乱纪成了陈规陋习。这就是说,只要党委“瞄准”谁,执法机关实际上在任何时候对任何经济工作者都可以立案法办:或给予党纪处分,或撤职查办,或关大牢。与此同时,党的领导机关越来越多地浸透了部门利益,越来越多地为本部门效劳。在各民族共和国,党的领导机关则安插越来越多的本民族干部,越来越多地浸透着民族利益和越来越多地为本民族效劳。党和党的领导机关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官员名录上的干部手中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不是像斯大林在世时和搞镇压时那样。但是党的权力至上的幻想仍继续存在,而且在意识形态上还在继续滋长。

最后,社会上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高智力社会集团,它可能是潜在的反对按官员名录实行干部委任制的反对派的精神支柱,在这个反对派里,一部分人持民主观念,而另一部分人则追求权势。苏共二十大以后,党的领导机关面临如何在不再采用镇压手段的条件下管理官员名录上的干部的重大问题。干部的自由放纵、领导的胡作非为,在中央和地方都有所滋长。贪污受贿、营私舞弊、出于贪财或玩忽职守的滥用职权、对很多人来说有利可图的经营不善等情况大为增长。当营私舞弊和滥用职权又成为普遍的现象时,就极有可能既容易又简单地把这一套实际关系用于为宗派和黑社会团体的利益服务。

那么都是哪些人在反对经济改革呢?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阿甘别吉扬指出,反对改革苏联经济管理体制的人有四类:第一类是官员。多是部一级和司局级工作人员。由于权力将下放到企业和协会,他们将被剥夺这些权力。这些人试图证明,没有他们,一切会变得更糟,管理部门将不会正常地发挥作用。第二类是一些能力差的管理人员,即一些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他们习惯于根据行政措施办事。第三类是那些“拿钱多干活少”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由于劳动组织存在缺点,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虽低,但却拿高工资。第四类是贪污国家财富者、受贿者和酗酒者等反社会分子。^①于是,戈尔巴乔夫决定“改组党机关”。他说:“现在的机关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得力的。”党的机关对戈尔巴乔夫

^① 参见美联社维也纳 1987 年 7 月 8 日电。

的改革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人们开始记恨他,认为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是不稳定的根源,它破坏了大家对明天的信心,而这一信心是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机关的主要成果。”^①面对官僚经济的暗中反对,戈尔巴乔夫决定:“要坚决加快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精神发展速度,就要在走向崭新状态的道路上实现根本改革。这无疑是一项革命性任务。”^②结果,经济成为政治的牺牲品,而且是浮光掠影式的政治。正如一句古老的俗语所说,如果躲在森林中的大树后,谁都找不着。“而主要的目的——人民的福祉,销匿在了个人政治奢望的围栏下。”^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在寻找经济改革失败的原因时发现:“原因并不在每个经济部门,而恰恰在政治方面”^④，“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⑤。

2. 西方的经济援助:政治企图

对西方国家来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遭遇到的困难越多,其在与西方打交道时作出的政治妥协就可能越多。事实上,就在苏共二十七次确定“加速战略”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了在苏联的经济困境中的谋取政治利益的筹码。1986年4月21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戈尔巴乔夫和患病的俄国熊”的评论。文章指出:

苏联领导集团面临着一些最根本、最艰难的抉择,而随着石油价格骤降,作出抉择变得更加刻不容缓。

——苏联面临着经济继续停滞,甚至进一步恶化的前景。要想克服这种状况,必须大幅度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苏联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的办法是任用新管理人员,加强纪律,禁止酗酒和改进现有的

①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596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5页。

③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64页。

④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14页。

⑤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机器。但是，真正需要的是减少中央对经济领域的控制。

——减少中央的控制，会改变收入分配制度，使抑制性通货膨胀变为开放性通货膨胀，甚至大概还会引起劳工斗争。这最后会削弱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如果不进行这种改革，苏联在经济上注定要继续比西方落后大约一代(二十五年到三十年)。苏联的军事部门虽然今天肯定不像经济部门这么落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军事方面的竞争能力也会受到危及。简而言之，苏联的经济状况大概不会比前一段时间好转，而且很容易会进一步恶化。其结果之一是，到一九九〇年日本可能会取代苏联，成为世界上的第二经济大国。戈尔巴乔夫说“应当”和“应该”进行重大改革，但却缺乏新的根本主张。苏联没有发生任何重大变化。

鉴于苏联的力量有限和世界现代技术的发展，如果苏联政权不改弦易辙，它在军事竞赛中也会逐渐落后。此外，苏联目前的境况不佳，无力在国外进行代价高昂的新冒险行动。但是，情况仍值得人们警惕。苏联新政权上台以来，一直在阿富汗、安哥拉和尼加拉瓜比较积极地采取军事行动。它不会放过任何风险不大的机会(例如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它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虽然人们还不大清楚戈尔巴乔夫是否或何时努力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大清楚如果他这样做会出现什么情况(包括他本人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有几点是清楚的。第一，苏联的制度并未濒临崩溃；第二，苏联不会进攻西方——在困难面前退却更符合列宁主义制度的特点；第三，戈尔巴乔夫迫切需要摆脱同西方的军事竞赛，同样也迫切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资金。

西方应该怎么办呢？

第一，促使苏联的制度在政治上多样化有利于民主国家。必须判断清楚，帮助患病的俄国熊或同苏联建立非补贴性经济关系究竟能否更好地促进实现这个目标？许多欧洲人和一些美国人都认为，西方政府的补贴能使苏联不致铤而走险和变得更加危险，能促进苏联进行有益的变革。这种理论在七十年代没起什么作用，现在看来也不会起多

大作用。关键原因是莫斯科权势集团不想变革。它得到的援助越多，变革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二，资本主义世界的所有领导人都应该意识到，苏联的竞争地位在日益削弱。对日本来说，这同收复被苏联占领的四个小岛有关。对欧洲来说，这增大了少受苏联军事威胁的可能性。对美国来说，这则同核军备控制谈判、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大势力范围以及犹太人移居等有争议的问题有关。

第三，苏联和西方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个人接触越多，苏联人民之间的交往越自由，苏联统治者的专断权力受到的约束就越大。^①

进入1988年以后，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成功越来越受到西方的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在评估报告中表露出了这种悲观。评估认为：

● 戈尔巴乔夫曾推动反酗酒计划，但是收效甚微，后来不得不放弃。由于伏特加酒官方销售的大幅下滑，国家财税收入受到了巨大影响。大规模非法酿酒的出现，既损害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也造成了食糖的大面积短缺。

● 尽管大量新资源被用来进行工业现代化改造，但是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改观。

● 苏联新机械设备未能达到世界技术标准，相对西方的技术落后进一步拉大（大型计算机和超级计算机落后15年；高级微型电路和光纤设备落后10年；计算机控制机械工具落后9年）。

● 1987年经济改革方案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

● 最重要的是，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艰难。食品大面积短缺，老百姓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所有在售商品，包括食品和其他商品，价格不断攀升。^②

① [美]罗恩·特列姆利：“戈尔巴乔夫和患病的俄国熊”，《华尔街日报》，1986年4月21日。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77页。

在1989年1月布什就职美国总统后,美国政府开始形成对苏联改革的新战略——“布什主义”。“布什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西方援助的目标是要促进和奖励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说:“我们正小心地负责地鼓励历史的趋势朝前发展,但是我们不想过快地放开步伐,以免造成危险的不稳定。我们鼓励改革采取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它同苏联结盟角度看都是可以长期坚持下去的那种速度。”^①不过,“布什主义”的另一方面内容则是要“惩罚”那些在改革进程中走回头的国家,即通过西方世界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来封锁和逼迫这些国家走向全面崩溃。事实上,“布什主义”的首次实践就是在东欧开展起来的。正是通过对波兰的全面经济制裁,波兰的社会不满迅速累积并最终促使共产党政权作出巨大的政治让步。而下一个目标就是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了。也就是说,只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符合西方的价值和原则时,西方国家才能给苏联以切实的帮助。

1989年7月15日,就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戈尔巴乔夫给巴黎首脑会议发来一封长达5页的信,表示希望就经济合作问题同西方工业化七国举行“建设性对话”。在西方首脑看来,这是苏联政府前所未有的举动,是东西方关系缓和的积极因素。但是在讨论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将苏联纳入世界经济的建议时,西方国家坚持认为,目前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苏联还未达到加入的条件。法国总统密特朗说,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不需要7国集体回复”。他指出七国“希望苏联开展的民主事业取得成功”。关于苏联能否参加七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密特朗说,这个国家尚不具备第一个条件,即“民主制度和实践”的条件。^②美国总统布什认为,尽管戈尔巴乔夫表示准备进行经济合作,但考虑苏联参加最发达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为时过早”。布什说,在考虑这种意见之前,苏联应发生“许多事”,特别是向市场经济变化。^③尽管表示了拒绝,但是布什还是安慰戈尔巴乔夫,认为他致首脑会议的

① [英]《卫报》,1989年7月14日。

②③ 参见法新社巴黎1989年7月16日电。

信是“迷人的”，这说明“苏联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朝我们这边走来”。^①

事实上，对西方国家来说，帮助戈尔巴乔夫其实就是帮助西方提高赢得战胜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概率。盖茨指出，在苏联改革的最后阶段，戈尔巴乔夫面临两个矛盾问题：“其一，他费尽千辛万苦独立推行了苏联政治民主化，但是内心从不愿意将自己的命运交到选民手中。因此，他一手缔造的政治进程最终将他抛弃。对他来说，民主化可能始终是一种手段，并非目的——它是击败党内对手和强硬推行改革的一种有效的政治手段，并非真正的政治信仰。其二，为了修复苏联制度，他加速了国家不可避免的消亡。尤其在经济领域，他认识的缺陷和个人的局限性，加之政治上遭受反对和俄罗斯文化与历史的影响，阻止了任何替代组织结构的创立。结果，由于戈尔巴乔夫削弱和取消原有经济控制机制后很长时间都未建立新制度，1987—1988年苏联经济开始崩溃。经济困难极大地恶化了其他危机，使苏联政权，尤其非俄罗斯共和国政权，遭到了严重损害。”^②

改革所带来的混乱局面让西方看到了机会。1989年8月6日的《新闻日报》公开倡议：“现在是援助戈尔巴乔夫的时候了。”评论指出，有些人仍然把苏联看作敌人，认为援助没有意义。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事实上，“如果苏联经济垮台，那么结束极权主义的发展趋势将停顿下来，斯大林主义分子将卷土重来。能说这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吗？美国和西德、日本应研究如何在今后几个月帮助戈尔巴乔夫。西方的影响力量很有限，但援助终究有重要意义”^③。美国前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公开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任务不是保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而是“不管他成败如何，制定为我国利益服务的政策”。美国前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新闻周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莫斯科需要西方的援助，我们应当设法利用这种愿望迫使苏联改革体制。但是提供长期信贷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应当同意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联在一起。我们还没有进入冷战完全结束的时

① 路透社荷兰莱顿 1989 年 7 月 16 日电。

② [美] 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382～383 页。

③ [美]《新闻日报》，1989 年 8 月 6 日。

期,但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戈尔巴乔夫是个崭新的人物,他继续掌权在此时无疑是符合西方利益的。只有在我们能对美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够重新确定它办事的轻重缓急次序,处理新时代的紧迫问题。同戈尔巴乔夫谈判提供了美国能促进其本国利益的最有希望的途径。”^①到了1989年秋,美国政府对苏联的政策更加明确而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外交政策协会上的讲话中表示,戈尔巴乔夫大力改造苏联社会的行动值得美国给予积极的支持。因为苏联改革会带来的不是危险,而是强调希望。^②基辛格对戈尔巴乔夫的路线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如果你准备毁灭苏联,你还会采用其他方式吗?”^③

3. 市场经济的神话:改革破产

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其改革必须走向市场经济。对于西方来说,市场经济并非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已,而是包括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全面转型。就在戈尔巴乔夫倡议的“加速战略”实施一年多后,美国卡尼州立学院政治系主任托马斯·马格施塔特敏锐地观察到了“加速战略”的局限性和西方在推动苏联走向市场经济道路上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苏联社会的全面变化。马格施塔特指出,对西方来说,苏联集团的经济改革运动所展示的前景,不仅为放宽贸易政策,而且也为在武器控制和处理地区冲突等领域取得进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共产党的领导人如果放弃面向市场的改革,他们肯定会使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并且不得不眼看着他们的社会越来越落后于西方社会。然而,如果他们要加紧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话,他们就会遇到要求他们国家的政治机构相应放宽限制的强大压力。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有机会去影响这场斗争的结果。这个机会是有限的,但具有重大意义。”^④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

① [美]《新闻周刊》,1989年9月20日。

② 参见[美]《新闻日报》,1989年10月18日。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83页。

④ [美]托马斯·马格施塔特:“马克思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共产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美国凯托研究所编:《政策分析》,1987年8月。

究中心的苏联问题专家巴里·布莱克曼说：“戈尔巴乔夫执政并奉行他的政策的时间越长，就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继续执政符合我们的利益。”他说：“政府现在认识到，戈尔巴乔夫奉行的方针对美国为自己制定的几乎每一个对外政策目标都是有利的。”^①

如果从总体发展来看，美国对苏联的经济援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通过经济援助要求苏联不要干预东欧的事态发展；第二个阶段就是在东欧剧变发生后，美国通过经济援助直接要求苏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作为对戈尔巴乔夫不介入东欧事态的奖励，在1989年12月2日—3日与戈尔巴乔夫举行的马耳他会晤上，美国总统布什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的支持。布什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坚定地支持和平变革——我确实要强调‘和平变革’这个词——这是一个给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功绩，值得我们给予我们所能给予的支持。”^②事实上，在这次的马耳他美苏首脑会谈中，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求美国支持他为使危机四伏的苏联经济转危为安而进行的斗争。布什满足了戈尔巴乔夫的期望：美国愿意帮助苏联获得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观察员地位。但是布什提出了要求：一旦自由移民权在克里姆林宫即将制订的法律中得到正式认可，美国将取消对苏联进入美国的货物征收的高额关税。12月4日，法国《费加罗报》以“用美元支持苏联改革”为题发表评论：

美国打算引导苏联开始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它将向苏联提供“技术性合作”。这种“技术性合作”将表现为美国向苏联派去许多经济专家。美国要求这些专家在克里姆林宫制定批发物价指数化制度，要求苏联公布防务预算。从长期的角度来看，乔治·布什似乎已把布热津斯基的下述提法作为自己的观点了：“应当给共产主义提供一笔合乎礼仪的安葬费。”^③

① 路透社华盛顿1989年10月25日电。

② [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89年12月21日。

③ [法]《费加罗报》，1989年12月4日。

在东欧发生了雪崩式剧变后,美国把对苏联经济援助的目标开始转移到要求苏联进一步削减军费并停止对第三世界的军事援助上面。事实上,进入1990年后的苏联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戈尔巴乔夫迫切需要西方对其进行直接的经济援助。但是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请求,美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6月24日,美国国防部长切尼明确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除非苏联进一步削减军费开支并停止对古巴、阿富汗和安哥拉政府的补贴。切尼说,他对苏联提出的越来越长的援助需求单感到不安。切尼表示,他之所以反对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是因为苏联人并未作出保证,说明这些钱都用于何种目的。他说:“离我接受向苏联提供经济援助的动议,苏联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①

6月27日,美国总统布什说:“我不认为应该用对苏贷款来‘挽救戈尔巴乔夫’。”布什拒绝大规模援苏的理由是美国面临的“法律问题”,还有“政治问题”。他说:“美国人将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向一个每年给古巴50亿美元的国家提供贷款。”布什认为只有在莫斯科“作出彻底改革努力之后”才能向苏联提供数十亿美元。他说:“美国支持苏联改革。”但是在苏联经济变成市场经济之前,美国只向它提供技术援助。布什很明确地表示:“如果没有改革,钱就白花了。”^②

在7月9日—10日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西方世界的领袖们再次表示了对戈尔巴乔夫推动苏联和东欧走向民主和实行面向市场经济行动的肯定,并且允诺将提供“帮助”来鼓励进一步的改革。七国首脑会议发布的政治宣言宣称:“我们对苏联朝着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方向采取行动的意图以及苏联按照市场的原则改革他们的经济的尝试表示欢迎”;“我们决心同苏联一起努力支持它创造一个公开的社会、多元化的民主和面向市场的经济的努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向那些以适当的方式……选择自由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90年6月26日。

② [法]《费加罗报》,1990年6月28日。

的国家提供实际的帮助”。^①

进入1991年以后的苏联经济更是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维持正常的经济运转,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下曾经的超级大国尊严,开始向西方作乞讨式的援助请求的努力。但是布什却趁机勒紧了缠绕在苏联脖子上的绳子。5月29日,在戈尔巴乔夫派出普里马科夫前往美国求援时,美国国务卿贝克明确告诉他说,只有苏联减少军费开支、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采取灵活态度、减少对古巴的支持以及表明坚决致力于自由市场改革后,美国才会考虑对苏联经济提供援助。5月31日,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对外援助小组的报告强调,苏联必须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满足西方的条件:

● 缔结重要的常规武器和战略武器控制协议,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改变行为格局”。

●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主席职务实行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也实行选举,继续改善人权状况,并确定一个进程,使各加盟共和国有机会决定“它们将来同苏联的联系”。

● 使货币可以兑换,实行浮动汇率和银行改革,建立真正的价格机制,国营企业实现私有化,维护私人产权。^②

6月4日,《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说:“援助苏联的关键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该评论指出: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已成功地使西方对帮助苏联经济感兴趣,但如何使苏联重新进行拖延已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棘手问题却使美国及其盟国在帮助苏联经济方面裹足不前。

布什政府高级官员认为,无论花多少钱,即使作出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那种规模的营救努力,都无法拯救正在崩溃的苏联制度。这些官员认为,公众的注意力过于集中在援助问题

① 美联社休斯敦1990年7月10日电。

② [美]《华盛顿邮报》,1991年5月31日。

上,而真正的问题是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国家走上持续改革的道路。

由于预算紧和政治上有人反对,美国在短期内不可能提供大量援助。欧洲盟国或日本也不可能马上提供具体援助。

然而,布什总统和其他盟国领导人已表示同情戈尔巴乔夫并且显然希望帮助他,相信他仍然是改善国际局势的重要力量。

官员们说,布什准备在今后几个月中给这位苏联领导人一系列有限的刺激以促进改革,其中包括使贸易关系正常化以及让苏联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立正式关系。

布什政府正在采取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设法首先促使改革,使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发生变化。

苏联问题专家弗雷德里克·斯塔尔说,西方应当等苏联进行政治改革后再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哈佛大学俄国问题研究中心的马歇尔·戈德曼对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能力一直持怀疑态度。他说,向戈尔巴乔夫提供大量援助,可能反而会影响放松中央控制和实行市场经济的进程。

一批苏联官员和美国学者已在哈佛大学一起起草一项利用大量西方援助改造苏联经济的庞大计划。参与起草的哈佛大学教授阿利森说,这项计划的前提是进行经济改革,它决不仅仅是准备交给克里姆林宫的一口袋金子。他说,如果苏联领导人“准备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情,那么西方援助的种类和数量将大大地影响其成功的可能性”。^①

6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上说,苏联国内一个新的改革浪潮已经兴起,它将“使苏联的政治发生大转弯”。美国决心帮助苏联进行这种改革。但是贝克告诫说,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迅速地注入大量资金不会推动改革迅速完成。他对部长们说,苏联政府4月23日通过把罢工煤矿的控制权交给这些煤矿所在地的各共和国平息了大规模的煤矿工人罢工,如果采取同样的做法,把权力从中央政府交割给各共和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91年6月4日。

国,苏联就会踏上真正的改革之路,从而拯救戈尔巴乔夫总统和他的改革计划。贝克列举了五种政治和经济改革情况,他暗示,莫斯科如实行了这五种改革就会从西方得到更多帮助。这些改革包括: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允许有私人资本,实行自由价格;向着自由选举和法制的社会迈进;彻底放弃对那些“追求对内镇压对外进行颠覆活动”的政权的支持;通过同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谈判给予它们所要求的自治权;大量削减防务开支,加快把军工厂转化为生产消费产品的工厂的速度。^①

同时,由激进的苏联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和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阿里森联合领导起草的改革计划(“哈佛计划”)建议,西方对苏联提供援助的条件是,苏联一定要在经济和民主方面取得稳步进展。具体来说,第一阶段持续大约两年半时间,在这个阶段中将使苏联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执行和监督该计划的两个主要机构)联系成员资格。第一阶段一开始实行,苏联政府就要设法进一步放宽物价,开始小规模的私有化并把卢布的汇率变为可以兑换的汇率。与此同时,政府要开始大力减少预算赤字。该报告小心地没有说明苏联民主化的具体条件,但是一再明确指出援助的条件是要保证采取一些行动举行大选和实行其他的民主改革。报告特别阐明,最迟到1992年初应进行最高苏维埃的选举,另外在进入第二阶段之前应达成一项联盟协议,让那些不愿属于联盟的共和国自行其是并同苏联单独达成经济协议。第二阶段开始时,要使卢布成为完全可兑换的货币,进一步扩大私有化,完全取消对物价的控制。该计划将提交给7月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计划要求西方每年提供200亿至350亿美元的援助。“哈佛计划”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使苏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要建设使苏联的经济和社会产生大规模和迅速的转变,其程度要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马歇尔在欧洲实施的计划或俄国1917年革命本身产生的转变一样大。”^②

此时,苏联国内对西方国家欲借经济援助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的计划已经明了。6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许多代表对西方援助苏联改革的前景持谨慎态度。在讨论帕夫洛夫总理的报告时,最高苏维埃的计划预算委员

^① 参见法新社哥本哈根1991年6月6日。

^② [英]《金融时报》,1991年6月13日。

会主席库切连科表示,在苏联国际收支恶化的情况下,“盲目地渲染国外的神话般的新贷款引起了严重不安”。他否定了将苏联纳入世界经济的“哈佛计划”。他说,这个计划在破坏人们对内阁反危机纲领的信任。库切连科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吸引外国人,但一向是外国人为我国服务,而不是像现在宣传的,我国要为外国人服务。”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完全支持代表们提出的将帕夫洛夫的报告和库切连科的发言交给电视台播放的建议。帕夫洛夫在回答代表们的提问时也对“哈佛计划”态度冷淡,他用讽刺的口吻说:“我国经济计划的数量已超过了论文的数量”(在苏联,博士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了科研成果的数量)。帕夫洛夫表示,他不相信美国愿意提供无偿援助。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和“联盟”议员团成员金永云支持帕夫洛夫的观点,他称指望西方每年会向苏联经济投资 250 亿~300 亿是“神话”。他说:“在遵守互利原则的条件下,必须为外国投资建立良好的投资环境,但是指望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是不现实的。”^①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更是公开指责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企图颠覆苏联经济的阴谋。“最近,中央情报局一直在采取敌对行动计划,旨在破坏苏联社会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他说:“人们在谈论,说我们可能会得到 2500 亿或 1500 亿美元的贷款。这是神话,是幻想。这不是自欺欺人,就是受了别人的骗。”^②

然而上述反对意见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则是保守势力的政治反动表现。在 6 月 20 日和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举行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指出,在即将开始彻底改革的时候,所有反对改革的人,包括议会议员,都动员起来了。保守势力,其中包括所谓的“爱国者万岁派”,他们不能正视现实。戈尔巴乔夫说:“对他们来讲,所发生的一切几乎是国家的灭亡,几乎是倒退和沦为资本主义的奴隶。然而,正是我们走上的这条道路开创着走向未来之路。我们可以走得很远,但不会超出社会状况、社会利益所规定的限度。”^③

在苏联国内关于西方经济援助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美国再次火上浇油。

① 塔斯社莫斯科 1991 年 6 月 17 日电。

② 路透社莫斯科 1991 年 6 月 23 日电。

③ 塔斯社莫斯科 1991 年 6 月 20 日电。

6月1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柏林举行的欧洲34国民间研究机构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转向真正的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将有益于苏联国民,对此提供援助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如果苏联表示出了自助的愿望,我们就应该开始同他们共同努力。”贝克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不管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亲信怎样提出含有巨额数字的文件,只要苏联没有表明首先要自力更生的愿望,美国就不打算提供任何帮助。“其实,贝克先生的真正意图是,即使苏联表示出了这种愿望,美国的援助也只能是循序渐进的。”^①

6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与刚刚当选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举行了会谈。神气十足的叶利钦对俄罗斯共和国同美国的直接经济合作表示出了积极的愿望,并向布什总统提议创建以推进农业改革和扶植私有企业为目的的“俄罗斯·美国银行”。可是,布什却非常慎重地回答,要从“苏联全局”出发去考虑这个问题,相反,布什总统倒是要求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密切合作。

那么美国政府的目的是什么呢?1991年7月出版的日本《选择》月刊以“冷酷无情的布什政权”为题,揭露了美国的真正目的。文章指出:

美国的真正目的是,谋求苏联向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转移,促使以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为主的共和国顺利地脱离苏联、实现独立。美国的这一目标最终只能导致苏联解体,从而使苏联成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的国家。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总统一再要求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并请求西方提供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这无异于是“飞蛾扑火”。

布什政权要能达到目的,只需逐步地对戈尔巴乔夫总统拿出冷酷无情的措施就行。观看对方的脸色,每打出一张牌就附带一些条件,这样只需10年或者20年,苏联就会成为唯美国之命是从的国家。再也没有比声称要对苏提供善意援助的布什政权更冷酷无情的了。^②

在7月15日—18日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扮演了令苏联蒙羞的角色。他希望通过签署减少核导弹条约来换取富国俱乐部的三

①② [日]《选择》月刊,1991年第7期。

流的“准会员”资格。然而对于旁观者来说,无论戈尔巴乔夫付出多大的努力来证明自己,西方世界都始终没有忘记对苏联的根本政策——遏制并摧毁它。7月28日的《瑞士报》明确指出:

我始终认为,美国、西方在对付苏联方面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使这个国家变为一个无害国家,但又不使它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如果陷入无政府状态,相邻的欧洲就要遭受其害。

5年来,华盛顿对戈尔巴乔夫实行手段高明的讹诈:只有苏联自行停止实行其政治制度和大大削减其核军力,我们才能帮助苏联摆脱经济困境。

西方政府在伦敦又刚刚重申了它们的条件。一项最后公报解释说:苏联如果希望得到所乞求的援助的话,就应当在三个关键方面(国内制度、对外政策和国防)朝着西方向它指出的方向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在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取得成效之前,西方一个美元也不会给的。白宫是不赊账的。

这种手法戈尔巴乔夫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越是照着西方说的办,他失去的东西就越多。他推行的改革毁了他个人的权威和联盟政府的权威。

人们企图强加给他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眼下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度是行不通的。这一点,西方是知道的。戈尔巴乔夫创造的自由气氛使千百万苏联人心里得到安慰,但要取消所有约束就会葬送国家的价值观念,使国家四分五裂,使军队灰心丧气。

在实行目前政策的必要性上,莫斯科最高层看法是一致的。它的目标与布什的目标是相反的;布什的顾问们和战略家们梦想把苏联巨人按倒在地,使其导弹失去作用,使这个国家陷入一场噩梦之中。^①

① [瑞士]《瑞士报》,1991年7月28日。

4. 资本主义的幽灵:改革诡计

西方国家在向戈尔巴乔夫兜售市场经济的“救世良方”时,其实就是针对苏联经济困境的现实和摆脱困境的希望而实施的一场有针对性的意识形态“诡计”。

1991年2月25日,《民族》周刊以“资本主义的幽灵”为题发表文章,揭露了西方国家是如何制造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诸多神话,以引诱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走上历史的复辟道路。文章指出:

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能够解决世界许多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吗?作出肯定答复的人事实上是把他们的结论建筑在一些神话和谬论之上。这些神话和谬论虽然被主流派经济学家和一流经济大国吹得天花乱坠并认为是准确无误的,而事实上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神话之一: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体制始终是一场灾难。

“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失误之处是有目共睹的,其中首要的是由于缺乏民主而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的、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但是,不应忘记计划经济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

在苏联和中国早期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都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在苏联的头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年)期间,在西方遭到经济大萧条打击的同时,苏联经济却取得迅速增长,据西方保守分析家估计,平均年增长率为12%。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由于战争动员和斯大林清洗等因素,发展速度下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经济又再度起飞。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在50年代苏联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9.3%,相当于美国同期增长率的两倍。因此,赫鲁晓夫当年曾对西方外交官断言:“不管你们喜欢与否,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埋葬你们。”就连著名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中央计划经济学派的宿敌弗里德里克·冯·哈耶克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在中国,1952—1978年,工业每年平均增长11.2%。尽管资源的分

配和规划不够合理,产品质量也不平衡,但这个成绩仍然是非凡的,这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从衡量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平均寿命来说,在共产党1949年接管政权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40岁,到1988年上升到70岁,比世界银行排列的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寿命整整高10岁。因此,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特亚·森说,在中国,“事实业已证明,政治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无关系)决心根除饥饿和掠夺现象显然是消除社会制度造成的贫穷的重要法宝”。

古巴通过强调计划机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无论从健康水平或社会环境等指标来看,古巴比其他拉美国家的情况要好得多。例如,1988年古巴的平均寿命为76岁,而拉美三个经济大国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则分别为69岁、65岁和71岁,古巴还基本上扫除了文盲,其婴儿死亡率只有12‰,美国也不过才10‰。

与加勒比和中美洲的其他国家相比,古巴的经济在生产各式各样的内需和出口产品方面都比它们更成功。其中,古巴在发展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成就和能顶住美国31年禁运造成的破坏性压力给人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史密斯学院的经济学家、古巴经济问题专家安德鲁·津巴利斯特说:“在80年代,古巴把用于生产资料投资的费用的近1/4投放到机械设备上,这在第三世界中是无与伦比的。”古巴生产的内需产品包括:灌溉设备、空调和冷冻设备、甘蔗收割机、半导体元器件、电池和火车机车等。

在东欧,即使现在的当权者极力排斥计划经济,情况也并非一面倒。以在西方鲜为人知的农业的情况为例,尽管共产党政府在实行农业集体化时有强迫的一面,但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间,农业的产出和收入确实有大幅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农业集体化减轻了个体农民沉重的劳动负担,以致许多东欧国家的农民不再愿意恢复个体农业的经营。

诚然,中央计划经济也面临着许多根本性的困难,特别是在70年代初期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央计划体制开始出现危机。尤其是在苏联,同西方竞争所付出的代价,极大地消耗了它的资源;试图通过打开与西方贸易关系以理顺社会主义经济的努力遭到失败;一些东欧国家债台高

筑。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它无法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因为他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失业问题。此外,由于日用消费品短缺,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刺激的作用太微弱。只要工人不能掌握关于工作条件、生产和工会组织的决策权,就很难使工人的精神振奋起来。

神话之二: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进行的政府干预也是失败的。

在拉丁美洲,有人把这个地区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问题,特别是债务危机以及使80年代成为“失败的10年”的责任归咎于拉美国家实行的国家主义政策。早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绝大多数拉美政府就奉行强烈的干预主义政策。他们的主要想法是鼓励国内发展制造业,这种思想扎根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运动之中,其代表人物有墨西哥的卡德纳斯、巴西的瓦加斯和阿根廷的庇隆。他们希望通过“进口替代品”计划,使地方工业发展成具有生产和制造进口替代品的能力。这种政策并没有对现存阶级关系构成任何挑战,但确实是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政策取得很大成功。但到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无法再坚持下去。然而,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违背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的根本信条,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其他特性,如收入的分配极不平均,因此国内的购买力从未增长到足以消化新的工业生产能力所生产的产品的程度。而更为严重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从来未能摆脱对外国资本的依赖。

因此,尽管进口替代品计划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而在实施这一战略时却又要进口外国的设备、技术和引进多国投资,从而使拉美国家的外债迅速增加。

进口替代品战略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如:在保护主义环境下,一些公司不愿冒技术革新的风险,因此技术很难发展进步。它们还设法游说政府,不给国内其他同类公司以保护,以此保护自身的特权。此外,庞大的官僚机构的形成助长了贪污腐化的滋生。尽管如此,在进口替代品战略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简章并不是伴随这一战略出现的偏差,而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济进步。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一样,这

一战略使拉美国家在很短时期内就奠定了现代化的工业基础，人均收入也有很大增长。但是，由于没有实行均衡或重新分配财富的政策，贫富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神话之三：东亚的经济“奇迹”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型。

罗纳德·里根1985年在其国情咨文中宣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通过自由市场的机制，大大走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前头。”然而，问题是，亚洲地区的经济，特别是里根所指的取得最大成功的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现在不是，过去从来也不是自由市场经济。

无论在计划和金融战略方面，国家却起着支配作用。国家向企业提供出口补贴、保护和优惠贷款。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艾丹·福斯特—卡特认为，韩国的农业体制实际上是“一个单一的庞大的国家农场：价格由国家确定，投入和贷款由国家提供，粮食由国家收购”。无论从任何一方面衡量，国家所起的积极作用都不亚于拉美国家。那么为什么日本和韩国能在一段较长时期取得成功，而拉美国家则不能呢？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从本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就把日本和韩国看作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给予巨大支持。此外，东亚地区实行的国家干预也比拉美地区有效得多。^①

^① [美]《民族》周刊，1991年2月25日。

第七章 军事竞赛：西方与苏联的改革困境

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并通过持续性的军备竞赛以增强美国军事力量优势的同时,逼迫苏联不得不保持高额的军事开支以增加其经济负担,这是美国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遏制战略在军事领域的核心政策。1946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战争部—海军部第4096号文件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明确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决断应该始终考虑到用武力支持我们的政策的即时行动的能力,而不是考虑长期的潜力,为动员国家资源所需的时间可能来不及避免另一场战争的灾难。归根结底,世界安全的唯一最重要的军事因素是美国的绝对军事安全。”^①在戈尔巴乔夫开启改革大门之时,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充分利用戈尔巴乔夫通过军备谈判以削减军费开支的迫切心理,在保持自身强大军事威慑的前提下,诱使戈尔巴乔夫不断在国内改革、东欧问题和阿富汗问题以及西方援助等方面作出让步,加剧了苏联的改革困境并使之最终走向党、军队和联盟中央的分崩离析。就像里根所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强劲的发展势头为我们抗击共产主义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资金。苏联永远不可能赢得军备竞赛;我们永远可以比他们花得更多。”^②

① 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一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5页。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一、美国的军事政策：军事竞赛与实力优势

咄咄逼人的里根政府在其上台之初就发现了美苏之间长期的军事竞赛对苏联经济的消极影响。里根指出：“对于美苏两家来说，继续进行代价高昂和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建立更庞大、更具威力，能够消灭整个世界的进攻性武器系统，是荒唐可笑的。我们在武器上花的钱更应花在许多其他事情上。我想，或许在克里姆林宫也有人意识到，处于对峙局面的美苏两国，就如同两个各自用枪对准对方头部的西部牛仔，共产主义世界与自由世界的生存同样面临致命的威胁。克里姆林宫的某位人士一定已经认识到，在把自己武装到牙齿的同时，他们加剧了苏联的经济困难。”^①在高喊军备谈判的同时，里根政府决定通过开展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来加剧和恶化苏联经济，以此强化美国在与苏联对抗中的全面优势。

1. “星球大战”：技术与信心

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星球大战”）就是里根政府对苏联开展新一轮军事竞赛的主要体现。1983年3月23日，里根在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时，首先向人们展示了说明苏联导弹力量“已大大超过美国”的四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图表，强调苏联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威胁使得美国的进攻力量必须现代化。接着便宣布美国要加紧研制空间时代的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以便在敌人的导弹到达美国之前就予以拦截和彻底摧毁。为此，他要求美国公众支持他在今后五年中花一万八千亿美元来研究其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的这次演说立即轰动了美国和世界。国际舆论认为，里根的演说揭开了美国太空战略的帷幕，为今后打一场“星球大战”开了绿灯。对里根来说，战略防御计划的提出和实施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具有深远意义。“从美国方面看，导致在今后5年里寻求和平和与苏联改善关系的突破的最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6～257页。

重要的原因,我敢说是战略防御计划,以及我们军事力量的全面现代化。”^①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就将战略防御计划更多地描述为一场争夺资源的战争,而不是一个军事上的概念。他说:“它的确事关我们如何重新制订国家的投资战略。”^②

里根推行战略防御计划的信心来源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全面优势。从1981年到1989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翻了一番,从1580亿美元上升到了3040亿美元。里根于1981年这一财政年度在卡特政府的基础上又批准了68亿美元的额外预算,后来又在卡特最终建议的基础上增加了数十亿美元的庞大预算,这本身已经超过了5%的增幅。从1981年到1985年和1986年间达到高峰,美国在军事领域投入的研发资金增长了两倍。然而,由于到1989年美国的经济扩张在实际意义上一样接近1/3,尽管美国人在里根时代花在军事上的资金多达2.7万亿,但这个数字却从来没有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5%。^③与此同时,由于在70年代与疲于战争的美国进行对抗时,苏联缺乏自我约束,结果到了80年代美国的元气开始恢复时,苏联则在更快地扩军,整个体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崩溃的。谢瓦尔德纳泽说:“勃列日涅夫使我们卷入了一场我们负担不起的军备竞赛。”^④苏联最后的、内耗性的军费膨胀开始于198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其军事开支达到了令人惊讶的45%的增长速度。此外,从1981年到1985年,苏联事实上增长的所有工业产值——苏联经济增长中的唯一部分——几乎同时都投到了军事上,这是自朝鲜战争后的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变。苏联军事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1年大约21%~22%提高到了1985年的26%~27%。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83年决定再次增加军事开支,增幅达到55%,超过了1980年的水平。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以后,立即批准在以后五年中增

①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540页。

②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60页。

③ 参见[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29~630页。

④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30页。

加45%的军费开支。尽管在1988年后苏联减缓了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但在苏联最后五年的日子里,戈尔巴乔夫要确保军费开支达到或者超过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从1980年到1985年挥霍在军事上的水平。^①

为了谋求与美国的军事实力对等,庞大的军费开支成为苏联经济的“梦魇”。然而令苏联领导人更为忧心的则是在高新技术领域方面与美国的差距开始拉大。1985年4月18日,北约发布的报告指出,苏联及其盟国尽管进行了现代化努力,但是它们在适应新技术方面仍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苏联存在管理死板、训练不够、质量控制不严、供应短缺和缺乏革新精神等问题,而且越来越落后于西方。^②6月4日,美国国防部关于美苏两国的军事技术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军事技术水平在许多领域里同苏联相比都占优势。报告说,将美苏关于电子计算机、激光、导航技术、雷达等二十项主要军事技术水平进行综合比较的结果表明,美国保持优势的达十五项之多,双方水平不相上下的只有五项,而苏联没有任何一项军事技术的水平能够超过美国。具体来说,美国军事技术在电子计算机领域与苏联相比处于优势,并且将继续领先;对苏优势大体不会改变的有电子和光学探测、警报装置、生物化学等生命科学、微电子材料和集成电路的生产技术等八个项目;眼下占优势,但今后有可能由于苏联的努力而被追赶上的包括导航技术、轻质材料、耐热材料、光学、雷达探测装置和探测潜艇能力六项;被认为苏联与美国水平不相上下的领域包括航空工程、流体力学、导弹、常规弹头和核弹头五项。^③1988年8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卡卢奇在苏联总参谋部学院对士官生和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更是毫不客气地说:“我愿意承认,美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比苏联强——我还要说,我们完全打算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技术能力。”^④

战略防御计划一经推出就让苏联感到震惊和不安。苏联领导人发现,与西方相比,苏联的问题不再是暂时性的,不可能通过体制的温和调整便能

① 参见[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46页。

② 参见路透社布鲁塞尔1985年4月18日电。

③ 参见共同社华盛顿1985年6月4日电。

④ 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8年8月1日电。

轻松度过。西方经济正在强劲反弹,技术发展的繁荣期已经来临。20世纪70年代,苏联极为担心美国强大的工业和技术优势可能应用于军事建设,而他们的担心已经成为现实。他们看到,美国的国防预算正在急速增长,而且经济上不存在任何压力。80年代初期,他们看到美国正在部署战略武器,新型项目也正在实施,而且他们认为这些项目足以为美国提供第一次打击能力。“克里姆林宫看到西方正在重新建立信心,并出现使用武装力量的意愿。”^①1985年1月5日,契尔年科在给基督教代表协商会晤的两位主席埃夫里·波斯特博士(美国)和卡罗伊·托特博士(匈牙利)的回信中说:“我们也理解你们对宇宙空间出现军事化的可能性,其中包括在宇宙中部署核武器所感到的不安。确实,美国某些集团把‘星球大战’的时代强加给人类的尝试孕育着对世界的新的额外威胁。如果美国军国主义势力在这个问题上占了上风,那么就会出现孕育着极其危险的后果的不可逆转的局面。”^②

苏联之所以坚决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关键就在于它打破了美苏之间的核均势,并使苏联可能处于冷战对抗中不利的境地。1985年2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发出警告,里根政府“正在努力获得对于苏联的军事优势”;“战略防御倡议”“被广泛宣扬为一种在核战争中保护全体美国人民的有效方法”,同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美国希望“把苏联拖入某些领域中代价昂贵的军备竞赛,美国估计在这些领域中苏联落在美国的后面”。^③1986年8月15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以“为什么‘星球大战’使俄国人不安”为题的评论中分析了其中原因。评论指出:

显然,俄国人不喜欢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他们一直在施展计谋和进行宣传鼓动,以期阻止或推迟部署和发展这项计划的任何组成部分。

为什么这对他们来说如此要紧?回答因为苏美核武库有很大的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5年1月5日电。

③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4页。

差异。

美国远程武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核弹头都安装在世界上最寂静的潜水艇上，能够随时从苏联人毫无所知的地方发射。

苏联远程武库中差不多三分之二的核弹头安装在陆地固定的地方，其中每个地方都被美国侦察卫星所发现，并已被定为美国弹头袭击目标。

除此之外，苏联远程弹头武库的其余部分以潜艇为基地，但是潜艇很少出海，而且出海时又噪声很大，北约的侦察装置在它们一出海时便能发现，而且能跟踪到底。

苏联人拥有大约六十艘有发射远程核武器装备的潜艇，但通常只有大约十三艘随时都在海上。美国拥有三十五艘这样的潜艇，通常有大约十八艘随时都在海上。

五角大楼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它自己的陆基威慑力量。苏联的陆基导弹准确性越来越大。据信，他们最新式、最精良的导弹的准确率已达到二百米。

在理论上，苏联人可以向美国的二千一百一十八枚陆基弹头投掷他们的六千四百二十枚弹头，以打掉美国的大部分陆基弹头。那正是美国核战略家所担心的，因此他们希望有更好的办法来保护美国的陆基威慑力量。

让“星球大战”成为高度成功的保护力量，可以使一千零一十八个安放弹头、构成美国陆基威慑力量的地下掩体中的大部分得到保护。如果在苏联人还没有为他们自己的陆基威慑力量发展相应的保护力量的时候就做到这一点，美国就会在核力量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苏联的巨大投资就无效了。^①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坚决反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1985年11月13日，在苏美首脑会晤前夕，戈尔巴乔夫在接见以美国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乔

^① [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6年8月15日。

治·沃尔德为首的代表团时发出警告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将导致一场“自杀性的”军备竞赛。如果华盛顿实施其建立太空防御系统的计划,美苏关系就会降到新的低点。戈尔巴乔夫重申,如果美国实施这个计划,苏联就不得不采取反措施。^① 尽管苏联批评的腔调很高,发起的舆论攻势也很猛烈,但是里根看到的却是苏联的色厉内荏。11月19日,在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里根发现:“当我们的谈话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继续进行时,他使我相信我们长期以来的猜测是正确的,苏联领导层的确存在着对美国及其核武库根深蒂固的恐惧。”^② 尽管戈尔巴乔夫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态度仍然僵硬,但是里根还是明确地告诉戈尔巴乔夫:“我必须正告你,如果是军备竞赛,你应该清楚这将是一场你们无法取胜的军备竞赛,因为我们不会让你们取得对我们的优势地位。”^③

为了反制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并维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的平等地位,苏联开始实施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1984年春天,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宣布:“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大量的资源转到加强国家安全方面。”^④ 这种政策的出台,使得苏联把更多的资源转到高技术军事部门。据20世纪80年代领导苏联空间研究所的罗阿尔德·Z. 萨格杰耶夫说,苏联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以勉强对美国的战略防御倡议作出响应。“在里根先生于1983年宣布‘星球大战’计划以后,这个计划成为第一号的优先项目。”^⑤ 苏联为此安排了庞大资金,从零开始发展科技工业设施。到1986年,创立了16个独立的综合企业,从事诸如激光和基因工程等方面的技术与开发。到1984年秋天,苏联科学院编制完成计算机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涉及的主要工作都与第五代计算机技术有关。计划大致分为五个方面:设计和制造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微处理器;开发并行处理器和多重处理器结构;设计用于支援逻辑程序设计的操作系统;研究问题求解软件和专家系统及用户响应应用。苏联政府已为这项计划拨款一亿美元,具体工作由莫斯科

① 参见合众国际社莫斯科1985年11月13日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34页。

③ 同上,第635页。

④⑤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

科学院的国际计算机工程师委员会负责。苏联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在计算机研究领域确立自己的前沿位置。

然而让苏联没有想到的是,由应对“星球大战”计划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最终将逼迫苏联对自身的经济体制进行结构性变革。否则,苏联脆弱的经济根本无力承担起回击美国技术挑战的任务。苏联的经济体制非常适合于概念化、实验室和飞行项目创新,但在规模发展上却是失败的。比如“隐形”技术,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莫斯科无线电工程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彼得·尤费赛夫发明的,但这项技术却由洛克希德公司使用一台克雷1号超级计算机进行开发,并成功用在B-2轰炸机上。^①于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出现了。苏联出现改革运动是里根政策的必然结果。“从许多方面看来,苏联的改革是一种军事上的主动行为”,苏共中央委员叶夫根尼·诺维科夫回忆道:“他们早在1982年就谈论这件事了,并且把它看作是保存苏联军事实力的需要,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军事建设的时候更应该进行改革。”苏联最高苏维埃委员伊利亚·扎斯拉夫娅则是这样认为的:“罗纳德·里根是苏联的改革之父。”^②

2. 秘密援助:阿富汗战争

通过战略防御计划的鼓吹和欺骗,里根政府成功地诱导了苏联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军事领域,并因而加重了苏联经济的负担和困难。与此同时,里根政府公开指责奉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苏联在萨尔瓦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地的快速扩张,决定改变尼克松、福特和卡特政府以来的“缓和”政策,在各个领域向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发起挑战,以重新恢复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精神领袖和民主制度的捍卫者这一历史性的角色。里根说:“作为我们对外政策的基础,我决定向俄国人发出尽可能强硬的信息,即当他们武装和资助恐怖主义分子并颠覆民主政府之时,美国再也不会袖手

^① 参见[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下),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648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27页。

旁观了。我们的政策是以实力和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政策。我要以实力,而不是以一纸空文,去求得和平。”^①

在里根政府看来,苏联的扩张在带来帝国荣耀的同时,其实也为自身的崩溃埋下了覆灭的种子。1981年年中,中央情报局出台了一份国家评估报告,对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外交政策进行了正式评估。这份题为“苏联在世界权力竞争中的目标与期望”的秘密报告开篇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苏联时任领导人发现,过去三十年的巨额军事投入获得了回报,包括前所未有的优势军事地位和长期政治利益,军事实力和军事援助一直是其推行国家政策的现实手段,或者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关键补充方式……只要苏联认为西方实力在下降,只要它继续利用不断增长的军事实力作为实现全球野心的手段,它就会一直实施这种更加强硬的政策。”^②但是此时已经开始摆脱卡特政府时期经济衰退局面的里根政府,却透过苏联的扩张看到了赢得冷战对抗的历史机遇。“虽然我们认为苏联可能继续从事此类活动,但是自然规律将使苏联帝国在第三世界不断扩张所取得的大部分成就演变为政治责任和沉重的负担,加之其国内不断恶化的危机,最终必然导致苏联政权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破产,并推动它的最终瓦解。”^③

为了维持苏联在全球各地的共产主义优势,对外援助始终成为苏联经济的沉重负担。据苏联中央情报局估计,从1981年到1986年,苏联仅向阿富汗、安哥拉、尼加拉瓜的支持就高达130亿美元。^④苏联官方统计也表明,1986—1989年,苏联对外无偿援助总额为600亿外汇卢布,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1%。巨大的对外援助开始引起苏联领导人的反思。安德罗波夫曾经愤怒地说:“为什么我们总要管周围所有的人的事?只要有什么人高喊:‘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朝他飞奔而去。为什么我们要管所有的人呢?或许,最好要首先等一等、想一想、看一看?是我们比别人更需要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255~256页。

② [美] 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31页。

③ 同上,第134页。

④ 参见[美] 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364页。

援助？还是我们比谁都富有？”^①

苏联最大的债务国(1990年)^②

债务国	债务(卢布)	购货品种
古巴	155 亿	油、谷物、木材、黑色金属
蒙古	95 亿	工业机械/设备
越南	91 亿	工业机械/精炼油
印度	89 亿	机械、石油、化学产品
叙利亚	67 亿	机械/设备、武器
波兰	49 亿	油、天然气、铁矿石

对于美国来说,苏联的困难就是美国的机会。美国唯一要做的就是以一种合适的方式不断地增加苏联的负重,并最终使之崩溃。在1979年12月苏联大举入侵阿富汗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有了具体的目标聚焦点——为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秘密援助,以达到将苏联拖入战争泥潭使其不得脱身的政治目标。

1980年1月16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卡特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机密备忘录——《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西南亚计划》中对苏联的战争目标作了深入分析。该备忘录指出:“占领阿富汗可能使苏联更容易实现某些目标,其中一个亲苏的伊朗政权是它最为渴望的……由于苏联即将发生严重的国内能源短缺,所以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伊朗可能是克里姆林宫地区事务中的头等大事,至少是非常重要的选项。”^③2月,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对巴基斯坦进行了访问,并与穆罕默德·齐亚总统讨论了一项扩大化的秘密计划。之后,布热津斯基又访问了沙特阿拉伯,确保沙特与美国一样对反政府武装提供支持。这样,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之间就建立了反对苏联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关键同盟关系。主要由沙特出钱、美国提供武器,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将物资运抵阿富汗。7月,美国

① [俄]尼·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王攀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② [美]《新闻周刊》,1990年3月19日。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10~111页。

的秘密行动计划取得了巨大进展,开始向反政府武装提供全面的武器和军事援助。10月29日,布热津斯基要求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增强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力度。特纳表示赞同布热津斯基的看法,并向他表示中央情报局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尽力向巴基斯坦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

从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的一年半时间内,美国向阿富汗提供了价值1亿美元的物资援助,用来抵抗苏联。在1981年里根政府上台后的9个月里,美国与巴基斯坦签署了长达6年、价值32亿美元的协议。按照协议,美国将向巴基斯坦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贷款,其中包括购买40架美国制造的F-16战斗机,美巴关系由此得到巩固,巴基斯坦的军政府成为美国兄弟般的“自由斗士”。不过,直到1983年,美国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援助一直停留在卡特政府时期所建立的框架之内。“这意味着华盛顿只通过第三国给阿富汗抵抗力量输送少量武器和其他供给品。在冲突的最初两年,经由巴基斯坦机构分配的美国援助在总量上远远少于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国家。”^①这种援助事实上对苏联的阿富汗战争并没有起到美国政府预想的作用。到了1983年,美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1983年1月17日,里根政府通过的第75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中,明确指出美国的目标是保持给莫斯科最大的压力使其从阿富汗撤军,确保苏联在继续占领期间付出严重的政治、军事和其他代价。6月,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在给国务卿舒尔茨的信中提出,现在到了重新审视美国对阿富汗政策的时机了。他说:“我们现在的一系列政策很有可能不会带来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即迫使苏联军队完全撤出……苏联人能够无限期地承受现在的伤亡率……我们不得不表明我们能够提高他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圣战者们也许已经通过战斗让苏联人在阿富汗陷入僵局,但是从长远看,决定性的因素将会是苏联人的持久和圣战者有限的资源。”^②很快,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的介入最终促使美国采取积极行动。凯西一直认为必须在阿富汗“让苏联人流血”。他说:“苏联正处

① [挪]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4年,第364页。

② 同上,第365页。

于极大的过度扩张中,因而很脆弱。如果美国在每一回合都挑战苏联人,并最终在一个地方击败他们,就可以击碎‘共产主义是未来前途’神话,苏联就将开始解体。”^①1984年2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向凯西建议,可以考虑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大幅增加武器装备的供应。凯西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时获得了沙特政府的同意 1984 财年将援助规模增加到 7500 万美元,1985 财年进一步提升到 1 亿美元。1984 年秋,美国的援助规模再次增加。凯西通报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美国计划在 1985 财年投入 2.5 亿美元,并马上准备拨付 1.75 亿美元。^② 在里根总统的允诺下,美国的秘密援助直线上升。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援助经费从 1981 年 1 亿美元增加到 1988 年 7 亿美元左右。到 1988 年,美国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资助已高达二十多亿美元。美国学者威廉·布卢姆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成为美国历史上耗资最多的秘密行动之一。^③

1985 年 1 月,随着苏联大幅提升了阿富汗战争的级别,里根政府重新制定了阿富汗战争政策。里根要求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兰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以支持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装。里根严肃地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不仅要使穆斯林游击队生存下来,而且还要他们获得胜利。”^④3 月 27 日,里根总统批准的第 166 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美国在阿富汗的政策、计划和战略》(NSDD166)。该项指令为阿富汗战争制定了新目标:赢得战争的胜利,将苏联人赶出阿富汗。美国政府的整个外交机器都要支持这一努力。“所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感觉到,我们必须改变参与阿富汗战争的途径,”麦克法兰回忆道,“我们觉得,我们已经造成了一种僵局。如果我们能够击败新的挑战并且增强对穆斯林游击队的支持,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胜利。”^⑤

① [挪]文安利:《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366~367页。

② 参见[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

③ 参见白建才:《“第三种选择”:冷战期间美国对外隐蔽行动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3页。

④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1页。

⑤ 同上,第242页。

根据该项指令,里根政府决定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美国制造的“毒刺”导弹。这是美国1981年才研制出来的最新式的小型防空导弹,当时共有3000枚,还尚未实战使用过。每枚价值5万美元,是一种有效高度为3000米的热导红外线跟踪导弹。1986年2月,美国国防部向中央情报局提供400枚“毒刺”导弹,以供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使用。9月25日,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第一次使用“毒刺”导弹,共发射了4枚,一举击落了3架苏军的米尔-24武装直升机,充分显示了其威力。在整个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先后给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的“毒刺”导弹达一千多枚。中央情报局根据卫星照片资料统计,阿富汗反政府武装共发射了340枚“毒刺”导弹,击落了269架米尔-24飞机,成功率高达79%。毫无疑问,“毒刺”导弹成为阿富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和阿富汗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程度,所以也增加了莫斯科的战争成本;它迫使苏联改变了战术,进而帮助了地面作战的圣战者游击队;此外,反抗武装的士气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大幅增加的援助资金使圣战者游击队获得了各种大批物资,美国先进的卫星信息帮助他们更精确地锁定了苏联和阿富汗的目标位置,以及1986年年底大批‘毒刺’导弹的运用,使阿富汗战争局势开始逆转。苏联必须增兵,否则只能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他们正在失败。”^①

事实上,美国在阿富汗的秘密行动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力量,使苏联为入侵阿富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根据苏联官方估计,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平均每年为之付出的经济损失高达六十多亿卢布。这种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向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提供了武器装备。“我们总感觉到这对于莫斯科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这笔专门用于战争的金钱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经济”,罗杰·鲁宾逊回忆道:“在阿富汗和其他任何地方耗费苏联宝贵的硬通货,这是我们的‘三位一体贸易战略’所取得的成功。”^②在造成经济损害的同时,美国援助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武器装备也给苏军造成了巨大伤亡。据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93页。

^② [美]彼得·施魏策尔:《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43页。

苏联军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苏军阵亡 13310 人,伤 35478 人,另有 311 人失踪。^① 因此,阿富汗战争成为苏联历史上最得不偿失的战争。戈尔巴乔夫在 1986 年 2 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称之为“流血不止的伤口”。1986 年 11 月 13 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阿富汗撤军。1988 年 2 月 8 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声明,宣布苏联从 5 月 15 日开始撤军,9 个月内撤完。到 1989 年 2 月 15 日,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1989 年 12 月 24 日,第二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宣布:“1979 年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少数几个人违背宪法作出的,应受到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谴责。”^② 1991 年 12 月 31 日,莫斯科和华盛顿完全终止了对阿富汗的援助。

对苏联来说,从阿富汗撤军表示戈尔巴乔夫不想再用军事力量来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希望通过减少在第三世界的援助来支持国内的改革。《芝加哥论坛报》发表评论指出:

苏联将于本周完成从阿富汗撤走一半军队的计划,另一场似乎无休止的冲突更加接近于解决了。虽然阿富汗的前途和苏联在阿富汗的作用仍然不清楚,但是莫斯科决心把军队撤回国内是又一个迹象,表明对外政策中出现有助于开始和平解决好几个地区性冲突的新方针。在过去的两周内,8 个这样的冲突已接近于解决,其中每个冲突都涉及苏联,因为交战各派当中有一派是苏联支持的。除了苏联军队继续从阿富汗撤走之外,古巴也原则上同意开始从安哥拉撤走 5 万军队。当柬埔寨争夺权力的四方和河内的代表会晤的时候,柬埔寨复杂的战争朝着解决的方向迈出了一小步。第四场冲突是两伊战争,这场冲突艰难地走向结束,克里姆林宫政策的变化增加了这个地区的问题得到长期解决的可能性。世界和平这样不寻常地到来是同苏联内部事务以及莫斯科和华盛顿关系的改善有关的。一位西方外交观察家说:“戈尔巴乔夫和其余的领导人都认定,他们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处理内部事务上。因此,他们在对外政策上已有所收缩。”

① 参见塔斯社莫斯科 1988 年 5 月 25 日电。

②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红旗出版社,1992 年,第 222 页。

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争取时间重建他的国家。朝着这个目标迈出的一大步是苏美关系的改善。他希望苏美关系的改善会使他能够减少军事开支。上述事实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事实合在一起看,可以看出,新观点和新的政治思维正在得势。苏联现在必须寻找某些办法确保友好政权的存在,改善同大国的关系,让领导人有时间去解决国内令人头疼的问题。柬埔寨问题是一个恰当的事例。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目标现在是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苏联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已成为妨碍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严重障碍。苏联鼓励越南人进行谈判和从柬埔寨撤军,从而促使这场冲突正在得到解决。这还有利于苏联达到更大的对外政策目标,为改善中苏关系扫清道路。对苏联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减少在远东的开支。^①

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对阿富汗反政府武装的支持是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最为出色的秘密行动。冷战时期最后一位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指出:“从秘密行动来看,中情局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阿富汗计划是最出色的。在中情局的布置下,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向圣战者游击队输送了数十亿美元的物资和武器。因此,阿富汗反政府武装才得以有能力阻止苏联军队的进攻,并最终迫使苏联政府做出了撤军决定。苏联付出的代价和面临的困境在其国内产生了深刻而深远的政治影响。”^②

二、苏联的军事改革:“新思维”与战略的转变

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戈尔巴乔夫在反思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时认为,苏联模式已经丧失了发展前景,“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

^① [美]《芝加哥论坛报》,1988年8月14日。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86页。

下去并且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①。为此，戈尔巴乔夫开出了新的“药方”——“新思维”，并将其视为解决苏联体制弊病的“灵丹妙药”。“新思维”的提出，从根本上放弃了苏联军事力量“打赢阶级战争”的政治立场，深刻地改变了苏联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说，促使苏联军事力量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退却，并因而深深影响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冷战走向和历史结局。

1. 核恐惧：苏联军事思维的新变化

对核战争的恐惧是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的基本动因。戈尔巴乔夫认为，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样的论断在核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核战争不可能有胜利者，“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②。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核战争时代，任何谋求军事优势的企图都是荒谬的，它只能导致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并最终爆发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战争。因此，戈尔巴乔夫提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应放弃实力政策，采取政治解决的方式作为处理国际冲突的唯一途径。

1985年4月10日，戈尔巴乔夫接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戈尔巴乔夫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在正处于冰川时期。我们主张苏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我们的这种立场的基点，是我们理解到了，并不存在两国利益必定要发生冲突的任何可能性。而且我们有一个相互的共同利益——避免核战争，保障苏联和美国的安全，保全我们国家人民的生命……这个出路就是和平共处，承认每个民族都可以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其他的选择是没有的……”^③

1986年1月1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关于争取在2000年实现无核世界的声明。切尔尼亚耶夫说：“看来他真的是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军备竞争。他敢于冒那个‘险’，这是因为他勇敢地看到，这不会有危险，因为即使

①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7页。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③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24页。

我们彻底裁军,也不会有人来进攻我们。为了将国家引上路面坚实的道路,必须抛弃沉重的、耗尽经济实力的军备负担。”^①

2月22日,戈尔巴乔夫就其准备在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对外政策方针进行了小范围讨论。在讨论中,戈尔巴乔夫对“新思维”提出了自己的初步理解。他说:“世界是多维的。这使我们想起列宁:在他的论述发表100年之后,我们又重新来理解他关于社会利益往往高于阶级利益这个论断……我在谈话中多次反复提到世界多维性、它的多样性和多种特点的问题。这是正确的态度。确实应该认识处于各种内、外相互关系中的整个世界。如果对这个共同的东西认识不清,我们就不能制定对内和对外战略。和平共处在每个阶段都要求我们对它做出评价。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仅要制定对外政策方针,而且还要通过宣传和执行政策来加强它。最要紧的是,我们抓住了转折时刻,并据此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但是,最重要的是在主要的趋势和主要的方向上不犯错误。什么是新思维?要有根据地回答这个问题。”^②

3月24日,戈尔巴乔夫就暂停核试验问题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他对局势作了这样的分析:

很难说新思维将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它将出现,而且甚至可能迅速地突然出现,因为生活使我们懂得这一点。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局势出现突变的先例……我们是被迫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就这么简单地宣布中止暂停核试验。我们不能不考虑来自全世界最广泛的各界人士对我们这一行动巨大的支持浪潮……“星球大战”计划自然使我国人民感到不安。对此我考虑过,并与我的同事们讨论过:也许不要再害怕“星球大战”计划?……当然,在对待这一危险的计划方面,我们不能漠不关心。但还是不应该有自卑心理。要知道赌注正好押在苏联在精神、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害怕“星球大战”。因此,也就在这个计划上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② 同上,第71~72页。

使劲,以便拖垮我们。我们决定说:是的,我们反对“星球大战”计划,因为它使和平变得更加不稳。但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害怕的问题,而是责任问题,因为后果将不堪设想。“星球大战”计划不会巩固安全,而只会破坏尚能成为安全因素的残余……我决定再次指出,我们对“星球大战”计划的回答将是有效的。美国指望我们将建立类似的武器系统,希望在技术上同我们拉开距离,并利用技术上的优势。然而我们苏联领导人懂得:为了消灭“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只要有10%的费用就足以反对这种武器的体系了……^①

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应争取禁止核试验国际会议与会者的请求会见了这次会议的一批科学家,他说:“需要有新的思维。不能用几百年前的概念,甚至是几十年前的概念,至少是不能用核武器出现前和最近出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转变前的概念来回答当代的迫切问题,尤其是下个世纪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生活在复杂、相互制约和矛盾的世界里。必须学会共同相处,不管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其他国家有它们自己类型的民主,但愿它们长命百岁。主要的是,我们或是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是使文明受到灾难性后果。必须摆脱把世界看成是某某的世袭领地这一过时概念。必须努力来建立国际事务的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世界已发生了变化。不承认这一点,就可能在政治上犯大错误。”^②

7月18日,戈尔巴乔夫在与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会见中说:

世界处在独特的十字路口,事态将怎样朝前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美关系的状况……正是我们两国巨大的军火库,其中包括核武器库的存在,是今日世界最严峻的现实。如果我们从错误的前提和理由出发,来建立我们的相互关系政策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的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79~80页。

② 塔斯社莫斯科1986年7月14日电。

话,那么,事情会发展到对抗的极点,以致会给我们大家和全世界带来最悲惨的后果。我想强调说,在苏联社会,而且不仅在领导层,形成了坚定的信念——寻找苏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找到和扩大我们之间的共同点,以便最终建立友好关系……要知道现在形成了确实是离奇的局势。甚至如果一国将不断地搞武装、扩充军备,而另一国什么也不搞,那么,搞军备的那个国家也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要知道较弱的一方会干脆地引爆所有自己的核弹头,甚至在本国的领土上,这对它自己将意味着自杀,同时也意味着慢慢地杀害对手。所以,您说的要取得军事上的优势是无稽之谈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甚至如果美国政府不再对解决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我们是不会让它得到安宁的。^①

1987年2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大会上的讲话中发出警告:“发生核战争以后,任何问题都不再存在,再也没有谁会坐在谈判桌旁,不用说桌旁,连坐在树墩上、石头上谈判的人也不会有。第2艘挪亚方舟无法在核洪水后生还。大概所有人都能用理智来理解这一点。问题是要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指望一切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但在世界上还有不少人正是这样想的。有必要抓紧时间,使国际上的交往、各个国家和政府的行为符合核时代的现实。”^②

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核武器问题作为修正意识形态及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所以他不仅放弃了关于苏联军队必须准备打赢一场核战争的理论,而且认为西方的威慑战略同样不可接受。这两种理论都设想把核武器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所以他断然予以否定。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所以,“他开始改革而从事的工作,是拯救国家于崩溃,同时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13~115页。

^② [苏]米·戈尔巴乔夫:《为了人类文明的永世长存》,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第4页。

也是使全世界免除核灾难的最佳方案”^①。作为最佳方案的“新思维”表明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动机——通过改善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为国内改革赢得时间和机会。“戈尔巴乔夫推行新军事政策初期最大的特点是缺乏系统分析，更不用说没有制定出贯彻这些政策的策略了。相比之下，他的动机却十分明确。在大多数苏联精英人士中，存在一种广泛得令人吃惊的共识，即苏联经济已陷入严重困境，军费负担是主要原因。为了削减军费，戈尔巴乔夫求助于通过军备控制来进行裁军。他认识到，不从根本上改变苏联与整个世界的关系——无论是与资本主义世界，还是与外国共产党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②

2. 裁军：“合理足够”的军事力量

随着对外政策的转变，苏联的国家安全观念也有了重大变化。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指出：“这种新思维的根据是什么呢？共同生存下去的相互依附性——这种世界各国面对着可能的核冲突的历史命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具有根本的意义。这种相互依附性决定了对国家安全问题采取崭新态度的必要性，这种态度也就是新的政治思维的特征之一。”^③

“新思维”将国际政治关系理想化，把“全人类的利益”作为苏联对外战略的基点，其军事战略随之作了重大调整。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提出了新的外交思维，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是“合理需要”的概念，即苏联的军备应控制在合理足够的范围内，苏联既不去追求更大的、无限制的安全，但也不同意更小的、危及国家主权的安全。他认为虽然帝国主义所推行的侵略性政策给世界稳定带来了威胁，但是由于有了社会主义这支进步的、爱好和平的力量，世界大战也并非不可避免。他将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使人类免遭灾难作为苏联的历史使命，认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全面对峙与军事对抗是没有前途的。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②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21~122页。

^③ [苏]多勃雷宁：“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共产党人》，1986年第8期。

既然两种国家形态之间并不存在一定导致冲突的阶级对抗,在政治上有了缓和,那么在军事上的对抗也就不存在了。在新的外交思维、新的安全观的指导下,苏联的军事理论转向了绝对防御,其具体内容包括军备应控制在合理的足够的范围内、非进攻性防御、解决各种武装力量间的不平衡、不对称状况等。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基本上放弃了以往使用武力解决地区冲突的做法,更倾向于通过政治途径解决问题。1988年2月10日,《红星报》总编辑伊万·帕诺夫中将在讨论阿富汗问题时曾说:“军事手段不是解决这一冲突的理智的办法,而且也不是解决其他地区冲突的办法,这正是新思维的表现。”^①

按照防御性军事理论的要求,苏军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一支“合理足够”的军队。

1988年11月7日,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十月革命阅兵式上发表主旨讲话,强调苏军的改革要坚持“力量要既充足又合理”原则,并指出在估计军队的效能时要考虑“质量”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数量”。所谓“合理足够”,是指苏联的军事实力应保持在符合其所受到的军事威胁、确保不超过抗击侵略所需要的水平上。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在其《苏联军事理论及其防御性方针的实施》文章中专门谈道,苏军正在实施“合理的足够防御”基础上的原则方针,并“使武装力量具有非进攻性的结构,在武装力量的总构成中最大限度地限制突击系统”。^②

1989年5月30日,戈尔巴乔夫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内外政策报告时,将“裁军和国防能力削减到合理足够水平”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了在1990—1991年把军费开支削减100亿卢布的建议。这一数字意味着苏联要作出单方面裁减军队50万人、1万辆坦克、800架飞机等决定。同时,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削减军费的建议还意味着,大约14%的军费将用于国民经济的需要。苏联财政部长鲍里斯·戈斯捷夫指出:“100亿卢布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国家今

^① 新华社莫斯科1988年2月10日电。

^② [苏]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苏联军事理论及其防御性方针的实施”,《真理报》,1989年3月13日。

年可以把大约同样数量的卢布用于发展国家的三个最重要的工业综合体——机器制造综合体、冶金综合体和化学林业综合体。”^①

根据这一原则要求，苏军以“军备的合理足够”为目标，将裁军作为推动军队改革进程的重要手段。

(1) 加快苏美军备控制谈判的进程，力促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签署

苏美军备控制谈判在苏联裁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985—1991年，苏美之间共举行了8次首脑会谈，历次会谈成果不一，但总的来说苏美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为苏军的裁减奠定了基础。在戈尔巴乔夫以前，苏美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中共签署了五项条约：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部分核武器禁试条约、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关于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未经美参议院批准）。然而这些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改变军备竞赛的局面。苏美在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双方核武器总量都未达到条约规定的限额，这在实质上使苏美战略武器的发展合法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这种边谈边扩充军备的局面。

1985年10月初，戈尔巴乔夫提出苏美两国削减各自50%的中远程核武器的新建议，并在英法中远程导弹问题上作出退让，表示苏联可以同两国就该问题达成单独协议。11月，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与里根总统进行了其任期内的第一个苏美首脑会谈，此次会谈虽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双方重建了对话关系，构造了所谓的“日内瓦精神”，为后来的双方首脑会晤和达成核协议打下了基础。

1986年初，戈尔巴乔夫提出十五年内分三个阶段全面销毁核武器的新建议：第一阶段，5~8年内苏美将战略导弹削减50%，彻底销毁双方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第二阶段，苏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最晚从1990年开始削减核武器，时间大概为5~7年；第三阶段，到2000年底，销毁全世界剩下的所有核武器。全面销毁核武器的大胆建议表明戈尔巴乔夫决心在核军备控制问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9年6月1日电。

题上取得突破。

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再次在中导问题上作出让步,表示愿意单独就中程导弹问题签订协议,而此前苏联一直坚持着欧洲中导、洲际导弹和太空武器问题结合起来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此后,核谈判进程明显加快,在12月份的苏美首脑华盛顿会谈中,双方正式签署了削减中程核导弹条约。根据中导条约,至1991年6月,苏联总共销毁了一千枚中程导弹和一千两百多枚短程导弹,撤销了隶属于战略火箭军的一个导弹集团军部和六个导弹师。

1989年9月,在苏美两国外长会晤中,苏联在战略武器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不再把削减战略武器与太空武器问题捆绑在一起。在1990年5月份的苏美首脑会谈上,双方就削减50%战略核武器取得一致意见。1991年7月,苏美首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正式签署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1985—1991年间苏美历次首脑会谈情况

首脑会谈	时间	主要内容及进展
日内瓦首脑会谈	1985年11月19日—22日	双方承认核战争没有赢家,同意防止爆发战争、停止军备竞赛,美坚持“星球大战”计划。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会晤重建了对话关系。
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谈	1986年10月11日—12日	就削减欧洲中程核武器、10年后全面销毁战略核武器、减少核试验等达成共识。但因美坚持“星球大战”计划,会谈中断。
华盛顿首脑会谈	1987年12月8日—10日	正式签署中导条约。
莫斯科首脑会谈	1988年5月29日—31日	交换中导条约批准书,签署《关于为核查地下核试验进行联合监督协定》和《关于通报洲际导弹和潜艇基弹道导弹发射协定》,未取得重大突破。
马耳他首脑会谈	1989年12月2日—3日	主要讨论东欧局势、军备控制、中美洲形势及苏联改革问题。这是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首次会晤,为东欧剧变后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
华盛顿首脑会谈	1990年5月31日—6月4日	讨论裁军、德国统一、欧洲安全及苏联国内形势问题,双方就削减50%战略武器取得一致意见。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做出让步。
赫尔辛基首脑会谈	1990年9月9日	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就海湾危机进行了5小时会谈,一致认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不能容忍”。
莫斯科首脑会谈	1991年7月30日—31日	签署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2) 加快苏联常规军事力量的裁撤, 建立高效、合成、精干的新型军队

1988年12月7日, 戈尔巴乔夫在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 苏联在两年内单方面裁军50万人, 约占苏军总数的12%。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获得西方国家舆论的一致赞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韦尔纳说, 这一行动“看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认为, 这“为实现欧洲常规武器稳定提供了一次良好机会”。奥地利总理称戈尔巴乔夫的声明是“一项具有巨大推动力的、果敢的、建设性的建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我认为, 这是一次重要讲话。讲话的调子是积极的, 而且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想法。因此, 我认为, 这为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同苏联建立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①根据法国《中肯》杂志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西欧各国人民相信戈尔巴乔夫比布什更有决心来结束军备竞赛: 认为戈尔巴乔夫真正有决心来实现裁军目标的占64%, 认为布什有决心实现这一目标的占39.5%。西德绝大多数人相信戈尔巴乔夫和布什两人都有裁军愿望, 但是尽管如此, 戈尔巴乔夫仍占多数即76%, 而布什则是55%。在英国, 戈尔巴乔夫与布什的对比是74:38。在意大利是65:36。在法国是41:29。^②

12月15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克托·卡尔波夫发表声明:

我想向你们宣布, 目前苏联正在研究有关制定1989—1990年期间裁减苏联武装力量50万人的时间表计划的问题。在这个计划中要规定解散有关的部队, 其中包括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走的部队, 以及相应地减少定期应征服役, 确定转入后备役的退伍军人的范畴和比例, 同一时期裁减1万辆苏联坦克、8500门火炮和800架战斗机以及大量裁减苏联亚洲部分常规军备数量的时刻表, 裁减苏联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武装力量人数和武器(5万人和5000辆坦克)的时刻表。计划中还将规定撤退空降强击兵团和部队及其他一系列兵团和部队, 包括登陆和渡河兵团和部队及其武器和技术兵器。还要确定改编留在欧洲盟国境内的师和赋予它们新的防御结构

① 美联社伦敦1988年12月7日电。

② 法新社巴黎1989年5月27日电。

的办法和日期。我们还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使有关单方面裁减苏联武装力量和武器的一切活动,能在最大开放性和公开性的条件下进行,其中包括通报执行这些措施的日期,使世界公众能够确信所宣布的一切裁军措施真正实现,其中包括采取邀请外国观察员的办法。^①

1989年3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正式发布《关于在1989至1990年期间削减苏联武装力量和国防开支》的命令,对裁军50万人及削减常规武器和国防预算作了具体规定。4月,戈尔巴乔夫在访问英国时宣布,苏军将在1990年年底前从425.8万人降至376万人。截至1990年1月1日苏军总人数约为399.3万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苏军就减少了26.5万人。至1991年底,苏军总共撤销了2个军区机关、2个军队集群机关、4个合成集团军部、4个步兵军部、55个摩步师和坦克师、3个航空兵军团和10个航空兵师、4个防空军和师、59个导弹团。^②

但是“合理足够”作为苏军的转型目标却在改革中逐渐陷入了困境。苏军在经过大规模裁减之后,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提高质量”的效果。以往,苏联军队是以一支庞大常备军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自确定“合理足够”的目标之后,苏军力图将军队的规模控制在既符合国家经济实力又能承担起抗击侵略任务的范围之内。然而其做法主要是集中在裁撤军队数量、削减武器装备和精简机关上。军队在经历了短时间内的大量削减之后,未能及时建立起有效的补充机制,许多部队因为兵员不足而无法展开训练,“有的团除团长之外只有32个人”,“无论师或团,兵员人数都在定员的1/2以下”^③,苏联军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面临着巨大挑战。在转型过程中,征兵问题严重困扰着苏军。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先后出现反征兵运动,此后运动波及苏联其他地区。反征兵运动给苏军造成极大伤害,不仅导致苏军无法正常补充兵员,部分加盟共和国更是

① 塔斯社莫斯科1988年12月15日电。

② 参见陈学惠:《俄罗斯军事改革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95~96页。

③ [日]《产经新闻》,1991年9月3日。

借此要求本国青年脱离苏军加入“国家卫队”。

3. 撤军:苏联军事力量与东欧剧变

在对外政策目标及“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对军事战略作了全面调整。缓和与收缩是戈尔巴乔夫军事战略调整的主基调。从国外撤军是苏军全面收缩政策所采取的具体行动。据苏联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苏联在国外共有军事人员 62.75 万人。^① 苏联准备在短时间内撤回大部分军队。

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第四十三届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宣布苏军在两年内裁减 50 万人,并于 1991 年前从东德、捷克、匈牙利撤出 5 个坦克师并予以解散。1989 年,苏军开始从东欧各国撤军。^②

(1) 东德:驻德苏军人数为 38 万人。到 1989 年 8 月 15 日,将有 1 万多苏联军人、大约 1000 辆坦克和大约 330 门火炮及迫击炮撤离。1990 年随着“两德”统一的意愿日趋强烈,东德政府希望苏联加紧撤军步伐。1990 年将撤出 2 个师、1 个空中突击旅、4 个训练团和 3 个独立营,总共将撤走 4000 辆坦克。7 月,戈尔巴乔夫和西德总理科尔宣布就德国统一问题达成协议,苏军将在 2~4 年内从民主德国全部撤出。1991 年 5 月 6 日,苏德就驻军与撤军问题达成协议,苏联将在 1994 年以前全部撤出其驻德军队。

(2) 捷克斯洛伐克:驻捷苏军人数为 8 万人。1990 年 2 月 22 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就苏军完全撤出达成协议。到 1990 年年底将撤出 5300 人、708 辆坦克和 20 架作战飞机。在 1991 年年底前驻捷苏军分三个阶段完全撤离。到 1991 年 6 月底,苏军完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全部撤军的计划。

(3) 匈牙利:驻匈苏军人数为 6.5 万人。1989 年 1 月,苏联向匈牙利提交了撤军时间表,计划在 6 个月内撤出部分兵力。4 月,苏联宣布将于 1990 年年底前从匈牙利撤出 1 万军队、450 辆坦克和 200 门火炮及迫击炮,并于 4 月 25 日开始了第一阶段撤军。1990 年 3 月 10 日,苏联同匈牙利政府正式签署了撤军协议。

(4) 波兰:驻波苏军人数为 4.5 万人。1 个坦克团、1 个地对空导弹团和

^① 参见美联社联合国 1989 年 12 月 15 日电。

^② 参见路透社伦敦 1989 年 5 月 10 日电。

1个直升机团将在1989年将撤出这个国家,但具体的人数尚不清楚。1989年6月15日,苏联从波兰撤出首批部队,到1990年底苏驻波兰军队已减至4.8万人。

东欧历来是苏联与西方对抗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驻扎着大量苏军。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从东欧各国撤出大量部队,这就意味着苏联不再施行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在放弃使用武力手段干涉东欧各国事务的同时,试图用签订意识形态条约的方式为东欧政治发展设定“底线”。1987年4月苏联同波兰签订的《关于意识形态、科学与文化领域的合作宣言》,1988年11月苏联又同匈牙利签订《意识形态合作改善综合计划》,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意识形态合作改善综合计划》。1989年1月又同罗马尼亚签订《1989年至1990年度意识形态合作计划》。一系列协定的签署表明,苏联在容忍东欧各国独自的改革的同时,事先却规定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超越的界限”。苏联“不想按照原来那样的超法规的论据对东欧进行控制,而想通过事先签订的条约进行合法控制”。^①

但是一旦苏联宣布放弃使用武力来维护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那么必然刺激早已跃跃欲试的东欧政治反对派的政治野心。事实上,在1989年7月6日—8日召开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主张就造成了苏联东欧集团内部深刻的政治分歧。波兰和匈牙利已经走向不同形式的议会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而其他国家,尤其是东德和罗马尼亚一直维持着斯大林主义刻板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它们还批评匈牙利和波兰的民主试验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在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匈牙利代表团团长涅尔什·雷热的一次会谈中,由于双方在匈牙利族问题和罗马尼亚修建“铁幕”防止逃亡问题上言语不和,会谈的“气氛非常紧张”。^②因此,在会议明确华约联盟内各国有权“制定它自己的政治路线、战略和战术,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涉”之后,东欧各国所面临的“武力干涉”威胁被解除,在西方国家的鼓动和支持下,波兰、匈牙利等国不再甘当苏联的“小伙伴”,率先发起了“脱苏入西”的浪潮,最终导致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垮台的政治连锁

① [日]《东京新闻》,1989年6月30日。

② 合众国际社布加勒斯特1989年7月8日电。

反应。

就在东欧剧变引起世界震惊的时候,《华盛顿邮报》亲切地称呼戈尔巴乔夫为“我们的人”。在题为“我们的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评论中,该报指出:

苏联帝国的中心——东欧正在崩溃。在今后的一年内,东欧可能完全摆脱苏联的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选举出非共产党政府尚需一年时间。而后,要想恢复苏联帝国则是不可思议的。

东欧对苏联帝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苏联帝国就成了一个空壳。目前,东欧的非共产化是俄国非共产化的最可靠的道路。几个月前,是莫斯科的改革推动东欧的改革,而今却颠倒了过来。苏联的改革者在注视着东欧,并在东欧的鼓舞下向国内提出相同的要求。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多元化方面也将如此。

西方的最高利益是需要一个独立的东欧,使其一劳永逸地摆脱苏联控制。这就意味着戈尔巴乔夫要继续生存,他的改革要继续生存。因为他执政一天,东欧就进一步崩溃一天,他是自君士坦丁向基督教转变以来最大的自我转变者,他迄今在退却方面所做的一切比杜勒斯当年所能梦想到的还要多。^①

三、分裂与瓦解：苏联军队的“中立旁观”

改革时期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共产党的毁灭性打击及其政治多元化后释放出来的民族主义,抽掉了苏联军队最为关键的两个构件:组织和意识形态。于是,在“非党化”的政治浪潮和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的政治大混乱之际,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多民族军队陷入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军队与民族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息息相关的,这不仅因为军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而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9年12月8日。

且更重要的是民族问题影响苏联帝国的稳定。军队若失去镇压民族分裂主义势力的意愿和能力,那么苏联帝国是否能长久存在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①

1. 改革与“新思维”:苏联军队的“非政治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国家是阶级分化和阶级统治的产物,而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暴力组织机构,是维护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那么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②。在“无产阶级军队的领导权”这个问题上,列宁始终坚持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独立的政党和一支属于这个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苏联军队的阶级属性。红军组建初期,其主体是旧俄军队,这些从沙俄时期过渡而来的官兵在很大程度上还留有封建残余习气,而当时的苏俄所面临的现实是外国的干涉与国内战争的威胁,怎样解决“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这个问题就成为无产阶级胜利的关键因素。

列宁在组建苏俄红军时就明确提出必须以无产阶级理论作为军队的指导思想。首先,明确了新型军队的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的新型军队,它有自己的使命和任务。在1918年俄国内战爆发的条件下,列宁对革命军队作出指示,“保卫革命的成果,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保卫兵工农代表苏维埃,保卫整个真正民主的新制度”^③。其次,确保军队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列宁要求在军队中普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培养出真正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就成为革命军队的领导人”。最后,提出新军队的纪律问题。军队没有“无产阶级铁军的整齐步伐”是无法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军队中加强党的思想影响力和组织凝聚力。按照列宁的建军原则,在组建苏俄红军时,军队

^①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318页。

^② [德]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1987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8页。

^③ [俄]列宁:“在欢送第一批社会主义军队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21页。

中建立了坚实的党组织体系,设立了各级党组织与政治部,将政治委员列入军队编制,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且在以政治部为核心的党组织体系中,布尔什维克党始终坚持从思想上对官兵的改造。

然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从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摧毁了苏联共产党领导军队的政治合法性。“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将军队的控制权交给议会和国家行政部门,而不是某个政党”^①,重构苏联共产党与军队的关系。最终,“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摧毁和瓦解了军队”^②。

为了在军队中推行“新思维”,戈尔巴乔夫通过大量的撤换和调整,将拥护改革和相对年轻的将领提到了军队高层领导的队列,作为自己在军队中的政治拥护力量。通过人事撤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得以在军队中贯彻,苏军基于其新的国际政治认识和对国家军事安全的诠释,将“防御性”军事理论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庞大的军备体系建设也让位于“合理足够”原则。但是大规模人事撤换并没有达到如期效果,“它常常把有能力的人逐出军队,同时把庸人留在部队,使骗子继续扛着将军肩章”^③,苏军陷入思想混乱和实力下降的局面。

1985—1991 年期间苏联武装力量主要将领变动情况

时间	职位	原任职(年龄)	调整后(年龄,原职)
1985 年	总政治部主任	叶皮谢夫(77)	利济切夫(57,驻东德政治部主任)
	战略火箭军司令	托卢勃科(71)	马克西莫夫
	陆军总司令	彼得罗夫(68)	伊万诺夫斯基(67,白俄罗斯军区司令)
	海军司令	戈尔什科夫(75)	切尔纳温(57,曾任北方舰队司令)
1986 年	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彼得罗夫(69)	卢舍夫(63,驻德苏军集群总司令)

①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249页。

②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86页。

③ [俄]尼·布兰涅茨:《棋子——国防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36页。

续表

时间	职位	原任职(年龄)	调整后(年龄,原职)
1987年	远东军区司令	亚佐夫(62)	莫伊谢耶夫(48,远东军区原参谋长)
	太平洋舰队司令	西多罗夫	赫瓦托夫(太平洋舰队原参谋长)
	国防部长	索科洛夫(74)	亚佐夫(62,国防部长副部长)
	防空军总司令	科尔杜诺夫(64)	特列季亚克(64)
1988年	克格勃主席	切布里科夫(65)	克留奇科夫(64)
	苏军总参谋长	阿赫罗梅耶夫(65)	莫伊谢耶夫(50,远东军区司令)
1989年	华约总司令	库利科夫(68)	卢舍夫(65,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华约部队总参谋长	格里布科夫	洛博夫(54,原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
	陆军总司令	伊万诺夫斯基	瓦连尼科夫(66,原驻阿苏军总司令)
1990年	内务部长	巴卡京(53)	普戈(53,原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空军司令	叶菲莫夫	沙波什尼科夫(48)
1991年	国防部副部长	—	阿恰洛夫(原空降兵司令)
	国防部长	亚佐夫	莫伊谢耶夫(原总参谋长,此时兼任临时国防部长)
	克格勃主席	克留奇科夫	舍巴尔申(此时为代理克格勃主席)
	内务部长	普戈	特鲁申(此时为代理内务部长)
	国防部长	莫伊谢耶夫(临时)	沙波什尼科夫(49,原空军司令)
	国防部副部长	—	格拉乔夫(43,原空降兵司令)
	总参谋长	莫伊谢耶夫	洛博夫
	内务部长	特鲁申(代理)	巴兰尼科夫(原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
	克格勃主席	舍巴尔申(代理)	巴卡京
	莫斯科军区司令	加里宁	托波罗夫(45)
	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司令	库兹明	米罗诺夫(47)
	陆军总司令	瓦连尼科夫	谢苗诺夫
	防空军总司令	特列季亚克(68)	普鲁德尼夫
	空军总司令	沙波什尼科夫	杰伊涅金(54)
	空降兵司令	格拉乔夫	波德科尔津
	外贝加尔军区司令	—	特列季亚科夫(50)
总参谋长	洛博夫	萨姆索诺夫(原圣彼得堡军区司令)	

“新思维”对于苏军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大挑战莫过于其“民主化”与“公开性”。随着“民主化”“公开性”的扩大化,苏联社会出现各种攻击苏共

的政治力量,社会团体和政治反对派层出不穷,“社会被分割为‘改革的工程主任’和‘阻碍势力’,过去的历史被扭曲了,被描绘成漆黑一团,千百万人的思想因此产生了混乱”^①。苏联军队在“民主化”与“公开性”的浪潮中丧失了政治信仰,马列主义建军思想被抛弃,整支队伍出现思想混乱,党在军队中的威信下降,军中退党成风。据1991年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尔科夫将军透露,1990年“军队里有34000多党员退党,其中12000名来自‘高层’”^②。

“新思维”对苏联军队的领导体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1990年3月,苏联政治制度急剧转向,不仅在宪法中取消了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有关条款,决定在苏联实行总统制和“三权分立”,而且多党制亦被确定下来。这就从法律层面上取消了苏共对军队的领导权力。而随着多党制的放开,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崛起,苏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不断被弱化。在军队层面,政治反对派开始谋求军队的“非党化”。1990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社会团体法》,该法案为军队“非党化”奠定了基础。1991年初,戈尔巴乔夫将军队的政治机关改造成性质完全不同且不受苏共领导的“执行国家政策的军事政治机关”,之后又成立全军党委以取代总政治部。1991年7月20日,叶利钦颁布俄罗斯国家机关非党化第一号总统令,禁止苏联共产党及其在军队和护法机关中的党组织的活动。“八一九事件”之后,叶利钦开始全面实行其非党化命令,戈尔巴乔夫也宣布停止苏共在军队中党的组织活动。1991年8月29日,戈尔巴乔夫发布总统令,决定撤销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和铁路部队中的军事政治机关。8月30日,苏联国防部宣布,根据苏联总统的命令,在武装力量中已经开始进行有关停止政党和政治运动的活动、撤销军事—政治机关的工作。到9月1日,在所有部队、管理机关、军事院校、国防部的企业和组织中,政党的组织结构的组织活动将被停止。至此,苏联共产党在军队中的组织领导体系被全部取消,苏联军队成了弃儿,“它今天不为任何人所需要,在某种意义上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333页。

② 美联社莫斯科1991年8月10日电。

变成了第 16 个共和国,面临饥饿、组织涣散、装备和给养很差状况”^①。

2. “八一九事件”与苏联军队“中立旁观”

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副总统亚纳耶夫(代总统)、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总理帕夫洛夫、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等人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克里米亚度假别墅软禁了戈尔巴乔夫,以保卫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并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尽快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名义发起事变,三天后(即 21 日)事变失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被逮捕。分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的原因,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军队的“中立旁观”。在“八一九事件”中,作为主要人物的格拉乔夫^②、沙波什尼科夫和列别德^③在关键时刻投靠政治反对派的叶利钦,成为八月政变的关键原因。事实上,从八月政变一开始,“格拉乔夫一直和叶利钦保持联系……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公开发表‘不用武力反对人民’的声明……海军司令也做了不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表态”^④。

在多年遭受“新思维”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之后,苏联军队在思想上处于极端混乱之中。军队已经无法达到令行禁止,更无力去执行实施“紧急状态”的政治任务。“到了 1991 年,苏共已如强弩之末,根本无法控制军队。而军队领导层严重腐败,争权夺利,优柔寡断,根本不可能齐心协力组织政变。大多数高级军官不是不愿冒险,就是只关心个人的名利仕途,在重大政治斗争中,一个个就像墙头草,看到哪边获胜的希望大,就毫不犹豫地倒向哪边。”^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起事变后,曾立即命令十一个重要地区的苏军部队进入紧急状态,并要求调集部队进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核

① 路透社莫斯科 1991 年 10 月 25 日电。

② 注:格拉乔夫,原为苏空降兵司令,“八一九事件”中支持叶利钦,后成为叶利钦第一总统任期的国防部长。

③ 列别德,空降兵副司令,格拉乔夫的副手。

④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14 页。

⑤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 376 页。

心地区,但除波罗的海沿岸军区和莫斯科军区有所响应外,其他部队或者按兵不动,或者消极抵制。在莫斯科,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制定了攻打俄联邦议会大楼并逮捕叶利钦的计划,但空降兵司令格拉乔夫及其副手列别德在关键时刻将枪口转向紧急状态委员会,军队反而成了保护叶利钦右翼分裂势力的重要力量,格拉乔夫也兑现了早前对叶利钦的承诺。

事实上,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政策对苏联武装力量而言曾是一种巨大威胁,军方长期以来并不信任叶利钦。但是进入1991年以后,叶利钦开始想办法讨好军方。在5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中,叶利钦“所到之处都要视察军事基地和会见军队的官兵”^①。在视察图拉空降师时,格拉乔夫专门为叶利钦举行了一次伞降空投演习,随后叶利钦答应给该部队提供500套公寓并决定拿出部分其自传的版税支持该部队建设。叶利钦曾问格拉乔夫,出现危急状况时是否可以依靠军人、依靠他,格拉乔夫就此许下了诺言。叶利钦回忆说:

叛乱前不久,我参观了模范的图拉师。空降部队司令员帕维尔·格拉乔夫让我检阅了作战部队。我很喜欢这个人,这位年轻的将军,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相当果断,有主见,性格坦诚。于是,我犹豫片刻之后,决定向他提个难题:“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假如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合法选举的政权在俄罗斯受到威胁——若出现某种恐怖、阴谋,企图逮捕人的时候……可以指望军队,可以依靠您吗?”他回答:“当然可以。”于是,19日我打电话给他,这是我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打的最早的电话之一。我提醒了他我们曾有过的谈话。格拉乔夫窘住了,他长时间沉默着,听得出电话的另一端他有些呼吸急促。最后他终于说,作为一个指挥官,不能违抗命令。我似乎对他说了一句:我不想把您置于危险境地。他答道:“请等一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把自己的侦察连(或者是警卫连,我没记清)给您派到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我谢过他后挂了电话。妻子回忆说,那天早晨我放下话筒对她说:

^① [美]《华盛顿邮报》,1989年6月2日。

“格拉乔夫是我们的人。”为什么？

格拉乔夫的第一个反应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况且,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接回答的。命令就是命令……何况某种借口是有的,但格拉乔夫没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这才是最重要的。

通常,人们很少有在一瞬间决定生活中的主要问题的情况。格拉乔夫在话筒中喘息的时刻,不仅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而且决定了我乃至千百万人的命运。当然,作为这样高级别的军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有着太紧密的联系,他亲自发出军队进驻莫斯科的命令,亲自领导着政变的军事方面,而同时却又支持我们。在这个职位上有像格拉乔夫这样气质的人——意志坚强、见解独立、敢作敢为,是俄罗斯真正的幸运。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他的个人品质,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武装力量似乎有两支军队:一支是训练有素、经过阿富汗战争考验的具有最高世界水准的战斗部队;另一支是庞大的“菜园”军队,它们仅仅维持生计,而未参与过任何国家工作。当时“瘦”将军和“胖”将军之间潜在的内部矛盾冲突已经酝酿起来了。

当我打电话给格拉乔夫时,他得在几秒钟内全盘考虑几个问题,包括政治、道德的问题,还有纯职业的问题。他明白了:他这个“瘦”将军获得了一次历史性机会——把“菜园”军队变成真正的军队。这需要经过磨炼、痛苦和一次十分痛苦的改革。但必须把这台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恐怖机器变成永远让俄罗斯感到骄傲的俄罗斯军队。^①

在“八一九事件”中,“格拉乔夫政治上的两面性,使得空降兵部队成为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民主派两股势力争夺的对象”。亚佐夫把制定实施紧急状态方案具体细节的任务交给了格拉乔夫和列别德,格拉乔夫则将国防部下达的每一道命令通报给叶利钦,并表示决不会向空降部队下达攻打“白宫”^②的命令。当列别德率领一个营到达“白宫”时,格拉乔夫对亚佐夫宣称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66~68页。

② 注:因俄联邦议会大楼为白色建筑,故又称“白宫”。

已经进入指定位置,而对叶利钦则表示派部队来保护民选总统。列别德作为计划的具体实施者,则害怕攻打“白宫”会导致流血事件,“军队将永远无法洗清掉这个罪责”^①,在格拉乔夫的指示下,他将原本用来攻打“白宫”的伞兵部队变成守护叶利钦的“忠诚卫士”。

叶利钦回忆说:

亚历山大·列别德是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一位经历过阿富汗战争的将军,他的空降兵达标成绩曾优于任何一名士兵。他举止严肃、胸怀坦荡,把军人和军官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格拉乔夫派他来探察情况。当根据亚佐夫的命令越来越多的部队开往莫斯科的时候,应当确定并弄明白宫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列别德试图向人们解释,只要向白宫发射几枚反坦克导弹,白宫就没有任何防御可言。

这位将军宣布,停在白宫周围的8辆装甲运兵车将参加白宫的防御。鲁茨科伊和伊别茨开始争论应怎样更好地配置战车。争论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列别德再一次确信,他现在与之打交道的人在军事方面知识甚少,他们甚至未必能顶住一个不大的职业小分队的进攻。而莫斯科和莫斯科城外这种小分队已有数十个。

在会谈中,列别德语气枯燥但令人信服地向我解释说,我要求军队不服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怂恿士兵和军官不执行命令,这可是违反誓言的行为。

列别德说,为了使您的呼吁有效并有理有据,您应当取得俄罗斯境内最高总司令的地位。因为最高总司令并非国防部长亚佐夫,而是戈尔巴乔夫总统。他现在去向不明,而您作为共和国总统有权统率俄罗斯的武装力量。

我对列别德表示感谢,然后我们就告别了。我没有马上决定迈出这一步,就这个问题的命令直到第二天才正式签署。

^①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18页。

我委托尤里·斯科科夫同军队和内务部的最高领导进行接触。我们需要与他们保持非正式的联系。他会见了亚佐夫的副手格拉乔夫和普戈的副手格罗莫夫。鲍里斯·格罗莫夫和帕维尔·格拉乔夫也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经历了殖民战争(从前曾会这样说)的痛苦磨炼。但这两位将军都极不想在莫斯科看到战火。^①

叶利钦的警卫队长科尔扎柯夫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

我找到了列别德少将。列别德解释说,他是受帕维尔·格拉乔夫的派遣而来的。眼前形势尚不明朗,不知道会不会进攻白宫,但是格拉乔夫根据总统的要求先把空降兵派过来。部队分布在地铁“飞机场”站地区,而列别德前来勘察地形。他要求我安排他亲自和总统见面。总统和列别德大约谈了20分钟。列别德将军解释说,他打算维持白宫的秩序,以免遭抢劫。他接到报告,似乎国家财产正迅速被公开盗窃。其实根据他亲眼所见就能证明这种传说不符合事实。白宫大楼的所有出入口都有警卫,任何东西也不可能送进去,更谈不上往外拿东西了。总统允许列别德把一连空降兵派驻大楼周围。^②

海军司令切尔纳温、火箭军司令尤里·马在西莫夫和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从一开始就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然而他们中有权力向莫斯科方面施加影响的却只有沙波什尼科夫一人”^③。作为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手里掌握着莫斯科军区的所有轰炸机和运输空降部队所必需的军用运输机,国防部所制定的依托空降部队攻占“白宫”的计划只有得到沙波什尼科夫的配合才能付诸实施。在“八一九事件”中,沙波什尼科夫认为根本不值得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哪怕是流一滴血。他要求部属“千万不能给空军

①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100页。

②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71~72页。

③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2页。

抹黑”，并主动向叶利钦表示“空军是不会背叛人民的”。^①在8月19日这一天，沙波什尼科夫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大转换。“早上醒来时他还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和空军司令。到中午时，他做出了‘选择’（这也是他回忆录的书名），即反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②对国防部的命令，沙波什尼科夫采取拖延抵抗的策略，先是以天气不适合飞行为由，拖延向莫斯科输送后续空降兵，而后又故意降错机场导致军队无法及时进入预定位置。在决定国家命运的紧要关头，沙波什尼科夫选择了支持叶利钦。科尔扎柯夫说：沙波什尼科夫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派飞机轰炸“白宫”的命令。不仅如此，元帅还亲自发布命令，禁止他统辖的空军部队参与政治冲突。“但是沙波什尼科夫为民主事业所做的贡献不止这些，他最先表态支持俄罗斯总统关于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的命令。”^③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拯救苏联的行动失败后，苏联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了。曾经无比强大而令人生畏的苏联军队陷入绝望之中。1991年12月23日，《时代》周刊对此发表评论：

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军队似乎仅留下中央机构。

即使新的联合体想要使军队保持统一，但是要军队保持团结，那是幻想。苏军已开始分崩离析。历来依赖莫斯科中央来养活和提供物资的武装部队发现，他们无法靠自己来支撑。

征兵在某些地区已经失败，开小差的军人不断增多。军饷不足，士兵们纷纷到黑市上变卖军事设备。燃料奇缺，以致许多舰艇被迫返回其原来停泊的港口。许多飞机、军舰和坦克被拆走零件。从东欧回来的数以千计的复员军人束手无策，住在破旧的帐篷城市里，既无充足的住处，又无救济金。士气低到极点。华盛顿的一个研究中心负责人赫斯普林说：“苏军患了弹震症（由于战争的紧张而造成的精神病）。军队

①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是怎样崩溃的》，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

② [美]威廉·奥多姆：《苏联军队的瓦解》，王振西、钱俊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③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的内聚力已被破坏殆尽,因此,即使有某些军官想发动政变,他们也不可能搞得起来。”

虽然苏军一贯不愿卷入政治,但是军人们现在怒不可遏地要求得到较多的尊重。各共和国坚持要部署自己的军队,将会引起各支军队间的冲突。

军队生活条件艰苦。军人们春天建猪圈,种蔬菜,以便过冬时有东西吃。各地的兵营已经没有新军服和药品,也没有降落伞和汽油。

许多退伍军人无法就业或找到住房。因此,苏联要裁军70万人的计划必将引起军人激烈的反应。^①

^① [美]《时代》周刊,1991年12月23日。

第八章 全人类利益：政治 价值与国家利益

无论冷战的结束有着多么复杂的历史原因,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戈尔巴乔夫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相当意义上讲,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或许会继续存在,冷战仍将持续对抗。当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相继去世而令美国总统里根苦恼——“如果他们不断去世的话”,“我怎么同俄国人打交道”^①——时,戈尔巴乔夫给他带来了惊喜。在决定冷战命运的关键时刻,西方世界面对的是一位“新”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是另一代人,与受到斯大林威吓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缺乏前人的强悍作风。非常聪明又温文尔雅的他,像是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中的抽象人物——既见过大世面,又不脱乡村气息;聪明绝顶,但不专精一技;有远见,但见不到眼前的主要困难。”^②无论是里根还是布什,很快就发现了戈尔巴乔夫与前任苏联领导人完全不同的特征——可以与之打交道。“自由”“民主”“人权”等被视为帝国主义蛊惑伎俩的词汇,成为戈尔巴乔夫与西方打交道时的共同语言和统一价值。当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以“全人类利益”来结束东西方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时,西方给予他以最坚决的支持。于是,“戈尔巴乔夫缔造了当代意义最重大的一场大革命。苏联共产党组织起来,只有一个特定目标——夺权、抓权,事实上它已经掌控了苏联人民生活的每个层面;戈尔巴乔夫却摧毁了共产党。然后,数个世纪辛苦建立的帝国,也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瓦解”^③。

① [美] 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第607页。

②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727页。

③ 同上,第728页。

一、“全人类利益”：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价值

戈尔巴乔夫认为，“新思维”的核心就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①。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承认这一点，不仅是出于国内改革面临的巨大压力，更是出于对更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不结束冷战，国内的改革就无法正常进行下去。“如果不对国家面临的问题进行检查和深刻的批判性的重新思考，不对国家的和国际的现实进行重新思考，改革简直就是不可能的。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过去我们对世界及其发展趋势和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与作用的概念，是建立在很深的意识形态教条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教条使我们根本无法实行务实的政策。需要打破这些概念，制定对国家和周围世界发展的崭新的观点。这件事是很不简单的。须得抛弃几十年来认为是不可触动的真理，重新考虑进行领导和活动的方法和原则。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由意识形态的偏见所留下来的公式）重新思考周围的一切。这项工作的结果就是新思维。它成了改革年代国家全部内外政策的基础。新思维的出发点就是不从狭窄的阶级利益或民族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人的利益优先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从日益扩大的世界整体性和所有国家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性的立场上，从经过许多世纪形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立场上去评价一切。”^②

1. 全人类利益：持久的和平

当戈尔巴乔夫把“全人类价值”引入苏共意识形态的思想库时，最初为的是要“淡化”苏共的传统意识形态提法。这个概念只是用来作为“对外使用”，因为这里边还包括维护和平、裁军、防止生态灾难等思想。但是右派激进主义大众新闻媒介在社会不注意的时候将这个概念“抛”到社会关系范畴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② [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73~74页。

上来,“与阶级利益相对立”^①。于是,在“全人类价值”中又加入了法制国家的原则,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认为,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党和国家的首脑向“西方价值”的转变。这种情况几乎对所有的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对外政策方面、意识形态方向、经济方面,等等。

戈尔巴乔夫思想观点的变化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引起不同反响。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这一转变,意识形态专家、改革“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拿着到处鼓吹,说这是根本性的、“指标性的”转变,特别是跑到国外去吹。雅科夫列夫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用哲学术语作掩饰,而且不时选用复杂的句型说:“人类共同利益不是哪一位思想家在象牙塔中通过苦思冥想而假设出来的抽象的哲学范畴。在我们这个时代,当整个地球似乎已小得不可思议之时,当人类的命运与历史只要按一下按钮就会结束时,当不用几个小时全球 50 亿人便对某一事件家喻户晓时,这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就是具体而又生动的了。这些的确是全人类的利益所在。这也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部分,而且还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优先考虑人类共同的利益,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发展的客观趋势。它要求放弃僵化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它有助于我们现实而又理智地把政体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共处看成是历史的要求,是国际主义者追求全球发展的体现。”雅科夫列夫的讲话让人大吃一惊,以致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惊讶地问道:这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吗?用雅科夫列夫的话来说,当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的确确把“无产阶级”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这一基本理论还导致了他的许多其他错误。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人类的确有它的共同利益,如果苏联领导人能认识到他们的利益也包含在其中,那么冷战就会成为历史。”^②

①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68~169页。

那么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把“全人类利益”作为“新思维”的核心呢？1986年的《共产党人》杂志刊发了原苏联驻美大使、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撰写的《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的文章。多勃雷宁指出：“对大家来说，真正可靠的安全只能通过消除现代世界上不信任，紧急局势和敌意的根源的办法来取得。”“人类在核启示录面前已开始认识到一个简单的真理：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国际关系中不是从使我们相互对立的、狭隘理解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我们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愿望出发。”^①按照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解释，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社会各国日益增长的互相依存的趋势愈来愈强烈，出现了越来越尖锐的全球性问题，特别是人类在进入原子能被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就可能不再是永生了。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命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在军备竞赛中取胜，以致在核战争中取胜，是不可能的。所以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②

由此，戈尔巴乔夫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如今武器的性质决定了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比如说通过构筑国防，甚至是最强大的国防，就能保护住自己，只要有军事技术手段，保障安全越来越成为一项首先是用政治手段才能解决的政治任务。而政治手段就是谈判和再谈判。谈判就需要有耐心，要始终不渝地寻找能够相互接受的、相互妥协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结论：在当代，实力政策注定是要失败的。从实力立场出发的和平，无论对它怎么说，都存在着内在的不牢靠。就其本性而言，它的基础是冲突——隐蔽的或者明显的冲突，是不断有爆发的危险，是总要试图通过使用武器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个结论：它是前两个结论在逻辑上的继续。在当代条件下，安全（特别是说到大国，首先是核大国时）只可能是相互的，而如果拿整个国际关

① [苏]多勃雷宁：“争取无核世界，迎接二十一世纪”，《共产党人》，1986年第8期。

②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系来说——那就只可能是大家共同的安全。^①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上述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②。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同战争与和平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而且力图把对世界事务的政策和道义伦理态度统一起来。“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③于是,戈尔巴乔夫强调:“在人类的一切事务中,尤其是在国际政策中,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在当前所有矛盾中,战争与和平、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居首要地位。并要争取及时地、从和平利益出发来解决这一矛盾。”^④

2.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幻想

“新思维”的提出,表明了核战争时代戈尔巴乔夫的全部世界哲学观念和颠覆性的政治结论——战争与革命之间不再存在因果关系。戈尔巴乔夫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但是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作出判断。历史能判断一切。让各国人民自己去判断,哪一种制度更好,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好吧。让和平竞赛来决定这一切吧,让各种制度来证明自己有能力满足人的利益和需要吧。”^⑤

改革,就是戈尔巴乔夫通过和平竞赛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途径。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是一个含义广泛、内容极为丰富的词。但是如果从它的许多同义词中选出一个关键的、最能表达其实质的词,那就可以这样说:“改革就是革命。”^⑥为什么要把改革叫作革命呢?戈尔巴乔夫指出:

① 参见[俄]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37~239页。

②③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77页。

④ [苏]米·戈尔巴乔夫:《为了人类文明的永世长存》,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87年,第5页。

⑤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⑥ 同上,第55页。

“据我们理解,革命是立,当然也总会有破。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打破过时的、停滞的东西,打破一切妨碍迅速前进的东西。没有破就不能为新建设清除场地。那么,改革就意味着坚决果断地破除已形成的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东西。破除经济管理中陈旧制度和思维上的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改革会触及许多人的利益,触及整个社会。自然,要破就不可能没有冲突,有时甚至不能没有新旧事物之间的尖锐斗争。只不过是没有什么炸弹的轰鸣和枪弹的呼啸声而已。”^①

具体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实现其本质特性的飞跃,改革就是:

坚决克服停滞现象和打破障碍机制,建立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可靠而有效的机制,使它具有更大的活力。

依靠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活动,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鼓励主动精神和自主性,加强纪律性和秩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

使苏联经济全面集约化,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原则,普遍运用经济的管理方法,放弃行政命令方法,大力提倡革新和社会主义进取精神。

实现向科学化的坚决转变,学会使任何创举都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使科学技术革命的成就同计划经济结合起来。

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良好的劳动条件、生活和休息条件、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时刻关心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水平。

使社会坚决摒弃歪曲社会主义道德的做法,始终不渝地实现社会公正原则,言行一致,权利和义务一致,推崇诚实的、高质量的劳动,克服在劳动报酬方面的平均主义倾向和消费观点。

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深刻革新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主义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充分地揭示我们的制度在其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②或者说,改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58页。

^② 同上,第35页。

革就是要克服人与政权的异化,实现人的精神解放,使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不调动人的因素,也就是不考虑人们、劳动集体、社会团体、各个社会集团多种多样的利益,不依靠他们,不吸引他们进行积极的创造活动,要解决任何一项任务和改变国家的状况都是不可思议的。”^①戈尔巴乔夫在回答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奥基托提出的“苏联社会处于何种阶段,苏联革新进程走的是什么道路”问题时说:“我们今日所处的时期——这是对列宁的方法论、辩证法、列宁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的政治措施加以开拓实施的时期。我们应当将我们的概念从过去扭曲和变形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应当从列宁的观点出发,开始思考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但是将要到来的正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对此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确信无疑。犯错误的完全不是社会主义,它之所以不成功,是变形和悲剧性时期的结果。如果要问改革的主要含义,那就是克服人对经济和政治进程的疏远,通过彻底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达到人的精神解放。”^②

1989年4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英国伦敦市政厅发表讲话时说:

国际社会出现两种政策。总的来说,一种是武力政策,这种政策来源于过去。另一种政策刚刚在形成。它归功于世界整体化和相互依存的蓬勃进程。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优先是这种政策的绝对命令。

当代的政治家肩负着负责选择的重担,决定命运范围的重担。谁也没有回避这种重担的道德权利。

我们坚决走上了克服僵死的教条和已经习惯的公式和陈规旧习的道路。改革和新思维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内外政策就是其成果。既然,这涉及的是苏联这样的国家,这也就在各处引起了特别强烈的兴趣,并且影响到国际气氛和世界上的现实政治形势。

对我们改革的兴趣今天依然并未减弱。我明白,你们希望听我介绍,现在的情况如何,下一步如何进行改革,改革的前景怎样?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6页。

②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31~332页。

改革是严肃的,长期的。现在谁也不能使改革后退。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同改革牢牢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是完全有意识地去进行改革的。我们预见到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和不寻常性。我们明白,这一进程会变成对整个社会的一次强烈的“震动”。在主要方面我们没有犯错误。许多国内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规模没有立即显露出来,而是随着已经开始的事业的进程逐渐显露出来,这就是另一回事情了。这就要求不断采取新的态度和作出新的决定,在精神和实践上做极其紧张的工作。

至于说到困难,我们是把它当作过渡时期的矛盾的自然表现来看待的。任何一种困难都不能证明改革构想本身是错误的。这些困难只能强调正在经历的时期的转折性质,因为在这个时候旧事物还有生命力,还不可能一下子将其赶走,而新事物还不能全力地投入到行动中去。正在打破意识形态教条和心理上的条条框框的常见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问题和困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涉及在各个方面——在生活方式、劳动态度和对公民职责的态度方面的深刻改革。

我们彻底地和坚定不移地选择了通往新的生活方式——在各个方面使社会民主化的路线。

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民主化,才能建立起正常运转的、健全的、有活力的经济。根本的经济改革,再加上同市场进行有计划的协调,就能使我们走向新的经营机制,就能使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经营活动的多种形式协调起来,并且将为生产者的主动精神和经营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

我们还看到,改革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良好的作用。把赌注押在实力上,这是走向死胡同的危险立场。当代现实揭露了对抗哲学的无能为力。“冷战”数十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付出了过多的代价。继续全面对抗可能导致所有人的灾难。

世界政治在此阶段上的客观逻辑就是这样的。我们新的政治思维就是根据世界政治规律而来的。

如果我们不同时根本改变地球上的政治气候,我们就不能达到真

正的和深入的裁军。如果我们不走裁军道路,不腾出资金来解决生态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挽救环境。

我已谈到,在1989—1990年期间,我们将裁军50万人。我要借此机会告诉诸位,前不久,我们决定今年停止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高浓缩铀。除了1987年关闭的加工制造武器用的钚工业反应堆以外,我们计划在今年和明年再关闭两个这样的反应堆,并且不用新的设备代替它们。这是朝彻底停止生产制造武器用的裂变材料迈出的又一步。总之,因“苏联的军事威胁”而感到恐惧是没有根据的。^①

3. 和平的演说:改革的表白

作为对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剧变中保持的政治冷静和军事不干涉,以及他所倡导的人道的、民主的改革的奖励,他获得了西方世界授予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殊荣”。1991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挪威奥斯陆发表诺贝尔和平奖演说:

当我同意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认识到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生活下去了。

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国家所有制,无处不在的独裁的官僚主义体系,政治上的意识形态控制,社会思想和科学中的垄断,攫取了我们最好的资源,包括具有最好的智力资源的军事化工业,军事化工业负担着难以承受的军事开支,危害着我们社会的进步,我们也曾为此骄傲。后果是,我们的社会在经济和精神两个方面正在衰败下去。然而,对于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来说,这个国家看起来仍是一幅相对健康、稳定、有秩序的图景。在宣传魔力错误引导之下的社会很难知晓正在发生什么,它所面临的不远的将来是什么。最微弱的抗议表示也被镇压下去,绝大多数人将抗议者视为异类、诽谤者和反革命。这就是1985年春天

^① 塔斯社伦敦1989年4月7日电。

的形势,仍然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让人们维持现状,只做一些表面的改变。这就意味着继续欺骗我们自己和人民。

我们想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人类的普遍价值和諧一致,遵守国际标准。当社会被给予了自由后,它就无法认识它自己了,因为它“在镜子背后”生活的时间太长了。我们承认每个民族的合理选择,如果一个民族通过公正的全民公决真的决定退出苏联,我们对此理解。

在一个世代人民都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在政治生活甚至是投入监狱的国家里,领导一种和平进程并非易事。世代以来,这个国家的问题已经习惯于最终用暴力手段来解决。

果断并不意味着回到压迫、压服对方,或是对权利和自由的压制。我永远也不会同意将我们的社会分离为一部分人宣称“代表人民”说话和行动,另一部分则是“人民的敌人”。

在多党制、思想自由、重提各共和国的民族特征和主权的新的氛围中,社会的利益必须绝对置于各个政党、各个团体的利益之上,置于其他任何局部的、地方的或个人的利益之上。

苏联领导人,无论在中央还是各共和国,以及苏联公众的一大部分,都明白这种需求,尽管在我们社会的一些地方,也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想法的。有一些挥舞旗帜的人,他们宣称唯有自己才是爱国主义,认为这就意味着不与外部世界“纠缠在一起”,这种爱国主义什么也不是,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的自私追求。

我们在与西方的一般性政治合作中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在东欧剧烈变化和寻求德国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时刻,它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波斯湾危机这样高度紧张的局势中,它也站稳了脚跟。

冷战已经结束,全球性核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经消失。铁幕已经撤去了,德国重新统一,这是欧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真正和平的世界政治的未来前景依赖于通过共同努力,去创造一个民主空间,在其中,各国的指导方针是人权的优先和它们自己国民的

福利。

和平意味着“普遍的商谈”。

一个现代国家,它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都追求一种能够将自己人民的利益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的政治……

通过授予我诺贝尔奖,我看出了对我的愿望、我的追求、我国业已开始的深刻变革的目的、新思维的思想的理解和你们对我坚持以和平手段实现改革任务的赞许。为此我对委员会成员心怀感激并请他们相信:如果我对他们的动机估计得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并没有做错事情。^①

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演说表明:他已经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最后的精髓,虽然此时马列主义仍然是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础。马特洛克分析了戈尔巴乔夫的精神裂变之路: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经常被外国观察家们所误解,其中包括将他视为朋友的西方政治家们。他们说戈尔巴乔夫仍表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他们认为他对市场经济一无所知。他们的错误在于,虽然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地延用这个词(社会主义),但他其实是害怕一旦抛弃这个词,那些潜在的支持者就可能拂袖而去。从1988年到198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也毫无觉察。“仔细研读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你就能清楚地看到他的思想已经转变。在这篇演说中,马列主义的传统概念已经荡然无存。但戈尔巴乔夫思想转化的最有力的证明以及他对未来的设想是出现在7月份,奥斯陆之行几周之后。等到苏联共产党新党纲草案发表时,不仅仅是马列主义的概念没有了,甚至连一点点社会主义的影子也都找不到了。”^②

戈尔巴乔夫的诺贝尔和平奖演说,“是他与马克思社会主义信仰的一次

① 郑建新:《在历史祭坛上——戈尔巴乔夫的命运》,南方日报出版社,2012年,第230~232页。

②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55页。

告别”^①。

二、共产党—苏联命运：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

作为发起冷战的推手之一的乔治·凯南认为：“苏联政权的政治特性乃是意识形态和环境的产物。”^②任何忽略意识形态对苏维埃政权存在的意义的做法都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改造是为了使其回归到最初的本意——为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逐渐建构起来的以斯大林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早已与苏维埃政权融为一体而不可分割。对苏联共产党坚持的意识形态的彻底修正，其实就是对苏维埃历史的彻底否定。“意识形态的因素一直是苏联决心与美国抗衡并进行扩张的原因之一。虽然其信仰体制有腐化和日益犬儒化的趋势，苏联领导层与精英们在表达其国际行为及安全利益的时候，还在继续使用现实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两套语言。但同样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也使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显得古怪，甚至可以说怪异。尤其是一些过时的或者说误入歧途的意识形态臆想，使得斯大林于不经意间引发了与美国的对抗，后来接着又是朝鲜战争。不同的但也是误入歧途的臆想，使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以为，可以以实力为依托，通过谈判来实现与美国的和平共处。最后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对于苏联的垮台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就像充满救世热情的戈尔巴乔夫那样，倡导‘新思维’，拒绝把武力作为强权政治的基本手段来使用，哪怕是为了维持国家的秩序。在历史最终的反讽中，以革命的暴力作为意识形态基础的苏联社会主义帝国，却死于非暴力的意识形态。”^③

①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563页。

② [美]乔治·凯南：《美国外交》，蔡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85页。

③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3页。

1.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与阶级立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从生产关系的变革性角度对此作了阐释。他说:“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②在给格·特利尔的通信中,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暴力革命的意义。他指出:“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的措施。”^③而无产阶级要想建立自己的统治,必须用自己的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这一过程,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历史表明,没有革命的暴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用革命的暴力镇压工农的直接敌人,就不可能摧毁这些剥削者的反抗。”^④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上述观点成为无产阶级观察以往历史的根本立场,是无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权的理论指南和根本立场。然而戈尔巴乔夫以核

①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65页。

②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225~226页。

③ [德]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21~322页。

④ [俄]列宁:“在各省肃反委员会第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5页。

战争为由,从根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的政治逻辑。“和对内政策一样,在对外政策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当然,在正式场合,阶级利益通常都是用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或者集团利益等等掩盖起来的,阶级利益还被‘共同福利’或者宗教说教弄得模糊不清。但是,归根到底,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其他清醒地判断问题的人都深信,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政策,都是由在这些国家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所决定的。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曾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结果是,人类的政治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部战争史。今天,这一传统径直通向核深渊。整个人类现在是同舟共济,是沉是浮,只能在一起。”^①戈尔巴乔夫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暴力革命学说适合于充满对抗的社会。“的确,从阶级角度来对待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这种态度在今天既完全符合存在着各种阶级利益对抗的阶级社会的现实,也完全符合充满这种对抗的国际生活的现实。直到最近为止,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发展的核心,现在阶级斗争仍然是划分阶级的国家的核心。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用阶级态度对待社会现实的主要问题。”但是戈尔巴乔夫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在核时代却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随着大规模(普遍的!)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第一次出现了现实的,而不是抽象的,今天的,而不是遥远的全人类的利益——使人类文明免于毁灭。”^②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全人类利益”作为新的政治思维的核心价值基点,其目的在于把人类文明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因而它实际上应该成为苏联处理国内国际事务的方法论。在戈尔巴乔夫的要求下,苏共二十七大对苏共纲领作了修改,决定不再继续保留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视为“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的提法。新修订的党纲删除了以下两句话:“一旦帝国主义侵略者胆敢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各国人民不会再容忍那种使他们卷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② 同上,第185页。

入毁灭性战争的制度。他们将扫除和埋葬帝国主义。”^①戈尔巴乔夫强调,不能再意识形态的有色眼光去看待世界、划分界限了。“我深信,早就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仔细想想过去的教训,勇敢地估计我们处在什么位置。一个国家把另一个国家看成‘绝对坏’,而把自己说成‘绝对好’,这就把关系引向死胡同。”戈尔巴乔夫提议,作为国家领导人不能不接受苏美两国的对抗历史,但是完全有可能在新一代领导人的手中结束仇恨的接力棒。“应当超脱意识形态分歧,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选择,这种选择应当受到尊重。而为此必须有新的政治思维,这种思维的出发点是理解普遍的相互依存性,它的基础是让文明社会永存的思想。我们能够就这种思维的标准达成协议,那就是寻找解决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相应办法。如果政治家们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够实现这一点,那将是理智的一个胜利。”^②作为“新思维”的执行人,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宣称:“两种制度的对抗已不再是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能否在高科技基础上加速并公正分配物质财富,共同努力恢复和保护人类生存所需的资源。”^③在“新思维”的指导下,谢瓦尔德纳泽有充分理由不把和平共处看作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当把国际关系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时,就很难承认作为最高普遍原则的和平共处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也是现实可能的和必然的了。”^④

简单地说,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没有把资本主义看作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死敌,也没有把美国看作苏联的死对头。他们把自己从意识形态的成见中解放出来,因为“伪意识形态”已经让国家一穷二白了。美国应该被看作有潜力的合作伙伴,而不是有着深仇大恨的敌人。^⑤然而当戈尔巴乔夫满怀希望地奔向西方的时候,却没有想到西方迎接他的将是对他的国家和历史的彻底颠覆。1982年6月8日,里根在英国议会两院发表演讲时

① [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② 同上,第289页。

③ [苏]谢瓦尔德纳泽等:《苏联外交反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④ 同上,第59页。

⑤ 参见[美]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7页。

批评苏联：“极权主义者建立的政权用了超过 30 年的时间打造他们的合法性。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政权敢自由选举。刺刀下的政权是不可能生根发芽的。”^①1983 年 3 月 8 日，里根在全国福音派信徒协会年会上公开指责苏联是“邪恶帝国”。他说：“苏联领导人公开宣称，他们所认可的唯一道德，是推进他们事业的道德，而不是任何宗教的道德，也不是超越阶级观念的道德；道德完全从属于阶级斗争的利益；道德对于废除一个陈旧的社会制度、团结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许多有影响的人拒绝接受苏联的这种基本理论，这本身就表明历史不愿意看到一个极权主义大国的存在。”在里根的眼里，苏联就是“当今世界的罪恶之源”。^②从里根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D75)到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NSD23)，美国从来没有忘记“冷战总统”杜鲁门的公开誓言：

随着自由世界实力的不断提升、更加团结、对铁幕两侧人民吸引力的进一步增强，随着苏联轻松扩张的希望得到遏制，苏联发生变革的时间必将到来。没有人能够断言，这种变革何时发生，或者能够预测变革如何发生，通过革命，卫星国家制造麻烦，还是克里姆林宫内部发生变化。

无论苏联统治者出于自由意志调整自己的政策，还是以其他方式发生变革，我都坚信苏联一定会发生变革。

我对人类自由怀有深刻而持久的信仰。在耐心和勇气的支持下，我们终将迎来一个新时代。^③

2. 国家利益：国际政治的现实本质与苏联的自我放弃

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呢？难道就像资产阶级所宣扬的那样，是调和矛盾

① [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政治姻缘》，陈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 年，第 222 页。

②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 年，第 562 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 年，第 461 页。

的“超阶级”存在?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既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而照市侩和庸人般的教授和政论家们说来,国家正是调和阶级的。马克思认为,国家实质上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抑制阶级冲突,并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抑制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恩格斯认为,这种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学说,实质上掩盖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他指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①

国家作为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那么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列宁指出,国家作为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其统治的形式是各不相同的。就资产阶级统治而言,在有这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就用这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在有另一种形式的地方,资本又用另一种方式表现它的力量,但实质上政权总是攥在资本家手里,不管权力有没有资格限制或其他限制,不管是不是民主共和国,反正都是一样,而且共和国愈民主,资本主义的这种统治就愈厉害、愈无耻。北美合众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共和国之一,可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资本权力即一小撮亿万富翁统治整个社会的权力表现得如此横蛮,采用贿赂手段如此明目张胆。资本既然存在,

^① [德]恩格斯:“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导言”(1891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28~229页。

也就统治着整个社会,所以任何民主共和制、任何选举制度都不会改变事情的实质,即只要私有制存在,即使是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也无非是资本家镇压工人的机器,而且国家愈自由,这种情形就愈明显。列宁指出:“欧洲的瑞士和美洲的北美合众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两个都是民主共和国,粉饰得很漂亮,侈谈劳动民主和全体公民一律平等,尽管如此,任何地方的资本统治都没有像这两个国家那样无耻,那样残酷,那样露骨。其实,瑞士和美国都是资本在实行统治,只要工人试图真的稍稍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就立刻会引起一场国内战争。在这两个国家内,士兵较少,即常备军较少(瑞士实行民兵制,每个瑞士人的家里都有枪;美国直到最近还没有常备军),因此,罢工发生时,资产阶级就武装起来,雇用士兵去镇压罢工,而且在任何地方,对工人运动的镇压,都不如瑞士和美国那样凶暴残忍;在任何一国的议会里,资本的势力都不如这两个国家那样强大。资本的势力就是一切,交易所就是一切,而议会、选举则不过是傀儡、木偶……”^①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多数劳动者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别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②

列宁也认为,国家的消亡,根本在于阶级的消亡。他说:“我们要抛弃一

^① [俄]列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74~75页。

^②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0~491页。

切关于国家就是普遍平等的陈腐偏见,那是骗人的,因为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可能同工人平等,挨饿者也不可能同饱食者平等。人们崇拜国家达到了迷信的地步,相信国家是全民政权的陈词滥调;无产阶级就是要扔掉这个叫作国家的机器,并且指出这是资产阶级的谎言。我们已经从资本家那里把这个机器夺了过来,由自己掌握。我们要用这个机器或者说这根棍棒去消灭一切剥削。到世界上再没有进行剥削的可能,再没有土地占有者和工厂占有者,再没有一部分人吃得很饱而一部分人却在挨饿的现象的时候,就是说,只有到再没有发生这种情形的可能的时候,我们才会把这个机器毁掉。那时就不会有国家了,就不会有剥削了。”^①代替那个存在着各种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也就是说,“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②。这时,国家的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

那么在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最终胜利之前,无产阶级还需不需要国家这一暴力工具呢?革命的实践表明,只要人类还没有实现彻底的自由,无产阶级就必须坚持和运用这一暴力机关。“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 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

① [俄]列宁:“论国家”(1919年),《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75~76页。

② [德]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4页。

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①那种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被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的反权威主义者,实际上是对革命实践的漠视和对资产阶级的妥协。恩格斯严厉批评:“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②

巴黎公社的最终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充分运用好国家这一暴力统治工具。“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③因此,为了汲取巴黎公社的惨痛教训,恩格斯强烈主张:“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④

戈尔巴乔夫承认阶级国家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但是他从核战争下全人类毁灭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戈尔巴乔夫认为,冷战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讲就是由苏美两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和歧视以及对人类总体命运的蔑视引起的。当然,其中的主要责任在苏联,特别是在于当时

① [德]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② [德]恩格斯:“论权威”(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44页。

③④ [德]恩格斯:“致菲·范一派顿”(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页。

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①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新一代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相信自己完全有责任把苏维埃政权从阶级国家的思想禁锢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实现人类生活更加文明、理性而富有的工具,而不是为了维护某一阶级甚至某一集团政治利益的权力工具。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始终觉得苏联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并不是来自资本主义敌对国,而是来自共产党官员、经济管理者和心灰意冷的工人,内部威胁远比外部威胁更致命。“包围我们的不是强大的军队,而是更为先进的经济制度。”^②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强大的核威慑能力足够免除外部的安全威胁,因此他表现出了与斯大林完全不一样的领导品质。“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③

作为超级大国的政治领袖,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新思维”的政治主张,就是意图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全球秩序。他的行为完全背离了斯大林以来苏联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主义做法。“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

①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

②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42页。

③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6页。

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①

不能使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问题成为戈尔巴乔夫的重要政治原则。“我生平的另一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②美国驻苏大使马特洛克评价说:“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是历史上第一位不是把使用武力放在优先地位,而是把它作为最后手段的俄罗斯领导人。”^③很显然,戈尔巴乔夫把自己与外国领导人的友好关系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要。不过,与戈尔巴乔夫热情的亲西方态度截然不同的是,许多西方领导人表现出内敛的实用主义态度。美国与西方对苏政策的基础不是思想观念、救世的事业和个人的喜好,而是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利益,以至于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私下里把戈尔巴乔夫和他的顾问们称作“火星星人”,因为他们无视强权政治的法则。“我不知道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一定会有多么不解,”他坦承,“他们搞不懂,戈尔巴乔夫和他在政治局的朋友们为什么不明白怎样去利用武力和施压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④

就在戈尔巴乔夫充满幻想希望以领导人个人间的友好关系来消除国家间的利益分歧时,美国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真正的国家利益——削弱和颠覆社会主义苏联。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将决定谁将在超级大国的争斗中取胜。”^⑤他向里根政府提出建议,为了与苏联进行有效的竞争,美国必须提高六个关键性能力:

①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5页。

②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5页。

③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下),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68页。

④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9页。

⑤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3页。

(1) 意识形态的力量。尼克松指出:“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①

(2) 外交。尼克松指出:“外交不仅仅是达成妥协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竞争的策略。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苏联人进行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而是为了获得胜利。”^②因此,谈判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策略。

(3) 经济援助。尼克松指出,美国必须学会通过提供外援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在与苏联进行竞争时,必须利用美国的经济优势。“必须使外援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服务。”^③

(4) 军事援助。尼克松指出,军事援助常常是保护我们自己及盟友利益的最佳办法,也是在今后数十年中苏联将寻求向我们的利益进行挑战的主要方式。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向盟友提供足够多的军援,莫斯科的附庸们就会从各条战线上向前推进。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选择:或者放弃我们的利益,或者牺牲美国士兵的生命,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现在在军援上花一点钱,就可以避免今后既流血牺牲,又花更多的钱。”^④

(5) 军事力量。尼克松指出:“没有决心在重要的冲突中果断地有选择地使用军事实力的决心,我们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就将不战自败。”^⑤

(6) 秘密行动。尼克松强调:“美国必须能够以隐蔽方式采取行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⑥如果美国不把秘密行动看成实现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那将会犯致命的错误。

在东欧发生剧变的关键时刻,为了防止苏联的武力干预,美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从各方面加大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支持。美国前亚洲事务助理国

①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② 同上,第98页。

③ 同上,第100页。

④ 同上,第102页。

⑤ 同上,第102~103页。

⑥ 同上,第105页。

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就提出建议,要助戈尔巴乔夫一臂之力,因为苏联的改革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说:

如果西方世界某一天一早上醒来发现戈尔巴乔夫已于头天晚上被推翻,我们的感觉如何呢?我们是否会失去一个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加强苏联改革力量的历史机会?

上周,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说,“美国对外政策的任务不是保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功”,而是“不管他成败如何,制定为我国利益服务的政策”。

波兰最近的事件,即1945年以来东欧出现的最重要和最有希望的事件证明了这一点。没有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勃列日涅夫这样的人掌权,这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戈尔巴乔夫垮台,其后果将是各非俄罗斯共和国或国内经济日趋混乱,于是戈尔巴乔夫的继承者掌权时就会保证恢复苏联式的法律和秩序,这将意味着国内采取压制政策,也许重新对西方采取更加强硬的军事路线。

如果我们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能存在下去而踌躇不前,这只会进一步削弱他的力量。我认为,如果他现在需要取得对外政策方面的成就以加强他自己的政治基础,现在正是谋求达成武器和其他方面的双边协议的时候,以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我们自己的安全。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我们应该谋求使苏联从中美到太平洋的整个对外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

在复杂得多的经济领域,我们应当考虑采取一项更大胆的行动,放弃对苏联国内经济结构不大干预的政策。

莫斯科需要西方的援助,我们应当设法利用这种愿望迫使苏联改革体制。但是提供长期信贷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应当同意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联在一起。

我们还没有进入冷战完全结束的时期,但是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戈尔巴乔夫是个崭新的人物,他继续掌权在此时无疑是符合西方利益的。

只有在我们能对美苏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美国才能够重新确定它办事的轻重缓急次序,处理新时代的紧迫问题。同戈尔巴乔夫谈判提供了美国能促进其本国利益的最有希望的途径。^①

进入1990年后,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遭受越来越严厉的批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给布什总统提交的政策备忘录中提出建议,不应该再把所有赌注押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而应该重视发展同苏联国内其他政治反对派的关系,比如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1990年7月13日,中央情报局局长盖茨在提交给布什的备忘录中指出: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越来越不受公众支持。人们认为,他优柔寡断,完全像一台“复读机”。他一手制造了苏联的当前困境,但是又没有能力领导国家摆脱现状……在内心深处,他还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一直这样表达……由于选举制度的推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改革派领导人,他则显得越来越保守……他试图将国家社会主义和“控制性”市场经济相结合……他的改革措施混乱而又缺乏连续性。所有这些,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灾难。事实上,对如何摆脱困境,他完全一筹莫展。

……

虽然戈尔巴乔夫成功发动了一场政治革命,同时又割断了苏联与过去的联系。由于他的改革,苏联能够以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结构视角思考自己的未来。他像摩西一样,虽然让自己的人民摆脱了束缚,但是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带领人民抵达“希望之乡”(the Promised Land)。戈尔巴乔夫让苏联人民摆脱过去的同时,又让他们身陷沙漠,茫然无助,只能坐等约书亚(Joshua)将他们带向未来。^②

^① 《新闻周刊》,1989年9月20日。

^②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27~428页。

因此盖茨建议,美国对苏联改革的支持应该实施“去个人化”,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对改革过程的支持上,重视其他改革派领导人,推动民主和市场化改革,加大对关键改革措施的支持力度。盖茨说:“戈尔巴乔夫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历史正在离他而去。总统先生,当你充满信心地带领西方世界大步奔向未来之时,如果苏联人认为你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了一个人身上,而此人实际无法走得很远,那必将是一件遗憾的事情。”^①

尽管布什一直表现出对戈尔巴乔夫的赞赏之情,但是他还是同意美国应该加强与其他改革派领导人的接触。从1990年夏天开始,美国政府在国务院的带领下,开始主动与戈尔巴乔夫以外的其他改革派领导人联系,并与加盟共和国领袖会谈。1991年年初,这些人陆续抵达华盛顿,与不同级别的美国官员会晤,包括与布什总统会晤。由于太多来自不同加盟共和国的不知名领导人来到美国,以至于国务院开始犯难:总统应该决定与哪些重要人物举行会晤。很快,美国政府就确定了应该接触的“重要人物”——叶利钦。1991年3月底,尼克松访问了莫斯科并向布什汇报他与叶利钦会晤的相关情况。正是尼克松的汇报促使布什总统与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改变了对叶利钦的认识。6月20日,布什总统与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举行会晤。

8月11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公开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必须斩断其与戈尔巴乔夫的纽带。他说:“东西方关系不应该效仿那种坏人们突然之间悔过自新的通俗电影。明智的策略是不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上,而是要明白,一个其规模、重要性和活力如苏联的国家不可能永远地和必然地将其利益与我们的利益等同起来。我们必须在对变化了的气氛的依赖与对体制上的保障措施的依赖之间保持较好的平衡。如果丧失了这种分寸感,试图调节本是在我们的控制能力之外的苏联国内的发展,美国的对外政策就可能变成疯狂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华盛顿应该重新审查我们公开对戈尔巴乔夫这

^①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27~428页。

个人做出的特殊承诺——我们在莫斯科首脑会晤上再次表示了这样的承诺。即使戈尔巴乔夫因将苏联推上改革道路而应大受赞扬,但事实仍旧是——无论多么无情——几乎所有的苏联民主派改革者现在都反对他。”^①

当苏联最终走向解体之时,美国国务卿贝克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出战斗的号召:苏联的崩溃给了美国“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其利益和价值观念。^②看来,戈尔巴乔夫始终没有明白,苏联与美国的冷战对抗“是一场水火不容思想与军备的斗争,是一场基于人性、人民与政府关系的竞争,更是一场思想的竞赛,虽然双方能够在军事上‘共存’,但是在政治上永远势不两立”^③。

三、苏联—俄罗斯人民:社会生活与民族情绪

戈尔巴乔夫怀揣着“全人类利益”至上的崇高理想,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人类开辟一个没有核恐惧的安全世界。可是,苏联人民却成为他建立全球新秩序、成就个人声誉的垫脚石和牺牲品。就像戈尔巴乔夫给美国人讲的笑话一样:

人们排成巨龙一般的长队,等候进入商店买伏特加酒。一个男子由于长时间等待而感到精疲力竭,声称马上要去宰掉搞成这个样子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问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时,这位男子叹息道:“那里排队想杀掉戈尔巴乔夫的人比排队买伏特加酒的人还多呢!”^④

① [美]《洛杉矶时报》,1991年8月11日。

② 参见路透社华盛顿1992年2月5日电。

③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461~462页。

④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6页。

1. 改革的阵痛:人民的痛苦与民族情绪

戈尔巴乔夫失败的改革给苏联社会带来了普遍性的伤害。1991年12月6日,《快报》周刊发表题为“莫斯科见闻”的政治评论。文章对弥漫在苏联社会各阶层的痛苦与绝望作了如下描述:

莫斯科——苏联或俄国的首都。它既不是欧洲城市,也不是亚洲城市。它几乎是一座海市蜃楼,当人们以为抓到它时,它便消失了。鞑靼人、拿破仑、希特勒都有过这种痛苦的体验。

莫斯科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神话。900万人生活在莫斯科,每天有300万外地人到莫斯科寻觅在外地难以见到的产品,因为这座城市长期享受特殊待遇。供应莫斯科被视为是合情合理的,特别是在食品方面。现在,有些共和国不乐意再供养一个它们不再承认的帝国的首都。商店前排队的长龙越延越长。

在莫斯科市中心,有1/2的套房是好几家合住,因为仍然存在着尖锐的住房危机;失业者越来越多,他们不享有任何社会保护;行贿受贿相当普遍,以致必须以金钱贿赂专门的工匠才能得到一块盖墓的石板。不断的涨价是远远不能在工资中得到补偿的,特别是退休者,他们直接受到从未经历过的通货膨胀的打击。

对于莫斯科人来说,这犹如落入痛苦的地狱……

“安分守己”之家

由于害怕出现饥荒,许多人都在储存物品。热尼亚和丽塔·诺伊施塔特在他们的套间的阳台上堆放了汽车轮胎、罐头、果酱、袋装土豆泥等等。他们像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那样,每周去50公里以外的一块菜园耕作好几次,夜晚只好睡在他们的汽车上或帐篷里。以前,他们从没有种过地。现在,他们的生活节奏随着季节变化,夏季再也不能去度假,因为收获时节不等人。

诺伊施塔特一家自称是“安分守己”之家。两年前,他家买了一条

凶猛的德国牧羊犬。热尼亚解释说:“因为犯罪率不断上升。”他还说:“我们从未想这么做,但是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也担心再次发生过去沙皇反犹太人的大屠杀。”德国牧羊犬将保护他家对付可能的来犯者。

法律是否还存在呢?困惑的法官

伏龙芝居民区的法庭位于市中心,距离白俄罗斯火车站很近。在法庭内,人民法官尼古拉耶娃坐在她的扶手椅上不停地哈着手,以求暖和暖和。大厅深处的墙上挂着一枚大徽章,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法庭的走廊里到处是瓦砾:这座建筑一年多来仍在维修。

女法官说:“在我学习法律期间,人们一直要求我记住,苏联的法律机关高于各共和国的法律机关。如今,人们要求我执行俄罗斯的法律。有时,我真感到无所适从。”她的一些同事对他们的收入还不如一个有轨电车司机的收入高而感到不满,因此他们去给一些私营合作社当法律顾问。

怀旧的艺术家

在莫斯科远郊有一个舞台艺术家的“退休之家”,它位于莫斯科东面。那里住着100来名退休的歌唱家、演员和音乐家。他们当中的共产党员过去喜欢说,他们有吃,有住,穿得干干净净,而不花一个戈比。所有的人都理所当然地对他们的过去记忆犹新。

前演员、82岁的令人尊敬的老太太叶连娜·索伯莱娃1984年来到这个“退休之家”。她几乎从不外出,她不了解正在进行的改革。她回忆说:“当列宁去世时,我悲痛欲绝。我真想替他死。今天,我还时常想念他:当时,他代表着一切美好的东西。”叶连娜接着说:“后来,我在一个集体农庄工作,那时,我在集体农庄睡在地板上。条件是艰苦的,但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总是唱:‘愿它美好,我的祖国。’我们当时绝对信任斯大林。”她还说:“现在城里人的问题是难以理解的。他们的问题越来越具有政治色彩。我不经常听新闻。我的电视机坏了,我不能让人来修。新电视机看来也难以得到。人们甚至对我说,能吃饱饭就不易

了。但是我无法相信。”

忧虑的警察

在高尔基街的拐角处,17名突击队员埋伏在一辆停在那儿的公共汽车上。维塔利·基伊科少校再次强调:“目标:明斯克餐馆。不许任何人出来。”突击队员们又紧了紧他们的防弹背心,调整了一下他们的黑贝雷帽。这些身强力壮的突击队员是1988年建立的特种民警部队的成员,其任务是: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在这个寒冷的冬夜,特种民警部队在莫斯科所有可疑地点展开了一次打击行动。这次行动的计划是:“逮捕走私者、投机商、贩毒者、诈骗者、卖淫者……”

拂晓时,20多名嫌疑者被带入特种民警部队的积满污垢的办公室,其中有:明斯克餐馆的就餐者、宇宙咖啡馆的顾客、一名出租汽车司机及其乘客。一名娼妓……战利品是:一只铁拳头(套在手指上的凶器)、一把刀。基伊科少校说:“在这座城市里,人们应重新学会尊重警察。现在,人们当面嘲笑我们。社会上强盗歹徒横行。”的确,在莫斯科,目前犯罪案件激增。其形式各种各样:凶杀、绑架、强奸、诈骗、走私……

俄罗斯内务部的尼古拉·博伊科面带忧虑地说:“自今年年初以来,仅仅我们记录在案的就有敲诈案256起,凶杀案350起,入室盗窃案件比创纪录的1990年又增加了50%。为了美元,莫斯科人准备什么都干。何况苏联的法律现在已经失效。不再有人知道这是否合法,也不再有人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

青年:“当一个敲诈者”

思想混乱在青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莫斯科郊外维希诺,从前的一个酒吧间已被改建成一个体育馆。17岁的弗拉基克一边举杠铃,一边说:“在这个国家中,谁最强壮谁获胜。因此我想成为最强壮者。”每天晚上,弗拉基克和他的伙伴们就来这里锻炼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施瓦尔泽内格式的肌肉。

弗拉基克说:“当体育冠军?我毫无兴趣,这没有什么油水;意识形态?这是过时的东西;重要的是钱。”他郑重地表明了他的生活目标:“当一个敲诈者。”他是要成为一个像那些身穿运动衫强行为街头的玩具商、餐馆老板和商贩提供“保护”的神气活现的年轻人那样的人。

弗拉基克之所以产生奇怪的抱负是因为:有些年轻的敲诈者(据估计,在莫斯科约有几千)发了大财,他们驾驶铃木4轮驱动越野车在莫斯科横冲直撞,到处炫耀。一些年轻的莫斯科人不考虑任何“正当的”挣钱手段,当然这指的是美元。

25岁的萨沙说:“我的职业是泥瓦工,我每月挣300卢布。而我的牛仔裤却值800卢布!”他全身上下都是一副摇滚歌手的打扮:皮夹克,饰有金属片的长筒靴,每个手指都戴着嬉皮士式的戒指。他的“第二职业”是合伙走私牛仔裤、手表、电视机、毒品等。

少年:“没有未来”

莫斯科人的吸毒方法是先煮切碎的罂粟茎,然后将熬出的东西注入自己静脉。这是极其危险的。据专家们说,这种吸毒方法现在还不大普遍。因为真正毒品是美元。

16岁的中学生安德烈说:“在我的学校里,所有的小伙子都吸毒。低年级的学生吸烟。高年级的学生能提供一切,包括士兵们廉价出售的‘卡拉什尼科夫’式轻机枪。”据一项官方调查说,只有男孩子吸毒,女孩子则梦想成为“挣美元的妓女”。最有抱负的女孩子的梦想是到一家国际公司工作,她们的优先目标是:嫁给一个西方人。

青少年看来受到混乱的环境的影响。许多小孩在收集“非俄罗斯”物品,即西方的东西。他们捡小空啤酒瓶,这种小啤酒瓶在跳蚤市场上可以换25戈比。

大多数青少年喜欢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摇滚乐。晚上,由于酒吧间的东西太贵,他们便到黑市(比如,布尔什维克林荫道的黑市)买几瓶酒,成群结伙地聚集在街头、公园、建筑物旁或地下室里。人们对他们说,他们是国家的未来,而他们则哈哈大笑,以他们的方式回答说:“我

们没有未来。”

原来的莫斯科消失了。人们难以理解这一迷恋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一位前来分发食品援助的欧洲共同体官员说：“在莫斯科，一切都可以出卖。无论什么，青年人都准备干。我为他们的未来担忧。”

明天将会怎样？

戈尔巴乔夫改革以来，莫斯科人就失去了许多他们所信赖的东西，以致他们似乎感到担忧，似乎在反躬自问：谁知道明天将变成什么样呢？于是，女算命人、星相学家和其他占星者乘虚而入，大发横财。

出走。对于那些有出走能力的人来说，这种欲望是强烈的。最好的翻译、音乐家、科学家都力图离开这艘船。狄纳摩队最有天赋的足球运动员伊戈尔·科利瓦诺夫已被一家外国俱乐部买去。莫斯科已被瓦解。甚至警察都不再露面。按正式规定，酒后开车要罚款800卢布，而实际付款则为200卢布。现在，人们甚至不再知道怎样互相称呼。6年前，大家都叫“同志”。而后又称“男公民”或“女公民”。而今，在地铁里常听到乘客以“男的”或“女的”相称。^①

2. 民主的限度：与国家的自由繁荣无关

在西方的引诱和迎合之下，戈尔巴乔夫以民主为旗帜的改革到底给苏联、东欧人民带来了什么？无论从当时苏联、东欧的社会民主改造现状，还是以今天的历史经验积累来看，似乎美国向世界推销的“民主”价值并非总是那么令人接受和适用。

1991年4月11日，美国《新闻周刊》在题为“忧虑不安的时代”一文中，对苏联东欧的民主改造作出了如下评论：

^① [法]《快报》周刊，1991年12月6日。

一年以前,世界似乎陶醉在民主气氛之中。而今天看来,一个个国家相继变革带来的欢天喜地的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头痛的烦恼。戈尔巴乔夫为了维护苏联的统一,他有可能重新实行独裁统治。某些波兰人担心,波兰的首次自由的总统选举事实上会阻碍经济改革。罗马尼亚举行了开放的选举,获胜的却是前共产党人。

在东欧之外的地区,民主进程也并不比东欧顺利。美国推翻了巴拿马的诺列加独裁政权,结果却发现,选举产生的新政府需要得到大量扶植才能生存下去。以色列的民主政治制度看来根本无法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1990年使世界得到的教训是民主是有局限性的,这大概是一种正常的情况。民主概念已经被浪漫化到使人无法辨认的危险程度。它成了一种政治万应灵药。

过去的一年使人们得到了几点教训:随着90年代时间的推移,政治家们也许会把以下这些教训写进他们的教科书里:

1. 民主不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教师。东欧国家经过政权更迭后的经济情况却不大好。在墨西哥,萨利纳斯总统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是重新建立摇摇欲坠的经济,二是消除腐败整顿政治体制。他已明确决定首先处理经济问题;如果他首先处理政治问题的话,那他就永远不可能有处理经济问题的权威了。

2. 民主并不总是有助于加强国家的内聚力。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甚至连俄罗斯共和国看来都希望摆脱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南斯拉夫,人民既然有权就这些问题进行投票表决,那么这个国家看来也有可能分裂成为若干共和国。民主限制了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也会摧毁这种权力。

3. 民主并不总是在制造新的血液。美国人对政治家们感到非常气恼,但又不能避免他们重新当选。美国人现在在谈论修改宪法,限制国会议员的任期,表明公众并不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是完美的。在实现了

“民主”的东欧国家甚至可能会重新建立君主立宪制。^①

看来,民主并非治病的万能良药,其效果仍然是有限度的。1992年1月29日,《新闻周刊》以“民主的限度”为题再次发表评论,提醒正在从事改革的各国领导人,要注意“民主”的适用有限性。文章指出:

世界许多地方最近几年不断发生“民主”运动并取得了成功,但是“民主”并不等于繁荣和稳定,要消除人们心目中对“民主”的误解。全球不少地区和国家并不是先搞“民主”而繁荣起来的,而是先依靠不同程度的专制手段稳定局势和促进经济发展,然后再实行“开放”和“民主”。民主的形式应当多种多样,要适应当地的条件和历史的习惯。

国家领导人应注意不要陷入对民主的三种误解之中。

误解之一:民主定会带来繁荣。在一些国家里,有人往往把民主与自由市场经济联系起来,认为民主定会导致资本主义,会带来丰衣足食。然而,严酷的现实是,民主制度至少是在短时期内难以引进自由市场改革,因为这些改革是非常痛苦的和极其不得人心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改革使物价飞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他们中的许多人拒绝共产主义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而是没有给他们带来与西方一样的经济繁荣。一些地方的自由市场制度是在不开放的政治制度下发展起来的。在亚洲,发展模式看来是先繁荣后民主。韩国……新加坡全都是在几乎不能容忍反对派存在的政权统治下取得经济繁荣的。

误解之二:民主带来稳定。通常,民主会带来稳定。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从来没有过民主的经验,那么民主可能会成为一种破坏稳定的力量。许多中国人认为,要想把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和多样化的国家团结起来,实行某种程度的集权主义统治是必要的。最近几个月来把南斯拉夫弄得四分五裂的各民族之间的战斗和苏联的解体使

^① [美]《新闻周刊》,1991年4月11日。

得许多中国人显然更加相信这种观念了。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从短期前景来看,民主都不能保证给社会带来稳定和繁荣。

误解之三:民主意味着多数统治。民主即多数统治理应如此,但民主还意味着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和利益。南斯拉夫的四分五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造成的。此外,民主要求一整套机构予以保证,其中包括独立的司法系统、文官控制军队和新闻自由等,而上述机构的发展和成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那些年轻的民主国家很难达到这些标准。

此外,民主不能够统一模式,要注重各国和各地区的传统。例如在东亚,孔丘的价值观念仍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正如伦敦的亚洲问题专家西格尔所说:“从传统上来看,东亚的政治文明不是由统治支配的,而是由一种基本伦理观念支配的。西欧和北美所谓的民主不一定适应世界其他地方。”^①

3. 普京的反思:体制性危机与改革悲剧

作为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普京向来重视对俄罗斯历史,尤其是苏联时期的历史的总结和借鉴。在2012年12月国情咨文中就提出了“上好历史课”的问题。他说:“要复兴民族意识,我们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合为一体,要澄清一个最朴素的真理,俄罗斯历史既不始于1917年,更不始于1991年,我们有连贯一致的千年历史,只有依托这个历史,我们才能获得力量,理解国家发展的内涵。”^②

2013年2月19日,普京在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编写历史统一教科书的问题。4月5日,俄罗斯历史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由该协会组建制订俄罗斯史教科书新教学法大纲工作小组,组长由国家杜马主席兼俄罗斯历史协会主席纳雷什金担任,副组长为教育部长利瓦诺夫、文化部长兼俄罗斯

^① 《新闻周刊》,1992年1月29日。

^② [俄]普京:《普京文集(2012—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军事—历史协会主席梅金斯基,小组学术领导人由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里扬院士担任。

2014年1月16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新历史教科书《总构架大纲》的作者集体,要求在这个总体框架基础上,编写出俄罗斯史的新的统一教科书。事实上,《总构架大纲》表达了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社会政治中间派对历史,尤其是对苏联时期历史的“正式评价”。

《总构架大纲》对苏联解体原因的核心论述集中体现在如下内容:

勃列日涅夫时期被认为是20世纪我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但这并不是纯粹的单一含义。其开启之初,是同人们所期望的改革,也同苏联的发展繁荣相合拍的,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国家处于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危机状态。不能满足变化需要的在册官僚阶层,利用原材料出口不断增长的条件,特别注重于对业已形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结构采取保守倾向。在关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大吹大擂的词句下,体制性危机发展成熟;而1985—1991年苏联的“改革”政策,就是对这一危机的回应,而后苏联解体。^①

尽管目前《总构架大纲》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历史只是简单地列出条目而尚未作出详尽的阐述,但是普京本人对改革的看法却是显而易见的。在2007年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说:

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无论是在革命动荡时期还是在停滞年代,我们几乎都是希望变革。的确,我们每个人对怎样变革都有自己的设想,都有自己的重点和好恶,都有自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自然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然而,有一种东西是把我们都毫无例外地联结在一起的,那就是所有人都希望朝着美好的方面进行变革。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怎样才能变得更

^① 马龙闪:《从普京版历史教科书大纲解读苏联解体原因》,《历史教学问题》,2015年第2期。

好。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不仅应该知道怎样做,而且还有责任不遗余力地制订出务实的具体行动计划。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使绝大多数国民相信这个计划的有效性,并使他们都成为共同的创造性进程的实际参与者。^①

^① [俄]普京:《普京文集(2002—2008)》,张树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

结语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 和智慧深化改革

——执政党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勇气、智慧和胆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改革，难免触动一些人的‘奶酪’，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不可能皆大欢喜。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担当。畏首畏尾，不敢出招，怕得罪人，是难以落实措施、推动工作的。”^①在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执政党以极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建立健全公正、合理、透明、开放的利益分配机制，使改革的红利普惠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夯实社会稳定基础、重塑社会思想共识，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顺利发展。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来源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立场决定勇气。有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勇气。利益固化筑起的藩篱，本质上是政治权力过度扩张和异化的产物。其带来的直接社会后

^①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4年2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2页。

果就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以致成为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社会向上的流动性越来越小,社会发展的空间越来越窄,社会进步的动力越来越弱。最终,一个本应该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将会被板结固化的赤裸裸的利益社会所代替。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最大不幸!

苏联的瓦解崩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在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在册权贵”及其掌握的政治经济利益构成了强大的特权利益阶层,成为苏联社会进步发展的绊脚石。“在册权贵”的形成始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干部任命体制——“职务名册”制度。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月,中央委员会又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2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第3号“职务名册”,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的干部名单,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月23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苏联等级不等的“职务名册”在七十四年的历史中,造就了庞大的特权阶层:一方面,在这一制度下,“人只要一进入官僚系统,马上开始使用权利,发放食品购买证和进入各种基地的通告证”^①;另一方面,这一制度“通过这个官僚系统保护自己”^②,从而更加强化了制度的垄断性。然而在国家面临巨大变革的关键时刻,苏联的权贵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右转,从而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堂而皇之地实现了对苏联人民创造了七十四年社会主义成果的窃取和占有。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调查表明,截至1995年,在新政府中有75%的人是苏联的党政干部,他们曾是苏共、共青团、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高级领导人;有82%的地方领导人和61%的大工商业家来自苏联的官僚机构。俄罗斯新闻媒介便直言不讳地讲,俄罗斯的暴发

① [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9~50页。

② 同上,第49页。

户中,61%的人靠的是将国有企业化为私有;而90%私有企业老板是过去社会主义企业的领导人。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希福德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①

苏联剧变的惨痛教训警醒我们:党内决不能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②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政治准则和发展导向。改革开放作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过程其实就是中国社会利益格局不断调整重组的过程。三十多年的成功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正确处理好了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能顺利进行;什么时候没有及时处理好社会利益关系,什么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遇到波折。今天,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的关键时刻,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更需要执政党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极大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确立公开、公正、公平的社会利益新格局,让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中国人民。那么怎样才能理顺社会利益关系,避免社会的负向发展,保证改革在健康发展呢?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执政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目标。只有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政治立场,才能正视利益固化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才能有敢于担当、勇于任事,排除万难、奋发作为的政治勇气。具体来说,就是要始终扶持人民主体地位,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人民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无论遇到什么

^① 《在自己葬礼上致富——苏共特权阶层腐朽生活》,《文史参考》,2010年第15期。

^②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困难和挑战,只要人民支持和参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越不过的坎。”^①

二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智慧来源于现代的政治精神。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对社会危害甚大、对党的执政根基危害甚大。它不仅会在经济利益上造成社会分配的不合理、不公正,而且更会在社会心理上形成乃至强化人民对政权的冷漠感、疏远感,从而从根本上销蚀政权的社会根基。

1991年12月25日19时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19时38分,象征红色政权的镰刀锤子旗从克里姆林宫徐徐下落,俄罗斯的三色旗随之升起。聚集在红场上的人们意识到,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然而令世人意外的是,无论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还是苏联社会的普通大众都平静地接受了苏联消亡的现实。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在一个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大国消亡的时候,社会竟是如此的平静?27日的《俄罗斯报》道出了其中的缘由。在苏联人民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好处,还带来了持续的混乱和不安,其改革的结果是,“留下了一个分裂的帝国,这个帝国曾有一个名字叫苏联;留下了无法遏止的通货膨胀、街头乞丐;留下了百万富翁和据说达到80%的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民”^②。可以说,对改革的彻底失望,最终造成了在苏联共产党最需要人民支持的时候而被人民所抛弃!探究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在于苏联共产党远远地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执政党的现代政治要求,即人民对公正、自由、民主

^①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

^② 俄罗斯政治与经济历史中心:《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政治对抗1500天》,王南枝译,新华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的精神需求和现实渴望,仍然沿袭斯大林模式的治国理念,最终使党丧失了对社会的敏锐观察能力和战略适应能力。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以绝对大的政治勇气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让人民充分享受改革成果,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中国前途命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关怀的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这种政治智慧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执政条件下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政治精神。现代政治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现代认知和自我完善。这一精神分别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体现出了极强的现代制度精神、现代社会精神和现代公民精神:

(1)从国家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始终坚持中国的根本制度与不断发展完善具体制度相结合的现代制度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进行改革开放,既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件,又是一项极富挑战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这场革命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这就是我们始终将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说,只有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为中国制度的现代创新提供坚定的政治基础。

(2)从社会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调整完善社会组织管理的法律规范与培育组织自治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一个充满活力、富于创新的历史活动,也是一个不断释放动能、社会重组的实践过程。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变,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多元发展过程中蕴含的内在变革要求,又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向执政型政党实现现代转型的必然选择。双重转型的内在要求与现实压力,都表明了在现代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国家—社会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党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积极主动推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可以说,只有遵循现代社会的治理规

律,才能在正确处理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提供绵绵不绝的社会动力。

(3)从公民层面来看,现代政治精神体现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引导与尊重个体利益相结合的现代公民精神。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既是现代中国的发展战略,更是现代中国社会凝聚共识和价值重塑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凝聚改革共识难度加大,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面对这一新情况新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把它作为塑造公民精神的主要思想资源。在这二十四字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实现了国家、社会和个体价值追求的有机融合,成为中国现代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有尊重、关怀公民个体的独立精神和利益选择,才能在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中,为社会主义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生生不息的现代精神素养。

可以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所形成的上述现代政治精神,使党能够更加自觉、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利益固化藩篱在现代社会的危害,也促使党积极主动行动起来,坚决予以破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推进改革必须一鼓作气、坚定不移,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勇气,不可迟疑、不可退缩。我们要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①

三

执政党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来源于强大的政治自信。“不谋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0~41页。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利益固化所形成的利益藩篱,往往涉及领域广、牵扯部门多、社会关注大,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漩涡可能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仅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勇气,要有破除利益固化的政治智慧,更要有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政治胆略。所谓政治胆略,即是说做事情,既要有胆识,又要讲方略,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这种敢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的胆略源于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的强大政治自信。

一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信念坚定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社会的团结纽带。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广大党员干部是党执政的组织行动力量和可靠政治保证。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高昂的进取精神,就一定能够实现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政治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言:“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我一直在想,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我相信,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能够做到的。”^①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团结纽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治前提和组织纽带。这是任何别的力量都无法替代的!

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执政经验和执政智慧。执政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治国理政实践,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处理棘手问题的方法与经验,并逐步形成了现代条件下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能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有足够的力量、有多种的办法,能够打破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观念机制束缚,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综合平衡中,稳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实践证明: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① 习近平:“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2013年6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5页。

康社会,就一定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可以说,强大的政治自信和高超的政治艺术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现代升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时,具备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局面和突发情况的政治能力,能够确保在利益格局进行深度调整的关键时期,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中央政治局坚定这个信心,只要中央委员会坚定这个信心,只要全党坚定这个信心,只要全国各族人民坚定这个信心,不论遇到什么风雨、困难、挑战,我们都能够坚定不移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①

列宁说,党是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历史的担当、复兴的使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政治智慧和政治胆略,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前进中的阻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所言:“我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一定要不负重托,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以自己的最大智慧、力量、心血,做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业绩。”^②

^①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11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141页。

^②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各个方面工作”(2012年11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军队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第114页。

参考文献

一、资料汇编类

1. 《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 苏群译,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2. 《戈尔巴乔夫:关于改革的讲话(1986—1987)》, 苏群译,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3. [苏]米·戈尔巴乔夫:《十月与改革:革命在继续》, 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7年。
4. [苏]米·戈尔巴乔夫:《赋予改革的改革以革新的意识形态》, 莫斯科新闻社出版社, 1988年。
5. 黄宏、纪玉祥主编:《原苏联七年“改革”纪实》, 红旗出版社, 1992年。
6. 康绍邦等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89—1990.3)》,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7. 柯燕编:《苏联东欧近期资料选编(1990.4—1990.8)》, 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内部参考资料。
8. 辛华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1987年。
9. 尧凌珊编:《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文件和评论》, 新华出版社, 1988年。
10. 苏群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 人民出

版社,1991年。

11.《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1964年。

12.《赫鲁晓夫言论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13.《勃列日涅夫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

14.《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新华出版社,1984年。

15.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二、期刊类

1.《参考消息》(1985—1991)。

2.《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5—1991)。

三、政治传记类

1.[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

2.[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潘兴明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

3.[俄]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4.[俄]米·谢·戈尔巴乔夫:《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5.[俄]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全著:《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孙凌齐、李京洲译,中央编译出版,2003年。

6.[俄]戈尔巴乔夫、[日]池田大作:《20世纪的精神教训》,孙立川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7.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述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

8.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9. [俄]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李永全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10. [俄]叶·库·利加乔夫:《警示》,钱乃成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

11. [俄]尼·伊·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08年。

12.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

13.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患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4. [俄]根纳季·亚纳耶夫:《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5. [俄]鲍里斯·叶利钦:《总统笔记》,李垂发等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

16. [俄]A. B. 科尔扎柯夫:《我所知道的叶利钦——俄罗斯总统安全局前局长回忆录》,杨藻镜、葛澹云、王文静译,外文出版社,1999年。

17.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18. [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

19. [俄]瓦·巴卡京:《摆脱克格勃——克格勃最后一任主席回忆录》,非琴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0. [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大政治年代》,焦广田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

21. [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2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尤里·安德罗波夫的政治传记》,徐葵、张达楠、何香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23. [苏]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24. [俄]Ю. В. 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张俊翔、石国雄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25. [俄]亚历山大·佩日科夫:《“解冻”的赫鲁晓夫》,刘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
26. [意]维·维达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日记》,王德树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
27. [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
28. [俄]列昂尼德·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
29. [苏]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自传: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30.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三卷本),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31. [苏]列夫·托洛茨基:《俄国局势真相》,刘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
32. [苏]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苏联的现状及其前途》,柴金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
33. [英]艾萨克·多依彻:《斯大林政治传记》,于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
34. [美]罗伯特·C. 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朱浒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35. [英]伊恩·格雷:《斯大林——历史与人物》,张志明、朱振国、唐国强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

36. [苏]罗·梅德韦杰夫:《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彭卓吾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7. [苏]普·凯尔任采夫:《列宁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5年。

38.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张开、达洲、陈启民译,新华出版社,1980年。

39. [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

40. [美]斯蒂芬·F.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

41. [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

42.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站在21世纪门槛上:总统手记》,陆兵、王嘉琳译,时事出版社,1997年。

43. [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李石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

44. [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攀迪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年。

45. [美]塔德·肖尔茨:《和平的幻想:尼克松外交内幕》,邓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46. [美]理查德·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王观声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

47. [美]吉米·卡特:《保持信心——吉米·卡特总统回忆录》,裘克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

48. [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1977—1981年国家安
全顾问回忆录》,邱应觉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

49. [美]罗纳德·里根:《里根回忆录》,萨本望等译,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1年。

50. [美]乔治·布什、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重组的世界:1989—1991年世界重大事件的回忆》,胡发贵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51. [美]罗伯特·盖茨:《亲历者:五任美国总统赢得冷战的内幕》,刘海青、吴春玲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

四、学术著作类

1. [俄]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年。

2. [俄]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王晓玉、姚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3.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侯艾君、葛新生、陈爱茹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4. [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徐葵、张达楠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5. [俄]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著:《克里姆林宫秘史》,徐芳夫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

6. [俄]B. A. 利西奇金、Jl. A. 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7.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8.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徐葵、邹用九、裘因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

9. [苏]阿·阿会托尔汉诺夫:《苏共野史——中央委员会与列宁》,晨曦、李荫寰、关益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0. [英]阿奇·布朗:《改变世界的七年》,韩凝等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

11. [英] 奥兰多·弗吉斯:《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 [爱尔兰] 康纳·奥克莱利:《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沈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 [澳大利亚] 科伊乔·佩特罗夫:《戈尔巴乔夫现象——改革年代:苏联东欧与中国》,葛志强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4. [美] 大卫·科兹等:《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5. [美]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梁永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6. [美] 丹尼斯·K. 姆贝:《组织中的传播和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和统治》,陈德民、陶庆、薛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17. [法] 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9. [法] 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 [德] 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21. [德]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美] 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高德平译,北京出版社,1985年。
23. [美]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李晓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24. [法] 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5. [德]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殷叙彝等译,贵州人民

出版社,2001年。

26. [英]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等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

27. [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28. [澳大利亚]彼得·科尔曼:《自由派的阴谋:文化自由同盟与战后欧洲人心的争夺》,黄家宁等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

29.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交易·谍影·谎言·真相》,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0. [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王琛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

31. [美]安德鲁·N. 鲁宾:《帝国权威的档案:帝国、文化与冷战》,言子馨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32. [美]梅尔文·P. 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闵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33. [美]德瑞克·李波厄特:《50年伤痕:美国的冷战历史观与世界》(上),郭学堂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34. [英]保罗·约翰逊:《现代:从1919年到2000年的世界》,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挪]文安利:《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社公司,2014年。

36. [德]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英格里德·宗塔格:《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吴雪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能否早日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能否顺利解决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的关系问题。国外转型社会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尤其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转型中分崩离析的沉痛教训更值得中国总结汲取。

高放教授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重大研究选题，也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勇敢面对和正在探索解决的巨大实践课题。相信“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能够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上海市政治学会名誉会长 王邦佐

“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研究”丛书第一辑以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问题为论述重点。这四本书犹如四部曲，环环相扣，层层展开，对于不断深化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相关性的研究是特别有益的。

——华东师范大学 王斯德教授

本丛书的最大特点是视角比较新颖，专题以纵向、横向综合性研究切入，避免单纯按历史顺序的史学研究范式展开，能较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在全新的国内外环境下大党治理与大国兴衰中的深层次问题，对我国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 周尚文教授

原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末的转型是世界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这一转型过程的研究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有益镜鉴。此丛书聚焦于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对于当前的中国尤有现实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 余伟民教授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二维码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二维码

上架建议：国际政治

ISBN 978-7-201-12496-4



9 787201 124964 >

定价：118.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466208

SS号=14466208